

目 录

文学与文化

- 3 刘文飞 / 诗散文：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
- 26 龙瑜晟 / “落在两扇磨石间的谷粒”：索尔仁尼琴在西方（1974-1994）

东正教

- 62 翁泽仁 / 当代俄罗斯东正教报刊的世俗化特色探析
- 82 张晓玲 梁英超 / 试论俄罗斯东正教哥萨克节的产生

认同问题

- 105 赵凤彩 / 东正教与当代俄罗斯国民信仰及自我认同
- 120 文龙杰 / 关乎身份认同：俄欧关系中的免签问题

教育问题

- 150 朱川豫 / 试论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妇女教育改革
- 172 顾鸿飞 / 社会转型背景下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发展的选择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贝文力、肖辉忠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4 年 10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4 年第 5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Лю Вэньфэй

Проза в стихах: "О скорби и разуме"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3)

Лон Юйчэн

«Угодило зе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Солженицын на Западе
(1974-1994) (26)

Вэн Цзэжэнь

Анализ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секуляризац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печати (62)

Чжан Сяолин, Лян Инчжа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Праздника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 (82)

Чжао Фэнцай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на исповедание и само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народ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05)

Вэнь Луцизе

Об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опрос безвизового режим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120)

Чжу Чуаньюй

О реформе жен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о времена прав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Екатерины II (150)

Гу Хунфэй

Развитие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социаль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172)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4 年第 5 期 (双月刊)

Contents

Liu Wenfei

Poem Prose: Joseph Brodsky's *On Grief and Reason*..... (3)

Long Yucheng

“The Grain between the Millstones”: Solzhenitsyn in the West
(1974-1994) (26)

Weng Zeren

Features of Seculariz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Russian Orthodox Press ... (62)

Zhang Xiaoling, Liang Yingchao

On the Birth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Cossacks' Day (82)

Zhao Fengcai

The Orthodox Church, Faith and Self-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Russia ... (105)

Wen Longjie

Identity: Visa-free Issue within Russia-Europe Relations (120)

Zhu Chuanyu

On the Women Education Reform under Catherine the Great (150)

Gu Hongfei

Choices for Russian Non-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Social Transition..... (172)

文学与文化**诗散文：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

刘文飞*

【内容提要】杰出的俄语诗人布罗茨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英语散文家。他生前最后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是他散文创作的集大成者。通过对这部文集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可以对布罗茨基散文的内容和形式、风格和特色有更深入的认识。诗歌和散文之间早有“散文诗”和“韵律散文”等交叉体裁，而《悲伤与理智》一书的文体更可定义为“诗散文”。布罗茨基曾言茨维塔耶娃的散文“是她的诗歌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有论者也认为布罗茨基的散文同样是他的诗歌之“继续”。事实上，在布罗茨基的创作中，诗和散文这两大体裁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二者间并无分明的主次地位或清晰的从属关系。以《悲伤与理智》一书为代表的布罗茨基散文创作所体现出的鲜明个性，所赢得的巨大成功，表明布罗茨基的散文不仅是其诗歌的“继续”，更是一种“发展”，甚至已构成一种有其独特风格和自在意义的“存在”。

【关键词】布罗茨基 散文 《悲伤与理智》 诗散文

【中图分类号】D751.2;I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 05-0003-(23)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1940-1996）是以美国公民身份获得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但在大多数场合却一直桂冠以“俄语诗人”（Russian poet）之称谓^①；他在1972年自苏联流亡西方后，

* 刘文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① 见维基百科“Joseph Brodsky”词条，http://en.wikipedia.org/wiki/Joseph_Brodsky。

始终坚持用俄语写诗，并被视为“20世纪后半期唯一一位可以与世纪之初灿若星辰的诗人们相媲美的俄语诗人”^①，甚至是“第一俄语诗人”^②。可是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界，布罗茨基传播最广、更受推崇的却是他的英语散文，他甚至被称作“伟大的英语散文家之一”（on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s great essayists）^③。作为高傲的“彼得堡诗歌传统”的继承人，布罗茨基向来有些瞧不起散文，似乎是一位诗歌至上主义者。可散文却显然给他带来了更大声誉，至少是在西方世界。世界范围内三位最重要的布罗茨基研究者列夫·洛谢夫（Lev Loseff）、托马斯·温茨洛瓦（Tomas Venclova）和瓦连金娜·帕鲁希娜（Valentina Palukhina）都曾言及散文创作对于布罗茨基而言的重要意义。洛谢夫指出：“布罗茨基在美国、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整个西方的作家声望，因为他的散文创作而得到了巩固。”^④帕鲁希娜说：“布罗茨基在俄国的声誉主要仰仗其诗歌成就，而在西方，他的散文却在塑造其诗人身份的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⑤温茨洛瓦则称，布罗茨基的英语散文“被公认为范文”^⑥。作为“英文范文”的布罗茨基散文如今已获得广泛的阅读，而布罗茨基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On Grief and Reason*, 1995），作为其散文创作的集大成者，更是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赞誉。通过对这部散文集的解读，我们或许可以获得一个关于布罗茨基散文的内容和形式、风格和特色的较为全面的认识，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布罗茨基创作中诗歌和散文这两大体裁间的关系，进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布罗茨基的散文创作，乃至他的整个创作。

① [立陶宛]托马斯·温茨洛瓦：《〈诗歌漂流瓶〉序》，见刘文飞：《诗歌漂流瓶——布罗茨基与俄语诗歌传统》，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页。

② [美]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刘文飞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293页。

③ Joseph Brodsky, *On Grief and Reason*,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1, 封底。

④ [美]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刘文飞译，第290页。

⑤ V. Palukhina, “The Prose of Joseph Brodsky: A Continuation of Poetry by Other Means”, *Russian Literature*, 1997, XLI, p.223.

⑥ [立陶宛]托马斯·温茨洛瓦：《〈诗歌漂流瓶〉序》，见刘文飞：《诗歌漂流瓶——布罗茨基与俄语诗歌传统》，第1页。

—

约瑟夫·布罗茨基 1940 年 5 月 24 日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父亲是海军博物馆的摄影师，母亲是一位会计。天性敏感的他由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主动疏离周围现实，并在八年级时主动退学，从此走向“人间”，做过包括工厂铣工、天平间整容师、澡堂锅炉工、灯塔守护人、地质勘探队员等在内的多种工作。他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写诗，并接近阿赫马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他大量阅读俄语诗歌，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两三年内“通读了”俄国大诗人的所有作品，与此同时他自学英语和波兰语，开始翻译外国诗歌。由于在地下文学杂志上发表诗作以及与外国人来往，布罗茨基受到克格勃的监视。1963 年，布罗茨基完成《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Большая элегия Джону Донну），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朗诵此诗。此诗传到西方后引起关注，为布罗茨基奠定了诗名。1964 年，布罗茨基因“不劳而获罪”被起诉，判处 5 年刑期，被流放至苏联北疆的诺连斯卡亚村。后经阿赫马托娃、楚科夫斯基（Корней Чуковский）、帕乌斯托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устовский）、萨特（Jean-Paul Sartre）等文化名人的斡旋，他在一年半后获释。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这所谓的“布罗茨基案件”（Дело Бродского）使布罗茨基举世闻名。他的一部诗集在他本人并不知晓的情况下于 1965 年在美国出版。^①之后，他的英文诗集《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及其他诗作》（Elegy to John Donne and Other Poems, 1967）和俄文诗集《旷野中的停留》（Остановка в пустыне, 1970）又相继在英国和美国面世。与此同时，他在苏联国内的处境却更加艰难，无法发表任何作品。1972 年，布罗茨基被苏联当局变相驱逐出境。他在维也纳受到奥登（Wystan Hugh Auden）等人的关照，之后移居美国，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执教，并于 1977 年加入美国国籍。定居美国后，布罗茨基在流亡前后所写的诗作相继面世。他陆续推出多部俄、英文版诗集，如《诗选》（Selected Poems, 1973）、《在英国》（В Англии, 1977）、《美好时代的终结》（Конец прекрасной эпохи,

^① 即《长短诗集》（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Washington & NY: Inter-Language Literary Association, 1965.

1977)、《话语的部分》(Часть речи, 1977; Part of Speech, 1980)、《罗马哀歌》(Римские элегии, 1982)、《献给奥古斯塔的新章》(Новые стансы к Августе, 1983)、《乌拉尼亚》(Уrania, 1987; To Urania, 1992)和《等等》(So Forth, 1996)等。1987年, 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 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之后, 布罗茨基成为享誉全球的大诗人, 其诗被译成世界各主要语言。1991年, 他当选美国“桂冠诗人”(Laureate Poet)。苏联解体前后, 他的作品开始在俄国发表, 至今已有数十种各类单行本诗文集或多卷集面世。其中以圣彼得堡普希金基金会推出的7卷本《布罗茨基文集》,^①和作为“诗人新丛书”之一种由普希金之家出版社和维塔·诺瓦出版社联合推出的2卷本《布罗茨基诗集》^②最为权威。1996年1月28日, 布罗茨基因心脏病发作在纽约去世, 其遗体先厝纽约, 后迁葬于威尼斯的圣米歇尔墓地。

像大多数诗人一样, 布罗茨基在文学的体裁等级划分上总是抬举诗歌, 他断言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布罗茨基曾应邀为一部茨维塔耶娃(Марина Цветаева)的散文集作序, 在这篇题为《诗人与散文》(Поэт и проза; A Poet and Prose)的序言^③中, 他精心论述了诗歌较之于散文的若干优越之处: 诗歌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 诗人因其较少功利的创作态度而可能更接近文学的本质; 诗人能写散文, 而散文作家却未必能写诗, 诗人较少向散文作家学习, 而散文作家却必须向诗人学习, 学习驾驭语言的功力和对文学的忠诚; 伟大如纳博科夫那样的散文家, 往往都一直保持着对诗歌的深深感激, 因为他们在诗歌那里获得了“简洁与和谐”。在其他场合, 布罗茨基还说过, 诗歌是对语言的“俗套”和人类生活中的“同义反复”的否定, 因而比散文更有助于文化的积累和延续, 更有助于个性的塑造和发展。

同样, 像大多数诗人一样, 布罗茨基也不能不写散文。在谈及诗人茨维塔耶娃突然写起散文的原因时, 除茨维塔耶娃当时为生活所迫必须写作容易

① 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т. I-VII.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ушкинского фонда", 2001-2003.

② 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в 2 т.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ушкинского Дома 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ита Нова", 2011.

③ Joseph Brodsky, *Less Than One*, NY: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6, pp.176-194. 中译见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 刘文飞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年, 第117-133页。

发表的散文以挣些稿费这一“原因”外，布罗茨基还给出了另外几个动因：一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need），一个识字的人可以一生不写一首诗，但一个诗人却不可能一生不写任何散文性的文字，如交往文字、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文等等；二是主观的“冲动”，“诗人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突然想用散文写点什么”^①；三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对象”和某些题材，如情节性很强的事件、三个人物以上的故事、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往事的追忆等等，就更宜于用散文来进行描写和叙述。所有这些，大约也都是布罗茨基本人将大量精力投入散文创作的动机。除此之外，流亡西方以后，在一个全新的文学和文化环境中，他想更直接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想让更多的人听到他的声音；以不是母语的另一种文字进行创作，写散文或许要比写诗容易一些。布罗茨基在《悼斯蒂芬·斯彭德》（*In Memory of Stephen Spender*）一文中的一句话似乎道破了“天机”：“无论如何，我的确感觉我与他们（指英语诗人麦克尼斯、奥登和斯彭德。——引者按）之间的同远大于异。我唯一无法跨越的鸿沟就是年龄。至于智慧方面的差异，我在最好的状态下也会说服自己，说自己正在逐渐接近他们的水准。还有一道鸿沟即语言，我一直在竭尽所能地试图跨越它，尽管这需要散文写作。”^②作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美国桂冠诗人，他经常应邀赴世界各地演讲，作为美国多所大学的知名文学教授，他也得完成教学工作，这些“应景的”演说和“职业的”讲稿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但布罗茨基写作散文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猜想还是他热衷语言试验的内在驱动力，他将英语当成一个巨大的语言实验室，终日沉湎其中，乐此不疲。

布罗茨基散文作品的数量与他的诗作大体相当，在前面提及的俄文版7卷本《布罗茨基文集》中，前4卷为诗集，后3卷为散文集，共收入各类散文60余篇。由此不难看出，诗歌和散文在布罗茨基的创作中几乎各占半壁江山。布罗茨基生前出版的散文集有3部，均以英文首版，即《小于一》（*Less Than One*, 1986）、《水印》（*Watermark*, 1992）和《悲伤与理智》。《水印》

① 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刘文飞译，第118页。

② Joseph Brodsky, *On Grief and Reason*,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1, p.411. 以下引自本书的引文仅在引文后括号内标明页码和文章标题。

一书仅百余页，实为一篇描写威尼斯的长篇散文；另两本书则均为近 500 页的大部头散文集。说到布罗茨基散文在其创作中所占的比例，帕鲁希娜推测，布罗茨基“各种散文作品的总数要超出他的诗歌”^①。洛谢夫也说：“《布罗茨基文集》第二版收有 60 篇散文，但还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英文文章、演讲、札记、序言和致报刊编辑部的书信没有收进来。”^②布罗茨基生前公开发表各类散文，总数约合中文百万字，由此推算，布罗茨基散文作品的总数约合中文两百万字。

据统计，在收入俄文版《布罗茨基文集》中的 60 篇各类散文中，用俄语写成的只有 17 篇^③，也就是说，布罗茨基的散文主要为“英文散文”。值得注意的是，布罗茨基的各类散文大都发表在《纽约图书评论》(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纽约客》(The New Yorker)等英美主流文化媒体上，甚至刊于《时尚》(Vogue)这样的流行杂志，这便使他的散文迅速赢得了广泛的受众。他的散文多次入选“全美年度最佳散文”(The Best American Essays)，如《一件收藏》(Collector's Item)曾入选“1993 年全美最佳散文”，《向马可·奥勒留致敬》(Homage to Marcus Aurelius)曾入选“1995 年全美最佳散文”。1986 年，他的 18 篇散文以《小于一》为题结集出版，在出版当年即获“全美图书评论奖”(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作为《小于一》姐妹篇的《悲伤与理智》出版后，也曾长时间位列畅销书排行榜。需要指出的是，布罗茨基这两部散文集的出版者就是纽约大名鼎鼎的法拉尔、斯特劳斯和吉罗克斯出版社(Farrar Straus Giroux，简称FSG)。这家出版社以“盛产”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而著称，在自 1920 年至 2010 年的 90 年间，在该社出版作品的作家中共有 23 位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就包括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 1970 年获奖)、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 1980 年获奖)、索因卡(Wole Soyinka, 1986 年获奖)、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 1992 年获奖)、希尼(Seamus Heaney, 1995 年获奖)和略萨(Mario

① V. Polukhina, “The Prose of Joseph Brodsky: A Continuation of Poetry by Other Means”, p.223.

② [美]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刘文飞译，第 294 页。

③ 同上。

Vargas Llosa, 2010 年获奖) 等人。顺便提一句,《悲伤与理智》扉页上的题词“心怀感激地献给罗杰·威·斯特劳斯”,就是献给该社两位创办者之一的罗杰·威廉姆斯·小斯特劳斯(Roger Williams Straus, Jr.)的。

散文集《悲伤与理智》最后一页上标明了《悼斯蒂芬·斯彭德》一文的完稿时间,即“1995年8月10日”,而在这个日期之后不到半年,布罗茨基也离开了人世。《悲伤与理智》因此也就成了布罗茨基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散文集,是布罗茨基散文写作、乃至其整个创作的“天鹅之歌”。

二

《悲伤与理智》共收入散文 21 篇,它们大致有这么几种类型,即回忆录和旅行记,演说和讲稿,公开信和悼文等。具体说来,其中的《战利品》(Spoils of War)和《一件收藏》是具有自传色彩的回忆录;《一个和其他地方一样好的地方》(A Place as Good as Any)、《旅行之后,或曰献给脊椎》(After a Journey, or Homage to Vertebrae)和《向马可·奥勒留致敬》近乎旅行随笔;《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The Condition We Call Exile, or Acorns Aweigh)、《表情独特的脸庞》(Uncommon Visage)、《获奖演说》(Acceptance Speech)、《第二自我》(Alter Ego)、《怎样阅读一本书》(How to read a Book)、《颂扬苦闷》(In Praise of Boredom)、《克利俄剪影》(Profile of Clio)、《体育场演讲》(Speech at the Stadium)、《一个不温和的建议》(An Immodest Proposal)和《猫的“喵呜”》(A Cat's Meow)均为布罗茨基在研讨会、颁奖仪式、书展、毕业典礼等场合发表的演讲;《致总统书》(Letter to a President)和《致贺拉斯书》(Letter to Horace)为书信体散文;《悲伤与理智》(On Grief and Reason)和《关爱无生命者》(Wooing the Inanimate)是在大学课堂上关于弗罗斯特和哈代诗歌的详细解读;《九十年之后》(Ninety Years Later)则是对里尔克《俄耳甫斯·欧律狄刻·赫尔墨斯》(Orpheus. Eurydice. Hermes)一诗的深度分析;最后一篇《悼斯蒂芬·斯彭德》是为诗友所作的悼文。文集中的文章大致以发表时间为序排列,其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 1986 年,最后一篇写于 1995 年,时间跨度近 10 年,这

也是布罗茨基写作生涯的最后 10 年。

这些散文形式多样，长短不一，但它们诉说的却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诗和诗人”。布罗茨基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说中称：“我这一行当的人很少认为自己具有成体系的思维；在最坏的情况下，他才自认为有一个体系。”（第 39 页，《表情独特的脸庞》）也就是说，作为一位诗人，他是排斥所谓的理论体系或成体系的理论的。但是，在通读《悲伤与理智》并略加归纳之后，我们仍能获得一个关于布罗茨基诗歌观和美学观、乃至他的伦理观和世界观的整体印象。

首先，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布罗茨基断言：“在真理的天平上，想象力的分量就等于、并时而大于现实”（第 12 页，《战利品》）。他认为，不是艺术在模仿现实，而是现实在模仿艺术，因为艺术自身便构成一种更真实、更理想、更完美的现实。“另一方面，艺术并不模仿生活，却能影响生活。”（第 205 页，《悲伤与理智》）“因为文学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释各种人类命运、各种体验之含义的手册。”（第 29 页，《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他在以美国桂冠诗人身份而作的一次演讲中声称：“诗歌不是一种娱乐方式，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不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我们的人类学和遗传学目的，是我们的语言学和进化论灯塔。”（第 177 页，《一个不温和的建议》）阅读诗歌，也就是接受文学的熏陶和感化作用，这能使人远离俗套走向创造，远离同一走向个性，远离恶走向善。因此，诗就是人类保存个性的最佳手段，“是社会所具有的唯一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狗咬狗原则的解毒剂；它提供一种最好的论据，可以用来质疑恐吓民众的各种说辞，这仅仅是因为，人的丰富多样就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存在的意义”（第 21 页，《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就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第 46 页，《表情独特的脸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在本书中不止一次地引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命题，即“美将拯救世界”（красота спасет мир; beauty will save the world），也不止一次地重申了他自己的一个著名命题，即“美学为伦理学之母”（aesthetics is the mother of ethics）。布罗茨基在接受诺贝尔奖时所作的演说《表情独特的脸庞》是其美学立场的集中

表述，演说中的这段话又集中地体现了他关于艺术及其实质和功能的看法：

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我再重复一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目标。（第43页）

一位研究者指出：“约瑟夫·布罗茨基创作中的重要组成是散文体文学批评。尽管布罗茨基本人视诗歌为人类的最高成就（也大大高于散文），可他的文学批评，就像他在归纳茨维塔耶娃的散文时所说的那样，却是他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之继续发展。”^①关于语言，首先是关于诗歌语言之本质、关于诗人与语言之关系的理解，的确构成了布罗茨基诗歌“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他将诗歌视为语言的最高存在形式，由此而来，他便将诗人置于一个崇高的位置。他曾称曼德施塔姆（Осип Мандельштам）为“文明的孩子”（child of civilization），并多次复述曼德施塔姆关于诗歌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恋”（тоска по мировой культуре）的名言。因为语言就是文明的载体，是人类创造中唯一不朽的东西。图书馆比国家更强大，帝国不是依靠军队而是依靠语言来维系的，而诗歌作为语言之最紧密、最合理、最持久的组合形式，无疑是传递文明的最佳工具。诗人的使命就是用语言诉诸记忆，进而战胜时间和死亡、空间和遗忘，为人类文明的积淀和留存做出贡献。但另一方面，布罗茨基又继承诗歌史上传统的灵感说，夸大诗人在写作过程中的被动性。他在不同的地方一次次地提醒我们：诗人是语言的工具。“是语言在使用人类，而不是相反。语言自非人类真理和从属性的王国流入人类世界，最终发出这种无生命物质的声音，而诗歌只是其不时发出的潺潺水声之记录。”（第288—289页，《关爱无生命者》）“实际上，缪斯即嫁了人

^① Альберт Леонг.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 творчество, личность, судьба. СПб.: Журнал "Звезда", 1998. С.237.

的‘语言’”，“换句话说，缪斯就是语言的声音；一位诗人实际倾听的东西，那真的向他口授出下一行诗句的东西，就是语言。”（第 71 页，《第二自我》）布罗茨基的诺贝尔奖演说是以这样一段话作为结束的：

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或烈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于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称之为诗人。（第 50 页）

最后，从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对于具体的诗人和诗作的解读和评价中，也不难感觉出他对某一类型的诗人及其诗作的心仪和推崇。站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讲台上，布罗茨基心怀感激地提到了他认为比他更有资格站在那里的 5 位诗人，即曼德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Robert Frost）、阿赫马托娃和奥登。在文集《小于一》中，成为他专文论述对象的诗人依次是阿赫马托娃（《哀泣的缪斯》〈The Keening Muse〉）、卡瓦菲斯（Constantine Cavafy，《钟摆之歌》〈Pendulum's Song〉）、蒙塔莱（Eugenio Montale，《在但丁的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Dante〉）、曼德施塔姆（《文明的孩子》〈The Child of Civilization〉）、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潮汐的声音》〈The Sound of the Tide〉）、茨维塔耶娃（《诗人与散文》〈A Poet and Prose〉以及《一首诗脚注》〈Footnote to a Poem〉）和奥登（《析奥登的〈1939 年 9 月 1 日〉》〈On "September 1, 1939" by W. H. Auden〉以及《取悦阴影》〈To Please a Shadow〉）等 7 人。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他用心追忆、着力论述的诗人共有 5 位，即弗罗斯特、哈代（Thomas Hardy）、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贺拉斯（Horace）和斯彭德。这样一份诗人名单，大约就是布罗茨基心目中的大诗人名册了，甚至就是他心目中的世界诗歌史。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布罗茨基对弗罗斯特、哈代和里尔克展开长篇大论，关于这 3 位诗人某一首诗（弗罗斯特的《家葬》〈Home Burial〉和里尔克的《俄耳甫斯·欧律狄刻·赫尔墨斯》）或某几首诗作（哈代的《黑暗中的画眉》

《The Darkening Thrush》、《两者相会》《The Convergence of the Twain》、《你最后一次乘车》《Your Last Drive》和《身后》《Afterwards》等4首诗)的解读竟然长达数十页,洋洋数万言,这3篇文章加起来便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布罗茨基在文中不止一次地提醒听众(他当时的学生和听众以及如今作为读者的我们),他在对这些诗作进行“逐行”(line by line)解读:“我们将逐行分析这些诗,目的不仅是激起你们对这位诗人的兴趣,同时也为了让你们看清在写作中出现的一个选择过程,这一过程堪比《物种起源》里描述的那个相似过程。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还要说它比后者还要出色,即便仅仅因为后者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而非哈代先生的诗作。”(第274页,《关爱无生命者》)。他在课堂上讲解弗罗斯特的诗时,建议学生们“特别留意诗中的每一个字母和每一个停顿”(第199页,《悲伤与理智》)。他称赞里尔克德语诗的英译者利什曼(J.B.Leishman),因为后者的译诗“赋予此诗一种令英语读者感到亲近的格律形式,使他们能更加自信地逐行欣赏原作者的成就”(第331页,《九十年之后》)。其实,布罗茨基并不止于“逐行”分析,他在很多情况下都在“逐字地”(word by word)、甚至“逐字母地”(letter by letter)地解剖原作。他这样不厌其烦,精雕细琢,当然是为了教会人们懂诗,懂得诗歌的奥妙,当然是为了像达尔文试图探清人类的进化过程那样来探清一首诗或一位诗人的“进化过程”。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在告诉他的读者,他心目中的最佳诗人和最佳诗歌究竟是什么样的。布罗茨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学生后来在回忆自己这位文学老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布罗茨基并不迷恋对诗歌文本的结构分析,我们的大学当时因这种结构分析而著称,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和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常常从法国来我们这里讲课。布罗茨基的方法却相当传统:他希望让学生理解一首诗的所有原创性、隐喻结构的深度、历史和文学语境的丰富;更为重要的是,他试图揭示写作此诗的那门语言所蕴藏的创作潜力。”^①布罗茨基称哈代为“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者”(第305页,《关爱无生命者》),他认为“正是这种理智较之于情感的优势使哈代成了英语诗歌中的先知”,“他的耳朵很少好过他的眼

^① Багчан А. Колумбий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Нью-Йорк, 1982. Сост. Лев Лосев и Петр Вайль, 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 труды и дн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996. С.63.

睛，但他的耳朵和眼睛又都次于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强迫他的耳朵和眼睛服从于他的思想”（第 285 页，《关爱无生命者》）。“他并非和谐之天才，他的诗句很少能歌唱。他诗歌中的音乐是思想的音乐，这种音乐独一无二。……其诗歌的形式因素很少能派生出这种驱动力，它们的主要任务即引导思想，不为思想的发展设置障碍。”（第 314 页，《关爱无生命者》）在关于弗罗斯特《家葬》一诗的分析中，布罗茨基给出了全文、乃至全书具有点题性质的一段话：

那么，他在他这首非常个性化的诗中想要探求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他所探求的就是悲伤与理智，当这两者互为毒药的时候，它们便会成为语言最有效的燃料，或者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它们便会成为永不退色的诗歌墨水。弗罗斯特处处信赖它们，几乎能使你们产生这样的感觉，他将笔插进这个墨水瓶，就是希望降低瓶中的内容水平线；你们也能发现他这样做的实际好处。然而，笔插得越深，存在的黑色要素就会升得越高，人的大脑就像人的手指一样，也会被这种液体染黑。悲伤越多，理智也就越多。人们可能会支持《家葬》中的某一方，但叙述者的出现却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当诗中的男女主人公分别代表理智与悲伤时，叙述者则代表着他们两者的结会。换句话说，当男女主人公的真正联盟瓦解时，故事就将悲伤嫁给了理智，因为叙述线索在这里取代了个性的发展，至少，对于读者来说是这样的。也许，对于作者来说一样。换句话说，这首诗是在扮演命运的角色。（第 225 页）

在布罗茨基看来，理想的诗人就应该是“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者”（rational irrationalist），理想的诗歌写作就应该是“理性和直觉之融合”（the fusion of the rational and the intuitive），而理想的诗就是“思想的音乐”（mental music）。

《悲伤与理智》中的每篇散文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关于诗和诗人的观照，它们彼此呼应，相互抱合，构成了“关于诗歌的思考”这一主题的复杂变奏曲。在阅读《悲伤与理智》时我们往往会生出这样一个感觉，即布罗茨基一谈起诗歌来便口若悬河，游刃有余，妙语连珠，可每当涉及历

史、哲学等他不那么“专业”的话题时，他似乎就显得有些故作高深，甚至语焉不详。这反过来也说明，布罗茨基最擅长的话题，说到底还是诗和诗人。

三

《悲伤与理智》中的散文不仅是关于诗的散文，它们也是用诗的方式写成的散文。

布罗茨基在评说茨维塔耶娃的散文时指出：“在她所有的散文中，在她的日记、文学论文和具有小说味的回忆录中，我们都能遇到这样的情形：诗歌思维的方法被移入散文文体，诗歌发展成了散文。茨维塔耶娃的句式构造遵循的不是谓语接主语的原则，而是借助了诗歌独有的技巧，如声响联想、根韵、语义移行等等。也就是说，读者自始至终所接触的不是线性的（分析的）发展，而是思想之结晶式的（综合的）生长。”^①布罗茨基这里提到的诗性的散文写作手法，这里所言的“诗歌思维的方法被移入散文文体，诗歌发展成了散文”（the resetting of the methodology of poetic thinking into a prose text, the growth of poetry into prose）之现象，我们反过来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中也随处可见。

首先，《悲伤与理智》中的散文都具有显见的情感色彩，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据说，布罗茨基性情孤傲，为人刻薄，他的诗歌就整体而言也是清冽冷峻的，就像前文提及的那样，较之于诗人的“悲伤”情感，他向来更推崇诗中的“理智”元素。无论写诗还是作文，布罗茨基往往都板起一副面孔，不动声色，但将他的诗歌和散文作比，我们却不无惊讶地发现，布罗茨基在散文中似乎比在诗歌中表现出了更多的温情和抒情。与文集《小于一》的结构一模一样，布罗茨基也在《悲伤与理智》的首尾两处分别放置了两篇抒情色彩最为浓厚的散文。在《小于一》一书中，首篇《小于一》和尾篇《在一间半房间里》（In a Room and a Half）都是作者关于自己的童年、家庭和父母的深情回忆；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第一篇《战利品》是作者关于其青少年时期自我意识形成过程的细腻回忆，而最后一篇则是对于其诗人好友斯

^① Joseph Brodsky, *Less Than One*, pp.178-179.

蒂芬·斯彭德的深情悼念。作者特意将这两篇抒情性最为浓重的散文至于全书的首尾，仿佛给整部文集镶嵌上了一个抒情框架。在《悼斯蒂芬·斯彭德》一文中，他深情地将斯彭德以及奥登和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称为“我的精神家庭”(my mental family, 第408页)，他这样叙述他与斯彭德的最后告别：“我吻了吻他的额头，说道：‘谢谢你所做的一切。请向温斯坦(奥登的名字。——引者按)和我的父母问好。永别了。’我记得他的双腿，在医院里，从病号服里伸出老长，腿上青筋纵横，与我父亲的腿一模一样，我父亲比斯蒂芬大6岁。”(第420页)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在一间半房子里》的一段描写：“在我海德雷住处的后院里有两只乌鸦。这两只乌鸦很大，近乎渡鸦，我每次开车离家或回来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它们。它俩不是同时出现的；第一只出现在两年之前，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第二只是去年出现的，当时我的父亲刚刚去世。”^①身在异国他乡的布罗茨基，觉得这两只乌鸦就是父母灵魂的化身。布罗茨基在大学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解哈代的诗歌，他一本正经，不紧不慢，可在谈到哈代《身后》一诗中“冬天的星星”的意象时，他却突然说道：“在这一切的背后自然隐藏着那个古老的比喻，即逝者的灵魂居住在星星上。而且，这一修辞方式具有闪闪发光的视觉效果。显而易见，当你们仰望冬日的天空，你们也就看到了托马斯·哈代。”(第322页)我猜想，布罗茨基这里的最后一句话甚或是出乎他自己意料的，说完这句话，他也许会昂起头，作仰望星空状，同时也是为了不让学生们看见他眼角的泪花。在布罗茨基冷静、矜持的散文叙述中，常常会突然出现此类感伤的插笔。布罗茨基以《悲伤与理智》为题分析弗罗斯特的诗，又将这个题目用作全书的总题，他在说明“悲伤与理智”就是弗罗斯特诗歌、乃至一切诗歌的永恒主题的同时，似乎也在暗示我们，“悲伤”和“理智”作为两种相互对立的情感元素，无论在诗歌还是散文中都有可能相互共存。他的散文写法甚至会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一般说来，诗是“悲伤的”，而散文则是“理智的”。可布罗茨基又似乎在将两者的位置进行互换，在刻意地写作“理智的”诗和“悲伤的”散文，换句话说，他于有意无意之间似乎在追求诗的散文性和散文的诗性。这种独特的叙述调性使得他的散文别具一格，

^① Joseph Brodsky, *Less Than One*, pp.468-469.

它们与其说是客观的叙述不如说是主观的感受，与其说是具体的描写不如说是抒情的独白。“所有这些文本，都是作者的内心独白，是他激情洋溢的沉思，这些独白和沉思大体上是印象式的、无限主观的。但是，依据布罗茨基在其俄语诗作中高超运用过的那些诗歌手法，它们却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文本。”^①

其次，《悲伤与理智》一书以及书中每篇散文的结构方式和叙述节奏都是典型的诗歌手法。关于布罗茨基的散文结构特征，研究者们曾有过多种归纳。洛谢夫发现，布罗茨基的散文结构和他的诗作一样，“有着镜子般绝对对称的结构”^②。洛谢夫以布罗茨基的俄文诗作《威尼斯诗章》（*Венецианские строфы*）和英文散文《水印》为例，在这一诗一文中均找出了完全相同的对称结构。《水印》共 51 节，以其中的第 26 节为核心，文本的前后两半完全对称。前文提到的布罗茨基的两部散文集均以两篇自传性抒情散文作为首尾，也是这种“镜子原则”（*mirror principle*）之体现。这一结构原则还会令我们联想到纳博科夫创作中的“俄国时期”和“美国时期”所构成的镜像对称关系。伊戈尔·苏希赫（Игорь Сухих）在对布罗茨基的散文《伊斯坦布尔旅行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Стамбул*, 1985）的诗学特征进行分析时，提出了布罗茨基散文结构的“地毯原则”（*принцип ковра*）^③，即他的散文犹如东方的地毯图案，既繁复细腻，让人眼花缭乱，同时也高度规整，充满和谐的韵律感。帕鲁希娜在考察布罗茨基散文的结构时，除“镜子原则”和“地毯原则”外还使用了另外两种说法，即“‘原子’风格结构”（*'atomic' stylistic structure*）^④和“音乐—诗歌叙事策略”（*musico-poetical narrative strategy*）^⑤。

① 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刘文飞译，第 298 页。

② 同上；又见 Лев Лосев. Реальность зазеркалья: Венец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6. №.5. С.235.

③ Игорь Сухих.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Стамбул. О поэтике прозы И. Бродского// 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 творчество, личность, судьба. С.233. 值得注意的是，帕鲁希娜在其英文论文中也同样提及布罗茨基散文结构的“地毯模式”（*carpet model*，见 V. Polukhina, “The Prose of Joseph Brodsky: A Continuation of Poetry by Other Means”, p.226, p.232），帕鲁希娜的论文发表于 1997 年，苏希赫的论文发表于 1998 年，但两位学者没有相互引证，不知这个提法究竟由谁率先提出。

④ V. Polukhina, “The Prose of Joseph Brodsky: A Continuation of Poetry by Other Means”, p.224.

⑤ Ibid, pp.226, 232.

温茨洛瓦在对布罗茨基的散文《伊斯坦布尔旅行记》进行深入分析时发现，布罗茨基的散文由两种文体构成，即“叙述”（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和“插笔”（отступление）：“这种外表平静（但内心紧张）的叙述时常被一些另一种性质的小章节所打断。这些小章节可称之为抒情插笔（为布罗茨基钟爱的哀歌体），可称之为插图和尾花。……如果说叙述部分充满名称、数据和事实，在抒情部分占优势的则是隐喻和代词，苦涩的玩笑和直截了当的呼号。”^①无论“镜子原则”还是“地毯原则”，无论“原子结构”还是“音乐结构”，无论“叙述”还是“插笔”，这些研究者们都不约而同地观察到了布罗茨基散文一个突出的结构特征：随性自如却又严谨细密，一泻而下却又字斟句酌，形散而神聚。

与这一结构原则相呼应的，是布罗茨基散文独特的章法、句法乃至词法。《悲伤与理智》中的 21 篇散文，每一篇都不是铁板一块的，而均由若干段落或曰片断组合而成，这些段落或标明序号，或由空行隔开。即便是演讲稿，布罗茨基在正式发表时也一定要将其分割成若干段落。一篇散文中的章节少则五六段，多则四五十段；这些段落少则三五句话，多则十来页。这些章节和段落其实就相当于诗歌中的诗节或曰阙，每一个段落集中于某一话题，各段落间却往往并无清晰的起承转合或严密的逻辑递进，它们似乎各自为政，却又从不同的侧面叙述某一总的主题。这种结构方式是典型的诗歌、更确切地说是长诗或长篇抒情诗的结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蒙太奇”手法。值得注意的是，布罗茨基多次声称，发明“蒙太奇”手法的并非爱森斯坦（С. М. Эйзенштейн），而是诗歌^②。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布罗茨基是用诗的结构方式为他的散文谋篇布局的。《悲伤与理智》中的句式也别具一格，这里有复杂的主从句组合，也有只有一个单词的短句，长短句的交替和转换，与他的篇章结构相呼应，构成一种独特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布罗茨基喜欢使用句子和词的排比和复沓。他在《一个和其他地方一样好的地方》一文中这

① Томас Венцлова.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з Петербурга в Стамбул//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на пиру. Москва: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12. С.179.

② 他在《关爱无生命者》一文中写道：“我记得我在什么地方说过，发明蒙太奇手法的是诗歌，而不是爱森斯坦。”见 Joseph Brodsky, *On Grief and Reason*,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1, p.297.

样写道：“其结果与其说是一份大杂烩，不如说是一幅合成影像：如果你是一位画家，这便是一棵绿树；如果你是唐璜，这便是一位女士；如果你是一位暴君，这便是一份牺牲；如果你是一位游客，这便是一座城市。”（第 33 页）排比句式和形象对比相互叠加，产生出一种很有压迫感的节奏。《致贺拉斯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对于他而言，一副躯体，尤其是一个姑娘的躯体，可以成为，不，是曾经成为，一块石头，一条河流，一只鸟，一棵树，一个响声，一颗星星。你猜一猜，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比如说，一个披散长发奔跑的姑娘，其侧影就像一条河流？或者，躺在卧榻上入睡的她就像一块石头？或者，她伸开双手，就像一棵树或一只鸟？或者，她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从理论上说便是无处不在，就像一个响声？她或明或暗，或远或近，就像一颗星星？”（第 395 页）布罗茨基钟爱的排比设问，在这里使他的散文能像诗的语言一样流动起来。在这封信中，布罗茨基还不止一次地坦承他在用“格律”写“信”：“无论如何，我常常对你作出回应，尤其在我使用三音步抑扬格的时候。此刻，我在这封信中也在继续使用这一格律。”（第 383 页）“我一直在用你的格律写作，尤其是在这封信中。”（第 391 页）帕鲁希娜曾对《水印》中单词甚至字母的“声响复沓”（phonic reiteration）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找出大量由多音字、同音字乃至单词内部某个构成头韵或脚韵、阴韵或阳韵的字母所产生的声响效果^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罗茨基在他的散文中使用了除移行（enjambment）外的一切诗歌修辞手法，

最后，使得《悲伤与理智》一书中的散文呈现出强烈诗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布罗茨基在文中使用了大量奇妙新颖的比喻。布罗茨基向来被视为一位杰出的“隐喻诗人”，他诗歌中的各类比喻之丰富，竟使得有学者编出了一部厚厚的《布罗茨基比喻词典》^②。帕鲁希娜曾将布罗茨基诗中的隐喻分门别类，归纳出了“添加隐喻”（метафоры приписывания）、“比较隐喻”（метафоры сравнения）、“等同隐喻”（метафоры отождествления）和“替

① V. Polukhina, “The Prose of Joseph Brodsky: A Continuation of Poetry by Other Means”, p.227.

② V. Polukhina, Ulle Parli, *The Dictionary of Brodsky's Tropes*, Tartu: Tartu University Press, 1995.

代隐喻”（метафоры замещения）等多种隐喻方式。^①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隐喻”（metaphor）一词出现不下数十次。在他的散文中，各类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比喻更是俯拾皆是。这是他的写景：“几条你青春记忆中的林荫道，它们一直延伸至淡紫色的落日；一座哥特式建筑的尖顶，或是一座方尖碑的尖顶，这碑尖将它的海洛因注射进云朵的肌肉。”（第 34 页，《一个像其他地方一样好的地方》）他说：“显而易见，一首爱情诗就是一个人被启动了的灵魂。”（第 76 页，《第二自我》）他还说：“一个人如果从不使用格律，他便是一本始终没被打开的书。”（第 378 页，《致贺拉斯书》）。他说纪念碑就是“在大地上标出”的“一个惊叹号”（第 241 页，《向马可·奥勒留致敬》）。他还说：“书写法其实就是足迹，我认为足迹就是书写法的开端，这是一个或居心叵测或乐善好施、但一准去向某个地方的躯体在沙地上留下的痕迹。”（第 355 页，《九十年之后》）他在《一件收藏》中给出了这样一串连贯的比喻：“不，亲爱的读者，你并不需要源头。你既不需要源头，也不需要叛变者的证词之支流，甚至不需要那从布满卫星的天国直接滴落至你大腿的电子降雨。在我们这种水流中，你所需要的仅为河口，一张真正的嘴巴，在它的后面就是大海，带有一道概括性质的地平线。”（第 164 页）

这里所引的最后一个例子，已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布罗茨基散文比喻手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即他善于拉长某个隐喻，或将某个隐喻分解成若干小的部分，用若干分支隐喻来共同组合成一个总体隐喻，笔者拟将这一手法命名为“组合隐喻”或“贯穿隐喻”。试以他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一篇讣告》（Nadezhda Mandelstam: An Obituary）一文的结尾为例：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 1972 年 5 月 30 日，地点是她莫斯科住宅里的厨房。当时已是傍晚，很高的橱柜在墙壁上留下一道暗影，她就坐在那暗影中抽烟。那道影子十分的暗，只能在其中辨别出烟头的微光和两只闪烁的眼睛。其余的一切，即一块大披巾下那瘦小干枯的躯体、两只胳膊、椭圆形的灰色脸庞和灰白的头发，全都被黑暗吞噬了。她看上去就

^① Полухина В.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етафоры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смысл// Под ред. Л.В.Лосева, Поэтика Бродского. Терафл: Эрмитаж, 1986. С.63-91.

像是一大堆烈焰的遗存，就像一小堆余烬，你如果拨一拨它，它就会重新燃烧起来。^①

在这里，布罗茨基让曼德施塔姆夫人置身于傍晚的厨房里阴暗的角落，然后突出她那里的三个亮点，即“烟头的微光和两只闪烁的眼睛”；然后再细写她的大披巾（据人们回忆，曼德施塔姆夫人终日围着这条灰色的披巾，上面满是香烟灰烧出的孔洞，她去世后身体上覆盖的也是这条披巾），她的“灰色脸庞和灰白的头发”；然后再点出这个组合隐喻的核心，即“她就像一堆阴燃的灰烬”，这个隐喻又是与布罗茨基在此文给出的曼德施塔姆夫人是“文化的遗孀”（widow to culture）之命题相互呼应的。

再比如，布罗茨基在《悼斯蒂芬·斯彭德》一文中这样描写他第一次见到的斯彭德：“一位身材十分高大的白发男人稍稍弓着腰走进屋来，脸上带着儒雅的、近乎道歉的笑意。……我不记得他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可我记得我被他的话语之优美惊倒了。有这样一种感觉，似乎英语作为一种语言所具的一切高贵、礼貌、优雅和矜持都在一刹那间涌入了这个房间。似乎一件乐器的所有琴弦都在一刹那间被同时拨动。对于我和我这只缺乏训练的耳朵来说，这个效果是富有魔力的。这一效果毫无疑问也部分地源自这件乐器那稍稍弓着的框架：我觉得自己与其说是这音乐的听众，不如说是它的同谋。”

（第402页）布罗茨基突出了斯彭德“十分高大的”身材、“稍稍弓着”的腰背、“儒雅的”神情和惊人地“优美”的话音，这一切都是为了最终组合成一个总的隐喻，即“斯彭德=竖琴”。布罗茨基在此书中曾多次提及“竖琴”（lyres），他仔细分析了哈代诗中“竖琴”形象的文本内涵以及里尔克诗中俄耳甫斯所持“竖琴”的象征意义。在他的心目中，竖琴似乎就是诗和诗人的同义词，有了这层铺垫，我们就能对布罗茨基这里的“斯彭德=竖琴”的组合隐喻之深意和深情有一个更深的理解。而这样一种贯穿全文、甚至全书的隐喻，也往往能使有心的读者获得智性的和审美的双重阅读快感。绵延不绝的此类隐喻还有一个功能，它能使布罗茨基的散文张弛自如，用帕鲁希娜

^① Joseph Brodsky, *Less Than One*, pp.155-156. 中译见布罗茨基：“布罗茨基散文四篇”，刘文飞译，《世界文学》，2013年第6期，第193页。

的话来说就是：“布罗茨基稠密的隐喻使他可以随意调节其叙述的速度和方向。”^①借助联想和想象推进的散文文本，自然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和更多的张力。

四

其实，各种文学体裁之间原本就没有太多严格清晰的界线，一位既写散文也做诗的作者自然也会让两种体裁因素相互渗透。只不过在布罗茨基这里，在《悲伤与理智》中，诗性元素对散文的渗透表现得更为突出罢了，他自己诗歌创作中的主题和洞见，灵感和意象，结构和语法，甚至具体的警句式诗行和押韵方式，均纷纷被引入其散文；只不过在布罗茨基这里，他借鉴诗歌元素进行的散文创作，“用诗歌的花粉为其散文授精”^②，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如前所述，布罗茨基在体裁的等级体系中向来是褒诗歌而贬散文的，他在收入此书的题为《怎样阅读一本书》的演讲中又说：“散文中的好风格，从来都是诗歌语汇之精确、速度和密度的人质。作为墓志铭和警句的孩子，诗歌是充满想象的，是通向任何一个可想象之物的捷径，对于散文而言，诗歌是一个伟大的训导者。它教授给散文的不仅是每个词的价值，而且还有人类多变的精神类型、线性结构的替代品、删除不言自明之处的本领、对细节的强调和突降法的技巧。尤其是，诗歌促进了散文对形而上的渴望，正是这种形而上将一部艺术作品与单纯的美文区分开来。无论如何也必须承认，正是在这一点上，散文被证明是一个相当懒惰的学生。”（第 86—87 页）可是，布罗茨基自己的散文却并非此等“懒惰的学生”，他用诗歌的手段写成的散文或许就是诗歌和散文的合体，是这两种体裁之长处的合成。

诗歌和散文之间的过渡体裁被人们称为“散文诗”（*prose poem;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 в прозе*）或“韵律散文”（*rhythmical prose; ритм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等等，而布罗茨基“诗化散文”（*poeticise prose*）的尝试之结果，则被帕鲁希

① V. Polukhina, “The Prose of Joseph Brodsky: A Continuation of Poetry by Other Means”, p.236.

② Ibid, p.226.

娜归纳为“散文长诗”(poem in prose)^①。或许,我们可以更确切地将《悲伤与理智》一书的文体定义为“诗散文”(poem prose; проза в стихах)。布罗茨基在谈及茨维塔耶娃的散文时曾套用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名言,说茨维塔耶娃的散文“不过是她的诗歌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②帕鲁希娜再次套用这一说法,亦称“布罗茨基的散文就是其诗歌创作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③。《悲伤与理智》中的21篇散文均以诗为主题,均用诗的手法写成,均洋溢着浓烈的诗兴和诗意,它们的确是诗性的散文。但是,如果仅仅把这些散文视为布罗茨基的诗歌创作以另一种体裁形式的继续,这或许是对布罗茨基散文的主题和体裁独特性的低估,甚至是某种程度的“贬低”。布罗茨基的确将大量诗的因素引入其散文,可与此同时,他也未必没将散文的因素引入其诗歌。也就是说,在布罗茨基的整个创作中,诗和散文这两大体裁应该是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两者间似乎并无分明的主次地位或清晰的从属关系。至少是在布罗茨基来到西方之后,一如俄文和英文在布罗茨基语言实践中的并驾齐驱(布罗茨基曾自称为语言的“混血儿”〈mongrel, 第167页,《一件收藏》),散文和诗歌在布罗茨基的文学创作中也始终是比肩而立的(就像是一对“双胞胎”)。布罗茨基曾称弗罗斯特的《家葬》一诗为“真正的仿芭蕾双人舞”(the real faux pas de deux, 第206页,《悲伤与理智》);布罗茨基在阅读哈代的诗歌时感觉到一个乐趣,即能目睹哈代诗歌中“传统语汇”和“现代语汇”“始终在跳着双人舞”(the constant two-stop, 第282页,《关爱无生命者》)。在布罗茨基的散文中,我们也同样能看到这样的“双人舞”,或曰二重奏,只不过两位演员换成了他的诗歌语汇和散文语汇。以《悲伤与理智》一书为代表的布罗茨基散文创作所体现出的鲜明个性,所赢得的巨大成功,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布罗茨基的散文不仅是其诗歌的“继续”(continuation),更是一种“发展”(development),甚至已构成一种具有其独特风格和自在体裁意义的“存在”(existence)。与诗

① V.Polukhina, “The Prose of Joseph Brodsky: A Continuation of Poetry by Other Means”, p.239. 帕鲁希娜在这一概念中用了一个俄语单词 поэма, 即 поэма。

② Joseph Brodsky, *Less Than One*, Farrar Straus Giroux, NY, 1986, pp.178. 中译见: 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 刘文飞译, 第119页。

③ V.Polukhina, “The Prose of Joseph Brodsky: A Continuation of Poetry by Other Means”, p.239.

歌一样，散文也成为布罗茨基表达其诗性情感和诗歌美学的主要方式之一。布罗茨基通过其不懈的诗性散文写作，已经跨越了诗歌和散文这两种文体间的分野甚或对峙；布罗茨基借助《悲伤与理智》一书的写作与出版，已经让诗人和散文家的名分在他身上合二为一。布罗茨基的散文无疑是堪与他的诗歌媲美的又一文学高峰，两者相互呼应，相互补充，构成了布罗茨基文学创作的有机统一体。

【Abstract】 Joseph Brodsky is not only a great Russian poet but also a great English language's essayists; *On Grief and Reason* is the last and most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his essays where the content and the form, the styl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rose writings could be seen obviously. Imitating such intersect genres as "prose poem" and "rhythmical prose", we could call Brodsky's essays as "poem prose". To paraphrase Brodsky's own thesis that "prose for Tsvetaeva was nothing but the continuation of poetry by other means", some scholars have defined Brodsky's prose also as such "continuation", but based on scanning and analysing of 21 essays of *On Grief and Reason*, this paper has got its conclusion that Brodsky's prose are not only "continuation"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his poetry and they could be seen as the "existence" with its individual style and independent genre meaning.

【Key Words】 Brodsky, essays, *On Grief and Reason*, poem prose

【Аннотация】 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 явля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великим русским поэтом, но и великим англоязычным эссеистом. Читая "О скорби и разуме", его последнюю книгу-эссе, мы имеем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лучше понима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и форму, стиль и характер его прозы.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и есть понятия интеро-жанры как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 в прозе" и "ритм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а мы хотели бы определить жанр прозы Бродского как "проза в стихах". Перефразируя слова самого Бродского о прозе Цветаевой, что "проза для нее просто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ее поэзии другими способами", некоторые ученые считают, что проза Бродского является тоже "продолжением" его поэзии.

Прочитав и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в 21 эссе в сборнике "О скорби и разуме", данная работа сделала вывод, что эти эссе являю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продолжением", но и "развитием" его поэзии и они даже стал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м" с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ым характером 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м жанровым значение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Бродский, эссе, О скорби и разуме, проза в стихах

(责任编辑 贝文力)

“落在两扇磨石间的谷粒”： 索尔仁尼琴在西方（1974-1994）*

龙瑜成**

【内容提要】 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和形象在流亡时期发生了重要转变。流亡前，作家对西方不无好感，但文化的冲突、冷战的特殊氛围以及避难者身份的尴尬等，使他从进入西方之初就陷入困境。借助自己的俄罗斯经验，作家很快在西方发现了熟悉的现代性精神危机，并对流行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主义想象进行了挑战。这也让他在东、西方都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被迫隐居的索尔仁尼琴最终通过对斯托雷平改革和二月革命的重新“发现”与书写，全面回顾、反思了自己的这次西方之旅。

【关键词】 索尔仁尼琴 西方 现代性反思 民族性 革命史

【中图分类号】D751.2;I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 05-0026-(36)

1974到1994年的二十年流亡生活，构成了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2008）思想肖像上最令人困惑的一道裂缝：此前，他创作的一系列揭露“古拉格群岛”真相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并为其赢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在真正来到“群岛”之外后，他却出人意料地调转枪头，开始向自由世界开火。

*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索尔仁尼琴流亡时期的创作与思想研究”（项目批号：14NDJC123YB）的阶段性成果。

** 龙瑜成，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深感“震惊”之余，西方读者痛诉作家“不爱我们”，^①对他的评价也从“人权斗士”逆转成了“冷酷的好战者”、“神秘教条的保守主义者”，以至“自由和民主的敌人”。^②相应的，作家在隐居佛蒙特后完成的大量作品再未获得此前的那种普遍关注。

要解释索尔仁尼琴立场的这种转变，最便捷的做法，莫过于将其归结为作家只是在习惯性地保持自己的持异见者姿态，甚或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故作惊人之举。^③然而，从预言苏联内部的崩溃，到质疑西方专家热议的俄罗斯自由化改革方案，作家这一时期发表的诸多意见，在不断被听众嗤笑、拒绝后，似乎总能得到历史不同程度的回应，并由此不断回到批评视野。这让人很难相信他在西方只是完成了一场浅薄的表演。根据事后的追溯，更多论者倾向于相信，对索尔仁尼琴最初定位的偏差，是由于冷战中两大阵营彼此隔绝、信息不畅，而作家在流亡前又有意识地向自己最重要的反极权盟友隐瞒了一些观点。这样的解释无疑说出了部分真相。不过，从作家的流亡笔记《落在两扇磨石间的谷粒》（Угодило зе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以及这一时期他与友人的通信来看，哈佛演讲中描绘的那个深陷危机的现代西方，即使对于他本人而言，也超出了原有的认识和想象。而流亡中卷入的一系列论战，更促使索尔仁尼琴对其最为珍视的革命史进行了改写。凡此种种，都提示我们，有必要对索尔仁尼琴的这次跨文化之旅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

一、并不单一的前理解

俄罗斯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反感，俨然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这与他们属于西方派还是斯拉夫派、政治立场是“左”还是“右”，并无必然关联。对于这些深受东正教文化熏陶的心灵而言，以逐利为唯一目

① Mary McGrory, “Solzhenitsyn Doesn’t Love Us”, in Ronald Berman ed., *Solzhenitsyn at Harvard: The Address, Twelve Early Responses, and Six Later Reflections*, Washington, D.C.: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1980, pp.61-63.

② Michael Scammell, *Solzhenitsyn: A Biography*, New York: Norton, 1984, p.917.

③ 这一观点，在中国学界一度十分流行，具体的论述篇目可参阅陈建华主编：《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史论》（第3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94-396页。

标的工商业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贪婪、庸俗和人情的冷漠；而高度理性的专业化分工更将使个人的精神世界变得逼仄。这样的认识，在他们亲临西方后，往往不是被消除，而是进一步强化。当然，也有许多研究者相信，这种集体的拒斥不过是一个欠发达国家自卑心理的反弹。但至少从 19 世纪开始，文化、艺术方面的辉煌成就，确实让俄罗斯知识分子有了某种骄傲的理由。进入苏联时代，尤其是冷战铁幕落下后，上述认识和想象被再次激化。苏联政权大力宣扬自身的类清教徒精神，西方社会则被贴上了“腐朽堕落”标签，深为“高尚的苏维埃人”所不齿。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固有想象，以及封闭环境下苏联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不太可能对索尔仁尼琴毫无影响。^①在流亡西方之前，其作品中已经出现了不少对西方的“类型化”批评。除了在剧本《内心之光》（又称《风中之烛》）中特意模糊故事背景、希望处理发达国家“共有的问题”外，^②在那封著名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作家更是直接批评了西方的片面追求物质繁荣与科技进步，以及对传统和地球生态的毫不怜惜。^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根据自己在劳改营中的见闻，索尔仁尼琴还率先揭露了“二战的最后一个秘密”，谴责西方同盟国应斯大林政府的要求强行遣返大量的苏联自愿逃离者，间接地将后者送进了劳改营。^④这大大加深了索尔仁尼琴关于西方国家精神出现萎缩的看法。在《囚徒》剧终，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沃罗滕采夫留给狱友的最后遗言就是：“不要等待来自西方的帮助：那些富饶的国家缺乏力量和意志。”^⑤毫无疑问，这些关于西方的负面认识和想象，已经给索尔仁尼琴流亡后的许多批评言论埋下了伏笔。

① 和同时代的其他苏联人一样，索尔仁尼琴了解西方的渠道十分有限。二战中，他曾踏上德国领土，在后来创作的《胜利者的欢宴》、《普鲁士之夜》等作品中，作家都提到德国城市的整洁、生活的富足给自己这个骄傲的苏联军官带来的巨大冲击。

② 参见Keith Armes, “Introduction”, in Aleksandr Solzhenitsyn: *Candle in the Wind*, trans. by Keith Arm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3, pp.12-13.

③ 参见[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载《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80年，第203-207页。

④ 索尔仁尼琴揭露的这个“秘密”也在西方引发了广泛关注。在作家之后，西方史学界对此已有多部专门的研究著作问世。参见Michael Scammell, *Solzhenitsyn :A Biography*, p.899.

⑤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Пьесы и киносценарии. Вермонт, Париж: YMCA, 1981. С.249.

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流亡前的作家得到了西方舆论的大力支持。这几乎成为他与苏联政府周旋的最重要的筹码。^①尤其是1970年索尔仁尼琴的获颁诺贝尔文学奖，相当程度上是在西方世界的支持下成为现实的。在被迫推迟了四年的获奖演说中，索尔仁尼琴动情地指出了这一奖项对自己的帮助，坦承如果没有这种“外部”支持，自己“未必能够挺得住”。^②而西方不仅作为最重要的反极权同盟得到了索尔仁尼琴的感激，作为位于铁幕另一端的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它还被几乎所有苏联持异见者视为“自由”、“开放”的代名词。对于一位以语言文字为武器、却多年无法获得言论自由的作家而言，这样的西方即使不是充满诱惑力的，至少也是能激发好奇的——尽管并非自愿流亡——索尔仁尼琴，他在初抵西方之际马上就感觉到了一种“自由的幸福”。他决定充分享受这种在其过往生命中从未有过的“自由”，尽快投入到自己被长期阻碍的写作事业之中：“如果我来的真是一个自由的世界，那么我就希望能自由。”^③

不过，以惜时如金闻名的索尔仁尼琴在流亡的最初几年里（1974—1976年），还是罕有地放下了手头创作，积极出游。在瞻仰了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历史胜迹后，他更在笔记中留下了大量的兴奋之辞。从这些文字中不难感受到“西方”对于俄罗斯人的另一重意涵：在现代化道路上日益落后、或者说边缘化后，俄罗斯的确开始以“西方”作为“议定本土文化时一个相对照的反面存在”；^④但除此之外，“西方”还代表着一个将俄罗斯包容在内的庞大文明共同体。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诸多前辈一样，索尔仁尼琴对前现代时期那个“更健康”的西方文明始终心怀崇敬。加上对20世纪初“俄罗斯文艺复兴”运动的关注，作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实还是倾向于相信，“精

① 在如何处理索尔仁尼琴的问题上，来自西方的压力对苏联高层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参阅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4-106页。

②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癌症楼》，姜明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482页。

③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Очерки изгнания// Новый мир. 1998. №9. С.59.

④ 参见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神的西方”完全有能力拯救“理性的西方”^①。就在那封写于流亡前一年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在指出现代西方已经误入歧途后，索尔仁尼琴接着又乐观地表示，西方文明仍然未失去自己“强大的能量”和“发明力”，只要其展开适当的重建，就不难“根除临头的危机”。^②

无论如何，身处苏联时，作家对西方的认识就是多重、而非单一的；在流亡之初，他也和其他文化跨界的“新手”一样，表现出了对新环境的好奇，以及重新寻找自己位置的某种期待。而对于这位苏联持异见者代表的突然来访，西方同样予以了热切的关注：后斯大林时代，“和平共处”的口号并未能改变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森严对立。苏联内部的反抗声音总能激起西方的浓厚兴趣，更何况索尔仁尼琴发出的是直接“顶撞橡树”的巨响。在西方人看来，作家孤身挑战苏联政府，以亲历者的有力证词揭露黑暗真相，这样的抗争几乎充满英雄主义色彩。^③再加上如前文所说，这位“英雄”多少还是在西方的支持下成长起来的，这也在心理上增加了西方大众对作家的认同和亲近感。

固然，如索尔仁尼琴后来逐渐发现的，至迟从1972年开始，随着《致大牧首的信》和《古拉格群岛》等作品的秘密流传到西方，西方社会（尤其是左翼）对他的评价已经有所反弹。^④但无论如何，索尔仁尼琴与强权政府的直接对抗，已经足以保持人们对他的基本好感。在《内心之光》1973年的英文版中，导读作者也提到了索尔仁尼琴对“国际化背景”的强调，但却选择将其解读为作家在苏联审查制度下的一种无奈“伪装”，并指出作品所描写和针对的其实就是苏联现实。^⑤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自动过滤”，显然还

① 参见 Olivier Clément, *The Spirit of Solzhenitsyn*, trans. by Sarah Fawcett and Paul Burn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1976, pp.16-18.

②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第206页。这与索尔仁尼琴这一时期接触到的西方刊物也有很大关系。参见 Donald R. Kelley, *The Solzhenitsyn-Sakharov Dialogue: Politics, Society, and the Futur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p.55.

③ 参见 Solomon Volkov, *The Magical Chorus: A History of Russian Culture from Tolstoy to Solzhenitsyn*, N.Y.: Alfred A. Knopf, 2008, p.218.

④ 参见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8. №.9. С.63; Жорж Нива. Солженицын.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2. С.39-40.

⑤ Keith Armes, “Introduction”, pp.9-10.

是因为论者已经将索尔仁尼琴默认为西方力量在敌对阵营内部的一位代言人。而 1974 年苏联政府的驱逐，更是完成了作家“抗暴英雄”肖像的最后一笔。自由世界很自然地将他的流亡视为自己对共产主义世界受难者的又一次庇护，大众关于“恐怖苏联”与“幸福西方”的双重想象更是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由此，当索尔仁尼琴 1974 年 2 月 13 日被押送到西德机场时出现了庞大的接机队伍，且法、英、西德、挪威四国争相对其提出政治庇护，也就不足为奇了。等待作家与西方的，似乎将是一场“亲密”接触。然而，如本文开篇就已提到的，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索尔仁尼琴很快发现“西方危机”之深重超出了自己的预想；^①其大胆的批评言论也迅速耗尽了这个“开放”社会对他的好感。

二、俄罗斯作家眼中的西方危机

如果说索尔仁尼琴在苏联时对西方的“自由”最为期待，那么，当他真正开始流亡生活后，最先让其感到失望的，也是西方的“自由”。而给他带来这一印象的，又恰恰是新闻媒体这一往往被认为最能体现西方自由精神的领域：暂居地外大批记者的昼夜蹲守，让作家不胜其烦。他认为媒体不仅在浪费俄罗斯人求而不得的宝贵自由，也侵犯了自己保持沉默的自由。在一次不愉快的贴身跟拍经历后，索尔仁尼琴对记者发出了“你们比克格勃更坏”的严厉斥责。^②这除了给第二天的新闻提供了绝佳素材外，也让西方媒体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一落千丈。

不难理解，在被尊奉为“无冕之王”的西方记者们看来，一直希望影响民众的作家没有理由不满足自己的要求，在大众媒体上发表宣言，评论时事。可惜，长期生活在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并未能分享西方社会对媒体价值的这种认同。甚至，作为一个对文字抱有严肃态度的传统俄罗斯作家，他还特别

① 参见 Alexzander Solzhenitsyn, *Warning to the West*, Toronto: McGraw-Hill Ryerson Ltd., 1976, p.126.

②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8. №.9. С.54.

容易去挑剔大众媒体对轰动性效果的追求。从记者们追问的问题来看，索尔仁尼琴认为他们其实“并不真正关心古拉格惨剧”。热衷的只是将“一切琐碎细节”放在耸动的“大标题”下；而自己刚刚离开恐怖现场，实在无法像个“媒体明星”一样来配合“做秀”。^①这些批评在经过记者们的渲染后，又被指认为是作家“反对言论自由”的表现。^②由此引发的舆论震动则让索尔仁尼琴更加认定，他关于急功近利的媒体会“简化和歪曲”自己思想的担忧是有道理的。^③

对媒体的这种不满，也让索尔仁尼琴开始以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审视西方其他领域表现出的“自由”精神。随着观察的深入，在他的流亡笔记中，这个词语带上了越来越浓厚的讽刺色彩。到了1978年的哈佛演讲，作家将自己的观察详细列出，指出相较于被赋予的各种权利，“自由”背后的责任，在西方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强调：和媒体的随意炒作相仿，食品生产商可以在产品中添加各种有害物质，青少年观看的动画节目中充斥着色情和暴力。毕竟，从“理论上说”，不能侵害商家“在自由企业经济中的权利”，而顾客仍有不购买这类商品的自由，“青少年也有权选择不去看或不接受”这样的节目。在竭力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很少能阻止成员因为“自由”的滥用而堕落。这样确实可以保障个人摆脱父权国家的桎梏，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悬置了道德问题。同时，和托克维尔的观点相似，作家认为，在自由、民主社会表面的开放活跃之下，存在着严重的“多数人的暴政”。（像他自己这样）有个性、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太容易被那些不负责任的草率发言

① 同时，这位前古拉格犯人还认为生活于自由世界的人们缺乏最基本的“斗争常识”。当对方要求自己发表公开声明时，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做可能会让其尚在国内的亲友和支持者陷入险境。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的附录《看不见的盟友》中对这些“盟友”进行了描写，但出于安全考虑，二十年后才发表了这部作品。参阅[美]约瑟夫·皮尔斯著：《索尔仁尼琴：流放的灵魂》，张桂娜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228页。

② 参见 Michael Scammell, *Solzhenitsyn: A Biography*, pp.851-852. 很快，《纽约时报》对《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原稿”（未经作家允许）的刊载和刻意渲染，让作家卷入了到西方后的第一场“丑闻”。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过程，可参阅 Michael Scammell, *Solzhenitsyn: A Biography*, pp.868-869. 传记作者也是当事人之一，证词相对可靠。

③ 参见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8. №.11. С.133-134.

所淹没。^①最终，对公众生活产生影响的，很可能只是危险的群众本能，以及善于迎合和煽动这种“民意”的媒体。^②

当然，在任何一个社会，基本的规则和评判标准都不可能完全缺席。作家认为在现代西方，唯有法律被赋予了这样的意义，并且得到普遍认同：

这被认为是终极的解决之道。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行为是合法的，那么就再没有什么其他要求了。没有人会指出，“合法”并不意味着已经尽善尽美，并进而主张自我约束或放弃这些权利，呼吁牺牲或无私的犯险，……每个人都竭力扩张，直到法律允许的极限。^③

一个关于现代性的著名论述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被允许的”，这等于拒绝了道德评价在行为上的应用。事实上，法律的衡量标准和衡量方式都低于伦理的标准。这是灵性或灵魂相关的平庸构成的氛围。^④

在此，索尔仁尼琴所质疑的，显然不是法律对于一个健康社会的必要性，而是其充分性。他强调，“法律”只能代表对人的最低要求。将法律作为标示“人的权利和正当性的界限”的最高标准，反映了社会精神的普遍“平庸”。而索尔仁尼琴对西方社会的这一批评，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其个人的西方经历。来到西方后，作家开始直接接触自己的诸多出版商，但出版事宜并未如其期望的那样高效展开。合作者对翻译质量和效率并不怎么关心，总是“要求先签合同和预付付款”；发现书的销量不错，“又开始争夺其他书稿的出版权”，利益问题每每被“轻易地诉诸公堂”，这让作家大感失望与疲惫。^⑤而就在索尔仁尼琴决定用《古拉格群岛》的版税成立基金，资助苏联境内的政治犯及其家庭后不久，他被指控为“偷税者”。尽管作家最终胜诉，这一事

① Alexzander Solzhenitsyn, “A World Split Apart”, in *Solzhenitsyn at Harvard*, pp.8-10.

② *Ibid.*, pp.10-11.

③ *Ibid.*, pp.7-8.

④ 皮尔斯：《索尔仁尼琴：流放的灵魂》，第310页。这是索尔仁尼琴接受采访时的回答。

⑤ 参见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8. №.11. С.99, 119.

件还是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成为了轰动一时的丑闻。^①对于已经习惯“萨米兹达特”（самиздат，地下刊物）运行方式、曾与其他作家一起不计报酬地通宵校稿排印的索尔仁尼琴而言，西方世界的“精明”和“清醒”显得如此难以理解和适应：

我总是在比较西方这里和我们那儿的人，对于西方世界遗憾地感到困惑不解。怎么会这样呢？难道西方人比我们那儿的人差吗？当然不是。但当仅仅从法律的水平要求人性时——标尺从高尚与荣誉的层面降低了，如今甚至连这样的概念都消失了——于是，滑头与敷衍塞责便有机可趁了。……更高的律法应当在我们心中。这里的这种冰冷的法律气息，我根本适应不了。^②

毫无疑问，流亡者身上常见的“思乡病”会让“西方这里”和“我们那儿”的对比变得更加强烈。这位被驱逐到西方的前古拉格囚徒甚至开始感叹自己“在东方进退得宜，在西方却多么盲目”。^③而作家固然很难与其西方合作者分享苏联持异见者运动中的那种自我感动和牺牲，其西方批评者也完全有理由从自己的文化逻辑出发，指出正是因为长期生活在一个缺乏基本法制精神的社会，索尔仁尼琴才会这么难“搞清楚这张权利和法律的网”，从而让自己深陷诉讼泥沼（同时，也正是法制的缺席才让苏联持异见者的那种个人牺牲成为一种常态）。甚至，如有些研究者已经提到的，索尔仁尼琴关于“法律”的这种认识，在俄罗斯历史中早已有迹可循：在东正教中“法律与恩惠，与信仰以及爱，尖锐对立”；和19世纪那些讽刺西方“兄弟与兄弟间订立合同”的斯拉夫主义者一样，作家并未能分辨清“机械化的、只在诉讼技术层面展开”的“法律主义”（legalism）和“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

① 有媒体甚至直接称索尔仁尼琴为“小偷”。一些左翼人士也借此事证明，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的证词并不可信。参见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9. №2. С.87-89.

②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8. №.11. С.118.

③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9. № 2. С.88.

造性的、有目的”的“法律性”(legality)。再加上相比许多出身贵族的前辈，作为标准“十月的孩子”，索尔仁尼琴的西学素养远谈不上深厚。过多地依据个人有限的流亡经历，让他对西方的认识和批评更难做到全面、客观。

应当说，索尔仁尼琴本人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一问题。1974年3月22日，在回复美国参议员乔治·赫尔姆斯的来信时，作家就指出，自己对对方提到的那个“拥有多重传统和取向、复杂多元的美国”其实很感兴趣，但长期以来，他“仅仅通过我们和你们的几个新闻记者粗浅和转引的表述来认识你们的国家，因此往往会忽视这些传统和取向”；而即使他如今已身在西方，“时间和精力有限”可能仍会长期妨碍他“亲身体会你们的问题的复杂性、规模和现实状况”。^①初到西方的作家在写这封信时或许还有些客套意味。然而，从1976年开始，因为与西方的关系持续恶化，作家开始隐居佛蒙特，用铁丝网将住宅围起来，自己终日埋头创作俄罗斯革命史《红轮》。^②这确实让他很难再有机会“沉浸”于西方，把握西方世界更多丰富的细节。而在不断被指责“不懂西方”后，索尔仁尼琴索性宣称，自己“所有的兴趣”、“所关心的所有事情都在俄罗斯”。^③这虽是负气之言，但也说明了部分事实——正如多年后作家所承认的，对苏联政治的熟悉和担忧，让他对冷战的发展形势过分悲观，并因此而采用了更为严厉的措辞来描述西方的危机。^④

不过，与西方社会的这种疏离，也许还不足以让人们完全否定索尔仁尼琴相关批评的价值。这位俄罗斯作家天性中确有愿意在人群中“用最大的声音发出呼喊”的一面，^⑤否则他也不会选择在隐居两年后，选择影响广泛的哈佛讲台发表那场注定会激怒听众的讲演。但和卡西尔笔下被狄德罗视为“病态”的卢梭不无相似，索尔仁尼琴也属于那种“不从社会中逃离，就不能效力于

①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8. №.9. С.119.

② 索尔仁尼琴的这一举动大大激怒了西方媒体。后者讽刺他“为自己建了一个新的古拉格”，而索尔仁尼琴称，“是西方先拒绝自己的”，他希望与“疯狂的周围世界分开”。参见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9. №.2. С.70, 77.

③ 参见皮尔斯：《索尔仁尼琴：流放的灵魂》，第239页。

④ 同上，第289页。

⑤ 参见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8. №.9. С.111.

它，就不能向它奉献出他原可奉献的东西”的思想者。^①因为强调精神的独立，拒绝被任何一种世俗权威当作工具，这类思想者往往陷于孤独。何况，索尔仁尼琴始终认为自己发言的最好方式，还是经过足够沉淀的写作。这让他苏联时就处于一种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执傲，不合群，同时又最需要人群的倾听和支持。到了西方后，这一状态并未出现本质的变化。

而更为重要的是，作家的“旁观”位置虽然有其不利的一面，却也让他有可能以外部视角，看到西方人因为太过熟悉而容易忽视的一些关键问题。甚至，正如作家逐渐意识到的，恰恰是他的俄罗斯经验，让其对西方社会的某些现象格外敏感。如果仔细阅读他关于西方“无限制的自由”与“法律主义”的具体论述，人们其实可以发现作家思想的一些连贯之处：在索尔仁尼琴看来，造成“自由”在现代西方失去其实际内涵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苏联同样盛行的物质至上而道德相对、以至虚无。它也造成了“短视”、“勇气衰竭”和“意志丧失”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与几个世纪前思想家们的乐观预计不同，在解除了各种传统的束缚后，“自由”的人们并未更积极地投入到对正义生活的营造之中。相反，因为不再有任何“坚固”之物的支撑和约束，人们对实用和实利的追逐可能更加肆无忌惮：“出于什么理由人们值得拿珍贵的生活冒险，去保护所谓的共同利益？”^②在任何价值都不牢靠，任何话语都被打回“权利”的原形时，所谓的“共同利益”变得毫无感召力。对物质层面的“快乐”的追逐，主宰了所有看似自由的“个体”。^③诚然，如西方批评者所提醒的，作家此时面对的是一个经验型的传统，推崇的是“多种价值之间的充满活力的竞争”，也正是依靠这样的传统，西方才避免了古拉格这类恐怖灾难；^④然而，当“相对主义”不再是一种认真感受和思考后的怀疑、挑战，而完全变成了道德犬儒的遁词时，它本身也悖论性地成为了一种可怕的“思想体系”——这正是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提出的一个

① [德]卡西尔著：《卢梭·康德·歌德》，刘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0-11页。

② Solzhenitsyn, "A World Split Apart", pp.6-7.

③ Ibid., p.7.

④ James Reston, "A Russian at Harvard", in *Solzhenitsyn at Harvard*, p.38.

核心概念。^①在这一点上，对作家的演讲予以肯定的一些西方读者给出了更为有力、也更令人震动的“内部”证词：当时美国的许多师生都倾向于认为，无法证明希特勒的价值观（“更喜欢酷刑、劫掠、有系统的谋杀、专制和奴役”）要“低于其对手的”，因为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其他人身上是“傲慢”而错误的。人们拒绝进行基本的道德判断，却认为这就是“自由”的表现。^②做任何选择（注定是“相对合理”的）变得永远不如“什么都不选”高明。可是，当所有思想和立场都需要在“相对主义”面前为自己辩护时，“相对主义”本身怎可例外？早在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圈》中，索尔仁尼琴就已经借涅尔仁与看门人斯皮里东的一段对话挑明，在“相对”与“绝对”之间，不应建立起简单的“非此即彼”关系。反对倾轧人性的必然律、一元论（“播的是裸麦，长出来的却是野草”），并不意味着否认“多元”同样可以、且应当有具体的精神内涵和道德底线（“捕狼犬是对的。吃人的人是错的”）；^③而质疑道德相对主义，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要重新匍匐于威权之下。

进入西方后，索尔仁尼琴仍会频繁提及自己的宿敌马克思主义，这并非偶然。不过，如今的他，意识到这一学说“最为成功”的一点，不是促成了俄罗斯的“伟大实验”，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传染了‘善与恶是相对的’这样的信念”。^④马克思一方面特别有力地揭示和抨击了现代社会的庸俗和逐利（这也是包括青年索尔仁尼琴在内的几代俄罗斯人拥戴德国话语、拥抱革命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却又用自己的历史唯物论更彻底地摧毁了那些曾经被认为“坚固”和“神圣”的东西：所有观念都被认为根植于现实的物质存在之中；人的所思所想也都会以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为转移。传统的道德观被认为是“过时”且“可笑的”。而正是因为有着与这种“失重”生活斗争的丰富经验，索尔仁尼琴才会如此迅速地在西方发现那么

①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古拉格群岛》（上册），田大畏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年，第171页。

② 参见 Michael Novak, “On God and Man”, in *Solzhenitsyn at Harvard*, pp.135-136.

③ 对《第一圈》这段对话的具体分析，可参见龙瑜宸：“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观念与写作”，《国外文学》，2014年第1期，第93页。

④ Solzhenitsyn, *Warning to the West*, p.58.

多自己熟悉的东西。具体政治制度的不同、甚至是对抗，并未能遮盖苏联和西方社会在现代性精神气质上的相似：

人们确实可以看到，在一种被腐蚀的人本主义与任何一种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基石：没有节制的唯物论；摆脱宗教和宗教性的责任感（在共产主义政权中达到了反教权独裁的地步）；根据一种所谓的科学方法专注于社会结构问题（这最后一点，对于启蒙时代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十分典型的）。并非偶然的，共产主义的所有修辞性誓约都围绕着（大写的）人，以及人的尘世欢愉。初看起来，这似乎有一种丑陋的平行：今天的西方和今天的东方，在思考和生活的方式方面有着共同的特点？但这就是唯物论发展的逻辑。^①

而更进一步，索尔仁尼琴相信，西方如果不对现代性逻辑进行根本的反思，将来就很可能重复俄罗斯的灾难。甚至，这位正在写作俄罗斯革命史的作家还多次宣称，自己已经在眼前这个“丧失了勇气和理智”的西方，看到了“前革命”时期俄罗斯的影子：

我们是从那个将成为你们的未来的地方注视西方，或者说我们回望了七十年看我们的过去，它突然在今天开始重复自身。我们所看到的，总是和那时所发生的一样：成年人听从他们孩子的意见；年轻的一代被一些肤浅、没有价值的思想左右；教授们害怕自己不够时髦；记者们拒绝为他们如此轻易挥霍的言辞负责；对革命极端主义者的普遍同情；有着严肃异见的人们不能、或不愿意说出它们；大多数人被一种宿命感消极地困扰；软弱的政府；社团的防卫性反应变得麻痹；精神的混乱导致了政治的动乱。^②

从自己的俄罗斯经验出发，作家出人意料地指出：相较于恐怖“群岛”

① Solzhenitsyn, "A World Split Apart", p.19.

② Solzhenitsyn, *Warning to the West*, p.130.

已经浮出水面的苏联，长处安乐、并不知道自身隐患的西方的处境可能更为危险。但比俄罗斯幸运的是，西方还有改变的机会。在此基础上，索尔仁尼琴更相信，他的俄罗斯身份不仅不是他和西方沟通的障碍，还应成为后者认真聆听其声音的理由：“20世纪数不清的大事件降临在我们头上，以一种不幸的方式丰富了我们俄罗斯的经验”，“不懈而真诚地尝试将我们各自的经验传达给彼此，至为关键。”^①

不过，在看到索尔仁尼琴对现代西方的批评，是以其个人经历和俄罗斯经验作为基础的同时，也许还是应当指出，对于西方世界而言，作家发出的这类声音并不能说是完全陌生的。《华盛顿邮报》的特邀作家乔治·F·威尔就针对哈佛演讲掀起的批评狂潮写道，事实上，“索尔仁尼琴的观点与西塞罗、奥古斯丁、阿奎那、帕斯卡尔、托马斯·莫尔、埃德蒙·伯克的观点相当一致。”^②作家关于物质主义、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批评，也并不只是所谓“俄罗斯斯拉夫主义传统的某种遗存”，事实上，这类声音在受到现代性冲击的各大文明（包括最先掀起这股浪潮的西方）广泛存在。^③与索尔仁尼琴观点尤其相近的，是舒马赫（E.F.Schumacher）等分产主义者（distributist）。同样意识到现代西方片面强调进步、膨胀物欲造成的巨大风险，并有着相近的宗教背景，这批思想家也提出了“限制”的必要性。而索尔仁尼琴到西方之时，恰恰是《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这类作品畅销之际。^④这一方面证明了索尔仁尼琴的许多观察和批评，其实是点中了西方的要害；同时也提醒人们，西方对作家言论的反应如此强烈，绝不只是思想之“罪”。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源于冷战的特殊气氛。如果说，正是从一种标准的冷战思维出发，在这位反极权作家流亡前，西方已经默认他是一位“自己人”；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当这位苏联来客开始批评西方时，人们也会轻易判定他

① Solzhenitsyn, *Warning to the West*, pp.92-93.

② 转引自皮尔斯：《索尔仁尼琴：流放的灵魂》，第246-247页。

③ 甚至，索尔仁尼琴和苏联自由主义持异见者代表萨哈罗夫的许多具体争论，也可以在同时期的西方知识界中找到对应。参见 Donald R. Kelley, *The Solzhenitsyn-Sakharov Dialogue*, pp.155-165.

④ 索尔仁尼琴在西方也读过舒马赫等分产主义者的作品。不过他强调，双方观点的高度相似，并不存在直接影响的关系。考虑到他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早已提出类似观点，这一说法当可成立。参见皮尔斯：《索尔仁尼琴：流放的灵魂》，第218-219页。

原来是选择苏联、认同专制的。虽然反对“思想体系”的作家曾在发布会上公开表示，自己“想避开左派和右派的专制，甚至东西方的对立也不那么重要，最危险的是人类灵性的普遍危机。”^①但对于只关心其“站队”情况的听众而言，这样的表态是很难被认真对待的。而根据“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对抗逻辑，作家在西方报刊的批评文字中读出了《真理报》的味道也就不足为奇了：“《纽约时报》开放的怀疑精神扩展到了所有的价值上，除了它自己的价值。”^②

除了冷战这一时代语境外，索尔仁尼琴的避难者身份同样会加大西方社会倾听其批评意见的难度。不要说作家在流亡前接受了西方的帮助，就在发表《分裂的世界》、《警示西方》这类演讲和政论时，索尔仁尼琴也正享受着西方的政治庇护。在这种情况下，给出“指导意见”的似乎更应该是恩惠的施予者，而非身处“低位”的受惠者——在听完索尔仁尼琴的哈佛演讲后，评论者讽刺道：“这位来自地狱的避难者，似乎在谴责我们这些处在炼狱中的人，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天堂。”^③事实上，这样的身份尴尬让索尔仁尼琴本人也忍不住在流亡笔记中悲叹，自己如此不遵守被庇护者“基本礼仪”的行为，实在太容易被视作“忘恩负义”了。^④然而，接连在苏联和西方现场看到“先进思想的黑风”造成的巨大“折磨和伤害”后，^⑤作家认为自己报答西方的最好方式，不是去发表那些显然能讨得庇护者欢心的称颂之辞，而是“帮助西方清醒和自我拯救”。^⑥在这样的表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俄罗斯作家对“作家—先知”身份的某种自矜。可惜，与其他让索尔仁尼琴在西方碰壁的俄式传统一样，文学中心主义对于美国这样的市民社会而言十分隔阂。甚至可以想象，索尔仁尼琴在论战中越是急于发出“警示”，其庇护者就越容易感到被冒犯。而尽管（或者可能正是因为）身处一个信息更新迅

① 转引自皮尔斯：《索尔仁尼琴：流放的灵魂》，第237页。

② 同上，第246页。

③ 同上。

④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8. №.9. С.53.

⑤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第203页。

⑥ 参见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8. №.9. С.103.

猛的时代，作家不受欢迎的形象一旦形成，就再难被他在论战之外释放的善意松动一二。索尔仁尼琴的儿子伊格纳特从小所受教育“跨越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俄罗斯文化传统”，他的下列评述，也许可以为这场让双方都感到沉重不堪的跨文化之旅加上一个生动的注脚：

人们，尤其是媒体，总是以老套的反应来思考问题。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索尔仁尼琴形象的模板：“隐居的、严厉的、一个现代的耶利米^①”……他说话的腔调和表达方式是西方所不习惯的。比如，当我父亲发表他那篇饱受争议的哈佛演讲时，他是诚恳的、充满激情的。但是，他炽热的激情仅仅被看做是不礼貌的、是苛刻的。也许，以下的事实又加重了这一点：他用俄语讲话，他的讲话是通过译者的翻译才能被听懂。可能这使他的激情失去了个性，也使它听起来比它本身更为苛刻。无论如何，我父亲的方法在盎格鲁—撒克逊圈子中没有得到理解。他的方法不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他是不够礼貌的。^②

三、挑战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主义想象

对西方社会的批评，无疑为流亡时期的索尔仁尼琴招来了最多批评。但正如作家所承认的，这不是他在这一时期最关注的问题。在被强行驱逐出境后，这位古拉格斗士迫切希望利用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从“远处”继续支持俄罗斯解放事业。1975年，在应美国劳联—产联邀请发表的第一场演讲，亦即自己的“美国首秀”中，索尔仁尼琴重点谈到了苏联境内基本人权的缺乏以及苏联对自由世界的巨大威胁。他呼吁西方社会与政府不要轻信虚假的“缓和”政策，不要继续向苏联经济提供援助与投资。在他看来，这

① 耶利米：《圣经·旧约》中的一位著名先知，因为预言神的审判而遭到同胞的敌视，饱经苦难，内心痛苦，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传道使命。又被称为“流泪的先知”。

② 这是伊格纳特接受皮尔斯采访时的回答。皮尔斯：《索尔仁尼琴：流放的灵魂》，第249-250页。

等于给“活埋”持异见者的苏联政府递上铁锹。^①出乎其意料的是，这样的发言不仅被西方媒体指责为“冷战言论”，^②更让其国内的同胞无法接受：人们痛斥作家沉浸于意识形态之争，不顾一切地阻断祖国的外界援助，这将大大孤立俄罗斯，甚至让大量民众得不到美国的谷物，陷入饥荒。对此，索尔仁尼琴试图通过区分“俄罗斯”与“苏联”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显而易见，这在实际政治外交中是根本无法操作的。作家最终也只能承认，如何斫断共产主义这只“章鱼”的腕足，而又不伤及被其紧紧缠绕的俄罗斯，这个难题并不像他当初设想的那么简单。^③不过，索尔仁尼琴仍然重申了自己此前在剧本《囚徒》中就表达过的观点，即俄罗斯归根到底只能自救，不能将希望完全寄托于西方的帮助。^④这里的“帮助”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更是思想层面的。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与西方自由主义者、俄罗斯侨民以及苏联境内诸多持异见者之间，有着更为深刻的分歧。对后者而言，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正是让俄罗斯摆脱专制命运的唯一途径。早在1969年，索尔仁尼琴与《新世界》编辑部就维克多·恰尔马耶夫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展开的一场争论，就已触及了这一问题。和《新世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索尔仁尼琴并不认同恰尔马耶夫将俄罗斯革命视为俄罗斯民族精神发展高潮的看法。但如果说自由马克思主义者们是“以革命的名义拒绝俄罗斯的民族传统”，那么他的观点正好相反：“必须以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名义拒绝革命。”^⑤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民族性的这种强调，当然也可以从其对一元化体系的批判中找到根源。而在1972年完成的一篇演讲词中，他还从更积极的一面强调了民族特质的可贵：

① Solzhenitsyn, *Warning to the West*, p.84.

② 针对这种批评，索尔仁尼琴指出，自己反对的只是以政治实用主义为基础的不牢靠的“假缓和”。在 *Warning to the West* 中，他提出了以“彻底终止意识形态论战”为前提的“真正的缓和”（第276页）。

③ 参见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9. №2. С.84-85.

④ Solzhenitsyn, *Warning to the West*, p.84.

⑤ 不过，这种观点在苏联、包括在持异见者中都是极为异端的。因此，“索尔仁尼琴选择了缄默，没有指责革命，甚至强忍着不提他同意恰尔马耶夫对西方的许多批评。”皮尔斯：《索尔仁尼琴：流放的灵魂》，第194-196页。

近来，有一种时髦的议论，说各民族将被同化，在现代文明的大圈子里，各民族的差异将消灭……在此我只能说：民族差异如果消灭了，这将使我们变得毫无特色，其后果比我们所有的人变成一个模样——性格相同，相貌相同——还要糟糕。众多的民族，这是人类丰富性的体现，人类综合性的丰富个性的体现。它们中的最小民族也有自己的独特色彩，包含着上帝构设的独特晶面。^①

在写作这篇演讲词时，索尔仁尼琴还只是从国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那里感受到一种向西方“普适道路”靠拢的朦胧渴望。而当他来到并身处上述想象的中心西方后，作家对民族“同化”的压力有了更切实的感受：无论是他对西方的批评，还是他认为俄罗斯和西方一样有权利和能力“通过累积的民族经验的有机发展”走出危机的观点，都经常被论者归结为一种悖逆“时代大潮”、自我封闭的斯拉夫主义。尤其让索尔仁尼琴警惕的是，这样的看法不仅仅存在于大众媒体，更被西方的许多学术著作所宣扬。按照这些著作的描绘，在俄罗斯单薄的历史和传统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以“有机发展”的资源。部分研究者更指出，20世纪俄罗斯革命之所以会走向极权政治，其根源恰恰就在于这个他们评价不高的俄罗斯传统。正是它们把西方提供的一本“好经”给念歪了。有鉴于此，1980年初，作家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组文章，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各种错误认识”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批驳。

在文章中，索尔仁尼琴重点对西方相关历史研究中的一些倾向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专家学者在看待俄罗斯传统时，总是抱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态度，不断地惊异于“这个奇怪的世界”为什么“总是拒绝接受西方对于事物的看法？为什么它拒绝跟随西方社会的显然更高等的道路？”文明间的“差异”，被描述为“正误”，“俄罗斯因为她与西方的每一个不同点遭到谴责”。^②而在具体的论述中，因为渠道被阻，研究者可以获得的材料有限，且往往“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污染过”。再加上他们那种强烈的价值预设，这些

① 索尔仁尼琴：“为人类而艺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词”，何茂正译，《俄罗斯文艺》，1998年第4期，第65-66页。

② Solzhenitsyn, *The Mortal Danger: How Misconceptions about Russia Imperil America*, N.Y. Harper & Row Pub., 1980, pp.9-10.

材料被进一步剪裁。甚至，索尔仁尼琴指责研究者在方法上也经常复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苏联学术，采取一种彻底摒弃了“精神历史”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以理查德·派普斯的《旧制度下的俄罗斯》（*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为例，索尔仁尼琴认为该书“没有一章提及宗教，或在俄罗斯精神与公共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宗教辩护者”，而是“完全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描绘俄罗斯社会”。在这样的描述中，俄罗斯全部历史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创造一个警察国家”。作家嘲讽道，对于更早进入现代民主社会的西方国家而言，俄罗斯主要就是个“粗暴的东方专制国家”；“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将她的历史缩减为‘伊凡雷帝加彼得大帝’”。然而，归根结底，“政治体制”只是“文明”的一部分。如果没有那些在历史中沉淀下来的组织“智慧”以及宗教等精神因素的平衡、缓冲，光凭各种政治恐怖与血腥镇压，怎么可能让这片大地上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且维系千年之久呢？^①

而对于那种在俄罗斯传统、以至“民族性”与俄罗斯大革命的失败之间建立简单因果关联的做法，索尔仁尼琴的反应尤为激烈。他承认共产主义在现实运转中，必然会带有“民族”与“地方”特性，^②但西方某些学者将一切负面现象都“倒推”为俄罗斯文化的某种“固有缺陷”，有着太过强烈的价值预设，也因此而模糊了一些基本事实。例如，虽然列宁等人明确表达过自己对雅各宾派的崇拜，并在宣言和行动上不断对之进行模仿，部分研究者还是坚称十月革命与法、德激进思潮的涌入毫无关系，一切都根源于俄罗斯的政治恐怖与农民起义“传统”；^③而革命结束不久苏联就开始修建古拉格群岛，则被认为完全“得益”于沙皇时代丰富的强制劳动经验。官方对农奴和战俘的残酷奴役，甚至人民自身的“奴性”被认定为俄罗斯的固有特色。作为《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也曾多次提及“彼得大帝的强制劳动营”，并不打算对其进行美化。但作家认为它在规模、管理以及根本性质上都与苏联时代的劳改营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点从二者对“政治犯”的不同处理上可以看得最为清楚。当“一个留着鼻涕的小男孩因为将一份反政府传

① Solzhenitsyn, *The Mortal Danger*, pp.9-13.

② Ibid., pp.119-120.

③ Ibid., pp.114-118.

单贴在围栏上而被捕”，他在两个时代将获得的惩罚有着质的不同。^①列宁、斯大林等人亲历过的“过于宽松”、甚至能多次逃脱的流放生活，不仅让他们“对沙俄政权的‘无能’极为鄙视”，更从中汲取了“教训”。^②可以说，“两害相权”下让帝俄之害反而显得较轻的那些“现代”因素，才是索尔仁尼琴希望追问、而西方部分俄罗斯历史研究者选择性漠视的（可以作为补充的一点是，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集中营出现在 19 世纪的欧洲殖民地，换言之，它绝非某种“俄罗斯性”的特定产物^③）。与上述研究的结论相悖、但逻辑一致的是，另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俄罗斯革命和苏联早期政权最初还是深受西方进步思想（尤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而且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17—1921 年的恐怖被称作‘新生的黎明’或者高峰”。^④可惜的是，继任者斯大林“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选择从俄罗斯历史中汲取教义”——虽然西方研究者笔下的这位“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一直是最残酷和彻底地摧毁俄罗斯传统社会而著称的。^⑤索尔仁尼琴辛辣地指出，将责任完全推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特殊性，可以帮助“过去曾支持过苏联血腥政权”的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卸掉思想包袱”，甚至让其继续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幻想”。^⑥

从现代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要对历史作任何本质论意义上的再现都是不可能的。在各种书写的背后，都隐藏着不同的“叙事政治”。由于对所属文明、或者所信奉的学说抱有强烈自信，西方研究者或许会更愿意谈论文化和价值的普适性，不愿意以民族、国界自缚手脚；而索尔仁尼琴则还在为俄罗斯的基本生存问题担忧。由此，他在论述同一段历史时，自然会更愿意强调文明多样性的可贵以及共同体传统的活力。他的目标，也不是提供下一步“实验”的“最佳”方案，而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来摆脱眼前这种“最坏”

① Солженицын. Пьесы и киносценарии. С.237.

② 可参阅[美]安妮·阿普尔鲍姆著：《古拉格：一部历史》，戴大洪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年，第 xix-xx 页。

③ 同上，第 xx-xxii 页。

④ Solzhenitsyn, *The Mortal Danger*, p.8.

⑤ Ibid., pp.12-14.

⑥ 在出席胡佛研究所的宴会时，索尔仁尼琴对美国的俄苏研究还有过一次集中的批评。参见 Michael Scammell, *Solzhenitsyn :A Biography*, p.952.

的局面。更何况，此时的他已经认定现代西方同样面临深重危机，绝非完美。由此，这位最著名的反极权人士才会出人意料地率先指出，俄罗斯不能“从极权主义的冰崖上突然跳向民主制”，它需要谨慎而平缓的变革。^①

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传统的这种坚持，遭到的最为激烈的批评并非来自西方，而是来自自己的同胞。俄罗斯批评者纷纷指出，索尔仁尼琴的言论，太容易被希望借助民族主义情绪来进行社会动员的苏联官方所利用，阻碍俄罗斯人实现“个人自由”。^②这其实又回到了当年索尔仁尼琴与《新世界》的那场争论。只是此时已经离开苏联反极权斗争“前线”的作家，开始更为直白地表露自己的观点。在多篇文章中，索尔仁尼琴明确指出，他反对“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中的沙文主义和侵略主义，更加不赞成“将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起来，把革命及苏联随后的历史当作俄罗斯精神的胜利来赞扬”。^③苏联官方提倡的那种民族主义强调的是臣民的“出身”/血统，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对共同体的“忠诚”；与之相对，他所呼吁的那种民族意识，是以共同体对成员基本权利的尊重为前提的。共同体的力量，来自有着共同民族精神（尤其是东正教精神）的各个成员之间“真正的情感联系”。^④而如果只是就一个人对自己所属族群和文明的“眷恋”而言，作家并不打算否认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或者“爱国者”^⑤

不过，索尔仁尼琴的这些回应也许并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他的民族主义立场之所以会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内部和西方引来一致批评，一个更为隐蔽、也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民族主义”这一原本意涵复杂的概念，已经被那种以抽象个体为单位、强调普适价值的强势话语挤压得只剩下负面色彩。在冷战造成的对抗与分裂局面中，“从文化特殊性走向更大的普适性”，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高尚而“引人入胜”的理想。^⑥尤其是长期自外于“主

① Solzhenitsyn, *The Mortal Danger*, p.59.

② 参见[俄]安德烈·萨哈罗夫：“评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载《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239页。

③ 皮尔斯：《索尔仁尼琴：流放的灵魂》，第221页。

④ Solzhenitsyn, *The Mortal Danger*, p.68.

⑤ Сараскина Л. И.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8. С. 760.

⑥ 克雷格·卡洪：“后民族时代来到了吗？”，《中国学术》，2005年总第21辑，第25页。

流”价值的俄罗斯，似乎只有越彻底地抹除自己的身份标记，才越能融入国际社会。^①然而，如克雷格·卡洪在《后民族时代来到了吗？》中所指出的：“不归属于任何社会团体、社会关系或文化，那是不可能的。那种可以选择自己所有‘身份’的纯粹的抽象个人观念极具误导性。”^②这不仅是在就个体长成的“自然”过程而言，也与国际政治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大格局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直接相关。无论是因为历史的“阴影”，还是现实的利益分歧，对于西方而言，俄罗斯总是散发出一种强烈的“异族”气息。对“民族主义”的指责，很多时候是为西方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攻击武器。索尔仁尼琴曾根据自己的流亡经验提醒道，那些对爱国主义大加贬斥的同胞并不知道，作为其“模板”的美国其实盛行爱国主义。^③而颇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意味的是，作家要求苏联“这个最主要的侵略国全面回缩”、让俄罗斯人“专注自身事务”的想法，却被判定为一种危险的“俄罗斯民族意识”。^④与之类似的，作为俄罗斯自由主义侨民的典型，供职于加州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亚历山大·雅诺夫（Alexander Yanov），一方面无法理解“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斯拉夫主义者”为什么就是不能痛快地承认西方文明所代表的那些“主流”价值，另一方面，他却也不能不在同一本书中尴尬地提到，自己的这种“诚意”并未能打动西方人。他的许多西方同行倾向于将所有俄罗斯人都视为民族主义者，并认为“萨哈罗夫与索尔仁尼琴、与勃列日涅夫并无区别”。^⑤这样的“怪现象”只能说明，所谓的世界主义“其实是对一种特定的且具有发展潜力的跨越疆界的文化生产过程和社会网络形成过程的参与”。也就是说，它同样“具有特殊的而非仅仅是普适性的内涵”。^⑥事实上，若非从一开始就认定西方文明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唯一正解，西方与俄罗斯知识精英也不会不假思索地将俄罗斯曾经拥有和目前尚存的一切，统统排除在

① 索尔仁尼琴指出，那些力图融入西方社会的俄侨为西方斯拉夫研究和想象提供了最重要的“有倾向性的材料”。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9. №2. С.97-99.

② 卡洪：“后民族时代来到了吗？”，第25页。

③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02. С.152-153.

④ Solzhenitsyn, *The Mortal Danger*, pp.56-57.

⑤ Alexander Yanov, *The Russian challenge and the year 2000*, N.Y.: Basil Blackwell, 1987, pp.xi-xiii.

⑥ 卡洪：“后民族时代来到了吗？”，第21页。

可以利用的“世界资源”之外；而像索尔仁尼琴这样认为本国历史与传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的保守者，或许也不会如此让人难以忍受。

四、在西方重写俄罗斯历史

在自己的诺贝尔演讲词中，索尔仁尼琴不仅提到了民族特性的可贵，也特别强调，在区域联系空前紧密的现代世界，任何民族都不能只用自己的特殊价值去衡量一切，人类需要展开更为有效的交流。当时，作家对此前景颇为乐观。但到1978年、流亡仅仅数年后，他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抱有这种乐观态度。^①对文化隔阂的痛苦体认和身份的尴尬，让作家在西方始终处于精神“流亡”状态。而让其处境更加恶化的是，每当作家在西方陷入恶战时，苏联境内也会掀起对他的批判高潮^②——即便索尔仁尼琴与西方交战的原因，可能正是因为他试图为俄罗斯进行辩护。加上俄侨与国内持异见者纷纷指责其思想“倒退”，作家感觉自己腹背受敌，被“东方和西方两扇磨石同时挤压”。这也是索尔仁尼琴流亡笔记标题的由来。^③相较于流亡前作战对象和立场的明确，离开抗争前线的作家反而更感疲惫和无力。在收到索尔仁尼琴的来信后，其国内的好友深感担忧：“他本来精力非常旺盛，可是信上说，勉强提起精神工作”；^④“他住在这里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从来没有抱怨过。现在他没完没了地抱怨。抱怨所有人。”^⑤

好在这位阿赫玛托娃眼中的“光明天使”并未真的失去斗志。作为一位作家，索尔仁尼琴最终还是选择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

①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8. №.11. С.134.

② 有意思的是，苏联媒体经常会直接引用西方同行对作家的批评言辞。参见 Michael Scammell. *Solzhenitsyn: A Biography*, pp.950-951.这一时期索尔仁尼琴的前妻与过去的一些朋友集中出版了一批书籍，对作家进行了严厉指控。参见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2001. №.4. С.111; Сараскина Л. И.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С.167.

③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9. №.2. С.87-89.

④ [俄]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著：《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蓝英年、徐振亚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7页。

⑤ 同上，第424-425页。

度。在佛蒙特的隐居生活中，他将自己绝大多数的精力投入到了革命史《红轮：往日叙事》的写作之中：这部作品的主体部分由《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和《1917年4月》四个大“节”（узел）组成，各节又分有多卷，规模庞大。索尔仁尼琴从青年时代开始构思此书，在流亡前已经完成第一大节的初稿和第二大节的一部分，到1989年才勉强完成全稿。^①按照作家本人的说法，《红轮》不仅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而且在整个流亡时期，此书就像他的“呼吸”，“拯救”了他，让他能够“避开没有出路的现代生活。”^②他更加自信地建议自己愤怒的西方批评者“要去读读《红轮》”，因为关于俄罗斯的历史，它将给出一个“不同于浅薄的时髦观点的解答”。^③从这类表态可以看出，索尔仁尼琴在佛蒙特展开的革命史写作，已不再是单纯的关于“俄罗斯”的，甚至也不仅仅是“历史”。它与现实语境以及默认在场的读者有着明显的对话性。

事实上，作家的西方经历在《红轮》中留下了极为鲜明的烙印。从最直观的层面来说，他看到了许多只可能在西方看到的历史资料。除了在苏黎世列宁故居、胡佛“战争、革命暨和平”研究所和巴赫梅季耶夫档案馆等地借阅了大量珍贵史料外，作家还亲自成立了“全俄回忆录文库”，向俄侨征求回忆录。而要揭示被官方历史叙事严重扭曲的真相，这些一手材料和个体记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索尔仁尼琴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读出什么”的，还是西方经历为他提供的新的问题意识。1976年，索尔仁尼琴大幅度地修改了在苏联完成的《1914年8月》初稿，新增了近

① 到1980年代末，作家意识到，因为《红轮》前四个大节规模过于庞大，加上自己年龄与精力的限制，他只可能以一种“综述”的形式来完成计划中剩余的部分。从第五大节开始，作家放弃了那些“虚构”的人物，并将笔墨集中于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红轮》的全部写作。其中涉及1917年的第五到九大节相对详细。第十到二十大节简单概括了1918年2月-1922年春的事件。另还标出了打算写作的1928-1945年五个尾声。参见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2003. №11. С.51-52.但作家并未感到太多的遗憾，因为他相信1917年4月之后俄罗斯形势的变化，与其说是“质变”，不如说是“量变”（详见下文分析）。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Апрель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16. М.: Время, 2009. С.565.

②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2001. №. 4. С124.

③ Solzhenitsyn, *The Mortal Danger*, p.105, 111.

四分之一的篇幅（集中于第六十到七十三章）来专门描写“斯托雷平 1905 年如何出现，以及在他之后、直到 1914 年俄罗斯的飞速发展”。^①而从《古拉格群岛》中对斯托雷平的描写可以看出，至少在苏联时，作家对这位“臭名昭著”的“反动大臣”还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好感。^②在革命史原来的设计中，他也只打算让斯托雷平在古奇科夫主宰的声部中作为一个补充性的人物出现。但在胡佛研究所阅读相关史料时，索尔仁尼琴却不可抑制地感到“斯托雷平站在我的眼前，灼烧着我的头脑”。^③尽管对这场改革的追述不可避免地会造成“1914 年 8 月”这个时间节点的混乱，作家仍坚持作出了上述改动。而他之所以会如此“不计后果”，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通过这位大臣富有成效的改革找到了有力的证据，可以回击在苏联与西方都十分流行的那种“帝俄一片黑暗”说，并指出“革命”并非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修订版的《1914 年 8 月》中，作家以翔实的数据材料证明，相对于革命恐怖行动的泛滥和疯狂，斯托雷平采取的镇压措施，远不像人们惯常所描述的那样“残暴”。相反，他可以说是用最小的代价稳住了局势。而在政治、经济改革方面，他更成功地同时顶住保守与激进两方的压力，^④做到了“向前，但轻踩刹车”。以关键的农村改革为例，斯托雷平立志建立强大的自耕农阶层，让农民真正获得土地所有权和自主经营权。他劝说右派应该看到，“农民，一旦没有自家的土地，他们就不再尊重其他任何人的财产”；^⑤但在对官地、贵族领地以及农民土地的数量与分布情况进行了实际了解后，斯托雷平又反对像左派所提议的那样，强行剥夺地主的土地，“一旦再分配土地体制启动，就不仅仅停留在分配地主的土地，进而要瓜分富裕农民的土地，所有优秀的东西都得崩溃，分地的成果为零”^⑥（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中

①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8. №.11. С.138.

② 参见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下册），第 106 页。当时的索尔仁尼琴只是希望证明，即使与臭名昭著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相比，苏联的统治也更为恐怖。

③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9. №. 2. С.74-75.

④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1914 年 8 月》，何茂正、胡真真等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年，第 666 页。

⑤ 同上，第 652 页。

⑥ 同上，第 679-680 页。

进行的这类分析，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苏联农村改革带来的惨重后果)。与之相对的是，他鼓励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推广新的耕种法和提高产量上去，同时也希望通过国家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充分照顾那些处于无权地位的农民的利益。^①加上宗教与地方自治方面的稳健政策，索尔仁尼琴坚信斯托雷平的这场改革，不仅让尼古拉二世顺利度过了第一阶段的统治危机，也让现代化变革与俄罗斯传统融合，为一战前的俄罗斯创造了一个黄金发展期。战前俄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从下顿河到高加索，穿过整个库班大草原，作家描绘了自己所熟悉（他出生于此）的地区经济‘腾飞’的景象。”^②小说中的库班庄园主托姆恰克，正是作家以自己的外祖父为原型塑造的。这位曾经一贫如洗的农奴，一方面能够秉持东正教朴素道德观念（“为了工作人员什么也不吝惜，不是小心地紧紧抱着财富不放”^③）；另一方面，又善于向德国垦殖者学习新技术（包括“怎样把广阔的草原划成一方块一区块的防风垦殖地；怎样按轮作体系轮番种植小麦、玉米、向日葵、苜蓿、驴豆，使其一年一年长得更茁壮，更丰收；怎样把所有母牛换成产三桶奶的德国母牛”等等^④）。其日益红火的生活具体诠释了斯托雷平农村政策的成功。

而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更让托姆恰克这样的农庄主可以将“大批的、沉重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远方市场。^⑤事实上，在《红轮》中，除了农村、农业面貌的改变外，晚期帝俄“大变革”的成功，还表现在国内外贸易繁荣、工业生产高速增长、教育普及，以至“白银时代”文化高峰的出现等各个方面。^⑥“人民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方便，国家采取思维健全的方式运作”。^⑦与一般认识中的“中间派”那种骑墙形象截然不同，索尔仁尼琴笔下的斯托雷平在和左右两翼同时作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最大的

① 索尔仁尼琴：《1914年8月》，第680页。

② Olivier Clément, *The Spirit of Solzhenitsyn*, p.161.

③ 索尔仁尼琴：《1914年8月》，第81页。

④ 同上，第78页。

⑤ 同上。

⑥ 在《红轮》中，索尔仁尼琴集中塑造了一系列年轻女性形象，来表现白银时代的开放多元，尤其是通过对西方血液的选择性输入激活和丰富了俄罗斯传统。参见 Olivier Clément, *The Spirit of Solzhenitsyn*, pp.164-165.

⑦ 索尔仁尼琴：《1914年8月》，第705页。

自持力、最坚定的勇气、最有算计的耐心以及最精确的知识”。^①作家甚至认为，斯托雷平超越了彼得大帝，因为他在引入现代理念改变俄罗斯落后面貌的同时，还最大程度保证了“我们国家的生存基础——人民的心灵世界”不受伤害。^②种种描绘让斯托雷平成了整部《红轮》中最为丰满动人的一个形象。而如果联系这一时期作家本人的处境，就不难理解他“再发现”和塑造这一人物时的动情：斯托雷平因为坚持缓慢调适而既被保守势力疏离，又被进步人士斥为反动，举步维艰却始终不改初衷。这几乎完美地折射了作家“落在两扇磨石间”的心态。除了挑战主流叙事外，如此书写斯托雷平“中间道路”的成功，或许也是孤独隐居的索尔仁尼琴进行的某种自我鼓励与暗示。

无论如何，1911年改革派的旗帜斯托雷平遇刺身亡，成了作家笔下帝俄命运的转折点。社会秩序的恢复被视为斯托雷平政府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这让革命变得越来越难了（革命的初衷却已经被忘记）。在多次从恐怖袭击中侥幸逃生后，这位改革者最后还是死于一场颇有“玩票”性质的暗杀，甚至未能得到社会舆论的基本同情。“世人得以见到光明，而使其然者反受其辱”。^③在作者看来，这场充满荒诞感的暗杀也是“整个20世纪的一次预演”^④：被激进而粗陋的历史想象所控制，俄罗斯人过于轻率地“扼杀”了暴力革命之外的其他可能性。虽然也用大量篇幅描写了斯托雷平死后统治阶层犯下的诸多错误，甚至坦言“革命永远是政府犯重大错误的标志”，^⑤但在作家看来，越来越激进失衡的“社会舆论”才是20世纪俄罗斯灾难的根源。

索尔仁尼琴曾在《古拉格群岛》中指出，克里米亚战争后，俄罗斯在西方启蒙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社会舆论”，已经成为可以与专制制度对抗的“最伟大的力量”。^⑥然而，一种真正健康的“社会舆论”应该是由个人自由表达、能够互相影响的意见汇聚而成的，它不仅不应受到政府的左右，也不应受到

①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1916年10月》，夏广智、林全胜等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63页。

② 改革所针对的农村村社似乎并未被作家放在这个“心灵世界”的中心，索尔仁尼琴：《1914年8月》，第705页。

③ 同上，第784页。

④ 同上，第734页。

⑤ 索尔仁尼琴：《1916年10月》，第396页。

⑥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下册），第93-94页。

社会中单一意见、思想派别的挟持（那种“封闭的开放”对于在自由世界陷入舆论漩涡的索尔仁尼琴而言，无疑是十分熟悉的）。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在《红轮》一、二大节中，索尔仁尼琴描述了“大革命前的俄罗斯”/“今日的西方”的精神失序。作为一个相对概念，“进步”并不能给一个社会带来坚固的价值内核。不过，相较于“今日的西方”而言，身处欧洲“边地”的俄罗斯所追求的“进步”有更明确的所指：以西方现代文明为模板，几代俄罗斯进步知识分子“憎恨俄罗斯的一切”，将本土文化中的所有“前现代特征”都视为俄罗斯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的阻碍，急于与之割裂。^①这样一种决绝的反传统文化立场，又与政治激进主义互为表里。既然西方先行者已经找到了历史的正解，那么俄罗斯不妨走得更快、更直接些。就像申加廖夫等人借用那个“命运之书”的传说所强调的，西方已经率先读完历史女巫手中那一整本“命运之书”，俄罗斯就不要再妄想同历史的铁律“讨价还价”，“任何人都避不开进步的阶梯。无论如何，西方所经历的那些阶段，我们都要艰难地走过。”^②在整部小说中，无论是在罢工风潮里，还是在杜马、城市联盟的辩论中，抑或在前线士兵的溃逃路上，进步知识分子总是熟练地运用一整套经过功利化、激进化解释的现代政治术语，以抽象的“人民”的名义发言，带动舆论不断向“左”倾斜。在《1914年8月》中，索尔仁尼琴甚至连用四章（第五十九到六十二章）的篇幅，描写了老牌革命知识分子阿格涅萨姑姑如何对后辈进行“教义”讲解。在她的慷慨陈词中，已经不难找到日后支持“古拉格群岛”运转的一些基本法则：

绝对不准用旧的道德标准评判革命者。对一个革命者来说，一切有助于促进革命胜利的言行，都是合乎道德标准的，而一切有碍于革命胜利的言行，都是不道德的。革命是一种伟大的范畴，这就是从专制向人民享有更高权利、更加正义的社会的转变，向最高真理社会过渡的过程。凡是知道生命的全部价值并能献出自己生命的人，都知道他该付出什

① 索尔仁尼琴：《1916年10月》，第1017页。

② 同上，第316-317页。

么，应该夺取什么，他就有权夺取他人的性命。^①

诚然，通过对其所在声部的深入模拟，小说也毫无保留地展现了阿格涅萨姑姑这类知识分子的个人美德与良好动机。但他们对俄罗斯命运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话语本身，与具体实情无关。^②而尤为重要的是，激进舆论一旦形成，就很难再被个人、包括最初煽动起这股舆论的人精准控制。相反，它会依靠自己抢占的道德制高点，成为一种新的、也更恐怖的“专制力量”。在一种要求快速“站队”的气氛中，本应是知识分子“基本属性”的独立思考能力反而成为禁忌。早在大革命真正爆发前，俄罗斯已经出现一种“精神陷阱”：但凡敢与左派争论的人都会被贴上“极右黑帮反动分子的标签”；而敢与青年争论的，就是“暗探局特务”。^③也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下，斯托雷平才会被认为“罪无可恕”。而在《1917年3月》（俄历2月）中，物质基础仍然坚固（粮食储备并未真正出现短缺，对德战争也即将进入反攻阶段^④）的帝俄政府才会毫无抵抗之意，在短短三天时间内应声崩塌。原本毫无革命准备的杜马和反对派政党轻松获胜。然而，也正因为只是以一股不代表真正理性选择的躁动民气作为初动力，这场革命才从一开始就走向了无序、盲动与暴力。从2月27日开始，“逮捕、抢掠、防火、酗酒、报仇与凶杀”，在“全城所到之处毫无阻挡。所有的政权被扫荡殆尽，所有的通讯设施尽皆中断，所有的法律都失去了效力。”在一切秩序都被打破的情况下，兵痞街霸肆意作乱，甚至连全城在押的刑事犯，也被当做“反抗专制的英雄”获得“解放”，“全城闹得人人自危，随时都可能遭到任何人的攻击”。^⑤

而此后的革命更如出笼猛兽，再难受缚。关于自由主义政党在俄罗斯大

① 索尔仁尼琴：《1914年8月》，第571页。

② 最有说服力的是，整部小说对四届国家杜马的速记记录进行了大量抄录，揭示出杜马已经从“独立于政府”转为“对抗政府”。致力于解决实际民生问题的建议总被认为是与万恶的专制制度妥协，无法得到代表们的倾听和讨论。关于这个问题的总结性论述，可参见[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1917年3月》，何茂正等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74-175页。

③ 索尔仁尼琴：《1916年10月》，第1019页。

④ 参见索尔仁尼琴：《1917年3月》，第140、298页。

⑤ 同上，第979页。

革命中的最终落败，研究者通常会提及自由主义这一政治理论在失序社会的天然局限性：它以“假定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作为前提，本身却并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共同价值标准、建立秩序的手段。^①但除了这一点外，在《红轮》中，作者还着力表现了俄罗斯自由派（看似与“软弱无能”相对立）的另一面：相较于欧洲其他各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本来就要“左倾”得多，也总是更“宽容地对待界限的向左扩展”。^②在经历了革命初期的惊慌后，罗江科、米柳科夫等人很快在等待其表态的公众面前，塑造了自己足够“进步”的形象，发表了一系列情绪激昂但与其政治立场并不符合的演讲和政令。尽管对革命形势的日渐失控不无担忧，他们也同样被这些势必会进一步激化事态的发言所感动，相信正是自己在创造历史。^③加上激进舆论的催化，这些政治领袖终于被“自我绑架”，自觉不自觉地“从革命”走向“更革命”。在与苏维埃谈判的过程中，米柳科夫等人不能不被自己以前喊出的一些口号缚住手脚，怕“公开的自我背叛”，也怕“人家痛恨、咒骂、谴责他，以为他是罗曼诺夫皇朝的捍卫者”。^④在索尔仁尼琴看来，苏维埃执委会提出的“一号令”（3月1日）和“八项条件”（3月2日），没有遭到多少阻拦就通过了，这意味着“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战胜帝国敌人的同时，苏维埃意识形态却窃取了胜利果实”。^⑤很快，面对更“进步”、更善于迎合庶民政治心理的挑战者，临时政府和被其推翻的帝俄政府一样，在力量占优的情况下完全失去了捍卫自身合法性的勇气。布尔什维克要做的，仅仅是将自由主义者“扔在地上”的权力“捡起来”。^⑥

从更广阔的社会思想、而非具体的政治观念出发，索尔仁尼琴最终对在西方广为流行的“肯定二月革命、否定十月革命”的观点进行了驳斥（更不用说苏联官方史学所主张的“十月胜过二月”了）。他提出，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间并无明显断裂，“俄罗斯民族无可挽回的损失，从二月革命就已

① 参见刘东：《理论与心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5-126页。

② 索尔仁尼琴：《1917年3月》，第1526页。

③ 同上，第638-640页。

④ 同上，第1550页。

⑤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ад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ей. <http://www.solgenizin.net.ru/razdel-sb-elbook-615-pgs/0/>

⑥ 皮尔斯：《索尔仁尼琴：流放的灵魂》，第261页。

经开始了”。^①作家甚至认为自己此前长期将十月革命视为革命史“中心”的判断也不正确：“主要的事件其实是 1917 年二月革命。”^②对中心的这一调整，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红轮》的结构，也被索尔仁尼琴视为自己的一次“思想转折”。而和“重新发现”斯托雷平相似，促成这种转变的，首先也是作家 1976 年春在胡佛研究所查阅到的大量资料。当时，《1917 年 3 月》的写作尚未正式开始。在研究所的两个半月时间里，作家“陶醉地‘翱翔’”于各种关于二月革命的材料之中，后者“打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③不过，从研究所回来后，索尔仁尼琴逐渐意识到，从开始进入西方到发现新史料这两年时间里，二月革命的问题其实早已从各种“缝隙”中显示出来。尤其是他此前对西方的“直觉式的坦率批评”，已经构成了“那个在二月革命材料中发现的新知的一股细流”。^④也就是说，作家仍然是带着特定的“前理解”开始阅读研究所的材料的。《红轮》中心的转移，与他两年来所处语境与自身思想的变化息息相关。一方面，被迫流亡在客观上让作家得以摆脱此前那种“对打”式的二元思维，有可能去质疑被布尔什维克指责、却“在苏联（持异见者中）和西方都得到广泛支持的”二月革命^⑤；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如前文所讨论的，在流亡生活中，索尔仁尼琴已经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注意到了西方同样危机重重，并且与苏联在“现代”精神气质上颇为一致。由此，他才会力排众议地将（自由主义的）二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十月革命勾连起来。作家相信，这两场看似对立的革命从根本上说都是以全民对“进步”的激进理解、以及关于“人取代神重新创造历史”的狂热想象作为支撑的。“当权者既不是人民委员，也不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更不是杜马委员会，而是那些普通百姓，他们才拥有最充分的权力。普通百姓的权力就是自作主张，他们和所有人都是这样理

①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ад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ей.

②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8. № 11. С.153.

③ Там же.

④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9. № 2. С.68-69.

⑤ Там же. С.68.

解的：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权力。”^①

不可否认，作为一位先是经历了古拉格灾难，后来又在铁幕另一端发现类似精神危机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自己的革命史中对“政治变革”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漠。按照《红轮》的描述，抛开那些宏伟的政治叙事不论，“政府以及其他统治机构的变换”，似乎并未能改变俄罗斯当时面临的“任何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而只是让它们的解决变得更难”。而“‘自由’、‘革命’、‘新纪元’这类神奇的字眼，也并没有让维系基本秩序变得不必要”。革命“新人”中最好的那部分（如新任农业部长申加廖夫），也“不能不和他们那些‘无能’的前辈忙活完全一样的事情”。而更多政客则一味以多半带有破坏性的口号迎合大众，博取晋升资本。^②在各种臆想的新事物、新思想中反而透出了“真正的庸俗”。失去传统约束力的民众沉浸在“吃不完的面包”、“不用再给军官敬礼”和“报复所有欺负过自己的人”这类想象之中。“节日”一词开始频频出现在《1917年3月》这一大节中，^③但与《1914年8月》中农庄主托姆恰克将收获的日子视为自己“最大的节日”不同，彼得格勒人此时享受的是一个以摧毁和破坏/“红轮”为主题的狂欢节。拒绝狂欢的“红色”，也就代表着成为公敌。“一名身穿军服的军官因为没有佩戴红色标记，被一群无知的平民百姓赶到一所房子的楼梯上，用枪给打死了，鲜血与脑浆溅了满墙。”^④以自由的名义（往往要加上暴力的手段）造反的士兵和工人尽量让更多人参与罪行，“从而让犯罪不再成其为犯罪”。而“革命运动越是成为‘全体性’的，就越是需要‘敌人’”。^⑤退一步说，索尔仁尼琴相信，就算没有后来的十月革命，这种以对俄罗斯母体的粗暴损害为代价的、外在的“进步”，也不能像革命者、以及后来许多西方与俄罗斯知识分子所设想的那样，解决共同体生活中的一切重大问题：

如果只是建立共和国，一个已解体的国家又能从中得到些什么呢？

① 索尔仁尼琴：《1917年3月》，第1312页。

② Немзер А. С.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Опыт прочтения. М.: Время. 2011. С. 193-194.

③ Там же. С. 207.

④ 索尔仁尼琴：《1917年3月》，第982页。

⑤ Андрей Немзер.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С. 217.

或者与日俱增的政治狂热能让人们的现有生活变得更好些？它能带来什么原则让我们摆脱内心里的痛苦、摆脱精神上的不幸呢？难道我们生活的实质就是政治性的吗？

……如果自己心里都搞不明白，又怎么去改造世界？^①

而在《1917年3月》的大纲《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中，索尔仁尼琴甚至提出，1917年发生的一切，是一场愈演愈烈的“十五大革命”的开端（标志这场革命“大功告成”的，是1930年代初“农民被彻底铲除”）。^②这进一步证明了作家所质疑的，与其说是二月革命中摆在台面上的那些政治理念，还不如说是以二月革命为象征、正式开启的俄罗斯现代化急行军过程——并非偶然地，在小说后面三个大节中，当俄罗斯形势日益危急时，早已身亡的斯托雷平仍以不同形式不断“出场”，提示着人们，除了“激进”与“倒退”，俄罗斯本来还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③

在索尔仁尼琴写作《红轮》的最后几年间，苏联形势开始急剧变化。对此，作家感到振奋不已。但在一片要求改革“快点，再快点”的热潮中，他也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危险气息。^④为此，索尔仁尼琴花了大量时间缩写《1917年3月》，并通过“美国之声”播出，提醒自己的同胞不要在狂喜中迷失方向。^⑤1990年他又着手写作《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希望以自己多年的历史研究作为基础，参与讨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应当如何展开重建。在这部改革方案中，索尔仁尼琴广泛借鉴了托克维尔、穆勒、熊彼特、波普尔等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观点，并对自己在瑞士阿彭策尔州亲历的“小空

① 索尔仁尼琴：《1917年3月》，第1937页。

②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ад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ей.

③ Edward E. Ericson, Jr., "For the Love of Russia", *Modern Age*, 2000, Vol.42, No.2.

④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2001. №.4. С.61-62.

⑤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2003. №. 11. С.36.

间民主”议政场景大加赞赏；^①但与此同时，作家再次重申，普适于所有民族的所谓完美方案并不存在，历史也不会以断裂形式行进。俄罗斯人应做好持久作战的准备，并着力恢复自己的精神传统，获取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秩序源泉与道德约束。^②有理由认为，索尔仁尼琴在西方最终选定的这一“保守”立场，不仅不是向壁虚构之物，反而是在极为激烈的文明对话与交锋中形成的。

可惜，20世纪初的那种精神混乱再次征服了俄罗斯大地。尽管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身为反极权代表的索尔仁尼琴在祖国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他关于“重铸民族性”的呼吁还是让一心向西方看齐的同胞大感失望，应者寥寥。作家只能在异乡看着“重病”的俄罗斯被“盲目而缺乏理性地大力催促着完成‘新的一跃’”。全方位的激进改革不仅没有创造“奇迹”，反而让俄罗斯内部的分裂和赤贫化变得更加严重。索尔仁尼琴悲叹，这简直就是对1917年2月的“戏拟”。^③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对俄罗斯革命的研究，以及关于激进变革存在风险的警告，与其说是出现得太晚，不如说是太早：对于仍然相信历史必然进程的俄罗斯来说，它们还不能被认真倾听。人们还是认定，“只要打开闸门，给市场以自由，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④而那些对“一个有着无限的消费品的世界”的允诺，也仍然要比“索尔仁尼琴所呼吁的自我限制的主张”诱人得多。^⑤

对此，索尔仁尼琴也不能不感到灰心。^⑥然而，1994年，在流亡了二十年后，作家还是选择离开始终未能让其获得归属感的西方，回到“深渊”中

① Solzhenitsyn, *Rebuilding Russia: Reflections and Tentative Proposals*, trans. by Alexis Klimoff,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1, pp.83-85.关于索尔仁尼琴在阿彭策尔州议政现场的具体见闻和感受，可参见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1998. №.9. С.108-111.

② 关于“我们如何重建俄罗斯”的具体讨论，参见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56-360页。

③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2003. №.11. С.68.

④ 谭索：《叶利钦的西化改革与俄罗斯的社会灾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页。

⑤ 皮尔斯：《流放的灵魂》，第279页。

⑥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2003. №.11. С.90.

的祖国。在流亡笔记的最末，他引用了罗蒙诺索夫的名言：“我活过，罪也受过，我知道，祖国的儿孙后代将怜悯我。”^①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间，屡败屡战的索尔仁尼琴还将继续去冲撞那些在东、西方都流行的、比极权政治更加强大的“观念上的橡树”。而无论是“黑色星期一”后其作品销量的回升，还是新世纪初俄罗斯学界掀起的斯托雷平热，^②或许都暗示着，在历史的不断检验和校正中，这些被夹在“磨石间”的“谷粒”所发出的声音，并非没有可能熬成传统。

【Abstract】 The thought and image of Solzhenitsyn mad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his exile. Before his exile, the writer had no favorable impression of the West. However, cultural conflicts, special atmosphere of the Cold War and embarrassing refugee status got Solzhenitsyn into troubl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his exile. Based on his Russian experience, the writer soon found familiar spiritual crisis of modernity in the West and challenged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of west-centered cosmopolitanism. As a result, he turned to be unwelcome either in the East or in the West. Ultimately, by “re-finding” and writing on the Stolypin Reform and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Solzhenitsyn, who was forced to live in seclusion, made an overall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his journey in the West.

【Key Words】 Solzhenitsyn, The West,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Nationality, Revolutionary History

【Аннотация】 Идеи и образы Солженицына сильно изменились во время изгнания. До изгнания писатель интересовался Западом, однако из-за различий в культуре, напряжённой атмосферы во врем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

①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 Новый мир. 2003. №.11. С.92.

② 无论是认为斯托雷平是“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保守主义者”，还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近年大多数研究者都对这位“现实的中间派”及其改革成效有了更为积极的评价。参见吴贺：“21世纪俄罗斯学界关于斯托雷平研究的概述”，《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第131-140页。

многих других факторов Солженицын столкнулся с рядом проблем сразу после приезда на Запад. Благодаря опыту проживания в СССР писатель вскоре обнаружил в запад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знакомый ему духовный кризис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и бросил вызов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у, центром которого всегда был Запад. Это всё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Солженицын стал неприветствуемым как на Западе, так и на Востоке человеком. Вынужденный жить в уединении Солженицын,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пересмотра» и описания Столыпинской реформы и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размышлял о своей поездке на Запад.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Солженицын, Запад,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история революции

(责任编辑 贝文力)

东正教

当代俄罗斯东正教报刊的世俗化特色探析*

翁泽仁**

【内容提要】21世纪的俄罗斯东正教报刊最显著的一个特征，便是其世俗化。这个世俗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一是内容的丰富性、现实性和紧迫性；二是受众群体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媒介策略，在俄罗斯，包括东正教报刊在内的东正教媒体以惊人的速度显示着它的发展潜能和趋势。这对于一个宗教国家，抑或是非宗教国家而言，都是一个很高的水平。从俄罗斯东正教报刊的世俗化本质特征去探讨其获取成功的经验，对于世俗媒体而言也可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 东正教报刊 东正教教会

【中图分类号】D751.2; B976.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5-0062-(20)

引言

宗教媒体的世俗化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与时俱进、同时又是非常艰深和需思量的问题。因为，较之传统社会而言，宗教不再作为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现代人对于生存在现代生活中的宗教产生了漠然态度。作为宗教的宣传工具，现今的宗教媒体作用浅显、功能单一。所以，世俗

* 本文系贵州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俄罗斯东正教媒体世俗化成因及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2GZZ0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章可能存在的不足与错谬由作者负责。

** 翁泽仁，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化问题的提出不仅不能缓解宗教媒体的工作压力，反而加深了它开展工作的难度和复杂度。因为，世俗化问题所涉及的面较大，而且波及两极对立的、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彼世与此世的问题、宗教界与世俗社会的问题、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的问题，等等。宗教问题本身就是极为敏感的话题，如果其媒体对这几类问题把握不当，会对宗教教会、宗教界人士及其活动产生一系列极大的负面影响。其话语权、社会地位会随之而减弱。

世俗化问题对于宗教媒体来说具有时代性，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宗教媒体的世俗化问题便在今日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被赋予了双重属性。该双重性表现在：一方面既要保持和体现其宗教价值、内涵及其精神意义；另一方面不仅不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而且还需与它们进行互动和协调。所以，如何进行变革和创新，如何在世俗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平衡和处理好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之间的关系，找准自己的价值和归属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在今天这个文化多元、宗教生活低迷的现代化社会，这一切对于一个宗教性质的媒体而言是相当艰难的。毫无疑问，宗教媒体的世俗化问题主要是程度的问题，而且必须严格按照规范和程序来进行。因为，它既不可能完全世俗得如同普通的大众媒介，从而丧失作为宗教媒体的基本意义和价值；又不可能仅仅略带一点世俗气息，便称自己已经世俗化了。因此，这的确是一个难以把握的关键问题。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是宗教性大于世俗性，还是宗教性与世俗性处于同等状态和地位？宗教性大于世俗性能不能吸引更多的受众，而宗教性与世俗性平衡又会不会引起人们对它的负面舆论？采取怎样一种方式才能使宗教媒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化、又能使得宗教性与世俗性不失衡、失序？这些都是需要宗教界、新闻界以及文化界深思的重要问题。

东正教人士在沙俄时期的俄罗斯是最早拥有报刊创办权和监督权的特殊阶层。同时，东正教教会也擅长于通过语言和文字与政府和民众建立紧密的关系。这已是其固有的传统。经历了俄罗斯社会巨大转型后的东正教教会，不仅恢复了苏联时期中断的媒体拥有权，而且推出一整套革新方

案，让东正教报刊最大限度地去关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这样一种改良立场，让东正教报刊在竞争激烈的媒体舞台上迅速站稳。俄罗斯东正教报刊所传递的多样化讯息及其所发挥的多元化功能，不是隐秘而是公开直观地表达了其个性化特点，以及与时代同步的文化特征。

一、东正教报刊概况

俄罗斯的东正教媒体不仅拥有浓墨重彩的辉煌历史，而且还有着不落后至于今天的今天。诚如俄罗斯学者谈到的：东正教“教会新闻——不仅是俄罗斯19世纪至20世纪初新闻史上的辉煌篇章，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新闻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①。其中，东正教报刊是东正教媒介体系中发展得最早、内容最为完整的代表性媒体。

（一）19世纪的东正教报刊

东正教报刊有着悠长的发展历史。19世纪前期，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些机构就开始创办报纸和杂志。其中，神学院是承办报刊的先锋和重要部门。这是因为，神学院聚集着大量文化精英和知识分子。1821年，圣彼得堡神学院首先创办了杂志《基督读物》，这是一份学术性的神学杂志；首本畅销的大众读物为1837年由基辅神学院创办的周刊《礼拜读物》；首本宗教学校的定期刊物是1857年在里加创办的《笃信宗教的学校》。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4大神学院创办了19种定期出版物，宗教学校出版了近十种杂志。其中，较为有名的是1884年由大主教阿姆夫罗西（Амвросий）创办的神学—哲学杂志《信仰与理性》。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出现了许多被称之为“神学—政论”的神学读物。这些读物中，有布道稿和对东正教会及非斯拉夫世界重大事件的分析，著名教会活动家的随笔等内容。其中，较为有名的有：圣彼得堡的《朝圣人》（Странник）（其副刊为：1900—1911年的《东正教神学辞海》），基辅的《适合于民间阅读的家庭交谈》（Домашняя

^① Каталог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прессы. Выпуск. Церковный вестник. <http://www.TSERKOU.INFO>

беседа для народного чтения), 莫斯科的《大有教益的读物》(Душеполезное чтение)等。1860—1870 年间的神学—政论期刊物的最大特点,就是对教会及教会—社会问题作出勇敢的讨论^①。

(二) 苏联时期的东正教报刊

在俄罗斯的国家发展进程中,东正教报刊一直伴随着它在俄国地位的日益显著而蓬勃发展,这样的势头一直持续至 1918 年。苏维埃政权成立的头五年间,近 400 份东正教定期刊物停止了发行。在此后的日子里,东正教界人士遭迫害,或被杀害、关押及流放,教堂被关闭。东正教及其宣传工具遭遇低谷与重创。从 1931 年到 1989 年,在俄罗斯只存活了唯一一份东正教杂志,即由都主教沃洛卡拉姆斯基(Волоколамский)和尤里耶夫斯基·皮季里姆(Юрьевский Питирим)管理领导的、兼有俄文和英文版的《莫斯科东正教圣大牧首公署杂志》(Журнал московской патриархии。该杂志从 1931 年创刊起一直未改变自己的设计和开本。直至 2009 年春天,至圣大牧首格里欧提出了其内容及外形必须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所面临的各项任务相一致的要求后,从 2010 年 1 月起,杂志以新的开本出现。2012 年 1 月开始刊发两个月一次的视频副刊。《莫斯科东正教圣大牧首公署杂志》展现了现代教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其中包括神学教育、教会的社会服务,它与军事力量的相互作用、传教士的工作等等。其文章涉及“圣经”的所有章节、布道稿、教会历史工作及图书简介等)^②。并且,这本杂志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跌宕起伏。它于 1931 年创刊、1935 年被查封,1943 年再次得以发行。该杂志拥有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它“成为了不被时代的敌对势力所浇灭的星星之火……因为,国内著名的神学家、文学家、教会历史学家和斯拉夫学家,在杂志的各个时期一直参与工作和合作。而且,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它的编辑部顽强、坚定地维护和宣

① Бронницкий Тихон: «СМИ РПЦ на пороге третье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http:// www. Pravoslavie.ru/ sobytia/ cpp/ smirpc.htm](http://www.Pravoslavie.ru/sobytia/cpp/smirpc.htm)

② Ксения Лученко: «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что та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СМИ». [http://os.colta.ru/ media/paper/details/37759/?attempt=1](http://os.colta.ru/media/paper/details/37759/?attempt=1)

传教会传统，对东正教新闻给予了高质量的文化支持”^①。“该杂志在这些年代里，成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喉舌。把福音的钟声带给俄罗斯的信徒们，成为关于教会生活无价的信息源泉，在对人们的基督信仰的培养和启蒙方面、在维护信仰的纯正性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在国外出版发行并针对西方受众的定期刊物，如使用俄语和法语、发行于法国的《西欧教区长公报》（Вестник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Экзархата），使用德语的《东正教之声》（Голос Православия）。

（三）新时期的东正教报刊

苏联解体之后，在时代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东正教报刊在新独立的俄罗斯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俄媒体转型的时期。东正教报刊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开始了自己新的发展轨迹。1991年是东正教报刊的重新起步年。该年诞生了新时期俄罗斯的第一份东正教刊物《家庭读物杂志》（后期改名为《东正教漫谈》）（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беседа）。主编为莫斯科大牧首管辖教会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瓦连京·列别杰夫（Валентин Лебедев）。《东正教漫谈》的创办，对东正教报刊的出版发行有着非常重要的先锋意义。“该杂志的出版开创了新纪元。因为，还在几年前，一些人冒着被国家严重惩处的危险，从国外带来了一本东正教图书”^③。同年，在莫斯科出现了第一份全国性的东正教报纸《拉多涅日》（“Радонеж”是由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大型教育联合会——“东正教协会 Радонеж”主办出版的。是东正教评论性报纸，也是俄罗斯首份独立的东正教报纸。16开月刊。在俄罗斯地位极其重要。该报拥有一批高水平、稳固的作者群。由于自身高水平的专业性，“Радонеж”在世俗的新闻团体及东正教同事中获得稳定的高评价。成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神学校、莫斯科东正教知识分子的喉舌。^④）。尽管《拉多涅日》不属于东正教会的官方报纸，但它的出

① Бронницкий Тихон: «СМИ РПЦ на пороге третье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② Там же.

③ Журнал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беседа» исполняется 20 лет. http://ruskline.ru/news_rl/2011/04/16/zhurnal-pravos/avnaya_beseda_ispolnyaetsya_20 лет/

④ История “Радонежа”. <http://www.radonezh.ru/society/history>

现，对东正教媒体而言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因为这份报纸“登载了教会的官方文件，坚持莫斯科大牧首的观点，与别的刊物和社会团体进行辩论，阐述所有教会生活的问题”^①。它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促使了官方教会媒体的编辑部采用新的语言来为现代读者——青年人解释东正教”^②。

1995-1996年杜马与总统大选期间，俄罗斯不仅出现保护各自集团利益的寡头媒体，而且国内舆论也呈现出多样化状态。在这个重要阶段，东正教界人士没有刻意回避媒体间的争斗与冲突，而是不失时机地显示其与时俱进参与社会生活的现实精神，也着手对自身的传播媒介进行改造和塑型。在东正教界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以及世俗媒体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协助下，东正教媒介体系的雏形开始形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种新类型的东正教报刊，它们被称为“青年东正教刊物”（Молодёжные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издания）。所谓的青年报刊，针对的是青年受众，是专门为青年人设置的报刊。这类报刊的诞生，实际上也就回应了《拉多涅日》（Радонеж）前期所做的开创性工作。1995年1月25日，莫斯科大学圣塔季娅娜苦行者家庭式教堂首创青年东正教报纸《塔季娅娜日》（Татьянин день，首刊创于1995年1月25日的俄罗斯大学生节，即塔季娅娜日。该报触及文化、科学、艺术、社会、政治和宗教的问题。《塔季娅娜日》力图避免阐释教会内部生活的问题，因为这个内容对外界来说可能会成为“诱惑物”。其中的特别关注点是在被称之为“青年问题”的领域上，首要的问题针对的是宗教分化运动的强劲传播。为此，该报设置了称为“扇面”的新闻传教士中心。其任务便是收集和传播关于非传统教士在俄罗斯大地上，首先是大学中的活动。中心尽可能地为遭受宗派灾害的人提供宗教—心理学的帮助。由于多年在这个领域上所做的工作，该中心主任，也即是《塔季娅娜日》的副总主编叶戈尔佐夫（Александр Егорцов）被授予“圣谢尔基·拉

① Антипов Максим, Рачкова Людмила Сергеевна: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СМИ—новый игрок н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м рынке». 21.февраля.2008г. Портал Богослов.ру.

② Там же.

多涅日奖”^①)。此外,《多马》^②、莫斯科神学院杂志《相遇》^③、圣彼得堡大学生报纸《彼得与帕维尔》(Пётр и Павел)等,也是这一时期诞生的第一批青年东正教刊物。这批新型刊物的出现,在东正教媒介体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对以后东正教报刊的受众定位开启了启发性的思路。在此之后,东正教报刊的小众化道路尤为突出。这是该类报刊颇具特色的地方。

从 21 世纪开始,东正教报刊便走向了兴盛阶段。据俄官方网站统计,到 2005 年,在俄罗斯有 800 多种登记注册的东正教刊物^④。东正教媒体从报纸开始发展,直至通讯社、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乃至现代的网络,其发展的力度越来越大,势头越来越强劲。不少报刊成了国家级报刊,在整个俄罗斯境内发行。许多报刊都拥有自己的门户网站。

① “ТАТЬЯНИН ДЕНЬ”-студенче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журнал-газета МГУ. http://www.pravoslavie.ru/Press/td_hist.htm

② 《多马》(Фома)始创于 1996 年,最初为黑白丛刊,现今已发展为文艺启蒙月刊,发行量为 3.6 万份。其名起自于使徒“多马”。其基本话题是基督教在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杂志稿件作者都是对东正教持正面态度的社会活动家和记者。这是一些对教会在现代人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担忧或感兴趣的人,是对解决重要的世界问题和民族问题、对发展文化艺术感兴趣的人。2007 年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建议图书馆订购该杂志。《多马》虽然并不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官方刊物,但其一切活动都受得莫斯科大主教的赞许。所以,从实质而言,它是属于半官方性质的杂志。该杂志原则上避免讨论现今世俗政治问题,更倾向于对文化和社会进程的分析。它成为 2011 年第一季度俄罗斯中央电视和广播节目中引用率较高的纸质出版物。参见翁泽仁:“俄罗斯东正教媒体发展状况探析”,《西伯利亚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62-63 页。

③ 《相遇》(Встреча)是在莫斯科神学院大学生的倡导下于 1996 年创办的。通过该杂志读者可以了解到神学校的内部生活。作者大部分为神学院教师以及神学和世俗学校大学生们。杂志于从 1996 年-2004 年获得大主教耶夫根尼的恩准,从 2005 年至今获得阿列克谢二世和格里欧的恩准。每年出版 1-3 期,发行量为 5000 份。2005 年以前为黑白版面,2005 年以后改为彩色版面。《相遇》以其优良品质获得社会极大好评。2006 年在第 14 届“东正教记者俱乐部”大会上,其主编 П·科罗廖夫获得“东正教大众媒介优秀记者”的荣誉称号;2008 年《相遇》在全俄“媒介一代人 2008”比赛中获得了“大学杂志”奖项第二名。该项比赛的组织者为全俄大众媒介工作人员社会组织——“媒介联合会”与俄罗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相遇》的栏目有:《福音书》、《弥撒学》、《哲学》、《使徒行传》、《为基督教教义辩护》、《牧师的职位》、《宗教教育》、《教父著作研究》、《教会历史》、《教会艺术》等。参见翁泽仁:“俄罗斯东正教媒体发展状况探析”,第 63 页。

④ «Между миссией и медиа: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СМИ в России». <http://www.полит.ру>

（四）东正教界人士与东正教报刊

虽然，俄罗斯政府给东正教会发展其媒体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空间，但必须承认的是，东正教媒体在俄罗斯的新生，主要还是由于东正教会人士的不懈努力。在宗教生活的复兴过程中，东正教会试图通过发展其传播媒介来传递它的政治和文化诉求，以恢复和提升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的地位。这种极其明确的价值观念，成为东正教媒介体系形成的强大推动力。对于媒体的重要性，东正教界人士非常关注，其领导人更是亲力亲为地进行扶助。已故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Алексий II）是最为典型的、积极的媒体倡导者和参与者。许多的东正教媒体是在他的倡导和恩准下得以创办的。继任的大牧首格里欧（Кирилл）为此也曾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出版报纸和继续播出广播节目是非常重要的和有益的事。它们甚至可以解决在扩充和完善这个美好事情（宗教）道路上所出现的问题”^①。格里欧继任以后，一直延续着阿列克谢二世大力推动东正教媒体发展的传统，给予媒体充分的支持与信任。正教会领导人身兼数职，不但拥有宗教行政权力，而且还必须对其媒体的发展承担重责。他们既是国家政令的传递者，引领和制约着媒体的发展方向，同时又是宗教领导人和宗教媒体的组织者、监督者。在俄罗斯，对于至圣大牧首所承担的新闻责任有着明确的规定和指示。对此，著名媒体人、俄罗斯东正教事务管理信息部主席及东正教青年报纸《多马》（Фома）的主编及创办者列格伊达（В. Р. Легойда）曾谈到，至圣大牧首要求教会管理信息部承担的任务是“共同调查、传播东正教教义，以及支持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大众新闻媒介的相互关系”^②。

东正教领导人不仅在思想上给予指导，启迪东正教媒体的发展思路，而且还坚定地明确了媒体的功能与作用。这种决策性的指导使得东正教媒体的从业人员有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定位。大主教吉洪（Бронницкий Тихон）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作为莫斯科大牧首管辖教会的出版委员会主席兼出版社主编的大主教吉洪，在2000年的“东正教报刊国际大会”上谈到，东正教报刊发展中急需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在俄罗斯创建一种面

① Радио «радонеж». <http://www.google.ru>

② Владимир Лейгойда. «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измерение должно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http://Паптриархия.Ру>, 13.01.2010

向大众的全俄东正教周报，即全国性的东正教社会性报纸。而这种报纸的宗旨就是：“用教会的视野来审视现代生活的重要问题，并且以此去影响大众舆论和政治制度。当然，除了实用的目的及任务外，它还应该成为信息的源泉、应该成为真理的见证人：带来真理，并确定与维护它。”^①在这里，吉洪把东正教媒体的功能与任务描绘得相当清晰与明了。他的思想可以说代表了大多数东正教界人士的想法。而且，几乎所有的东正教媒体，无论是大牧首管辖教会还是主教管辖教会的媒体，都按照这一理念去规划和编排内容。

（五）东正教报刊的整体性发展

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东正教教会的“统一性”精神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其首先表现在“没有地域之分，教堂、主教管辖区、教区、修道院、教会会馆，以及东正教兄弟会、社团、信徒联合会等，都纷纷出版自己的读物。”^②除了中心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喀山、叶卡捷琳堡、下诺夫哥罗德、新西伯利亚、萨马拉等教区都广泛开展自己的出版发行活动。这些刊物除使用俄语外，有的还使用当地的民族语言。如，瑟克特夫卡尔主教区使用的是科米语，巴尔瑙尔主教区则是阿尔泰语^③。主教管辖教会报纸中最为典型和成功的例子，是塔什干主教管辖教会出版的周报《生活的语言》（Слово жизни）。这份报纸承担着满足中亚地区东正教教徒宗教精神诉求的重要任务。其获得成功的一大重要原因是，塔什干及中亚大主教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对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大主教弗拉基米尔几乎成为每一期报纸的积极作者。他的谈话、布道及寄语都会登载在该报上。该报阐述基督教义，并登载圣父对孩子培养的思想、关于塔什干神学校的特写、关于各个教区星期日学校的材料和文章。《生活的语言》最大的特点是，能够提高身处于伊斯兰世界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相互理解度和包容度，并能够消除他

① Бронницкий Тихон: «СМИ РПЦ на пороге третье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② 翁泽仁：“转型时期俄罗斯东正教报刊的发展”，《西伯利亚研究》，2012年第4期，第66页。

③ Бронницкий Тихон: «СМИ РПЦ на пороге третье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们之间的不和与怀疑^①。

从区域上划分，东正教报刊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地区级的，即每个教区出版的公报类报刊。如，下诺夫哥罗德的《下诺夫哥罗德教区公报》（Нижегородские епархиальные ведомости）、新西伯利亚的《新西伯利亚教区消息》（Новосибирский епархиальные ведомости）；二为联邦级的（也即全国性的）。这类刊物虽然大多在莫斯科出版，但却在整个俄联邦发行。如莫斯科大学的《塔季娅娜日》、《拉多涅日》、《多马》等。其实，一些教区的东正教报刊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而言，毫不逊色于中心城市的报刊。如下诺夫哥罗德的《下诺夫哥罗德教区公报》。《下诺夫哥罗德教区公报》是俄罗斯较早发行的东正教报纸。它从1864年开始发行，于1918年8月停刊。现今复刊的《下诺夫哥罗德教区公报》为半月刊，共20页，发行量为21,500份，固定栏目有：“大事件”、“教会的人们”、“问答”、“日历”、“朝圣”及“监督司祭的消息”等。主编为瓦西里·斯比林（Васили Сибирин）神父。2008年该报获得了“刊物金色基金”优秀奖章。

二、东正教报刊的世俗化表现

（一）内容及受众

在俄罗斯所有的东正教媒体中，报刊的世俗化特色最为明显和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内容的丰富性，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其丰富性表现在：既涉及教堂艺术、历史、文学、宗教哲学，又观照世俗的社会问题^②，即那些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人们在大力追求物质生活和感官刺激时出现的既现实又紧迫的社会问题。探讨这类问题最多的是以下的一些东正教报刊：《东正教漫谈》、《雄伟的罗斯》、《塔季娅娜日》、《东正教的莫斯科》、《东正教的圣彼得堡》、《什一税》、《俄罗斯之家》等。此类刊物中常见的内容，涉及宗派、毒瘾、赌瘾、酒瘾及性病等问题。甚至虚幻的爱情与早婚

^① Бронницкий Тихон: «СМИ РПЦ на пороге третье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② 详见翁泽仁：“转型时期俄罗斯东正教报刊的发展”，第63-68页。

母亲、现代艺术和电影也成为讨论的话题。名人采访，以及醒目、有趣的照片在这些刊物中随处可见。如，《东正教漫谈》中便经常刊登较大的彩色照片^①。当然，毫无疑问，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和见解都是用东正教教义来进行解读的。例如，具有文艺启蒙和信息分析作用的、全国性青年插图月刊《多马》的基本话题，是“讲述基督教及其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②2003年在雅库特国立大学语言系诞生的青年东正教报纸《逻各斯》（Логос），用严格的新闻体裁讲述尖锐的社会问题，包括堕胎、孤儿，以及多神教在雅库特的需求等等。^③《拉多涅日》的办报宗旨是“向广大受众阐述神圣的东正教事务管理局和至圣大牧首对国际和俄罗斯社会生活、教会内部生活等重要问题的看法和观点。甚至讨论让东正教基督徒担忧的话题。”^④

在对宏观问题进行探索的同时，东正教报刊并未忽视人的生理及心理的微观层面。除了以上内容的报刊外，还出现了以下一些关注人的健康、工作和生活的读物。

“医疗型”报刊。在这类读物中，有古老的修道院手抄本的治病方法和药方。如，《用信仰治愈》便是讲述正确的和有害的治病方法的报纸。该报曾获得“2009年俄罗斯报刊金色基金”的奖励。报纸《永远活着》，则从东正教的视角去看待人的生活，以及家庭和生活方式的健康状态，讲述的是如何促使人的精神、心灵和身体得到健康恢复的问题。《修道院通俗医书》讲述的是修道院手抄本文献中被人们遗忘但却有价值的医疗方法，以及专家针对一些有害医疗方法的解答。

“职业型”报刊。东正教经济通报《教区》（Приход，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出版委员会的出版物）的受众为修道院长、女修道院中管理财务的修女，以及从事经济活动、解释财产权和优惠权的教区会计。这是一份阐述教区联合会的经济问题、东正教教区及修道院的经济活动，以及办理宗教组织

① Большакова Зоя Григорьевн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СМИ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Медиаскоп. <http://mediaskop.ru>

② ФОМА(журнал)-Википедия. <http://ru.wikipedia.org/wiki>

③ Ксения Лученко: «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что та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СМИ». <http://os.colta.ru/media/paper/details/37759/?attempt=1>

④ О газете-Радонеж. http://www.Radonezh.ru/analytic/o_Gazete/

的土地财产权、优惠权、结账等问题的杂志。该通报从一些有经验的牧师的建议和教区实践的具体情况来对教区进行全方位的关怀，包括对教堂的恢复等等。并常常登载莫斯科大主教区一些专家对于权力问题的解释，以及文件及咨询信息。

旅行指南报刊。如，杂志《东正教朝圣》、《东正教朝圣者》（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странник）。《东正教朝圣者》针对的是一些喜欢旅游并力图追寻精神生活的现代人，并为广大读者揭示基督耶稣出现过的一些特殊之地。主要是导引游客或读者进行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之旅，包括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修道院及神学院等。

2、受众群体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东正教报刊最大的特色，表现在它们对受众的无选择和无限制上。如果说内容的丰富性、现实性和紧迫性是东正教报刊吸引人们视线的后期环节，而对受众的态度和确认却是首要的吸引点。通常情况下，一般宗教报刊的目标受众是信徒，但东正教报刊却推陈出新，打破了陈规，超越了这个泾渭分明的界限，把受众群指向所有的民众：信徒、非信徒，以及对东正教持怀疑态度的人。在受众群中，它们对儿童和青少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用意很明显，因为这批受众既是东正教得以传承下去的核心力量，也是东正教获得繁荣发展的新鲜血液。东正教媒体便是以这样一种认知态度，充分宣扬基督的大爱和博爱精神。如，报纸《塔季娅娜日》的受众定位为“大学生、非教徒，以及徘徊于教会内外、对东正教感兴趣者，和对当代现实有见解之人。”^①《多马》则针对所有感兴趣的读者，不管他们的信仰和政治观点如何^②。全国东正教师范教育月刊《封面》（Покров），针对的是东正教高等普通教育学校、星期日业余学校、期待扩充神学教育的教师、家长、神职人员、图书馆工作人员、书籍爱好者、孩子和少年，以及所有力图进行神学自学的人们^③。

东正教报刊的工作人员在对受众无选择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这种思想扩充。其表现形式在于创办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报刊。这一点使其具备了

① “ТАТЬЯНИН ДЕНЬ”-студенче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журнал-газета МГУ. http://www.pravoslavie.ru/Press/td_hist.htm

② ФОМА(журнал)-Википедия. <http://ru.wikipedia.org/wiki>

③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http://dnkrus.ru/issue.shtml/pokrov/>

其他宗教报刊无法比拟的特性和优势。这类报刊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很强，直接接触各类人群常常遭遇或思索的问题。解答及消除人们的疑惑和悲伤。其目的是通过东正教的宗教世界观及价值观的灌输，为人们设立一个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精神路标。让人们在这样一个浮躁、狂乱及变化无常的混乱社会中找回自我，回归人性，保持淡定的心态和情绪。从中全面认识基督教的智慧极其强烈的人性关怀，并在受益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接受、履行基督教的生活原则。这诚如全国东正教师范教育月刊《封面》在谈到自己的内容设计时所说的：我们内容设计的目的就是恢复俄罗斯人民的精神追求，而且首先针对的是孩子和年轻人。

以下是典型的针对不同受众的东正教报刊。

青年报刊。俄罗斯最典型的青年刊物以《塔季娅娜日》、《多马》、《相遇》、《彼得与帕维尔》为代表。《塔季娅娜日》“触及了文艺、科学、社会、政治和宗教问题，……其中的特别关注点是在被称之‘青年问题’的领域。首要的问题针对的是宗教分化运动的强劲传播”^①。《逻各斯》的办报宗旨是“与年轻人谈论最重要的东西：生与死，生命的意义”^②。《继承者》(Наследник)杂志针对的是以下几类人：寻找真理及永恒价值的人，对提问题永远不会累的人，想努力弄清楚在人群中、生活中及爱情中的“我”的人，以及对祖国和对所有的人都漠不关心的人。

女性报刊。如《斯拉夫女人》、《我的希望》、《姊妹》(Сёстры)等。

《姊妹》是圣经教育中心于 2000 创刊的俄语季刊，杂志作者均为来自不同工作领域的基督徒。如新闻工作者、科学家、心理分析师等。除了在俄罗斯，《姊妹》在非洲、澳洲、德国、美国以及另一些国家也拥有读者。而且，其目标受众是对信仰问题和慈善活动感兴趣的女性同胞。《姊妹》中的文章是从圣经的角度、基督信仰的视野，来阐述许多现实的重要问题，关注的焦点在社会问题上，如孤儿、育儿问题，行善和募捐问题。在杂志中还能找到给予女性同胞和非成年人募捐和心理帮助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如何抵制家庭暴力、性侵犯和未成年怀孕等问题。《斯拉夫女人》讲述俄罗

① “ТАТЬЯНИН ДЕНЬ”-студенче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журнал-газета МГУ.

② Ксения Лученк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что та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СМИ» . <http://os.colta.ru/media/paper/details/37759/?attempt=1>

斯的宗教传统、家庭关系及孩子的养育问题；有献身精神的爱和信仰的神奇、健康与美丽；手工制品和烹饪中的秘诀。《我的希望》让广大读者了解东正教的家庭传统，以及关于孩子的培养、教育和健康问题。

儿童报刊。如《蜜蜂》、《萨沙和塔莎》、《小烛光》、《圣水盘》、《上帝的世界》、《东正教彩虹》、《向上》、《主日学校》。《主日学校》是俄罗斯教育部和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至圣大牧首协调委员会的官方出版物。它是俄罗斯唯一的一份东正教教学周报，每周刊给俄罗斯境内及一些国家的近千所主日业余学校和世俗学校、师范学院和图书馆。《上帝的世界》是俄罗斯儿童基金会出版的针对儿童和少年的插图杂志，讲述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的千年史和俄国文学艺术的宗教原理。《向上》是针对少年的知识性杂志，其宗旨是培养少年们的爱国主义，对祖国和人民传统的爱，扩展视野以及形成对大自然的爱。

家庭报刊。如《葡萄》杂志、《家庭东正教报纸》、《令人愉快的花园》（Нескучный сад）。杂志《葡萄》是专为父母亲所设定的东正教教育杂志。所有的内容皆围绕着对孩子的培养和协调家庭内部关系进行设定的。读者为将家庭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视为最基本概念的人们。每两个月出版一次，100-130页，发行量为1万份。栏目有：《家庭》、《培养》、《教育》、《艺术》等。该杂志与教育方面的权威专家、心理学家、语文学家、历史学家、自然学科的专家以及艺术家、东正教僧侣的代表人物进行协作。《葡萄》作为一本有影响力的教育杂志完全在于这些权威人士所给予的科学性、教育性及艺术性。《家庭东正教报纸》讨论的是东正教信仰、艺术和家庭等问题。它告诉读者如何建立与上帝的关系，建立并维护与人们的关系，还登载对东正教牧师、科学家、文艺活动家及政治家的采访内容。

实际上，东正教报刊还可细分为另一些类型的小众读物。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针对监狱服刑人员的读物。如报纸《红星》的同名副刊、报纸《赐予所有人的和平》（Мир всем）等。这类报刊触及当前极为现实的重大问题，如种族、宗教和军事冲突^①。

^① Большакова Зоя Григорьевн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СМИ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东正教小众刊物，特别是女性、儿童及家庭刊物的出现具有其独特性，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它体现了东正教对弱势及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以及所提倡的公民权利自由，以及对家庭和谐、宁静生活的支持与向往。尤其是出版针对服刑人员的刊物，体现了它对这类特殊人群的体恤和关怀。刊物用东正教的教义和训诫，去引导和开启这些曾经有损于社会和人们的犯罪人员的良知，让他们革面洗心、重新做人。这种受众细分的特殊手段，表明了东正教会鲜明的宗教立场和政治立场，即博爱和团结。这就是其永恒的精神价值，让所有的人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及主耶稣对人类的爱。

（二）经营手段

以经营形式而论，东正教报刊可分为：

（1）出资合办。其出版者为东正教的在家人、慈善基金会和社会基金会，以及教区的倡导团体。如《东正教漫谈》、《雄伟的罗斯》、《塔季娅娜日》、《东正教的莫斯科》、《东正教的圣彼得堡》、《什一税》、《俄罗斯之家》等，便是这样一类报刊。

（2）东正教会的官方刊物。通常指的是获得俄罗斯正教会正教事务管理信息部批准、盖章的刊物，其中较为有名的是《莫斯科东正教圣大牧首公署杂志》、报纸《教堂通报》、杂志《莫斯科主教管辖区公报》等。到2011年，共有150份刊物获得这样的批注。

东正教报刊的销售方式既体现了其时代特征，也反映了东正教会及其报刊工作人员超乎寻常的社会观。东正教报刊不仅不拒绝市场，相反显示出与市场接轨、紧密联系的特色，表现为任何人都可以零买，也可以订阅东正教报刊。进入市场，让市场检验工作效果，这对于东正教报刊而言是相当艰巨的一步。在俄罗斯教堂附近的教堂小商铺或是普通的报刊商铺，都能购买到这类刊物。与世俗报刊相仿的销售方式，使得东正教报刊的发行量不可小觑。如，1997年创刊的报纸《什一税》的发行量为5万份；2000年出版的叶卡捷琳堡青年东正教报纸《圣母饼幪日》的发行量为1万份；1993年创刊的报

纸《东正教的莫斯科》为3万份；《拉多涅日》的发行量在2万份到5万份之间。

在推广方式上，东正教报刊不断扩充其受众群体，受众的支持是媒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性力量。东正教界人士对此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也正是基于这种认知，东正教报刊的受众空间拓展得相当深广。所以，各种层次、不同领域的人们，无论是文化精英还是乡间村民，无论是国家决策人员还是市井百姓都是东正教报刊的传播对象。例如，《拉多涅日》就广泛地在国家权力机关，甚至一些分析中心传播。^①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媒体现象。因为，作为一种宗教性质的报刊，能够在非宗教的国家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中广泛传播，这是一个不多见的现象。这不是依靠民间力量就能做到的，而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权力机关赋予了东正教界人士及其媒体这种特定的权力。当然，这种传播方式非常清晰，明显地体现了俄罗斯执政层的政治意图和思路，即通过东正教文化传播载体广泛的、连续不断的宣传，使东正教文化渗透到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民众中去。

东正教报刊营运方式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务实的原则。它牢牢抓住媒体发展所需的要素：人脉—资金—市场，以内容为主线，以受众为目标，强力打造、开拓自身的发展空间。步入市场既是每一种媒介的必经之路，也是受众对它进行考评的一个评价体系。东正教报刊不惧市场，不担忧市场对它的检验。这种坦然、无畏的精神反而为其在俄罗斯风云跌宕的媒介市场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也正是于这种影响力，东正教报刊的市场价与俄罗斯一些大报的价格不相上下。

三、对东正教报刊世俗化特色的思考

东正教报刊一直引领着东正教媒体的发展方向。尽管东正教传播媒介种类众多，但直至今日，东正教报刊依然是人们了解东正教生活及其问题最为权威的媒介。虽然，今天纸质媒体的地位削弱了很多，但东正教报刊

① О газете-Радонеж. http://www.Radonezh.ru/analytic/o_Gazete/

依然拥有众多的读者。这不仅因为俄罗斯是阅读大国，人们依然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还在于东正教报刊的购买与订阅同世俗媒体一样便利。俄罗斯东正教报刊的发展可谓是独树一帜。因为，它在受众的定位、在报刊类型的发展上、在内容的设定、在发行和销售上，都以自己的评价体系和认知方式去进行规范。所以，它受众众多，内容繁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的东正教报刊不像纯宗教性质的媒体。因为，（1）其受众并不只是信徒；（2）其内容并不单纯是东正教话题；（3）其发行和购买渠道与世俗媒体无异。可以说，俄罗斯的东正教报刊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媒体，甚至可称之为宗教大众媒体，因为它具有与世俗媒体一样的特质。因而在俄罗斯东正教报刊成为普及面最广、规模最大和影响最深的宗教传播媒介。

东正教报刊的出现及其快速发展，是俄罗斯的产物。因为，它恰恰满足和解决了俄罗斯人的精神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东正教报刊成为人们了解东正教历史、文化及事务最为直观和方便的平台和窗口。正如莫斯科和全俄至圣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在《拉多涅日》报创办十周年年庆时所谈到的：“教会具备向罪恶世界挑战的信念、知识和经验。我们必须把教会的每一句话传递给那些能够接受它的人。同时，我们欣喜地看到，《拉多涅日》报十年的出版，正是在这个神圣的领域把福音的真理通过大众媒介进行布道的劳动成果。”^①

东正教报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俄罗斯社会的普遍认可和肯定。2013年9月7日莫斯科和全俄至圣大牧首格里欧在东正教报纸《雄伟的罗斯》（“Русь державная”于1993年9月7日在全俄和莫斯科至圣大牧

^① Газета“Радонеж”. <http://radonezh.ru/gareta>

首阿列克谢二世的恩准下创办^①) 发行二十周年的庆祝会上, 对该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该出版物坚定地证实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复兴。它定期地展现神职人员关于深而广的基督问题的观点, 对于基督的宗教道德价值观的确定作出了贡献, 促进培养了我们同胞的民族自觉情感和对教会及国家负责的责任心”^②。他还说: “在过往的岁月里, 《雄伟的罗斯》获得了声誉与好评。在东正教的家庭中、在部队、在医院和学校、在图书馆和大学等所有地方, 只要是对圣罗斯的历史及精神遗产、对东正教和俄罗斯世界现代生活不冷漠的人, 都会需要它。”^③

东正教报刊的世俗化特征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与世俗社会同步、展现世俗社会的众多领域上。当然, 它有它自身的侧重点和关注面。实际上, 东正教报刊世俗化的表现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远远优于、甚于一些世俗媒体。因为, 它更体现了其亲民路线及与社会接轨的思路和策略。显而易见, 东正教报刊的世俗化特色, 并不是东正教会的随意行为, 而是其传统办报思想的衍生和扩展。这种衍生形式使东正教报刊活跃于俄罗斯竞争尤为激烈、关系尤为复杂、思潮尤为繁杂、受众尤为挑剔的媒介市场。而活跃着的东正教报刊, 不仅促使老一辈俄罗斯人恢复、青年一代产生对东正教文化的浓厚兴趣, 而且大大激发了俄罗斯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 俄罗斯人更清楚地明白了东正教文化对于他们的重要

① 由于其主编佩切爾斯基 (А. Печерский) 来自于《真理报》, 所以该报也延续了《真理报》的严格版样、大的开本。由于对俄罗斯人民精神教育所做出的贡献, 主编佩切爾斯基被授予高级大牧首奖章, 报纸的全体员工获得了“维护宗教—精神价值”的奖状。该报首页的右上角引用的是圣色拉芬的一段话: “上帝饶恕俄罗斯, 并引导她经过困难获得伟大的荣耀。”一个东正教教会的高级僧侣对该报做出这样的评价: 《雄伟的罗斯》不仅是报纸的称谓, 它还是我们东正教人民关于我们国家未来体制的、长期的梦想。虽然今天这还是个梦想, 但我确信纵使历经千辛万苦, 她一定能实现。参见 Андрей Печерский-Газете «Русь Державая»-20лет-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я- Русское воскресение. <http://voskres.ru/idea/pecherskiy.htm>。 “该报神圣地遵循现代长老们的遗训: ‘为了信仰、沙皇和祖国’……《雄伟的罗斯》是俄罗斯为数不多的、从来没有走极端右倾路线的报纸。它一直坚持自己清晰的国家路线, 也即是东正教、爱国主义、与人民团结一致。 Александр Полуполтинных-«Русь Державая»-русская газета.[http:// stralbatros.livejournal.com/237848.html](http://stralbatros.livejournal.com/237848.html)

② Поздравление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газета «Русь Державая» с 20-летием со дня основания/Патриарх/Патриархия.ru.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3213426.html>

③ Там же.

性。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就媒体的性质而言，东正教报刊并非主流媒体，它只是一种拥有一定权威性、影响力和美誉度的亚媒体；就功能而言，东正教报刊在社会舆论引导方面还未起到主导作用。尽管它大量关注民生问题及政治问题，但作为一种宗教性质的传媒，它依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也仅仅停留在传达、表述自己主张与意见的层面上。其最终结果也只能起到议政但不能参政的作用。当然，这是东正教会一直努力但又无法实现的可悲现实。东正教报刊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教育与形成社会行为规范方面功能显著，作用突出。它对人们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影响非同小可：能形成一种社会张力，将人们的思想道德净化，把人们的聪明才智引向社会最需要的领域；能提倡良好、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让国家和谐、民众团结，让整个俄罗斯社会的精神文明提高到一个理想境界。就其本质而言，东正教报刊是重视精神、道德及心灵的媒体，具有指导、教化的功能。这也正是东正教会对社会生活的高度关注和责任心的体现。

实际上，东正教会伴随俄国发展到今天，一直很清楚自己的地位和作用。拥有自身宣传喉舌的专业传媒机构，无非是为自己俄罗斯社会中增加一定的砝码和话语权，以确保其地位的稳固。但不会、也不可能对国家的发展内容和方向起到把握、定位的作用。要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中立足，呼声显得尤为重要。没有呼声也就没有地位。因而，东正教会的战略选择，便是从另外一个渠道来展现自己的地位和表达自己的呼声。加上政府对东正教媒体的保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让这些媒体在降低成本的过程中增加了竞争优势，使其成为有特殊资源配置的传媒。东正教会的努力让其预期利益获得了实现。其媒体，包括东正教报刊在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社会归属感和认可度。东正教报刊成了一个开放的、自由的、民主的交往平台。它缩小了阶层距离，整合了社会关系，统一了价值观念。它让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交融，用真实话语和虔诚态度进行主流意识和文化的传播，对违背伦理道德的现象进行针砭。它尊重俄罗斯人民的文化和心理需求，促进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因而，东正教读物在俄罗斯成为符合主流社会话语、具有疏导和辅助作用的权威媒介。

东正教报刊在内容、受众定位，以及销售方式和出版、管理、合作机

制等方面，无不显露出它的世俗化特色。但这个特色并没有模糊、淡化东正教会的宗教宗旨和神学思想，相反解决了现代社会中宗教发展的现实危机。东正教报刊加入世俗化因子，反而彰显了东正教会的人文关怀特性。这种人性关怀在触动人们对真善美向往和追求的同时，强化了东正教会在俄罗斯的文化地位及政治地位。

【Abstract】 Secular progress is the most obvious feature of Russian Orthodox press. There are two forms. First, the content is abundant, authentic and urgent. Second is the pop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of the audience. Just based on this strategy, in Russia, the Orthodox media, including Orthodox press shows its potentials and tendency at an alarming speed, which indicates a high level either in a religious or a non-religious state. To gain successful experience by discussing features of secularization in the Russian Orthodox could be an example for the secular media.

【Key Words】 Russian Orthodox, Orthodox Press, The Orthodox Church.

【Аннотация】 Отличительной особенностью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печати XXI века является её тяготение к секуляризации. Свет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печати конкретно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о-первых, в богатом тематическом разнообрази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актуальном,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приближенном к реальной жизни читателей содержанию; во-вторых, в обращении к массовой, широкой аудитории.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печать России,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именно на та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с удивительной скоростью развивает свой потенциал, стремится занять не освоенные ранее ниши. Лучшие образцы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ечати могут служить примером для подражания в других светских и даже не свет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Изучение успешного опыта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изданий с их светским характером имеет огром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смысления развития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светских СМ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печать,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责任编辑 肖辉忠)

试论俄罗斯东正教哥萨克节的产生

张晓玲 梁英超*

【内容提要】为了团结俄罗斯哥萨克,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基里尔宣布,新历9月1日(教历8月19日)的顿河圣母像日为俄罗斯东正教哥萨克节。俄罗斯东正教会设立东正教哥萨克节,既有特定的社会背景,也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首先,俄罗斯社会重视历史、回归历史的大环境,为哥萨克在当代俄罗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其次,哥萨克优秀的传统文化为社会所需,则是哥萨克在当代俄罗斯受重视的重要文化原因。第三,历史上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哥萨克形成的密切关系及其在当代俄罗斯合作的现实需要,是该节日产生的直接原因。目前,俄罗斯大力支持哥萨克发展,并且高度重视历史回归和公民爱国主义教育。在可预见的未来,东正教哥萨克节将成为东正教会和政府重视和支持的重要节日之一。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 俄罗斯哥萨克 俄罗斯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D751.2; B976.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5-0082-(23)

引言

20世纪80年代末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启了俄罗斯东正教和哥萨克的复兴热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衰微,出现了向历史回归的潮流,具体表

* 张晓玲,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梁英超,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

现在国旗、国徽、国歌、城市名称、卢布、节日等方面的变化。俄罗斯历史上，哥萨克在巩固政权、保卫国家、拓展疆域和维护东正教会等方面功勋卓著。21世纪初的俄罗斯面临极其复杂的生存环境，内忧外患的俄罗斯受到政治、经济、人口等各方面的严重威胁。此时，复兴的哥萨克在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方面再次展现出极大的优势，优秀的哥萨克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也成为改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正因如此，哥萨克得到了俄罗斯政府和东正教会的高度重视。2010年9月1日（教历8月19日），为了团结哥萨克，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基里尔宣布，顿河圣母像日（День Донской иконы Божией Матери）为俄罗斯东正教哥萨克节（Праздник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新节日的设立总是与时代变迁、社会政治变革和国民心态等因素紧密相关。俄罗斯东正教会设立东正教哥萨克节，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是在俄罗斯东正教复兴和哥萨克复兴运动的背景下，官方和哥萨克关系、哥萨克自身文化价值、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哥萨克的特殊关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哥萨克与顿河圣母像日的历史渊源

哥萨克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社会群体，主要生活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地。在当代俄罗斯，哥萨克按照其传统聚居地被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分支，如：顿河哥萨克、库班哥萨克、捷列克哥萨克、乌拉尔哥萨克、西伯利亚哥萨克、伏尔加河哥萨克、坦波夫哥萨克、后贝加尔斯克哥萨克等等，人数多达数百万。俄罗斯学术界对哥萨克的产生时间和群体构成长期存有争议。我国学界普遍接受苏联史学家的观点，认为哥萨克是在14—17世纪出现的“自由民”，是随着俄国农奴制的确立而形成的，后逐渐演化成一种军事组织，并在18—20世纪初达到全盛时期。俄语中，“哥萨克”一词最早出现在歌颂1380年参加库里科沃战役的壮士之歌中。^①关于哥萨克和库利科沃战役还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据莫斯科顿河修道院功勋簿记载，1380

^① 杨素梅：“论俄罗斯学者关于哥萨克起源之说”，《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第118页。

年9月库里科沃大战（Куликовская битва）前，居住在顿河畔的哥萨克人送给莫斯科王公德米特里一个圣母像，以保佑他打胜仗。后来，德米特里率领的军队在这场战役中获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与此同时，该战役还使罗斯人民团结在以德米特里为中心的莫斯科公国周围，加速了金帐汗国的瓦解和罗斯国家的统一，成为罗斯人民反抗蒙古鞑靼人压迫的重要转折点。为了纪念顿河畔的这场战役，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被东正教会授予“顿河王”称号，顿河哥萨克人赠送的圣母像则得名“顿河圣母像”。自此，顿河圣母像被视为罗斯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的保护神，每当外敌入侵和重大节日时，官方和东正教代表都要在顿河圣母像前进行祈祷。

1591年鞑靼人再次进犯莫斯科，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在顿河圣母像前祈祷击退敌人，俄军带着顿河圣母像前往战场，最终大获全胜。俄国统治者和信仰东正教的士兵一致认为，顿河圣母像是有灵的圣像，能够把鞑靼人赶出俄罗斯正是得益于圣母的庇护。为了纪念这次作战胜利，费多尔宣布获胜这一天，即东正教教历（儒略历）8月19日，新历（格里高利历）9月1日，为顿河圣母像日。如今，在每年的顿河圣母像日这一天，俄罗斯东正教会都从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将顿河圣母像运到莫斯科顿河修道院（Донской ставропигальный мужской монастырь），以便在圣像前完成节日祈祷。顿河圣母像日饱含文化、历史和宗教意义，随着东正教会和哥萨克的复兴，它还被东正教会赋予了新的内涵。2010年9月1日，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基里尔正式宣布顿河圣母像日为俄罗斯东正教哥萨克节。他在对教徒的讲话中说：“我宣布顿河圣母像日，新历9月1日为东正教哥萨克节。感谢今天各位阿塔曼和哥萨克军队的代表前来，首次一同庆祝哥萨克团体共同的节日并与我一起祈祷。”^①俄罗斯东正教会此举旨在团结俄罗斯哥萨克，同时也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尊重历史传统的表现。

① День иконы Донской Божьей Матери---праздник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 <http://nacsk.ru/?p=206>（上网时间：2013年8月）

二、东正教哥萨克节产生的社会背景

东正教哥萨克节的产生有特定的社会背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使苏联国内各种思潮暗自涌动。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氛围使当时人们的思想发生变化，并为各种社会运动和思潮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发生巨变，原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带来了信仰真空。很快，俄罗斯社会掀起了东正教复兴热潮。东正教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苏联意识形态瓦解给民众思想上造成的空白，它帮助俄罗斯民众重塑道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哥萨克复兴运动也伴随着哥萨克东正教信仰的复兴以及重新回归教堂的使命蓬勃开展起来。随着俄罗斯东正教会影响的扩大及哥萨克在当代俄罗斯作用的凸显，俄罗斯东正教会逐渐意识到团结俄罗斯哥萨克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俄罗斯决策层也适时就哥萨克政策不断作出调整，在官方立法的引导和规范下，俄罗斯政府、东正教会和哥萨克展开了一系列合作，东正教哥萨克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

（一）东正教全面融入俄罗斯社会生活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宗教政策出现松动，以“罗斯受洗”千年纪念活动为标志，开启了东正教复兴的热潮。一时间大兴土木，修建废弃或拆毁的教堂；教徒人数不断增加；婴儿出生后到教堂领洗；年轻人更愿意在教堂举办婚礼；东正教神甫到军队中讲课；东正教节日活动受到重视，愈发隆重，甚至在电视台直播；上帝出现在俄罗斯国歌的歌词里；东正教堂、修道院、先知和圣人出现在俄罗斯1997年版纸币上；与东正教文化的相关图书和影像资料畅销；教会人员频频出现在总统及其他各级官员的就职仪式上；总统和其他官员常常出现在东正教的各种节日仪式上；俄罗斯中、小学校恢复了东正教礼仪和东正教文化等课程；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频繁出访等。这些事实都表明，在当代俄罗斯，东正教不仅得到了来自官方和社会的认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已经融入到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谈到东正教的作用，普京表示：“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一

直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不仅是每个信徒的道德准则，而且也是全体人民和国家不屈不挠的精神核心”^①。

复兴后的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关这一点得到了俄罗斯社会各界的肯定。著名的宗教活动家和政治家谢尔盖·莫兹格沃伊（Сергей А. Мозговой）在为《1990年以来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俄国的作用：政治与宗教的变化动力》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复兴了东正教，“东正教堂成了许多热心于基督教价值的人的道德基础——救赎、道德生活、履行戒律”，东正教吸引了许多政治家参与其中，东正教会也积极参与后苏联俄国社会不同层面的政治活动，东正教成为俄罗斯社会政治的重要因素。^②的确，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在俄罗斯政治、民族、文化、外交活动等各领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因素，东正教有助于俄罗斯中央权力的加强；作为一种信仰和道德因素，东正教是俄罗斯社会稳定和国家主权的忠实捍卫者。^③作为文化传承因素，东正教承载着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增加了俄罗斯民众的自我认同感。^④近年来，俄罗斯决策层还不断强调东正教在公民道德观念培养、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作用。2013年5月5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复活节活动的讲话中，就强调了俄罗斯东正教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在巩固道德观念、家庭体制及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⑤

（二）哥萨克在当代俄罗斯的复兴

俄罗斯哥萨克自产生至今，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苏联时期，由

① 乐峰：《东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版，第264页。

② 原载 Greg Simons, *The role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Russia since 1990: changing dynamics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2009, P. V. 转引自林精华：“无处不在的身影——东正教介入俄罗斯俄罗斯政治生活试析”，《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5期，第112页。

③ 戴桂菊：“东正教与俄罗斯改革”，《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第54页。

④ 郭丽双：“苏联解体后东正教伦理与俄罗斯的现代化”，载《国际关系研究：地缘关系与区域秩序的建构》，2011年，第3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年，第243页。

⑤ http://medvedevu.ru/blog/medvedev_paskha_vazhna_dlja_vsekh_kto_dorozhit_dukhovny_mi_tradicijami/2013-05-05-1195（上网时间：2013年10月）

于当局采取“去哥萨克化”政策^①，哥萨克经历了一个长达70年的历史“停滞”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社会政治变革的背景下，苏联时期被解散的哥萨克组织和迁往各处的哥萨克，开始有了回归故土、恢复名誉以及重新开展组织活动的诉求。1989年1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发表了题为“关于承认对各民族进行强行迁徙的迫害行为是违法和犯罪行为并保障其民族权利”的声明，为哥萨克复兴提供了最初的条件。^②1991年4月26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通过了《关于为各受迫害民族平反法》。1992年6月15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了落实《关于为各受迫害民族平反法》中关于哥萨克的政策第632号总统令，承认对哥萨克的迫害是非法的，并指出“哥萨克作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文化群体应得到平反”^③。同年7月16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又颁布了第3321-1号《关于为哥萨克平反的决议》，取消了自1918年以来针对哥萨克制定的全部迫害法令，正式恢复了哥萨克的历史名誉。1994年4月22日，俄罗斯政府出台了第355号《哥萨克国家政策构想》，确定了俄罗斯国家有关哥萨克政策的基本原则。为了进一步落实哥萨克政策，根据俄罗斯联邦第1389号“关于俄罗斯联邦总统哥萨克事务委员会”的总统令，1994年7月1日，建立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哥萨克事务委员会(Совет по делам казачества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④。这样，在官方的支持下，大规模的哥萨克复兴运动在全俄罗斯蓬勃开展起来。

① “去哥萨克化”(разказачивание)政策，是指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内战时期针对哥萨克特殊群体采取的措施。1917年11月11(24)日布尔什维克通过了一个题为《关于消除阶层和公民官阶》的法令，同年12月9(22)日人民委员会颁令：“开始消除哥萨克的阶层障碍和仇恨，逐渐消灭哥萨克”，这两个文件的出台通常被视为“去哥萨克化”政策的开始。在1919年俄共(布)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将哥萨克定义为“俄罗斯帝国主义历来的武器”，是“高尔察克—邓尼金反革命的堡垒”。1919年1月29日，签署了题为《给在哥萨克地区工作的全部负责同志》的秘密指令，正式拉开“去哥萨克”化的序幕。

② 参见О признании незаконными и преступными репрессивных актов против народов, подвергшихся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му переселению, и обеспечении их прав. <http://poisk-zakona.ru/274428.html> (上网时间：2011年9月)

③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5.06.1992 № 632. <http://poisk-zakona.ru/259906.html> (上网时间：2011年9月)

④ 1994年12月1日，第2141号俄罗斯联邦总统令批准了该委员会及其章程。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和制定与俄罗斯哥萨克有关国家政策、法规，曾于1997年被取消，2009年再次恢复工作。

当代俄罗斯哥萨克复兴运动是俄罗斯社会政治变革的产物，是历史因素、文化因素和官方政策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过去 20 多年中，复兴的哥萨克为当代俄罗斯国家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已经成为俄罗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顿河哥萨克军阿塔曼、俄罗斯联邦杜马成员瓦达拉兹基在接受西班牙《先锋报》报纸采访时曾表示：“我们对于哥萨克的企业家、商人、发明家、飞行员、渔民和农民知之甚少。”^①的确，复兴的哥萨克在当代俄罗斯扮演的角色不仅是传统的军人，而是履行着各种职能。哥萨克复兴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军事职能复兴、文化传统复兴、哥萨克教育复兴、政治参与度和 社会管理参与度提高等各个方面。诚如俄罗斯和境外哥萨克军队联盟（Союз казачьих войск России и зарубежья）^②外事部长伊萨因科所说：“哥萨克中有政治家和议会成员、军人和著名的商人以及文化活动的家。”^③

1994 年《哥萨克国家政策构想》第 4 条规定：“哥萨克可以参与其他非军事服务领域，如：防御、应对突发事件及自然灾害；民事和领土防御；社会治安保障、环保和消防安全；俄罗斯联邦边境防御等。”^④该规定为复兴的哥萨克积极参与为国家服务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如今，俄罗斯有越来越多的哥萨克积极参与到社会管理事务中来，他们协助维护地方社会公共秩序并且参与巡逻、协助缉毒和救灾工作，与政府协作共同保护林业资源以及受雇保卫俄罗斯边境的安宁等等。比如：在南俄的库班地区，哥萨克积极开展同贩毒分子的斗争；在莫斯科，哥萨克还参与达尼洛夫市场的安保工作。2005 年，普京护卫队新增的 20 名库班哥萨克成为克里姆林宫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远东，哥萨克与政府一起守卫俄罗斯边界；俄罗斯林业部对于哥萨克参与林业保护的计划也由实验阶段进入到立法阶段；在秋明市出任教堂的保安人

① 阿拉格涅斯：“当代俄罗斯哥萨克”参见：<http://www.inosmi.ru/social/20100420/159433940.html>（上网时间：2011 年 6 月）

② 俄罗斯和境外哥萨克军队联盟（Союз казачьих войск России и зарубежья，СКВРиЗ）1993 年正式在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登记注册，其前身是全俄社会组织——俄罗斯哥萨克军队联盟。俄罗斯和境外哥萨克军队联盟不是普通的俄罗斯哥萨克组织，而是注册的国际社会组织，它的成员不仅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塞尔维亚等近邻国家的哥萨克，还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哥萨克。

③ <http://www.inosmi.ru/social/20100420/159433940.html>（上网时间：2011 年 6 月）

④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2.04.1994 № 355. <http://poisk-zakona.ru/233145.html>（上网时间：2011 年 9 月）

员等等。此外，哥萨克组织还将同犯罪和腐败作斗争、预防青年道德水平退化、强化国民历史记忆和爱国主义意识作为工作的重点。可见，复兴的哥萨克在许多领域均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他们拥有广泛的活动空间，并且正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俄罗斯国家复兴。哥萨克的发展与俄罗斯的发展密不可分，没有哥萨克的俄罗斯是不完整的。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俄罗斯南联邦大学（Южны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的弗·特鲁特教授会说：“哥萨克应当成为俄罗斯国家政治、经济、思想伟大复兴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俄罗斯就没有哥萨克。然而，没有哥萨克，俄罗斯的未来、现在、未来将不会完整。”^①

（三）俄罗斯政府、东正教会与哥萨克加强合作

在俄罗斯东正教深入影响俄罗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及俄罗斯哥萨克复兴的背景下，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哥萨克成为国家和东正教会团结的力量。在国家层面上，为了规范当代俄罗斯哥萨克复兴运动，决策层先后围绕哥萨克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发展构想，并且还组建了负责落实哥萨克政策、管理哥萨克事务的专门机构。东正教会方面，俄罗斯东正教会视自己为哥萨克的精神领袖和庇护者，大力支持其忠诚捍卫者的复兴运动。在哥萨克一方，他们积极参与国家服役，拥护东正教教义精神，坚称自己是东正教信仰最忠实的捍卫者。俄罗斯政府、东正教会和哥萨克在很多方面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俄罗斯政府层面。从 20 世纪 90 年代正式恢复哥萨克名誉开始，俄罗斯政府就针对哥萨克复兴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完善，修订并补充各种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以规范哥萨克复兴运动。进入新世纪，为了促进哥萨克复兴运动的发展、加强与哥萨克的合作，俄罗斯政府正式将哥萨克纳入国家服役体系。2003 年，普京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完善哥萨克复兴和发展运动的第 249 号俄罗斯联邦总统令，2005 年又签署了第 154-ФЗ 号法律文件《俄罗斯哥萨克国家服役法》。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为了进一步深化哥萨

^① Трут В.П.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казачества: сущность, пут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облемы казачьего возрождения.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1996. Часть 1.С.86.

克复兴运动的相关政策，落实国家和地方权力机构与哥萨克进行合作的基本原则，于2008年7月3日签署了《俄联邦哥萨克政策的新构想》。《构想》指出，“为确保和促进哥萨克参与国家公务，复兴和发展哥萨克精神文化，国家将在财政、法律、信息和组织机构等方面一如既往地创造必要条件。”^①很快，考虑到哥萨克复兴运动的发展和俄罗斯国内形势的变化，相关部门又分别于2008年12月3日和2009年6月3日对《俄罗斯哥萨克国家服役法》进行了修订，以适应哥萨克复兴运动和社会现实的新需要。此外，俄罗斯还确定了两个负责哥萨克问题的联邦机构——俄罗斯地区发展部（Минрегион РФ）和俄罗斯联邦司法部（Минюстиция РФ），前者是负责与哥萨克团体合作的联邦执行机构，后者负责哥萨克团体进行国家注册工作。俄罗斯官方对俄罗斯哥萨克的重视程度于此可见一斑，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相关行政支持，给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哥萨克合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俄罗斯政府和哥萨克的合作表现在很多方面，以军事领域尤为突出。1994年第355号《哥萨克国家政策构想》曾指出，哥萨克是形成新的俄罗斯国体和加强国家安全保障的因素之一^②。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国内先后发生多次恐怖袭击和民族冲突。北高加索地区由于历史、民族、宗教等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一直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温床，局势格外令政府头疼。复兴的库班哥萨克和顿河哥萨克熟知高加索地区的风俗传统及当地的作战地形，在北高加索的战略防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95年2月，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哥萨克陆战团被派往车臣作战。2000年3月，第二次车臣剿匪战争中，哥萨克士兵表现英勇。在与车臣匪徒作战的过程中，86名哥萨克空降兵牺牲，仅6人生还，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载入俄军史册^③，哥萨克军人在此次车臣战争中的英勇事迹轰动了整个国际社会。2004年，在俄罗斯南部的北奥塞梯共和国的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人质劫持事件。就在官方与恐怖分子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以哥萨克人为主力的

① 赵凤彩：“苏联至当代俄罗斯对哥萨克政策的演变”，《西伯利亚研究》，2011年第3期，第39页。

②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2.04.1994 №.355. <http://poisk-zakona.ru/233145.html>.

③ 左师军：“感悟哥萨克”，《环球军事》，2005年第19期，第53页。

特种部队挺身而出，消灭了大量绑匪，解救了人质。不难发现，哥萨克在军事反恐及维护南俄社会稳定方面，已经成为俄罗斯政府倚重的力量。2005年第154-Ф3号法律文件《俄罗斯哥萨克国家服役法》第5条第2款规定，俄罗斯哥萨克可以根据联邦法律进入到俄罗斯联邦军队、其他军队和其他军事机构履行职务^①。该法律的出台，为哥萨克人正式进入俄罗斯联邦各级军队和军事机构提供了法律依据。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人口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人口减少造成每年适龄的服兵役人数减少。此外，俄罗斯军队中还存在着许多不良现象，如逃兵现象严重、军人道德水准退化、专业素质低下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允许哥萨克人进入军队，有利于缓解俄罗斯兵源不足的问题，为俄罗斯实现兵源多元化提供了可能。俄罗斯哥萨克有优良的军事传统，是俄罗斯践行军事爱国主义的典范。哥萨克准则中讲道：哥萨克可以使军人的精神传统、军队荣誉和尊严回归。友爱制度取代老兵欺侮新兵现象，“美式”合同被哥萨克军事服务义务取代，“为钱服务”转变为为祖国的尊严和荣誉服务。^②当然，这多少包含了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不能否认，哥萨克提倡的优良军事传统有助于帮助俄罗斯军队逐步实现军人荣誉和尊严的回归，对军队中一度横行的不良风气具有一定的道德净化作用。

第二，俄罗斯东正教会层面。在俄罗斯国家历史上，哥萨克自产生以来就与东正教有密切的关系交织，他们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帝俄时期，弘扬东正教信仰、效忠沙皇、保卫祖国是哥萨克的三大任务。鉴于哥萨克和东正教的这种特殊关系，东正教传统的复兴成为当代俄罗斯哥萨克复兴的重要内容。现任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曾指出：“在当今社会，哥萨克保持原来的东正教传统是非常重要的。”^③基里尔的话一方面表明恢复东正教传统在哥萨克复兴运动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俄罗斯哥萨克复兴运动的支持态度。2009年10月14日，俄

①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05.12.2005 № 154-ФЗ. <http://poisk-zakona.ru/94785.html> (上网时间：2011年9月)

② Русские традиции. <http://www.ruplace.ru/kazachestvo/katehizis-kazakov-v-rossii.html> (上网时间：2011年6月)

③ Казаки возвращаются. <http://www.pravmir.ru/kazaki-vozvrashhayutsya/> (上网时间：2011年9月)

罗斯联邦总统哥萨克事务委员会会议在新切尔卡斯克举行，会议开始前，基里尔进行了宗教祈祷。会上基里尔指出，俄罗斯哥萨克一直从东正教汲取力量以捍卫和平及俄罗斯人民的安宁，俄罗斯东正教会则庇佑勇敢无畏的哥萨克子民。基里尔还表示要将哥萨克纳入到东正教会的特殊保护中来，他指出：“哥萨克——不仅仅是一些外表有区别的象征、标志，哥萨克——是在东正教信仰的精神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正是认识到哥萨克复兴的重要性，我决定将俄罗斯哥萨克团体纳入牧首的特殊精神领导中来”。^①此外，为了促进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哥萨克的合作，会上基里尔还决定建立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哥萨克团体协作圣主教公会（Синод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п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ю с сообществом казаков），专门负责促进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哥萨克之间的合作。会议还就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哥萨克事务委员会相互协作的基本方向交换了意见，并就合作的相关事宜制定了具体措施。可见，俄罗斯东正教会不仅承认哥萨克的独特性和历史作用，认为东正教会和哥萨克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大力开展俄罗斯东正教会同俄罗斯哥萨克之间的合作也已被提上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日程。

在日臻完善的法律基础上，俄罗斯东正教会目前正与哥萨克展开广泛而积极的合作，共同致力于服务国家和社会。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哥萨克合作的领域主要有：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俄罗斯哥萨克重新回归教堂生活、在哥萨克武备学校（Казачий кадетский корпус）里进行青年道德和东正教伦理基础教育，以及帮助形成哥萨克团体的经济基础等许多方面。2006年，在伏尔加格勒举行了第一届国际东正教哥萨克青年大会（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съезд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казачьей молодёжи）。会议举办地选择伏尔加格勒并非偶然。在卫国战争期间，正是在这里实现了战争的根本性转折，这是苏联战胜法西斯的英雄城市。通过参加这一活动，哥萨克青年们在此感触祖国的历史和英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та по делам казачества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Ф.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813963.html>（上网时间：2011年6月）

雄的丰功伟绩，获知今天和平的来之不易，了解历史的真谛^①。这是双方在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合作的生动表现。谈到东正教在哥萨克武装人员精神教育和道德培养方面的作用时，沙赫特巴克兰诺夫哥萨克武备学校（Шахтинский Я. П. Бакланова казачий кадетский корпус）校长维塔利·巴贝里琴科指出，沙赫特巴克兰诺夫哥萨克武备学校教育体系的主要特征就是东正教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点在学校的发展大纲、精神道德教育大纲和“哥萨克记忆”爱国主义教育大纲中均有体现。学校还讲授“东正教文化基础”、“东正教生活方式”等课程。^②在经济领域，俄罗斯东正教会也积极参与到“形成哥萨克团体经济基础”项目的建设中来，支持并积极促进哥萨克进行商业性活动。2010年8月31日至9月5日，在莫斯科顿河修道院西门旁的顿河广场上，举行了首届俄罗斯哥萨克展览会。此次展览是由俄罗斯东正教与哥萨克团体协作圣主教公会、莫斯科顿河修道院和乌扎罗切展会公司联合主办的，口号是“感谢上帝，我们是哥萨克”。^③2010年8月25日，在俄罗斯东正教圣约翰学院^④（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святого Иоанна Богослова）开设了哥萨克分部（Казачье отделение），为哥萨克青年提供了获得哥萨克相关专业高等教育学历的机会，这是哥萨克教育史上划时代的事件，翻开了俄罗斯东正教和哥萨克教育领域合作的新一页。此外，哥萨克还是每年世界规模最大的俄罗斯民族论坛——全世界俄罗斯人民大会（Всемирный русский

① Кириченко. А.С. Рол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 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общеграждан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на примере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го воспитания граждан)// В. К. Крючков, И. А. Котина. Церковь и казачество: соработничество на благо Отечества: Материалы Перв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таврополь: Графа, 2011. С. 31.

② Бобыльченко В. А.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педагогика в духовном образовании и воспитании кадет Шахтинского Я. П. Бакланова казачьего кадетского корпуса. “За веру отцов, за честь родного погона”// В. К. Крючков, И. А. Котина. Церковь и казачество: соработничество на благо Отечества: Материалы Перв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таврополь: Графа, 2011. С.173-174.

③ Русская линия. <http://rusk.ru/st.php?idar=43551>（上网时间：2013年12月）

④ 俄罗斯东正教圣约翰学院建立于1993年，2011年根据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基里尔的第1号令建立了俄罗斯东正教大学（Российский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该学院正式成为俄罗斯东正教大学的组成部分，并且由俄罗斯东正教圣约翰学院的院长出任校长一职。

народный собор или ВРНС)^①积极的参与者。虽然全世界俄罗斯人民大会不是一个宗教性组织，但是其现任主席是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基里尔，哥萨克的积极参与从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对东正教会工作、对牧首工作的支持。而东正教哥萨克节的产生，则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哥萨克合作更生动的体现。

三、东正教哥萨克节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

在俄罗斯东正教和哥萨克复兴运动的背景下，顿河圣母像日作为俄罗斯东正教的重要节日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定的原因，东正教哥萨克节的产生亦不例外。一个新节日的产生不仅反映着时代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变革和国民的心态等众多因素。而俄罗斯东正教会设立东正教哥萨克节，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大牧首基里尔曾表示：“哥萨克复兴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上帝在人类历史上的神赐，哥萨克继承了爱国主义传统和深深的宗教感，并且他们时刻准备捍卫东正教的价值观。”^②的确，俄罗斯弘扬爱国主义的官方倡导，与哥萨克的历史贡献、当代俄罗斯的社会弊病、哥萨克优秀传统文化的诊疗作用、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哥萨克的密切关系等，都是该节日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弘扬爱国主义的官方倡导与哥萨克的历史贡献

俄罗斯是一个非常重视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近年来，“爱国主义”一词更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俄罗斯官方文件，以及官员、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演讲中，一时间成为大众传媒的高频词。爱国主义，从字面理解就是对祖国的爱，主要指公民捍卫国家利益及对本国历史和传统的尊重。谈到爱国

① 全世界俄罗斯人民大会创立于1993年5月，现任主席为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基里尔，重点探讨俄罗斯发展问题。2005年，大会获得了联合国授予的联合国专门咨商地位（специальный консультативный статус пр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大会长期作为俄罗斯社会思想的讲坛，近年来经历了一个向社会论坛转型的过程。基里尔评价该组织为俄罗斯公民社会最有效的、最重要的工具。

② <http://kazakirossii.ru/>（上网时间：2011年9月）

主义的重要性，普京指出：“爱国主义——俄罗斯未来坚固的基础”^①，“没有爱国主义，一个国家就无法存在，国家就会像糖块一样融化在茶水中”^②。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而历史教育则是俄罗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为恢复俄罗斯公民的历史记忆，俄罗斯政府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如：修复了许多历史博物馆，为战争英雄修建纪念碑，创办爱国主义军事俱乐部，隆重庆祝国家历史上的一些重大节日，建立爱国主义教育中心，等等。俄罗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措施还有许多，如：1997年3月14日建立了俄罗斯联邦政府下属的俄罗斯国立军事历史文化中心^③，中心旨在制定并落实推广爱国主义的一系列纲要和计划。普京上台后，俄罗斯还将爱国主义教育列入国家纲要（2000年），如今已经进入纲要实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④时期。俄罗斯联邦政府下属的俄罗斯国立军事历史文化中心目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落实2010年10月5日的第795号《俄罗斯联邦2011—2015年公民爱国主义教育》国家纲要。该《纲要》是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延伸，要求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共同解决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并且为爱国主义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атриотизм – прочный фундамент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http://history-kuban.ucoz.ru/news/vladimir_putin_patriotizm_prochnyj_fundament_budushhego_rossii/2012-09-12-172（上网时间：2013年12月）

② <http://er.ru/news/2013/2/2/putin-otmetil-znachenie-patriotizma-dlya-ukrepleniya-strany/>（上网时间：2014年4月）

③ 俄罗斯国立军事历史文化中心（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военный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ый центр пр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ли Росвоенцентр）是俄罗斯联邦机构，由联邦财政拨款。前身是1992年6月26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第710号总统令下令建立的俄罗斯联邦政府所属的俄罗斯国立海军历史文化中心（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орской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ый центр 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后来根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俄罗斯权力执行机构、俄罗斯联邦主体的权力执行机构、俄罗斯科学院及社会组织等的提议，根据1997年3月14日俄罗斯联邦政府第317号政府令，将中心更名为俄罗斯联邦政府下属的俄罗斯国立军事历史文化中心。http://www.rosvoenentr-rf.r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7&Itemid=75（上网时间：2013年12月）

④ 第一个五年计划为2001年2月16日第122号政府令通过的《2001—2005年俄罗斯国民爱国主义教育国家纲领》；第二个五年计划为2005年7月11日第422号政府令通过的《2006—2010年俄罗斯国民爱国主义教育国家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为2010年10月5日第795号政府令通过的《2011—2016年俄罗斯国民爱国主义教育国家纲领》。http://rosvoenentr-rf.r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51:2008-12-22-12-36-56&Itemid=72&layout=default，上网时间：2013年12月）

教育注入新的活力。《纲要》的实施使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并且使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初具规模。哥萨克在青年军事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在俄罗斯官方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的背景下，哥萨克成为俄罗斯唤醒公民历史记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选方式之一。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和历史文化现象，哥萨克产生的时间和群体构成在俄罗斯史学界长期存有争议，然而哥萨克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功绩却受到官方、社会和学界的一致认可。受俄罗斯人民英雄心理和功勋情节的影响，哥萨克在历史上创造的一系列历史功绩也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某种慰藉。在俄罗斯历史上，哥萨克最突出的历史贡献主要有：

第一，哥萨克是俄罗斯疆域的开拓者。从16世纪俄罗斯向东征服西伯利亚地区开始，哥萨克人就为西伯利亚地区划入俄国版图立下了汗马功劳。1581年-1584年，哥萨克阿塔曼叶尔马克带领大批哥萨克人向西伯利亚汗库丘姆发起远征，他们打败了汗国的军队并且同伊凡四世的军队一起踏上了西伯利亚的土地，这是俄罗斯人第一次征服西伯利亚。17世纪是俄罗斯的地理大发现时期，哥萨克人再次充当沙皇开疆辟土的马前卒。17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的疆土继续向东扩张，哥萨克人先后在叶尼塞河和勒拿河边建立起要塞，很快他们还踏上了东西伯利亚的土地，到达了贝加尔湖。哥萨克人库尔巴特·伊万诺夫在1640—1641年的旅行中，收集了许多关于勒拿河的地理资料，也是被公认的俄罗斯第一位勒拿河地区的地图绘制者。此外，他还绘制了贝加尔湖及其注入河流的概要图，收集并记录了湖里的鱼类资源信息及湖岸周围的泰加林里生活的毛皮兽的信息。^①在俄罗斯帝国开拓疆土的过程中，哥萨克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和冒险天赋，他们为俄罗斯今日的版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哥萨克是俄罗斯国家的保卫者。在1812年卫国战争中，哥萨克同侵略者进行顽强斗争，成为战争中一支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哥萨克将领、顿河哥萨克军阿塔曼普拉托夫将军，在这场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中表现出极高的军事天赋和英勇无畏的精神。他带领顿河哥萨克军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

^① Курбат Иванов – казак и первый русски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Байкала. <http://kdkm.mos.ru/presscenter/news/detail/857843.html> (上网时间：2013年12月)

了决定性作用。就连拿破仑在战争失败、逃出俄罗斯时对哥萨克的作战艺术也连连称赞，他表示：“是哥萨克在这场战争中给俄罗斯赢得了胜利。哥萨克是所有轻骑兵中的佼佼者。如果我的军队中有这些哥萨克，我将横行于天下”^①。为了表彰顿河哥萨克的卓越战功，沙皇下令在新切尔卡斯克城的西部和东北入口处各建一座凯旋门。一个城市有两处凯旋门，这在俄罗斯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城市还矗立着叶尔马克和普拉托夫的巨型雕像。这一切，向世人炫耀着顿河哥萨克辉煌的历史^②。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哥萨克军人同样表现出高尚的爱国情操和为国献身精神，为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击退法西斯侵略者，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扮演以上两种角色的同时，作为皇权的忠实拥护者，历史上哥萨克也充当着沙皇对外侵略扩张的血腥工具，因此我们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他们。作为政府利用的棋子，无论是在正义战争或非正义战争中，哥萨克都以自己的鲜血、生命、勇敢和智慧为国家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从俄罗斯国家统治者的立场来看，他们既是英勇善战的国家边疆保卫者、抵御外敌者，也是具有无畏精神的领土开拓者。因此，在谈到哥萨克的作用时，梅德韦杰夫也不无称赞地表示：“哥萨克在俄罗斯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他们永远勇敢地捍卫自己的祖国”^③。正因为俄罗斯民众对英雄的崇拜、对荣誉的崇拜，使得哥萨克在当代俄罗斯被广泛接受，其复兴运动也受到各界支持。换言之，这也反映了一个曾经叱咤欧洲的骄人帝国衰落之后，政府和民众均有较为普遍的功勋心理和英雄情结，他们强烈渴望谋求国际权威地位并重回世界“霸主”的舞台。

（二）转型带来的社会弊病和优秀的哥萨克传统文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体制的急剧震荡导致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俄罗斯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国民收入的减少及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失业率大幅度上升，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贫富差距严重，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① 左师军：“俄罗斯哥萨克重新崛起”，《中国国防报》，2001年9月11日。

② 参见：子河：“寻找顿河哥萨克”，《俄罗斯文艺》，2004年第1期，第75页。

③ http://kazakirossii.r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9&Itemid=23&lang=ru（2013-8）

离婚率、犯罪率越来越高，吸毒和自杀人数增多，人口下降，堕胎，非婚生现象严重，家庭观念薄弱，道德观沦丧，价值观蜕化等等。这一时期，生活条件的窘迫使俄罗斯人酗酒现象加重，导致恶性循环，人口死亡率上升，适龄的劳动力人数下降。据统计，1990年在20-55岁死亡的男性人口中，有7%是酒精中毒而死。^①同一时期，俄罗斯的离婚率也高得惊人。数据显示，1990—1998年离婚率从42.7%上升到58.6%。另外，因工作劳累、失业、失恋、家庭暴力等各种原因自杀的俄罗斯人，平均每年增加10%，1999年达到97276人，是1990年39150的2.5倍^②。此外，非婚生现象增多及离婚率的大幅上升，还使俄罗斯社会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父母健在的孤儿”（сирота при живых родителях）越来越多。即孩子的父母健在，然而由于非婚生或者父母离婚等原因导致孩子无人抚养成为“孤儿”的现象。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在转向东正教寻求慰藉的同时，也促使俄罗斯人民更加怀念并推崇优秀的传统文化及正确的价值观。哥萨克传统文化的精髓，恰恰是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所需要的，是俄罗斯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谈到哥萨克文化，普京曾指出：“哥萨克是我们国家不一样的人，是一支独特的歌曲，他们有悠久的传统，独特的文化，色彩鲜明而又富有生机。”^③文化的精髓是精神^④。哥萨克精神包括哥萨克人对自己的心理定位、对自身以及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思维方式、世界观和价值观等等。进取、勤恳、崇拜家长、有高度荣誉感和自尊心的哥萨克人，他们勇敢无畏、热情博爱、勤劳坚韧、热爱自由。长期以来，这种哥萨克精神在俄罗斯文化中散发着独有的光芒。而这一切都在转型时期受到俄罗斯民众的推崇，为当代俄罗斯社会所需要。优秀的哥萨克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哥萨克人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学者认为，哥萨克的农耕和传统生活方式具有宗法制的一些特征，不突出个性和个体，这对资本主义

① География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88.1-3. 转引自：冯绍雷、相蓝欣：《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82页。

② 同上。

③ <http://kazakirossii.ru/>（上网时间：2013年12月）

④ 王玉德：《文化学》，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2页。

迅速发展的俄罗斯社会而言难能可贵。第二，哥萨克人生性乐观、积极、向上。俄罗斯社会经历过数次社会巨变，急剧恶化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并没有使这一群体丧失原有的积极心态和乐观天性，他们总是能找到时间用来休闲和娱乐。在当代俄罗斯社会紧张而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这种心态是俄罗斯人最想要拥有的。第三，哥萨克人重情义，对朋友慷慨友爱。哥萨克以热情好客而闻名，他们认为客人是上帝派给他们的使者，通常来自遥远地方的、需要借宿的陌生客人均会成为哥萨克人的座上宾客。哥萨克俗语说道：“请记住，我的兄弟，友谊是哥萨克人的风俗，好客是哥萨克人法则^①”。第四，哥萨克人对女性十分尊重。尽管在哥萨克家庭中，父亲是家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哥萨克妇女地位低下。由于信奉东正教的原因，哥萨克人对家庭生活极为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哥萨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第五，哥萨克人的家庭观念十分强烈，很少有离婚现象。其对家庭的重视还表现为关爱子女、友爱兄弟姊妹。哥萨克群体长期以来是宗法制的组织结构，他们对祖先、对长辈有着独有的崇拜，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要尊重自己的长辈。所以，哥萨克家庭通常被认为是最牢固、最温暖的家庭。哥萨克的家庭观念无疑是疗治国家、社会、民族情感伤痕的良药。

让哥萨克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上述优秀品质直至今日仍没有消失。伴随着哥萨克复兴运动的开展，这些宝贵品质得以巩固和发扬，这对净化当今俄罗斯社会整体道德环境、改善社会弊病，起着重要的作用。坦波夫的神父维塔利·叶夫谢夫说：“哥萨克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俄罗斯身体的一个器官，并且这个器官是靠近心脏的。哥萨克是精神的载体，因为心脏是精神的载体，是人的精神载体”^②。他的话恰当地说明了哥萨克对俄罗斯的文化意义。正是这些传统文化和精神遗产，向世人说明了这个曾经辉煌的群体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优秀的哥萨克传统文化有利于俄罗斯多元文化

① Помни, брат, что у казаков. http://sonsny.ucoz.ua/publ/pomni_brat_chno_u_kazakov_d_ruzhba_obychaj_tovarishhestvo_tradicii_gostepriimstvo_zakon/1-1-0-106 (上网时间: 2011年6月)

② Иерей Виталий Евсеев: "Казак — это состояние души" — Тамбовский священник рассказал о значении казачеств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http://oskidke.ru/4072> (上网时间: 2011年6月)

的发展，有利于改善俄罗斯国内的一些不良社会习气。同时，哥萨克人的宽容忍耐精神，还有利于构建当代俄罗斯社会公民的认同感和宽容性。意识到哥萨克精神、哥萨克优秀品质对当今俄罗斯社会的重要性，俄罗斯东正教团结哥萨克，支持哥萨克的复兴，加强同哥萨克的合作，将东正教的传统节日宣布为全体哥萨克的节日，进而建立两者间更加紧密的关系，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

（三）俄罗斯东正教与哥萨克的特殊关系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亚历山大·别格洛夫说：“哥萨克历史上就与东正教密不可分。今天无法想象一个人称自己为哥萨克，却公开表示反对自己祖先的信仰”。^①的确，俄罗斯东正教和哥萨克的命运在过去几百年间紧密交织，宗教在哥萨克文化里占据核心与灵魂位置，很难想象哥萨克没有信仰会怎样。东正教哥萨克节的产生就直接说明了这一点。沙皇时期，弘扬东正教、效忠沙皇和保卫祖国是哥萨克的三大任务。有关这一点，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哥萨克团体协作圣主教公会主席基里尔曾表示：“哥萨克历史上就是国家主体民族俄罗斯族的传统价值观——为国家服务和东正教信仰的载体和保护者。在历史上没有例子证明，哥萨克由犹太教、佛教或者‘其他宗教’的信徒组成。”^②可见，东正教是哥萨克的庇护者和精神基础，哥萨克也视自己为东正教信仰的支柱和维护者，他们一生都在为服务上帝而努力。当然，对于哥萨克而言，东正教不仅仅是严苛的教条和教规，而且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也正是东正教世界观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末哥萨克复兴运动的精神基础。

首先，哥萨克维护东正教礼仪和教规。东正教决定着哥萨克从受洗到离世的完整人生道路，是形成哥萨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决定性因素。哥萨克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细节都体现出东正教的信仰，比如：哥萨克人十分重视受洗。在哥萨克看来，受洗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未经受洗的婴儿都被认为是没有灵魂的。因此哥萨克十分尊重施洗的人——教父和教母。哥萨克人的婚礼

① Казаки-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экстремисты? <http://3rm.info/20982-kazaki-pravoslavnyie-yekstr-emisty.html>（上网时间：2014年2月份）

② Там же.

也是典型的东正教模式。只有伴随着祈祷的婚礼才是合法婚姻的唯一见证。此外，哥萨克人很重视宗教节日和东正教堂。每逢重大的东正教节日，哥萨克都会以自己传统而独特的方式进行庆祝。在哥萨克村镇中，最重要的财产是教堂。哥萨克到达新的地方后，一切建筑活动通常都始于教堂的建设。整个集体会一起出资出力建设教堂，并且优待神职人员。

其次，哥萨克践行东正教教义精神和行为规范。东正教对哥萨克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最为深远。我们以罪恶观和家庭观为例来看看有哪些具体表现：与父母吵架被认为是哥萨克人的重大罪行，未能替父母完成临终愿望也是大不孝，会使他们无法得到安宁，甚至死后灵魂都要受扰。哥萨克人认为生命是上帝的恩赐，不珍视生命被认为是极大的罪恶，因此堕胎等行为是被禁止的。生气、发怒也被认为是罪恶的——“我们哥萨克是不记仇的民族，怒气消了，我们就愿意和解。因为我们在尘世原谅别人，自己在天堂就会被宽恕。这是上帝的法则”^①。可见，哥萨克文化是建立在绝对的东正教信仰基础之上的。正是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才使哥萨克作为东正教的忠诚追随者，以复兴东正教传统为重要使命，积极参加宗教活动，恢复东正教传统文化，支持宗教主导的各个组织及相关事务。从哥萨克的角度看，解决当代俄罗斯遇到的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和困难，需要得到东正教会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相同的东正教信仰以及精神上的共同寄托，有利于增进哥萨克各个团体间的认同和团结，防止哥萨克内部发生分裂。对俄罗斯东正教会来说，想要在当代俄罗斯继续发展并且扩大影响，也需要哥萨克的支持。

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哥萨克团结合作，也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正如牧首基里尔所说，“我们依靠谁呢？为什么不是你们（哥萨克）？你们的父辈用自己的鲜血印证了对东正教和国家的忠诚。所以，今天到了教会和哥萨克团体为了人民福祉紧密合作的时候了。”^②俄罗斯东正教会充分意识到了哥萨克在当代俄罗斯的重要作用，重新将俄罗斯哥萨克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同哥萨克开展积极合作，正是东正教哥萨克节产

① Казаки и православие. <http://cossacki.ru/pravo.html>（上网时间：2011年6月）

② Выступление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та по делам казачества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Ф.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813963.html>（上网时间：2011年6月）

生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此外，2010年2月11日，在俄罗斯联邦总统哥萨克事务委员会批准的哥萨克军事团体标准章程中，第一次提到东正教在哥萨克团体生活中的作用，这表明俄罗斯哥萨克和东正教合作再上新台阶，并且双方的密切关系得到了当代俄罗斯决策层的认同。^①可见，决策层、东正教、哥萨克三者关于加强相互合作是有高度共识的。2010年3月，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哥萨克团体协作圣主教公会正式成立，标志着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哥萨克的合作翻开了新的一页。

四、结语

为了引起社会对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作用的重视，2012年1月9日，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颁布了《关于在俄罗斯全境举办俄罗斯历史年》的总统令，将2012年确立为俄罗斯历史年（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②。这是俄罗斯政府开展的一场新型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俄科学院院士谢尔盖·卡尔波夫在接受“俄罗斯之声”采访时，称举办俄罗斯历史年的意义在于，“这是净化并确立俄罗斯人民、俄罗斯国家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过程”^③。哥萨克历史是俄罗斯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萨克的复兴也是俄罗斯历史的复兴。因此，东正教哥萨克节的产生，不仅体现了东正教会与哥萨克的良好关系，更是对俄罗斯国家历史的尊重。东正教哥萨克节的确立，符合俄罗斯决策层重视人们历史记忆的重塑、呼唤历史回归的国家方针。2012年2月20日，普京在《俄罗斯报》上发表题为《强大：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保障》的文章。他在该文中写道：“我想特别说一下哥萨克。今天，这一阶层的同胞有几百万人。哥萨克历史上就为俄罗斯国家服役，保护国家边界，参与俄罗斯军队的军事作战。1917年革命，哥萨克遭到了残酷镇压，事实上——种族灭绝。然而，哥萨

① Казаки и православие. <http://cossacki.ru/pravo.html>（上网时间：2011年6月）

② Указ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Год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14238>.（上网时间：2013年12月）

③ Анна Худякова. 2012 в России объявлен годом истории. http://diplom.161.ru/text/alma_mater/474059.html（上网时间：2013年12月）

克在保存了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之后，复兴了。”^①普京还强调：“国家的任务是尽全部努力来帮助哥萨克，吸引哥萨克人参与军事服务和青年军事爱国主义教育”^②。很快，为了进一步完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普京还于2012年10月20日签署了《关于完善国家爱国主义教育政策》总统令。根据该总统令，设立了负责爱国主义教育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社会项目管理局（Упра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проектам）。^③由此，随着立法健全和行政机构效能的完善，又有了更坚强的国家政权做后盾。在可预见的未来，哥萨克将继续受到国家重视，哥萨克与爱国主义教育将被纳入更高的官方合作层面。毫无疑问，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将继续团结和支持哥萨克的发展，而东正教哥萨克节不仅有历史意义、文化意义，还将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富有生命力的国家节日。

【Abstract】 To unite Russian Cossacks, the Orthodox Church Cossacks' Day in Russia was declared by Kirill — the patriarch of Moscow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 on September 1st 2010 (religion calendar on August 19th 2010). The reasons for proclaiming Cossacks' day include not only the specific social context, but also deep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oots. Firstly, the Russian societ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which provides a favorable opportunity for Cossacks to develop themselve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Secondly,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ossack satisfies social needs and enhances its recognition in contemporary Russia. Thirdly,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Cossacks in the history, and practical needs for cooperation give rise to the birth of this festival. Currently, Russia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Cossacks,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both returning to

①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02.2012.

② Там же.

③ Образовано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проектам. <http://www.kremlin.ru/news/16692>, 俄罗斯联邦总统社会项目管理局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下设的一个独立分支，主要负责提供与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基本方向相关的信息分析和组织保障，向总统提供巩固俄罗斯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基础及完善面向年轻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建议等。

history and patriotic education for citizen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Orthodox Church Cossacks' day will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s to which both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accord importance and support.

【Key Words】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Russian Cossacks, Russian patriotism

【Аннотация】 С целью сплочения казачества Патриарх Московский и Всея Руси Кирилл объявил День иконы Донской Божией Матери 19 августа (1 сентября по н.с.) Праздником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 Этот праздник установлен РПЦ по глубоки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и культурным причинам в рамках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контекста. Во-первых, уважение к истории и призыв вернуться 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создают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казачества. Во-вторых, главная причина в том, что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я нуждается в богатой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казачества. В-третьих, тесн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вязь РПЦ и казачества, а также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ПЦ и казаков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служат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причиной появления данного праздника.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Ф прилагает большие усилия дл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развития казачества, возвращению к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такж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дает огром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развитию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обозримом будущем Праздник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 будет оставаться в центре внимания РПЦ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будет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их поддержкой.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Русское Казачество, Русский Патриотизм

(责任编辑 肖辉忠)

认同问题**东正教与当代俄罗斯国民信仰及自我认同***

赵凤彩**

【内容提要】在苏联解体后 20 多年来的当代俄罗斯社会，东正教在各个方面均得到了复兴和发展。皈依东正教的俄罗斯国民人数不断增长，教会组织迅速扩大，东正教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加强。然而，在探究俄罗斯国民东正教信仰状况时会发现，东正教追随者与信仰者并不完全重合。这一现象反映的是东正教对俄罗斯国民精神、心理及民族文化自我认同上的影响力和作用力。

【关键词】东正教 东正教信仰者 东正教追随者 自我认同

【中图分类号】D751.2; K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5-0105-(15)

东正教在当代俄罗斯社会的复兴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俄罗斯国民中皈依东正教的人数，20 多年来基本呈现上升的趋势。这首先要归因于上世纪末俄罗斯社会经历的那场剧烈的社会变革。在国家制度、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诸领域进行转型的同时，无神论意识形态随之瓦解，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争相粉墨登场。当西方的自由主义未能使休克中的国家走出混乱与衰退，人们开始在宏观上对俄罗斯命运、未来国家发展道路等问题重新展开了讨论。而对于每一位突然由“苏联人”戏剧性地变为“俄罗斯人”的国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俄罗斯的政教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2BZJ039）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同时得到青岛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的资助（资助号：400-0022574）。

** 赵凤彩，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

民来说，世纪之交的这场社会动荡则激发了他们对于自己民族认同与文化归属的再思考与再定位。在对东正教皈依者的宗教意识、宗教行为以及信仰状况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的同时会发现，东正教在俄罗斯国民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显示了深厚的文化张力和影响力。

一、东正教的复兴：厚积而薄发

东正教的复兴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使政教关系有所缓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也有所放宽。而“新国家”俄罗斯联邦的建立，则使东正教的发展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俄联邦历任总统，包括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都有着很深的东正教情节。他们不仅与大牧首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友谊，还将这种个人关系上升到了国家政权的各个层面。政教关系的和谐发展，无疑为东正教的复兴提供了绝佳的时代机遇。20 多年来，俄罗斯国民中皈依东正教的人数呈持续增长的趋势，教会组织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在神学及宗教教育领域，东正教会不仅大力发展自身的神学教育体系，而且还积极向国家世俗普通教育及高等职业教育领域渗透，不断扩大宗教课程及神学专业开设的范围。东正教及其教会的社会参与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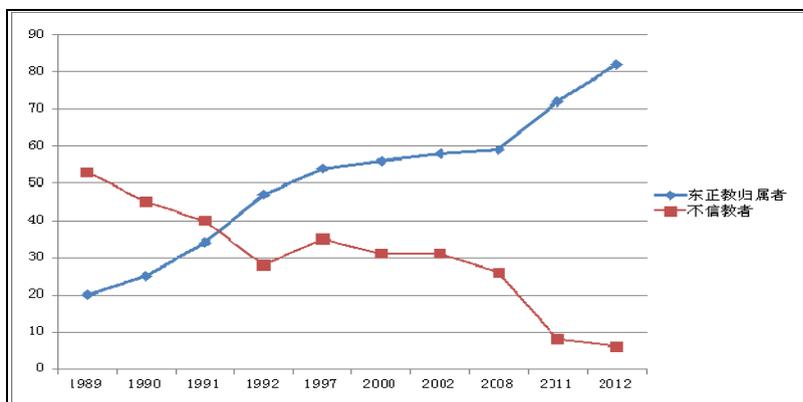
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院、“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和“社会舆论基金会”1989-2012 年的跟踪调查数据，俄罗斯国民中将自己归属于东正教信徒的人数由 20% 增长至 82%；与此同时，无神论者人数则由 53% 降至 6%。这一变化情况可以在图 1 中清晰地体现出来。

2012 年末，尤里·列瓦达研究中心（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Юрия -Левады）公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国民中东正教皈依者的百分比略有下降，为 74%，无神论者的比例则降至 5%。^①而由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院于 2013 年初公布的调查数据则显示，79% 的俄罗斯国民将自己归属于东正教，无神论者的比例则为 7%。^②

① Загвоздина Дарья. В России больше мусульман. 17.12.2012. <http://www.interfax.ru>

② Добрынина Екатерина. Вера и надежды//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5.01.2013. <http://www.rg.ru/2013/01/15/sociologia.html>

图 1 俄罗斯国民 1989-2012 年东正教归属者及无神论者人数的比例变化(%)



数据来源：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院的跟踪调查结果，详见 Ю·西涅丽娜：“当代俄罗斯国民宗教性发展状况”，《俄罗斯研究》，赵凤彩译，2013 年第 3 期，第 148 及第 150 页。

综合考察以上社会调查结果，尽管各种数据间存在着一些差异，但一个大致图谱和总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俄罗斯国民中将自己归属于东正教的人数 20 多年来不断增加。按照社会学家米·塔鲁新（М.Тарусин）的观点，在将那些穆斯林和永久不信教者等因素排除之后，如今归属于东正教的人数几乎达到了比例极限，80%将是一个很难超越的门槛。^①

东正教复兴的规模与程度还可以从有关东正教会自身发展状况的数据中得到印证。1988 年时，教会拥有 74 位高级主教、6,774 位神甫、723 位辅祭、76 个主教辖区和 6,893 个教区。而据大牧首基里尔年度报告中提供的数据，截至 2013 年 2 月，教会中的高级主教人数几乎是 1988 年的 4 倍，包括神甫和辅祭在内的普通神职人员数则是 1988 年的 4.6 倍；与神职人员数量增多并行的是，20 多年来，教会的主教辖区增长了 2 倍有余，教区数量则增长了近 4 倍。东正教会的修道院更是飞跃发展，从 1988 年的 22 座增至 2011 年的 805 座，增长了 36 倍之多（见表 1）。而隶属于教会、用于做礼拜祈祷等仪式的教堂数目增长更是令人叹为观止：1997 年时的教堂数为 172

^① Тарусин Михаил.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вер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России. 18.03.2013, <http://www.narodsobor.ru/>

座，至 2013 年 2 月初，则达到了 33,489 座，增长了 194 倍。^①

表 1 1988-2013 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发展变化

	高级主教 архиерей	神甫 священник	辅祭 диакон	主教辖区 епархия	教区 приход	修道院 Монастырь
1988 年	74	6774	723	76	6893	22
1997 年	146	12841	1402	124	18000	390(В России 242)
2006 年	182	26158	3292	131	27393	713(В России 216)
2008 年	217	27216	3454	157	29263	769(В России 234)
2011 年	217	29324	3850	164	30675	805
至 2013 年 2 月	290	30430	3765	247		

数据来源：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区官方网站发表的牧首各年度报告：
<http://www.patriarchia.ru/>; Древо 东正教百科网站：<http://drevo-info.ru/articles/11316.html#37>

在教会组织规模快速扩大的同时，东正教的神学及宗教教育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1988 年，东正教会只有 5 所神学教育机构，包括 2 所神学院和 3 所中等神学学校。至 2011 年，教会已拥有 92 所神学教育机构，包括 5 所神学院、2 所东正教大学和 47 所中等宗教学校。^②与此同时，教会各个教区也开始恢复 1917 年以前的传统，大力发展星期日学校，向儿童、青年及成年人传播东正教信仰和基本教义学说。如果说，在苏联刚刚解体时，星期日学校数还是零的话，20 多年后的今天，它已发展至 1 万多所，几乎遍及每一个教区。^③

为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恢复神学专业教育，东正教会不断付诸努力和实践，成效也颇为显著。1993 年，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联合俄罗斯各知名高等学府的领导人致函教育部，请求在俄罗斯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内纳入神学课，倡议很快便得到官方的回应。1993 年 12 月，俄罗斯教育部首次颁布了

① Из доклада Патриарх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 всея Руси Кирилла на Архиерейском Собор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02.02.2013.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2770923.html>

② Из доклада патриарх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 всея Руси Кирилла на Архиерейском Собор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02.02.2011. <http://www.pravoslavie.ru/put/44498.htm>

③ Воскресные школы: полтора века истории и нов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05.03.2013.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294573.html>

“高等职业教育神学学士学位联邦国家教育标准”。根据该标准，国立和非国立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开设五年制的神学学士专业。2001年和2011年，教育部先后两次出台“高等职业教育神学硕士学位联邦国家教育标准”。目前，在世俗国立和非国立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内，经国家注册的神学专业已达47所^①。

苏联解体后，随着无神论意识形态的瓦解，中小学的精神道德培养领域一直没有建立起富有成效的体系，由于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有广泛参与国民教育的传统，教会适时抓住时代契机，20多年来始终致力于恢复其在普通教育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从1991年在斯摩棱斯克州的几所学校尝试性地开设东正教文化方面的选修课程开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声中，“东正教文化基础”课不断扩大开设范围。自2012年9月1日起，该课程作为“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综合必修课程的模块之一，扩大到在俄罗斯联邦全境所有普通学校的4年级开设。这可谓是东正教会在世俗国民教育领域里的一次不小的胜利。

东正教在社会各领域的复兴自然带来了俄罗斯传统民族文化的回归。不言而喻，自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东正教成为国教以后，东正教对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和俄罗斯国家的建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千多年来，俄罗斯民族发展史也从未离开过与东正教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早已固化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内核，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俄罗斯文明的特质。表面上看，苏联74年的历史似乎割断了东正教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联系，但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东正教厚积薄发，不仅再次彰显了生命力，也昭示着它对俄罗斯民族意识及民族精神文化深厚的影响力与作用力。

二、东正教追随者与信仰者：俄罗斯国民宗教性的发展与困惑

俄罗斯国民中皈依东正教的人数近年来不断增加，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列瓦达研究中心1994-2012年的跟踪调查资料显示，有63-80%的被

^①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патриархате призывают ученых избегать "советских" методов борьбы с Церковью в отстаивании светско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11.06.2013. <http://www.interfax-religion.ru/>

调查者认为,尽管人们表现出对东正教及教会的关切,也参与一些宗教活动,但没有多少人真正信仰宗教。^①就拿光顾教堂做礼拜来说,依照东正教会的规定,除非有正当理由,连续三个星期日缺席礼拜仪式,就要被逐出教门。^②按照这样的教规,真正属于东正教会的教民会有多少呢?列瓦达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很耐人寻味。在被调查者中,每周都去教堂参加礼拜仪式的人,1991年为1%,2011年依然为1%;从不去做礼拜的人1991年为85%,2011年为65%。另一个调查数据表明:在宣称自己是东正教信仰者中,1991-2011年间每周去教堂领圣餐的从未超过1%,而从未领取过圣餐的1991年为86%,2011年为65%。^③

社会学家德·弗尔曼(Д. Фурман)和基·卡利安涅恩(К. Каарийнен)在其研究过程中曾经提出过“传统的信徒”(традиционный верующий)和“当前的信徒”(настоящий верующий)两个不同的范畴。属于前者的东正教徒包括:一、将自己认同为信教者;二、相信上帝;三、认为自己是东正教归属者;四、每月光顾教堂不少于一次,或者经常祈祷。两位社会学家认为,依照该范畴分类原则,“传统的信徒”大致比例为6—7%,如果再加上诸如遵守斋戒、经常接受圣餐、读过哪怕《福音书》的某些部分等更严苛的条件,那么所谓“传统的信徒”几乎不存在。比如,在1999年,只有1%的被调查者经常与神职人员交流。79%(其中61%称自己为信教者)的人回答“从不与任何神职人员交流”。完全遵守斋戒的只有4%,44%的人称从未打开过《福音书》。^④“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也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2006-2010年间,每天都完成宗教仪式的人数在3—4%之间,而从不进行任何宗教仪式的占32—37%。^⑤

当代俄罗斯国民宗教信仰方面的特点是值得深入探究的。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判定一个人是否为信徒,只要被调查者自己认为属于哪个宗教就可以

① «Россияне о религии и церкви». 11.10.12. <http://www.levada.ru/>

② Юрий Носовский. Верю—не верю, или Парадоксы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и// Правда». 25.10.2012, <http://www.pravda.ru/faith/religions/>

③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вера в России. 26.09.2011. <http://www.levada.ru/>

④ Каарийнен К.,Фурман Д. Старые церкви, новые верующие—Религия в массовом сознани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Летний САД. М.;СПБ., 2000. С.67.

⑤ ВЦИОМ, Пресс-выпуск №.1461.30.03.2010. <http://wciom.ru/index.php?id=515&uid=13365>

了。而另一些社会学家则认为，考虑的因素不仅仅包括信教者的自我认同，还应包括他们对相应宗教学说和教义的认知程度、参与宗教生活的积极程度等等。显然，由于统计、评价方式和标准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调查所得数据和分析结果的显著差异，东正教人群的比例数也会形成 4—6%至 70—80% 之间的巨大浮动。

为能更加有效地反映出东正教人群的特点，弗尔曼和卡利安涅恩将属于东正教行列的人（православные）分为“东正教追随者”（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和“东正教信仰者”（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верующие）并揭示出两者之间的不对等性：在 1999—2005 年，80% 以上的被调查者宣称自己是东正教追随者。他们中包括 92—98% 的信教者、90% 左右的摇摆人士、39—50% 的不信教者、还有 22—42% 的无神论者。^①也就是说，宣称是东正教追随者的人多于信仰东正教的人。这显然不符合“正常”的逻辑。为此，人们不得不给那些无神论的东正教追随者一个颇为调侃戏谑的称谓——“东正教的无神论者”（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атеисты）。弗尔曼和卡利安涅恩断定，这就是当代俄罗斯的现实：“东正教追随者”并不都是“东正教信仰者”，而“东正教信仰者”则是“东正教追随者”的一部分。

2012 年底，社会舆论基金会与非商业研究机构“星期三”进行了一次全俄范围的、题为“宗教与民族图册”的专项问卷调查。本次调查涉及 79 个联邦主体的约 57,000 人。调查结果显示，有 41% 左右的被调查者将自己归为东正教信仰者。^②这一结果同东正教会官方数据以及“列瓦达”等社会调查研究机构所得到的数据有相当大的出入。该中心社会学家巴格里娜（Алина Багрина）认为，这一调查结果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由于我们试图得到东正教信仰者的确切数字，因此我们改变了问卷调查中通常的询问方式，直接让被调查者确定自己是否属于东正教会。”^③仅仅是提出问题的方式

① Новые церкви, старые верующие – старые церкви, новые верующие. Религия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Под ред. Киммо Каарияйнена, Дмитрия Фурмана. Летний САД. М.:СПБ., 2007. С.43.

② «Церковные люди»: 41%. Служба «Среда» пересчитала верующих в России. 19.12.2012. <http://sreda.org/opros/arena-reliz>

③ Сямин Евгений. Русский, значит,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Культура. 22.12.2012. <http://portal-kultura.ru>

不同，便会导致“东正教信仰者”与“东正教追随者”数据的显著差异，“信仰”与“追随”两者的迥异可见一斑。那么，二者在宗教性范畴内又该如何衡量界定呢？

社会学家切斯诺科娃(В.Ф.Чеснокова)提出的“入教”(воцерковление)衡量评价体系也许更能直观和客观地反映出“东正教追随者”与“东正教信仰者”在宗教性上的程度差别。该体系借助描述和界定个人对教会生活的参与程度，将东正教人群进一步细化。依照切斯诺科娃的观点，“入教”包括个人对教规、教礼及普遍存在的教会习俗的了解，以及自身对该宗教的归属感，是一个人通过理解和掌握教会固有的生活与思维方式，自愿承认教会对其的影响。^①切斯诺科娃同时提出了借助行为观察来评价生活方式的研究方法。她认为，由于生活方式相当于意识现象和价值观的确立，显然是更易观察到的现象。借助于对生活方式的研究，可以记录同确立与某种行为相关的规律性。因此，使用这种方法研究俄罗斯国民中东正教追随者的入教程度，能够确立与东正教生活方式相关的一些关键性变量，并借助一定的标准，衡量每种变量的强度。通过这套标准，还可以了解某种因素进入一个人生活的深度以及对其掌握的牢固程度：该因素是否正在成为一个人的习惯，或者已变为其自觉的行为，或者还处于被其刚刚掌握的阶段，或者它根本就没有成为这个人的生活方式。

为衡量和掌握个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入教程度，切斯诺科娃提出了五项标准，包括：光顾教堂；参加圣餐礼；阅读福音书；祈祷；遵守斋戒。在此基础上，依据入教水平及程度，在每一项下由程度最强至最弱再依次分类。针对“光顾教堂”和“参加圣餐礼”两项，可分为：每月至少一次；每年几次；每年一两两次；少于一年一次；从不光顾（或从不参加）。对于“阅读《福音书》”再分为：经常性地阅读《福音书》及其他经文；只经常性地阅读《福音书》；不久前阅读过《福音书》；很久以前阅读过；从不阅读。针对“祈祷”一项，则分为：进行晨祷及晚祷；几乎每天用教会祷词进行祈祷；主要用教会祷词进行祈祷；经常自行祈祷；从不祈祷。最后针对“斋戒”一项有：遵

^① Чеснокова В.Ф. Темным путем: процесс воцерковления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XX века. М.: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5. С.4.

守所有斋戒，包括星期三和星期五的斋戒；在所有大斋期努力遵守斋戒；只遵守某些斋戒；有时遵守，但不经常；不遵守斋戒。依靠这种分类方法，可以将俄罗斯国民中的东正教追随者分为五大群体：入教群（воцерковленная группа），半入教群（полувоцерковленная），初入教群（начинающая），未入教群（невоцерковленная）和零入教群（нулева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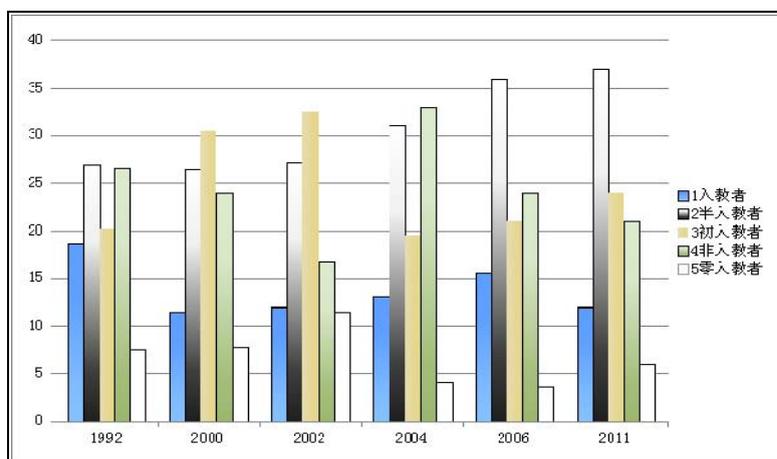


图2 依入教程度各组群体占东正教追随者的比例(%) (1992-2011年)
 数据来源：Ю·西涅丽娜：“当代俄罗斯国民宗教性发展状况”，《俄罗斯研究》，赵凤彩译，2013年第3期，第157-160页。

依照切斯诺科娃的评价体系和标准，综合1992-2011年的社会调查数据，可以看到俄罗斯东正教追随者五个群体的分布比例情况（见图2）。入教者10余年来徘徊在11.5-18.7%之间，零入教者在3.5-11.5%之间，而半入教、初入教及非入教者，总比例值一直保持在80%以上。也就是说，属于真正传统意义上的信徒，在东正教群体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从严格意义上说，也只有这部分人群才能归入“东正教信仰者”的行列，他们构成了东正教群体的内核。东正教群体的主体，是那些宗教行为和参与宗教生活的各项指标均不高、他们的生活只是或多或少地同宗教社团或教会教区相联系的人群。他们既不特别笃信教规教义或沉湎于宗教生活及宗教体验，也不完全排斥宗教在其周围的存在，或否定来自宗教及教会的影响。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 2010 年全俄人口普查结果，俄罗斯现有人口为 142,857,000 人。^①如果综合近两年来的各项调查数据，按照 75%的比例计算，目前俄罗斯国民中有约 1.07 亿人为东正教追随者。从数字上看，似乎可以断定俄罗斯是一个宗教国家了。然而，从宗教性来看，俄罗斯国民的各项指标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东正教对俄罗斯国民的日常生活及个人秉性影响也甚少。^②

三、亲东正教的社会共识：东正教与俄罗斯国民的自我认同

既然俄罗斯国民的宗教性程度不高，他们特别关切的显然不是宗教或信仰本身，那么如此高的东正教追随者比例又能说明什么呢？从俄罗斯文化上看，东正教维系了俄罗斯的历史与现代，是使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人们抛开彼此间的分歧与不合、抛开贵贱贫富的差别而团结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因此，在俄罗斯国民的心目中，东正教应该是俄罗斯民族的，东正教会是神圣的俄罗斯精神与俄罗斯统一的象征。可见，东正教已经远远不止是一种宗教信仰，它所能表达的内涵和外延都被大大扩展了。民意调查得到的印象是，人们对东正教的认可和期望值正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列瓦达”研究中心 2012 年的调查显示，对选项“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危难关头曾经拯救了国家，现在应该发挥同样的作用”，58%的被调查者表示认同。该项指标在 1994 年和 2003 年分别为 34%和 39%。有将近一半（48%）的国民则相信，只有诉诸宗教和教会，国家才能寻求到精神复兴的力量，这项数据在 1994 年时为 25%，2003 年时为 29%。^③对于东正教本身，持“非常好”及“很好”态度的，1996 年时为 88%，1999 年为 94%，至 2005 年一直保持在 95%的高水平。^④按照弗尔曼和卡利安涅恩的观点，

① Росстат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окончательные итоги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16.12.2011. <http://top.rbc.ru/society/16/12/2011/630214.shtml>

② 据“列瓦达”的一份调查问卷显示，1994—2012 年，50%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宗教及教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秉性影响甚少。参见 Россияне о религии и церкви, 11.10. 2012. <http://www.levada.ru/>

③ Россияне о религии и церкви. 11.10.12. <http://www.levada.ru/>

④ 详见 Новые церкви, старые верующие – старые церкви, новые верующие. Религия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Под ред. Киммо Каарияйнена, Дмитрия Фурмана. М.СПБ.: Летний сад, 2007. С.21.

这种对东正教友好态度的趋势在近几年不会有所下降。如果考虑到东正教信仰者只是小部分人而 75%左右的人口为东正教追随者的情况，那么，能有如此多的俄罗斯国民对东正教持友好态度，的确可以说俄罗斯社会达到了一个“亲东正教共识”（про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консенсус）了：不仅东正教人群，还有那些信仰摇摆者、不信教者以及无神论者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仅仅从无神论者这一群体看，对东正教持“很好”和“非常好”态度的比例也达到了 70%。21%对东正教会表示信任，47%的无神论者认为，每一位俄罗斯人的内心都是属于东正教的。^①

亲东正教的社会共识同样体现在国民对教会的信任度上。1991 年，68% 俄罗斯民众对东正教会表示信任，位列所有国家和社会机制之首。从 2002 年到 2011 年，民众对教会的信任度一直保持在第二位，仅次于对俄罗斯联邦总统。^②2012 年“社会舆论基金会”的调查显示，教会在民众中依旧有高达 64% 信任度。^③针对“列瓦达”研究中心提出的问题“总体上看，您是否赞成东正教会的活动？”，有 73% 的被调查者回答赞成。对问题“您是否赞成东正教会大牧首基里尔的活动”，69% 的人选择了肯定答案。^④由于大多数人同教会并不像同警察、大众媒体或者政府这样的社会机制一样有直接的接触，甚至有些人同教会从未有过任何干系，因此，教会能享有如此高的信任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民众的主观臆断。在大多数民众的心理或意识中，无论是东正教还是教会，首先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在无神论文化解体之时，它们成为人们寻找和定位自我的精神支柱。

曾经 70 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与当代民主国家的建立、转型与发展，使俄罗斯人的心理意识、民族及文化认同都经历了复杂的转换过程。弗尔曼

① Новые церкви, старые верующие – старые церкви, новые верующие. Религия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С.50.

② 2011 年，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院的调查研究显示，东正教会在民众中的信任度为 50%，位列第二。详细数据参见 Новые церкви, старые верующие – старые церкви, новые верующие. Религия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С.23.以及 Ю·西涅丽娜：“当代俄罗斯国民宗教性发展状况”，《俄罗斯研究》，赵凤彩译，2013 年第 3 期，第 11 页。

③ Отношение к РПЦ и патриарху Кириллу: Как россияне относятся к РПЦ и что думают о ее роли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04.05.2012. <http://fom.ru/obshchestvo/10434>

④ Сентябрьские рейтинги одобрения и доверия, положения дел в стране, запомнившиеся события прошедшего месяца. 26.09.2012. <http://www.levada.ru/>

和卡利安涅恩在研究中指出，“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前俄国人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那么十月革命后则变成了认为自己是苏联人；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前俄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东正教文化，十月革命后则认为自己的文化是苏联社会主义无神论文化了。然而，1991年国家的解体使情况再次发生了戏剧性的颠覆：如果说在苏联时代，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是苏联人，自己的文化是无神论文化，那么1991年以后的俄国人则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自己的文化是东正教文化了。这里，相信自己的文化是东正教文化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信仰东正教。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东正教并不意味着一种信仰，而是意味着一种民族认同：如果说在苏联时代，苏联=俄罗斯，那么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东正教。”^①

上世纪60年代末，苏联报刊上发表过一份有关苏联居民宗教性的社会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只有8%的苏联成年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东正教。学者们认为这部分居民主要是那些老朽、即将过世的老太婆们，由此他们断言，苏联很快将会成为一个无神论国度。然而，在90年代初由“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所做的社会调查中，仍旧有8%的国民将自己归为东正教，另有45%的被调查者尽管不那么确定，但认为自己带有东正教性。至90年代末，已经有65%的俄罗斯国民称自己为东正教的人。^②表面上看，似乎东正教一夜之间复活了，实际上，它从未从俄罗斯人的心里抹去，它一直活在人们的精神及意识中。社会舆论基金会负责人叶列娜·彼特连科（Елена Петренко）更是因此而从根本上否定苏联对俄罗斯国民的文化影响：“无神论年代并没有对人们的东正教自我认同产生任何作用。”^③

东正教对俄罗斯国民自我认同的影响力与作用力在俄罗斯国内许多学者的研究中不断得到印证。米·穆切德洛夫（М. Мчедлов）等三位学者在研究当代俄罗斯国民的宗教性问题时发现，东正教在当代俄罗斯不仅仅是一门宗教，它更是一个民族符号。许多被调查者在否定自己世界观中的宗教性的

① Киммо К., Фурман Д. Старые церкви, новые верующие—Религия в массовом сознани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С.15.

② Сямин Евгений. Русский, значит,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Культура. 22.12.2012. <http://portal-kultura.ru>.

③ Там же.

同时,又将自己归属于传统的东正教。他们不是将东正教视为某种宗教体系,而是很自然地将它归为文化范畴和民族生活方式:“因为我是俄罗斯人——所以我是东正教人”。^①巴格里娜在对“星期三”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进行解释时补充道:“当今俄罗斯国民通常将东正教作为确定其文化及民族自我认同的方式。在严格意义上也可以说,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俄罗斯就意味着东正教。”^②俄罗斯科学院的西涅丽娜(Ю. Синелина)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了俄罗斯国民在宗教信仰上的这一特殊现象:“受调查者中称自己为东正教追随者的比例高于认为自己为信教者。这表明,一些受调查者将自己归为东正教文化人,而不是东正教信仰者,以此来确定文化的自我认同。对于他们来说,宗教是一种文化自我认同的手段,极少能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宗教更多的是某种象征,而不是他们世界观的基础。”^③

由此可见,在俄罗斯国民的心理意识中,东正教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宗教学说,更是与俄罗斯民族密切相连的抽象的文化符号。东正教文化是千余年来东正教与纯粹的、世俗的和整体意义上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共生互动的结果。在当代俄罗斯国家,东正教文化之于俄罗斯文化的意义甚至在国家立法中得到表述:在俄联邦《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的页首便开宗明义,着重强调“承认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在俄罗斯精神和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④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再只单单将东正教与某种教条或仪式相连,不再将其视为具体意义上的、借助于国家或组织对人的意识或行为进行监控的社会机制。人们也不再仅仅是将归属于东正教看做是光顾教堂参加圣礼或读一读《福音书》、遵守一下斋戒的外在形式。那些世界观、道德等问题越来越变为个人或私人问题,东正教逐渐失去了作为外部因素对人的约束力。然而,摆脱了无神论官方意识形态的俄罗斯人,在突然间面对林林总总的思想、思潮和学说而不得不重新进行自我定位时,迫切需要某种永恒的、

① Мчедлов М., Шевченко А., Гаврилов Ю. Вера в Бога—мода или потребность? //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ь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2002, С.12.

② Сямин Евгений. Русский, значит,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Культура. 22.12.2012. <http://portal-kultura.ru>

③ Ю·西涅丽娜:“当代俄罗斯国民宗教性发展状况”,第9-10页、第23页。

④ 俄罗斯联邦法第125号《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1997年9月26日,参见 <http://base.garant.ru/171640/>

能够将他们牢固维系在一起的东西。于是，回归代表其文化与传统的东正教便成为一种很自然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正教追随者”可以认为是某种程度的“东正教文化信仰者”，或者“东正教文化归属者”。

结 论

多年的社会跟踪调查结果毫无疑问地显示了东正教在俄罗斯复兴与发展的强劲势头。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不排除有国家与社会内外诸多因素的作用，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东正教，它在当代俄罗斯的兴起多少能给我们一些其他方面的启示。

首先，透过东正教追随者不断增加的数据，在综合考察了俄罗斯国民东正教信仰状况之后便可以发现，东正教群体宗教生活的各项指标都不高，他们的宗教行为和宗教意识与纯粹的信徒还相距甚远，东正教与个人信仰、世界观、甚至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相关度都很小。因此，东正教的兴起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教的兴起，它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回归。这种文化回归与俄罗斯国民由于时代变迁而经历的心理意识、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再变化与再定位密切相关。

其次，从俄罗斯社会达到的一个“亲东正教共识”，可以感受到东正教文化在俄罗斯国民心中的地位及其牢固深厚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东正教可以让人们抛开信仰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歧，甚至是民族纷争而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俄罗斯人民。这对于因国家解体、社会转型而无所适从的人们显得尤为重要。正因为如此，它在俄罗斯国民自我认同的再确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在民族文化构成体系中，宗教可以说处于核心和灵魂的地位，民族与宗教密不可分。宗教不仅提供天启和格言性质的世界观，从而为个体生存提供意义支撑，它也可以为社会提供一种文化资源。由于宗教在民族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宗教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角色和历史使命。伴随着全球一体化，尤其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球文化扩张，民族国家的文化自觉意识愈加彰显，本土化呼声愈加高涨。民族的宗教文化意

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保留自身文化根基、抵御异质文明影响、侵蚀和同化的最后一块领地，是民族的象征和精神家园。从这个背景和意义上说，俄罗斯国民的东正教文化认同也是俄罗斯民族面对世界全球化的一种自卫和自我伸张，一种争取民族话语权的反映和诉求。

【Abstract】 For nearly 20 years, the Eastern Orthodox has been reviving and developing in all aspects. The number of Russians, who declared their belonging to Orthodox, is increasing.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has expanded rapidly. The social influences of Orthodox have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as well. Nevertheless, when exploring the Orthodox belief of Russians, we can find that the Orthodox followers and believers cannot express the same concept. The phenomenon reflects influences of the Orthodox on Russian national spirits, psychology, national and cultural self-identity.

【Key Words】Eastern Orthodox, Orthodox Followers, Orthodox Believers, Self-identity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течение последних 20 лет во всех сферах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заметно ощущается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Православия. Растёт количество людей, причисляющих себя в ряды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веры; РПЦ быстро расширяется; непрерывно укрепляется социа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Однако при изучении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исповед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ожно заметить, что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и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верующие отнюдь не относятся к одной и той же категории. За этим скрывается влияние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на дух, менталитет,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и культурную само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верующие, само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责任编辑 阎德学)

关乎身份认同：俄欧关系中的免签问题

文龙杰*

【内容提要】免签问题是俄欧对话中的重要议题，从2002年提出至今，已有十年时间。如今，俄欧在这一问题上陷入僵局，竟成了影响双边关系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免签对于俄欧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前景如何？借鉴符号学的分析范式，将“免签”视为能指，其所指为“可以自由出入欧洲资格”。从这一角度切入，可以发现，在关于这一问题的对话过程中，俄欧之间其实形成了一种“欧盟/审核者—俄罗斯/申请人”的关系。欧盟以“承诺”为手段，使俄罗斯不断向其所立的标准靠拢。由于在显性标准之外还有一套俄罗斯永远无法达到的隐性标准，因此，俄罗斯终究不会获得欧盟的免签——俄罗斯成不了欧盟心中的欧洲人。

【关键词】俄欧关系 俄欧免签 身份认同 移民问题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 05-0120(30)

免签问题是俄欧对话中的重要议题。^①签证制度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是

* 文龙杰，中国新闻社记者，国际政治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① 这方面的证据非常之多。例如，俄外交部此后曾公开称，“签证问题并非仅仅是关系到加里宁格勒地区的基本生活保障，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俄罗斯与扩员之后的欧盟之间的双边关系。” МИД РФ: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безвизового режим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вросоюзом. 22.07.2005. <http://www.mid.ru/bdcomp/sitemap.nsf/kartaflat/03>; 普京曾多次提到，实现俄欧免签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如В.Путин: Партнерство России и ЕС возможно лишь после отмены виз. 04.06.2012. <http://top.rbc.ru/politics/04/06/2012/653476.shtml>; 另外，自2003年起，俄欧历次峰会的议题中几乎都有免签问题。

一国控制和管理别国公民入境本国的措施和手段。若借用符号学的分析范式，可将“免签”视为能指，其所指为“可以自由出入欧洲的资格”。在俄欧对话的语境中^①，对于俄罗斯而言，这种资格代表着“欧洲人”这一身份。因此，与其说俄罗斯汲汲追求的是免签，倒不如直接点明，其念兹在兹的是欧洲身份。欧盟也将签证视为一种可以区分欧洲与非欧洲的标志。例如，一些欧盟国家提出，欧盟同俄罗斯实现免签，不会早于“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参与国^②。

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俄罗斯国内一片“西倾”气氛，“回归欧洲”作为俄罗斯的一种集体记忆再次被挖掘出来。俄罗斯处理免签问题的这一逻辑起点，实际上就注定了双方是在进行不平等对话：欧盟并不将俄罗斯视为平等的伙伴，而是“欧洲福利的申请人”^③。此后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可以说，俄欧关于免签问题的对话，实质上是一个“欧盟不断设立标准，俄罗斯则不断去达到这些标准”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承诺”是欧盟的一种关键性手段。承诺是指有决心、有责任、有义务去从事某项活动或不从事某项活动，或对未来行动进行约束。而且这样做是有目的性的。目的就在于影响别人的选择。通过影响别人对已作出承诺一方行为的预期，最终影响了别人的选择。^④欧盟正是通过“审核者”的身份对“申请人”许以承诺，以此影响俄罗斯的行为。

当俄罗斯国内“回归欧洲”的气氛冷却下来，俄国人逐渐认识到这一点时，欧盟通过承诺获得影响力的基础也就在被慢慢抽掉。俄罗斯不愿再像从前那样按照欧盟的要求去做。

俄罗斯不愿意在某些利益上让步，欧盟也不会轻易地降低它的标准。这当然是俄欧在免签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问题似乎并

① 这里需要格外注意，如俄欧这样将免签与身份联系在一起，并不普遍适用于国际关系中的其他双边关系。

② 指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在能否成为欧盟下一步扩员的对象这一问题上，这些国家比俄罗斯的可能性要大。

③ Сычугова Ю.А. Безвизовый диалог Россия-ЕС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12. No.7. С.132.

④ [美]托马斯·谢林著：《承诺的策略》，王永钦、薛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非这么简单。假如是这样，俄欧之间的免签问题也就与世界上其他双边关系中的免签问题并无二致了。须知，在理论上，俄罗斯和欧盟可以在技术层面上达成妥协；而在现实中，双方却一直在这些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放。如果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切入，就会发现，更为关键的问题其实在于，欧盟还有一套俄罗斯无法达到的隐性标准——欧盟不会将俄罗斯人视为欧洲人。因此，俄罗斯人没有资格在欧洲自由出入/所指，从而也就不可能获得免签/能指。

一、免签问题的缘起

首先提出免签的是俄罗斯。2002年8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盟成员国元首，信中大谈俄罗斯一贯有意深化与欧洲的相互协作，而且，俄欧在这一方面已经渐具战略伙伴的轮廓。目前的情况十分明显地显示，这一进程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俄罗斯与欧盟成员国之间实现公民的自由往来。最终使欧洲成为没有分界线的大陆，建成覆盖整个欧洲的统一经济、法律和人文空间。^①

普京向欧盟提出这一建议有两方面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加里宁格勒问题所迫；另一方面则是，当时俄欧关系发展良好，这使俄罗斯相信取消签证可行。

（一）加里宁格勒问题

从普京向欧盟提出免签的时间来看，这一举措明显与加里宁格勒问题因果相循。因为在随后的12月13日，欧盟在哥本哈根召开的首脑会议上，结束了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10个候选国的谈判，正式邀请它们在2004年5月加入欧盟。欧盟的东扩将危及加里宁格勒地区的基本生活保障。

加里宁格勒地区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俄罗斯的一块飞地，该地区与俄罗斯本土的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须过境立陶宛和波兰。然而，自1997年《申根

^① Сычугова Ю.А. Безвизовый диалог Россия-ЕС. С.122.

协议》纳入欧盟的框架后^①，凡加入《申根条约》的欧盟成员国将实行严格的边境检查制度^②。立陶宛和波兰加入欧盟和《申根条约》不过是早晚的问题。届时，加里宁格勒地区与俄罗斯本土的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在过境立陶宛和波兰时，将受到严格的审查和办理繁琐的手续。这势必会影响到加里宁格勒地区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进而影响到这块飞地与俄罗斯本土的关系。

俄欧之间如果取消签证，可使过境立陶宛和波兰的俄罗斯公民免受严格的检查和不办办理繁琐的手续，从而保障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本土的联系。

（二）误判

俄欧关系发展良好使俄罗斯对俄欧关系的性质产生误判。从冷战结束至 2002 年，俄罗斯无论是采取“亲西方政策”还是“多极化外交”，都将欧盟置于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出于对整个欧洲安全和稳定的考虑，欧盟也乐见一个民主、稳定的俄罗斯，因此积极地为俄罗斯的民主化和市场化进程提供支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俄欧关系发展顺利，双方于 1994 年签署了《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这一文件于 1997 年生效，为双边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至此，俄欧关系又上了一个台阶^③，政治互信不断提高，叶利钦于 90 年代后期提出的“大欧洲”思想^④在一些欧洲国家中引起了良好反响^⑤。

1999 年科索沃战争后，俄罗斯在维护欧洲安全中的角色顿显重要。欧

① 申根合作机制正式进入欧洲一体化领域肇始于 1997 年。其标志为，欧盟首脑会议于同年签订了《阿姆斯特丹条约》，将《申根协议》纳入其中。此后，申根协议国秘书处并欧盟秘书处、欧洲法院、欧洲议会、欧盟执行委员会等欧盟机构，开始正式介入移民领域的管理。参见朱虹：“欧盟移民政策的由来与未来”，《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 年第 4 期。

②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姜毅主编：《重振大国雄风：普京的外交战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182 页注释③。

③ 受 1998 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1999 年双边贸易额有所回落，但 2000 年即迅猛上升。

④ 关于“大欧洲”思想的详细论述，可参见[俄]鲍里斯·叶利钦著：《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曹缦西、张俊翔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年，第 168 页。

⑤ 这种反响主要来自德、法，尤其是德国。但若将俄德、俄法关系放到长时段的欧洲史中考察，则发现，彼此之间出于利益需要而暂时交好本是常态。但俄罗斯彼时融入欧洲的兴致正高，难免会过度解读德、法对其示好的潜在含义。

盟于随后的6月份通过了《欧盟与俄罗斯关系集体战略》。须格外注意的是，这是欧盟国家在《阿姆斯特丹条约》中确定的“集体战略”第一次用于欧盟以外的国家。此前一些欧洲国家对“大欧洲”思想的良好反响，和这次的“准欧洲待遇”使俄罗斯对俄欧关系产生了误判：以为融入欧洲指日可待。因此，普京向欧盟各国领导人提出解决加里宁格勒问题的建议是“直接取消签证，形成无分界线的统一欧洲”，而非什么其他权宜之计。今天，以“后见之明”来看普京当时的举动，不能不说俄罗斯方面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俄欧关系的水平和前景。10个年头已过，俄罗斯当时认为水到渠成的事情至今仍未如愿。

二、身份：“申请人”与“审核者”

（一）欧洲情结

俄罗斯人希望欧洲对其免签/能指，也就是希望获得在欧洲自由出入的资格/所指。从根本上讲，是希望获得欧洲身份。俄罗斯人平素就有“欧洲情结”，历史上曾多次提出“要做欧洲人”。显然，“要做欧洲人”的人自然不会成为欧洲人。

“社会思想本质上必然是一种记忆，它的全部内容仅由集体回忆或记忆构成。”^①诚然，过去的种种思想资源就像一个大仓库，而哪些资源会被拈出来再见天日，则是受当下情境所诱发。^②从苏联解体至问题发生之时，俄罗斯国内一派“西倾”气氛。先有叶利钦的“大欧洲”思想，后有普京的“融入欧洲”和与“欧洲实现一体化”^③。而免签是欧洲身份的符号。“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签证问题”马上触动了俄罗斯人内心的“欧洲情结”。

①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3页。

② 2011年3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在复旦大学以“执拗的低音”为主题做了一系列讲座，其间他与葛兆光教授进行了精彩的对话，笔者该处的论述即受此启发。网络上有讲座的相关视频和内容概要，笔者在此只列出一处以供参考：王汎森、葛兆光：“寻找‘执拗的低音’”，《东方早报》，2011年7月24日，<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7/24/634964.shtml>。后收入王汎森：《执拗的低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4年。

③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к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Полный текст). 06.05.2003. www.regnum.ru/news/819231.html

正因为如此，俄罗斯人在签证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格外的在意。

当时的俄罗斯杜马右翼政党“亚博卢集团”党魁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在2003年俄欧圣彼得堡峰会前一天发表了一篇题为《俄罗斯人也是欧洲人，俄欧没有一方可从签证制度中获益》的文章。俄罗斯人的心态在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此掇录几段以供分析：

“签证制度的实施，严重影响了我们（欧洲）各国公民之间的相互往来。在明日的峰会上，应该向西欧人提议共同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既存的签证制度严重阻碍了东西欧关系的发展。给人们造成了不便，人们对需要签证的国家形成了负面印象。”^①

在这里，这位亚夫林斯基在描述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时，使用的是“东西欧”，而非“俄欧”。可以看出，亚夫林斯基在潜意识里是将俄罗斯人看成欧洲（虽然是东欧）人的。^②

“申根签证使其持有者可以在欧盟的大部分国家来去无碍。然而，俄罗斯公民却始终没有成为这种便易的获得者，虽然，他们不过是希望顺利地去某个具体的欧洲国家度一次假。”^③

这句话不禁令人咋舌，申根区内部免签本就只应适用于申根区国家。俄罗斯理所当然不能受益。而亚夫林斯基却为此不平和委屈。之所以如此，仍是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将俄罗斯人定位为欧洲人。

“十分难以向俄罗斯公民解释：为什么他以前可以直接前往卡罗维

① Явлинский Г. Россияне-тоже европейцы: 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между Евросоюзом и Россией не выгоден ни одной из сторон // Известия. 29 мая 2003.

② 需要说明的是，文章《俄罗斯人也是欧洲人，俄欧没有一方可从签证制度中获益》的其余部分使用了“俄欧”。但通过上下文可看出，使用“俄欧”的情况是为了方便论述所做的技术处理，并不能反映作者的潜意识。

③ Явлинский Г. Россияне-тоже европейцы: 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发利^①和瓦尔纳^②休息，而现在却需要办理签证？在俄罗斯，20余万人有前往这些地方度假的传统，当他们被告知去往这些地方需要办理签证并要为此支付费用时，他们将会对此作出怎样的反应？”^③

“一些奉公守法的公民欲前往欧洲进行为期不长的停留，或者因公、或者因学、或者是为了度假。在欧洲期间，他们在物质上完全可以保障自己。然而，签证制度却使他们受到有损尊严的询问，为了证明自己的品质确系优良，需要填写大量文件，繁琐的申请流程使他们深感痛苦。”^④

“随着关于俄罗斯公民获取签证的规则和制度日益严格，人们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跑去领事机构，只求获得旅行的许可。他们必须为此遭受领事机构的屈辱性盘问，需要提交海量的文件材料以证明自己是奉公守法之身，以证明自己只不过是想去度假。而早先，这一切只需一张旅游证^⑤即可办到。”^⑥

亚夫林斯基的这段话十分耐人寻味。在办理签证时，领事人员询问相关信息，只不过是一种正常的公务程序，而在他看来却是“有损尊严的询问”、“屈辱性盘问”。而且，这种表达方式在亚夫林斯基这篇文章中多次出现。他何以会产生这种心态？下面所引录的一段文字有助于该问题的理解。

“最主要的是，只要存在着签证制度，俄罗斯就无法感觉到，自己是以完全意义上的欧洲人身份存在于欧洲。尽管俄罗斯在历史的长河中反复证明了，其选择是有利于欧洲文明的。但官僚的签证程序却阻碍了欧洲大陆的最终统一。作为一名俄罗斯人，总是被谁不断地提醒：他（俄

① 卡罗维发利是捷克西部波希米亚地区卡罗维发利州的一座温泉城市。19世纪，卡罗维发利就已名噪一时，国际名人尤好来此进行温泉治疗。

② 瓦尔纳位于黑海西岸，保加利亚第三大城市，是世界著名的海岸旅游城市。

③ Явлинский Г. Россияне-тоже европейцы: 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④ Там же.

⑤ 原苏联时期的一种旅游证件。

⑥ Явлинский Г. Россияне-тоже европейцы: 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罗斯人) 位居“二等”，不是最好的政治和业务合作伙伴。”^①

签证制度使俄罗斯人觉得自己是欧洲的二等公民，无法以完全意义上的欧洲人身份存在于欧洲。请注意，亚夫林斯基在此是将俄罗斯人视为欧洲人的，只不过是屈居二等的欧洲人。由此生出的自卑，使他格外敏感地看待具有区分我/他身份的签证制度，将正常的公务程序视为“屈辱性盘问”。尤其是原来与俄罗斯情况相类似的东欧国家将在欧洲获得免签待遇，更使俄罗斯将这种不认同夸大。

笔者之所以在此对亚氏的文章作繁复的引述分析，是想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来展现隐藏在签证问题背后的俄罗斯人的“欧洲情结”。这种“欧洲情结”在俄领导人和学者的言论中也有所体现，有关学者已对此作了丰富的分析^②，笔者不再续貂。

(二) 对话进程

俄罗斯试图加入欧洲的这种情结，使其与欧洲之间形成了一种“申请人—审核人”的关系。当欧盟国家显露出民粹主义倾向和政治右转趋势时^③，“俄罗斯人是欧洲福利申请者”的看法更为明显。这种关系使欧盟可以凭借对俄罗斯许以承诺，来影响俄罗斯的行为，使俄罗斯朝欧盟在边境管制、接受遭遣返的非法移民等问题上制定的标准努力。于是，俄欧关于免签问题一轮接一轮的谈判协商，就成了“欧盟确定标准——俄罗斯趋近标准——欧盟再确立标准——俄罗斯再趋近标准”的循环。当然，这是指整个对话的趋势而言，其间俄罗斯会对欧盟的要求有不满、抵制，但这属于双方在微观层面上的角力，本文的论述不涉及这一层面。

① Явлинский Г. Россияне-тоже европейцы: 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② 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姜毅主编：《重振大国雄风：普京的外交战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郑羽、柳丰华主编：《普京八年（外交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毕洪业：《俄罗斯与欧洲关系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中的相关章节。

③ 朱晓中研究员关于“中东欧国家入盟后在政治上民粹主义兴起和‘向右转’”有精彩的论述，参见朱晓中：“入盟后中东欧国家的发展困境”，《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4期。

1. 《俄欧简化签证和互相接收遭遣返非法移民协议》

普京在2002年8月提出免签一事的直接原因是加里宁格勒问题。在2002年11月的俄欧峰会上，双方就俄公民进出加里宁格勒过境未来欧盟成员国^①问题达成协议：自2013年7月起，向俄公民发放过境简化证件，但这与常规签证同时运行。事实上，这并未使俄公民进出加里宁格勒地区变得方便，甚至反而更为复杂：俄罗斯公民进入加里宁地区须办理两种准签证式的手续。^②这可以看做是俄欧双方为应对该问题的权宜之计。

这种折中当然无法解决问题。2003年2月28日，俄欧再次就免签问题进行对话。欧盟方面对普京的免签提议直截了当地回应道，“（俄欧双方）只有关于接收遭遣返非法移民机制达成协议之后，才能够认真地讨论有关免签问题的谈判事宜。”^③欧盟承诺“会与俄罗斯认真讨论有关免签问题的谈判事宜”，同时也开出了条件：俄罗斯与欧盟达成接收遭遣返非法移民协议。这是欧盟第一次在双方的免签对话中为俄罗斯制定标准。

2003年5月，俄欧圣彼得堡峰会将签证问题纳入了该峰会提出的俄欧“路线图”内。^④免签问题正式成为俄欧关系中的议题之一。同时，欧盟指出，免签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潜台词是，俄罗斯离欧盟的标准还有不小的差距。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5年5月9日的第15次俄欧峰会。在峰会上，双方介绍了简化签证制度和关于接收遭遣返非法移民机制的谈判进程，以及俄欧关于旅行免签协商的进展。^⑤

在这次峰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指出，“整个欧洲社会特别关注非法移民问题，俄罗斯应与欧盟携手解决这一问题。”“从欧盟方面来说，布鲁塞尔已经做好了与俄罗斯共同推进签证简化的准备。”^⑥话已说得十分清

① 波兰和立陶宛当时还没有加入欧盟。

② 一次是为了出境俄罗斯入境欧盟，一次是为了出境欧盟入境俄罗斯。

③ Светлана Б., Рагиани Н. Ну пустите же вы Дуньку в Европу! Россия борется за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с Евросоюзом // Известия. 28 февраля 2003.

④ Сычугова Ю. А. Безвизовый диалог Россия-ЕС. С.123-124.

⑤ Россия и ЕС согласовали "дорожные карты". 10.05.2005. www.lenta.ru/news/2005/05/10/roadmap/

⑥ Путин: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с ЕС возможен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решения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вопросов. 10.05.2005. www.lenta.ru/news/2005/05/10/visa/

楚：欧盟已经做好了准备，签证能否简化要看俄罗斯是否做好了准备——欧盟社会极为关注在非法移民问题上达到欧盟的标准。

而普京则对欧盟将简化签证手续与接收遭遣返非法移民捆绑在一起，颇有微词。他指出，在不破坏人权的前提下，俄罗斯会同欧盟共同解决接收遭遣返非法移民的有关问题。并提醒，强行将人们从此国迁往彼国，在本质上为现代人道主义法所禁止。俄罗斯方面希望能够先和布鲁塞尔方面谈妥针对部分人群——大学生、政治家、运动员、学者——的签证简化制度，此前，俄罗斯已经和个别欧盟国家有过此类实践。^①

但是，峰会结束后，俄总统普京表示，“俄欧之间实现免签证制度是‘最终目标’，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必须要完成一些必要的条件。”“俄罗斯自身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如果我们还没有同邻国之间解决边界问题，没有处理好与接收被遣返非法移民的相关问题，我们向我们的欧洲伙伴提出取消签证制度无异于多此一举。”^②普京的这番话简直是巴罗佐在峰会上那些话的延续。由此可见，这时的俄罗斯是在跟着欧盟定的调子起舞。

2005年8月31日，俄欧伦敦峰会前夕，俄罗斯已开始为签证问题积极造势。俄联邦驻欧共体总统代表弗拉基米尔·奇若夫宣称，俄欧伦敦峰会的中心议题之一是，俄欧之间简化签证制度和双方接收被遣返非法移民机制。因为，欧盟仍坚持其一贯立场，将这两个问题捆绑在一起处理。^③

2005年10月4日，俄欧峰会在伦敦召开。伦敦峰会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但双方就此前的一些遗留问题达成了共识。尤其是，俄罗斯放弃了自己在接受遣返移民问题上的强硬和难以解释的立场^④，如果第三国非法移民过境俄罗斯进入欧盟，俄罗斯同意承担遣送这些非法移民的费用。作为回应，双方同意简化入境欧盟的签证办理程序。这只适用于大学生、科学工作者、企业

① Россия и ЕС согласовали "дорожные карты".

② Путин: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с ЕС возможен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решения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вопросов.

③ На саммите Россия-ЕС в Лондоне Путин поднимет тему визового режима. 31.08.2005. www.lenta.ru/news/2005/08/31/summit/

④ 欧盟认为俄罗斯的立场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家、政治家和外交人员。^①

时任总统助理谢尔盖·亚斯特列任布斯基称,《俄欧简化签证和互相接收遭遣返非法移民协议》将在 2005 年底签署。专家们关于这些问题的实际上已经结束。俄联邦驻欧盟总统代表弗拉基米尔·奇若夫宣称,俄欧之间实际上已同意,无论是申根区还是整个欧盟,都对俄罗斯收取统一的签证费用,统一的签证费用约为 35 欧元。^②

2005 年 10 月 12 日,俄欧在卢森堡预签署《俄欧简化签证和接收遭遣返非法移民协议》。俄官员就此发表言论称,俄欧之间早晚会取消签证制度。例如,时任俄联邦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认为,“签证简化使人相信,在未来签证将会完全被取消。”^③普京向媒体谈及峰会的成果时,就取消签证可能性的问题说,“目前来说,(取消签证的)期限还尚难确定。但是,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欧盟领导人也认为免签是俄欧的共同目标。”^④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承诺俄欧之间将不会存在签证限制,这成了前述普京之言的互文,但其同样未言及取消签证限制的具体期限。^⑤

但是,俄国内也有为数不少的分析人士认为,这种乐观的估计似乎过早,从“协议签署”到“协议落实”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而且,协议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欧将在未来取消签证制度。因为,欧盟是否放宽对俄签证政策,要看俄罗斯是否做到了协议中规定的接收遭遣返的非法移民,而俄罗斯目前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俄国内有关人士批评道,俄用接收遭遣返非法移民换取欧盟放宽对俄签证政策,付出太多,得不偿失:

一方面,条约中的简化签证制度只是针对部分俄罗斯人,大部分俄罗斯公民并不能从这一签证简化协议中受益。享受简化签证的群体多为因公赴欧

① ЕС В ПРЕССЕ РОССИИ (Ежемесячный обзор)// Время новостей. 05.11.2005. www.vesper.ru/ru/euinpress.php?subaction=showfull&id=1131978720&archive=&start_from=&ucat=17&

② Там же.

③ Бульон из-под яиц: Москва заключила бессмысленн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с ЕС об упрощении визового режима.13.10.2005. www.newizv.ru/world/2005-10-13/33396-bulon-iz-pod-jaic.html

④ Там же.

⑤ Там же.

者，包括外交人员、卡车司机、学生、政治家、记者和学者。发放给他们的签证有效期限为3年或5年，而非1年。签证的办理时间不超过10天。但是，大部分欲前往欧洲的俄罗斯人，尚不能通过简化的程序获得签证。在近期，签证制度的放松将不会惠及旅游人士。^①

另一方面，欧盟在协议中就签证问题作出的大部分让步，实际上早已在俄罗斯和部分欧盟国家之间实行了^②。这就意味着，相比于俄罗斯为了落实该协议须在物质上大量付出，欧盟只是将其早先承担的义务略作扩大而已。因此，有专家质问，“俄罗斯到底从中赢得了什么？”^③

2006年5月25日，时任俄总统普京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索契峰会上正式签署了《俄欧简化签证和互相接收遭遣返非法移民协议》。2007年2月19日，除英国、爱尔兰、丹麦以外的其他欧盟国家通过了该协议。协议规定：非法移民的回国事宜，由其进入条约签署国前的离境国负责。即，凡是过境俄罗斯进入欧盟的非法移民，无论来自哪一个国家，按照协议都将被遣返回俄罗斯。这意味着，由俄罗斯负担这部分非法移民的安置。到这个时候，俄罗斯已完全愿意去完成欧盟先前所提出的标准。当然，这一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2. 《实现免签计划》

2007年4月19日，俄罗斯与欧盟在司法部长和内务部长层面，就免签问题进行了对话。双方在2007年5月的峰会上进一步讨论，共同制定了《实现免签计划》。计划涉及四个方面，欧盟在计划中再次为俄罗斯提出标准：

- 通过包括生物技术手段在内，确保证件的防伪性。
- 非法移民问题，包括接收遭遣返非法移民机制。俄罗斯务必同所有的欧盟国家都签署这一协议。
- 保障安全和法律合作，包括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和腐败。
- 对外关系。这一条指的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一方公民在对方领土

① Российским туристам не упростят въезд в Европу.13.10.2005. www.lenta.ru/news/2005/10/13/visas/

② 这些欧盟国家是，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

③ Бульон из-под яиц: Москва заключила бессмысленн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с ЕС...

上的行动自由须符合内部的规章制度。^①

2008 年俄格冲突爆发后，俄欧总体关系趋冷，受此影响，签证问题未见寸功。2009 年，在西班牙任欧盟主席国期间，为了使俄欧就移民问题的谈判进入快车道，俄罗斯方面建议成立新的工作机制。俄罗斯表示已准备好与欧盟 27 国代表就移民问题进行对话，并打算为此成立专门工作组。

2010 年 5 月 31 至 6 月 1 日，俄罗斯和欧盟在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州首府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举行峰会。在会上，莫斯科和布鲁塞尔都表示，应结束修改 2006 年俄欧简化签证发放程序协议的谈判。（这种表态通常只是一种外交辞令。）俄罗斯向欧盟提出了取消签证的协议草案。草案的主要内容有：

——欧盟公民可免签进入俄罗斯，与此对等，俄罗斯公民可免签进入欧盟的任一国家。

——当俄欧不希望某些人员入境时，双方均有权拒绝这些人员入境。

——当一方公民因正当理由滞留俄罗斯或欧洲境内时，可以免受制裁，并且不需要获得签证或获得所在国其他相关机构的许可，即可返回祖国。草案中并没有提及取消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所有限制。

——2006 年的协议中规定，只有外交护照持有者免签。俄罗斯提出的这一草案则规定有资格申请“五年多次签证”的人员有：合法居住在欧盟成员国境内的俄罗斯公民的近亲（反之欧盟公民亦然），俄罗斯地方政府人员和议会成员的近亲，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人员的近亲（反之欧盟亦然）。

——官方代表团成员，企业家，科学、文化和体育活动参与者及交流项目成员，记者，国际客，货运输司机在使用了为期一至两年的多次签证（根据 2006 年协议规定获得）并未违法的情况下，将能够获得最长期限为五年的多次签证。

——针对一些公民简化其签证申请流程。如果已经获得了短期签证并且没有违反逗留规则，那么该申请人在再次申请时，可以申请长期限的多次签证。此外，将免除未成年人（目前，面向六岁以下的儿童）和就医者（目前指有期就医）的领事费。

——此外，在新的免签制度下，俄联邦公民有权于半年内，在整个申根

^① Сычугова Ю.А. Безвизовый диалог Россия-ЕС. С.126.

区内居留不超过 3 个月。

俄罗斯外交部称，“俄罗斯方面已经完成了修改 2006 年协议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就可以将文件送给布鲁塞尔，欧盟的代表们应该研究文本并同意进行旨在通过文件的最后一轮谈判。希望能够在近期就签署，我们认为，五月份比较合适。”^① 欧盟外交人员也表示，“协议修正案可能很快就会生效，也许五月份还不行，但会在年内实现。”^② 从俄欧双方的言论来看，双方已就这些问题达成了共识，事情似乎已有眉目。

但实际上，签署文件尚存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俄罗斯坚持在文件文本中加入“公务护照持有者免签”的条款。而在莫斯科看来，这一问题关乎与欧盟进行对话的各部委和机关的工作人员，非常重要。“紧步外交护照持有者免签之后，免除持公务护照者签证成为签证制度简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俄罗斯外交人员乐观地认为，布鲁塞尔方面对于这一修正案的兴趣不会小于莫斯科，因为欧盟有 20,000 公务护照持有者，这其中包括欧盟委员会的公务人员，他们主导与俄罗斯就签证问题的谈判，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没有外交护照，因此不得不支持俄罗斯的提议。^③

据俄官方公布的数字，目前在俄公务护照持有者人数约为 15,000 人。但布鲁塞尔方面对此持怀疑态度，“在俄罗斯，获取公务护照较之外交护照要容易太多，尽管大部分欧盟国家其实也是这种情况。我们担心，俄罗斯的有关机构能否维持好此类证件的发放秩序”^④，以这样一个理由回绝了俄罗斯的要求。

对此，俄罗斯一方面表示，双方都有意进一步简化签证制度，这为解决俄欧在公务护照持有者免签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指出，如果情况最终走入死胡同，则须开列出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案。备选方案之一可能是，俄罗斯同个别欧洲国家单独签署公务护照持有者免签的双边协议。这种做法已有成例，比如俄罗斯与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签署了类似的

① Российские чиновники не заслужили Европы: Облегчению визового режима между РФ и ЕС мешают служебные паспорта. 28.03.2012. www.kommersant.ru/doc/1902460

② Там же.

③ Служебный вопрос. 31.10.2012. www.lenta.ru/articles/2012/10/31/visacheck/

④ Упрощение визового режим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затянулось из-за служебных паспортов. 28.03.2012. www.lenta.ru/news/2012/03/28/passapotes/

协议。“但这是不得已的方案，我们希望在整个欧盟层面和新条约框架下解决这一问题。”^①

此次峰会以后，俄罗斯还对现行俄罗斯移民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为外国专家及其亲属提供便利条件，这其中包括入境签证。其中的一项新措施是，简化外国专家及其家庭成员办理落地签的手续。^②在课征税费方面，外国专家享受俄罗斯公民待遇。^③从这里即可看出俄罗斯在免签问题上的积极态度。

2010年10月24日，欧盟在俄欧布鲁塞尔峰会上以内部没有形成“政治统一”为说辞，回复了俄罗斯提出的这一协议草案，同时向俄罗斯列出三个标准：第一，与所有申根国家签订《接收遣返非法移民协议》；第二，对出国护照的真伪加强检查，杜绝伪造出国证件的途径。推广使用具有生物识别信息的护照，在将来完全取代老式出国护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前述问题的解决；第三，加强边境线的防护和管制，尤其是东部和南部边界；第四，定期向国际刑警和欧洲刑警组织通报丢失的证件。^④欧盟不温不火的态度，让俄罗斯开始意识到免签或许只是个乌托邦。^⑤

2011年7月，莫斯科和布鲁塞尔就《实现免签计划》达成协议。不过，更要注意的是，欧盟的一些国家提出，只有在“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参与国的公民能够免签证进入欧洲时，欧盟才会同俄罗斯取消签证。至此，签证的区隔作用已是明白无疑了。

2011年11月7—8日，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来到德国，参加“北溪”管道的开通仪式。他先会见了德国总统斯蒂安·武尔夫，又会见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北溪”管道投入运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梅德韦杰夫宣称，签证制度是俄罗斯与德国合作道路上的障碍。“俄欧之间的签证是今日的过时之物，由于签证制度的存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至今尚未能建立起真正意

① Российские чиновники не заслужили Европы...

② Сычугова Ю.А. Безвизовый диалог Россия-ЕС. С. 130.

③ 更详细的内容可参见俄联邦2010年12月23日颁布的《关于修改俄联邦部分法令》N.385-ФЗ,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3 декабря 2010 г. N 385-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30.12.2009. www.akdi.ru/scripts/gosduma/smotri.php?z=745

④ Сычугова Ю.А. Безвизовый диалог Россия-ЕС. С. 129.

⑤ Там же. С.128.

义上的伙伴关系。”^①克里姆林宫援引梅德韦杰夫的话说，“我们在与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确立了‘路线图’之后，与其进行谈判，我们期望，这些国家不仅积极推进简化签证的进程，而且要致力于完全取消签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统一的欧洲，才能指望俄欧之间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伙伴。”梅德韦杰夫的讲话再次透露了，俄罗斯寻求与欧洲免签，旨在真正融入欧洲。

关于这一问题的佐证是，俄罗斯事实上已经与一些欧洲国家实行了免签，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行的免签制度已可以满足俄罗斯的需求。即便俄欧免签，俄罗斯在实际的便利程度上并没有十分明显的提高。所在意者，实为身份的认同。

2011年11月14-15日，俄欧布鲁塞尔峰会通过了《实现俄欧公民短期往来免签证共同行动》文件^②，列出了取消签证的必要措施清单，该清单脱胎于《实现免签计划》，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要涉及证件防伪，指出了引入符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③要求的生物识别护照的必要性。此外还规定，当护照遭窃、遗失或涉嫌伪造时，俄欧各方均有义务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供有关的情报和信息。

第二部分规定了，俄欧须联合打击非法移民以及与此有关的犯罪活动。

第三部分规定，俄罗斯和欧盟有义务联合打击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和贪污腐败，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安全，开展司法合作。

第四部分的主题为“对外联系”，保障俄罗斯和欧盟公民往来于俄欧之间的行动自由。^④

峰会之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就签证问题对媒体说，“免签证制度

① Президент Германии отказал Медведеву в безвизовом режиме. 08.11.2011. www.lenta.ru/news/2011/11/08/visa/

② 俄文为“Совместные шаги по переходу к безвизовому режиму краткосрочных поездок граждан РФ и ЕС”。

③ 国际民航组织的主要职能有：制订国际航空和安全标准，收集、审查、发布航空情报，防止不合理竞争造成经济浪费、增进飞行安全等，此外，还担任法庭的角色，解决成员国之间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争端。目前，该组织已逐步建立起了气象服务、交通管制、通讯、无线电信标台、组织搜索和营救等飞行安全所需设施模式。详细情况可参见该组织主页，<http://www.icao.int/Pages/default.aspx>

④ В.Путин: Партнерство России и ЕС возможно лишь после отмены виз. 04.06.2012. www.top.rbc.ru/politics/04/06/2012/653476.shtml

是俄欧双方的共同目标，但这在来年（2012 年）无法实现，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在现阶段，一些简化签证制度的进程只涉及记者和商务人员”。^①而俄罗斯方面则认为，同欧盟取消签证指日可待。俄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乐观地看待事态的发展进程：“我很想谈谈签证问题的进展。可以说，有关‘清单’的协议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争论了很长时间，彼此之间就一些问题不断地协商，最重要的是，我们达成了协议。俄欧双方的许多公民在俄欧边境的出入境手续得到了极大简化。”^②

如果说在该问题上取得了一点新进展，那就是，俄罗斯与欧盟达成协议，将向俄罗斯游客发放为期 5 年的超级版申根签证。相对以前在该问题上取得的进展，这是唯一一次具有实际意义的成果。事实上，双方仍只是原则上的同意，俄罗斯方面目前仍未从布鲁塞尔获知，这一协议生效的具体时间。^③

其实，欧盟的态度改变不大。就在布鲁塞尔峰会举行前不久的 10 月份，有议员向欧盟议会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取消从俄罗斯定期飞往申根地区国家的航班人员的签证。这位议员得到的答复是，俄欧免签证问题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④

3. “尚存技术问题”

2012 年 6 月，第 29 次俄欧峰会在圣彼得堡斯特列利纳镇举行。在会议的第二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指出，放宽限制双方公民往来于俄欧之间的政策，会为现阶段的俄欧关系注入可遇见的乐观因素。同时，他还强调，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还涉及经济和人文领域。俄欧双方合作的最坚实基础就在于俄欧双方人民的联系，在于他们在商业、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那些联合项目。俄总统还驳斥了认为俄欧互免签证将导致大量非法移民及犯罪分子

① Россия и ЕС обсудят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07.09.2012. www.snob.ru/selected/entry/52481

② Баррозу: Безвизового режим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в 2012 году не будет. 15.12.2011. www.rbcdaily.ru/2011/12/15/focus/562949982305149

③ 据俄联邦外交部全欧合作司司长沃龙科夫（Владимир Воронков）称，俄罗斯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获得这种签证。根据达成的协议，申请人首先须证明自己没有在申根区滞留超过一年的意愿。假如俄罗斯公民在欧盟境内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能够获得有效期为五年的签证。但是关于这一新的申根签证的发放程序何时生效，沃伦科夫并未言明。

④ Баррозу: Безвизового режим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в 2012 году не будет.

通过俄罗斯进入欧盟的说法。俄罗斯希望双方就《实现俄欧公民短期往来免签证共同行动》第一阶段的实施情况作一总结，这实际是质问欧盟为何在简化签证方面作为不大。欧盟方面的答复则是，欧盟将很快简化针对俄罗斯人的签证制度，但俄欧互免签证需要所有欧盟成员国同意，且俄方还需要解决一系列有关的技术问题。^①

面对欧盟“尚存在技术问题”的搪塞，普京明确表态，“签证问题解决之前，俄欧之间无法实现真正的合作”。^②此次峰会没有在签证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

鉴于欧盟的虚与委蛇，俄罗斯于2012年10月宣布，“对欧盟飞往俄罗斯的机组人员实行签证，2012年11月1日开始实行；与俄罗斯签订了免签协议的欧洲国家除外”。此后，俄又发表了声明，“为了给予欧盟机组人员办理签证的时间，实行签证的时间延至12月1日”。^③这无疑是俄罗斯在给欧盟施加压力，希望在年底的峰会上欧盟方面能有所让步。

然而，欧盟并不买账。在2012年12月的布鲁塞尔峰会上，欧盟一仍其旧地不同意俄罗斯“持公务护照者免签”的方案。普京说，“欧盟给予免签资格的国家有一个很长的名单，包括：委内瑞拉、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11月初，欧盟委员会又提议将5个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和10个太平洋国家列入这一名单。洋洋大观！其中40个国家远在欧盟国家千里之外。”然而，却没有俄罗斯。“与免签有关的所有技术问题都已解决，问题仅在于‘政治决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则情绪激昂地证明，免签问题并非一派萧索景象：“去年，欧盟为俄罗斯公民提供了526万张签证；部分公民——记者、商人、政府代表团成员、定期赴欧的大学生——将获得‘五年签证’；签证办理效率提高，距领事馆较远的公民3天之内即可获得签证；某些公民只需提交极少的文件……但是，无论如何，签证暂时还是需要的。”

① Приоткрытие границ. 26.07.2012. www.interfax-russia.ru/view.asp?id=331989

② В.Путин: Партнерство России и ЕС возможно лишь после отмены виз.

③ Экипажи регулярных авиарейсов из ЕС обязали получать визы в Россию. 26.10.2012. www.lenta.ru/news/2012/10/26/visas/

巴罗佐认为欧盟已经做得够多了。^①

就在此问题上，俄欧基本上陷入了各说各话的状态。俄罗斯提出该问题应在索契冬季奥运会（2014年2月7日至2月23日）举行前解决^②，而欧盟则反对人为地设置期限，主张须仔细完善2011年签订的《免签共同行动》；俄方呼吁欧盟勿将此事政治化，欧盟则说尚有许多技术问题有待解决。鉴于此，俄欧仍没有签署《针对部分人员简化签证协议》。这说明，目前俄欧已在签证问题上走入了死胡同。2013年的两次俄欧峰会都曾提到签证问题，但仍无实质进展。

2013年12月18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俄欧“免签共同进程”^③完成情况的首份报告。报告中对涉及俄欧免签制度四个关键问题进行了全面评价，这包括：（1）证件安全；（2）移民问题；（3）社会安全，包括打击腐败；（4）人自由迁徙的权利。总体上，欧盟委员会认为俄罗斯在落实“共同进程”方面取得了成果，已经完成了“共同进程”中的一些事项。但欧盟的报告仍然指出，俄罗斯仍须进一步开展工作，落实“共同进程”中的事项，以消除欧盟方面的不安。2014年1月17日，欧盟委员会与俄罗斯方面在俄欧合作常任理事会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一报告，寻求解决报告中指出的问题。欧盟委员会内部政策委员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说，“自俄欧开启免签对话以来，俄罗斯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使我们更加意识到这件事情涉及法制、自由和安全领域的一些情况。因此，我们能够告诉俄罗斯，还须在哪些领域进一步开展工作以完成‘共同进程’，直至出现进行免签谈判的可能性。”^④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洲委员会副主席凯瑟琳·阿什顿说，

① «Конец света» в Брюсселе не прошел даром для саммита Россия-ЕС. 21.12.2012. www.mk.ru/politics/article/2012/12/21/790931-konets-sveta-v-bryussele-ne-proshel-darom-dl-ya-sammita-rossiyaes.html

② 将期限定在索契冬奥会举行之时，是因为假如俄欧不免签，欧盟运动员在参加索契冬奥会时则须办理繁复的入境手续。

③ 2011年12月，俄欧就“免签共同进程”达成协议。

④ Первый доклад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о выполнении Россией "Совместных шагов по переходу к безвизовому режиму краткосрочных поездок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и и ЕС". 19.12.2013. www.eeas.europa.eu/delegations/russia/press_corner/all_news/news/2013/20131219_ru.htm

“欧盟与俄罗斯在‘共同进程’框架下，为最终实现签证制度的自由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希望，我们能够就这一问题继续努力。我希望，‘共同进程’中提出问题一旦解决，其中所提出的项目一旦落实，俄欧就签署关于短期免签制度的协议。”^①

报告指出，俄罗斯在落实“共同进程”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俄罗斯极大地改善了护照的安全性，使其符合国际标准。同时，对护照发放流程给予了好评。俄罗斯通过简化合法移民规则和限制非法移民完善了移民监管系统。俄罗斯还加强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达到了打击洗钱的国际标准。俄罗斯还采取措施减少了无国籍人员的数量。存在的问题和欧盟方面提出的建议包括：短期和长期居留俄罗斯规则复杂，条件繁杂；某些俄欧边境口岸的出入境办理时间过长；俄罗斯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间的协调合作机制太过单一，这极大地影响了办事效率；为与欧盟的刑警组织和欧盟司法机构进行合作，俄罗斯需提供相应的数据保护；缺乏打击贩卖人口的综合机制，无法保护受害者的利益；俄罗斯的人名变更太过自由；反腐措施力度不够。^②

尽管俄罗斯试图以索契冬奥会运动员免签事宜为突破口，实现俄欧之间的互免签证，但截至目前，事情都没有朝莫斯科方面预想的方向发展。2013年3月10日，欧盟负责简化与俄罗斯签证制度问题的主要谈判者、欧盟内部事务委员会总干事斯蒂凡诺·曼瑟维斯表示，欧盟委员会对欧盟与俄罗斯在2014年索契冬季奥运会前结束免签证谈判表示怀疑。他指出：“不应该在这方面操之过急，必须认真研究，因为如果出现某种纰漏的话，我们将承担草率决定的后果。”^③2014年3月6日，欧洲理事会就乌克兰危机召开特别峰会，决定暂停欧盟与俄罗斯互免签证谈判。

① Первый доклад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о выполнении Россией "Совместных шагов по переходу к безвизовому режиму краткосрочных поездок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и и ЕС"

② Там же.

③ “欧盟对与俄在索契冬奥会前结束免签证对话表示怀疑”，俄新网，2013.03.11，www.rusnews.cn/guojiyaowen/guoji_shizheng/20130311/43713201.html

三、欧盟的显性标准

(一) 边境问题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爱尔兰、荷兰、瑞典在俄欧免签问题上态度消极，因为这些国家深信，俄欧之间免除签证之后，欧洲一定会受到难民潮的冲击。事实上，俄罗斯的确不仅是欧洲非法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还是非法移民^①、跨国犯罪和毒品^②进入欧洲的主要陆上路线，而且俄罗斯在短时间内并无解决问题的良策。这是因为：

第一，俄罗斯拥有漫长而模糊的边境线，这使他国公民有更多的机会以可疑的身份入境俄罗斯，而这其中有为数不少的人试图借道俄罗斯前往欧洲。问题在于，无论受制于技术还是困窘于财力，俄罗斯在短期内都不可能在边境线上建立足够的出入境检查设施。

第二，就俄罗斯与独联体尤其是中亚国家之间松懈的边境检查而言^③，一方面，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相当大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解决这一问题既须与欧盟协调又须与独联体国家协调。假如俄罗斯按照欧盟的标准提高与这些国家的边境管制级别，则会对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一些关系造成消极影

① 根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0年6月21日报道，俄罗斯是进入西欧地区的两条重要通道之一。参见石刚：“全球非法移民问题综述”，《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第5期。关于这一问题，宋全成君也持相同看法，其在《欧洲移民研究：20世纪的欧洲移民进程与欧洲移民问题化》一书中提到：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偷渡路线基本上有陆、海、空三条。其中偷渡者的陆上路线为，先取道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后跨越“欧洲防线”的东部边境，最终进入西欧诸国。参见宋全成：《欧洲移民研究：20世纪的欧洲移民进程与欧洲移民问题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4-336页。可惜，这两位学者在谈及俄罗斯时只是一笔带过，并未多用笔墨。

② 近年来，每年都有数十吨海洛因从阿富汗过境中亚进入俄罗斯，以过境吉尔吉斯斯坦的运毒路线最为出名，该路线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运输渠道之一，被称为“北方之路”。这些从“南部方向”进入俄罗斯的毒品，除了用于“内部消费”还向其他地区扩散。俄罗斯之所以被贩毒者们列为主要目标市场，并成为一条从中亚到欧洲直至美洲的国际贩毒中转通道，便是由于其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边境监管因免签而相对松弛。不过，俄联邦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流通监管总局局长维克多·伊万诺夫指出，俄罗斯不是向欧洲运送毒品的中转国。相反，从欧洲向俄罗斯供应合成毒品。“俄缉毒局局长：每年约有30吨阿富汗毒品进入俄罗斯”，2012.11.11，<http://www.csstoday.net/Item/31276.aspx>

③ 欧盟在这一问题上不断诘难俄罗斯。但客观地讲，相较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俄罗斯与中亚地区的边境管制并非欧盟所认为的那样不堪。

响。^①例如，塔吉克斯坦赴俄劳工移民是俄塔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而影响劳工移民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俄塔之间的签证制度。

第三，确保证件的防伪性。这一点对于俄罗斯而言极为复杂，从 2011 年起，俄罗斯的所有第二代护照均具有可进行生物识别的功能，但俄罗斯公民有选择使用一代护照还是二代护照的权利。

（二）接收遭遣返非法移民问题

其一，遭遣返的非法移民，并非仅仅是俄罗斯公民，还涉及过境俄罗斯进入欧盟的第三国公民，这一规模对于俄罗斯而言并不小。因此，俄须为此投入巨额财政支出。

其二，在涉及第三国非法移民时，由于俄罗斯尚未与这些国家^②签订类似于俄欧之间的“接收协议”，那么，如何安置这些第三国非法移民？俄尚无应对该后续问题的措施。

目前，《接收遭遣返的非法移民协议》已经生效，俄罗斯已经与除英国和爱尔兰以外的 25 个欧盟国家签订了该协议。目前，俄罗斯已经签署了 17 个《接收遭遣返的非法移民协议》的实施协定。可以说，俄罗斯与欧盟就这一问题的相互协作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只不过，从纸面到落实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也是欧盟紧抓不放的口实。

① 据俄联邦移民局 10 月 28 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数据，截止到 2013 年 10 月 18 日，俄境内外国移民总计 11,280,975 人，其中有 5,129,578 人是来自中亚五国的公民，占到了将近半数。在俄移民较多的国家包括：乌兹别克斯坦（2,621,843 人），乌克兰（1,605,085 人），塔吉克斯坦（1,193,589 人），吉尔吉斯斯坦（671,716 人），阿塞拜疆（629,931 人），哈萨克斯坦（615,190 人），摩尔多瓦（561,155 人），亚美尼亚（492,278 人），白俄罗斯（377,617 人），德国（335,156 人）和土库曼斯坦（27,240 人）。除德国外，其他均为独联体国家。既由于历史上的联系，同时也出于地缘政治、外交和经济等方面的考虑，俄罗斯最大程度地简化独联体国家公民的入境手续办理流程——免签。这无疑为俄罗斯与独联体其他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交往，从而加深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稳固了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内的地缘存在。Сколько граждан республик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Обнародована свежая статистика ФМС. 22.10.2013. www.migrant.ferghana.ru/newslaw/сколько-граждан-республик-центральной.html

② 这些国家是中国、越南以及其他亚洲国家。

（三）俄罗斯的有关制度

第一，俄罗斯限制某些人员入境，这在其于 2011 年提交给欧盟的免签协议草案中有所体现。例如，柏林的非政府组织“德国—俄罗斯交流”代表克里斯蒂娜·斯莫利亚尼瓦伊特^①指出，她的立陶宛朋友在获得俄罗斯签证方面从未遇到过阻碍。但是，作为论坛协调委员会成员的英国公民卡梅隆·弗里扎^②却完全无法获得俄罗斯的签证；而克里斯蒂娜的爱沙尼亚同行叶甫盖尼·克里斯塔佛维奇^③飞到了普尔科沃机场，尽管他有签证，但却未能获准入境，因为他们被俄罗斯视为不受欢迎的人，他们未能参加 2012 年的圣彼得堡公民论坛。克里斯蒂娜认为，俄罗斯的行为很明显掺杂了某种政治的考虑。^④

第二，俄罗斯并非全境开放。“边界安全区”（погранзона）在欧盟国家是不存在的，而在俄罗斯却完全相反，这种针对公民个人的制度仍在实行。在欧盟看来，如果莫斯科想要严肃地进行免签谈判，它应该首先实现公民在国内迁移的自由化。既然这项准备还没做好，那就什么都不要讨论了。这一点，俄罗斯已经在其于 2011 年提交给欧盟的免签协议草案中放弃了。

第三，俄罗斯的公民素质。例如，欧洲人称，对俄执法机关的办事效率不敢恭维。在公务护照问题上也体现得比较明显。公务护照持有者是否免签，俄欧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僵持不下。俄罗斯称其“蓝色护照”^⑤持有者的数量约为 1.5 万，欧盟则认为有 5 万，比整个欧洲的此类护照持有者还多。^⑥这似乎是欧洲不愿意在“公务护照持有者免签”问题上松口的原因。事实上，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数量，而在于俄罗斯缺乏公务员文化。欧洲的官员只有在因公时才持有公务护照，度假时则持一般护照。但是俄罗斯的官员能否做到这一点，则令人生疑。

① 这个名字是笔者根据俄文 Кристина Смоляниновайге 译出，由于无法找到德文，这一音译或并不准确。

② 这个名字是笔者根据俄文 Кэмерон Фриза 译出，其英文表述不详。

③ 这个名字是笔者根据俄文 Евгений Кристафович 译出。

④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ЕС-Россия: Что изменилось за год? 11.10.2012. www.dw.de/dw/article/0,,16296414,00.html

⑤ 即俄罗斯的公务护照。

⑥ Хазов С. Везвизовый нажим // The New Times. 2012. No.40. С.12-13.

上述皆为欧盟摆在明面上的标准，其中的有些方面，俄罗斯已经在改善；有些方面，其效果的显现尚需时日。无论如何，俄罗斯的举措表明，其愿意朝欧盟所定下的标准努力。本文篇首已经讲到，这一切有赖于欧盟向俄罗斯许下了免签的承诺。当欧盟的承诺丝毫未见兑现时，再加上俄罗斯国内“回归欧洲”的气氛散去，俄罗斯开始思考是否有必要继续按照欧盟的标准去做——为此放弃自己的在某些领域的利益。

俄罗斯不再愿意在某些利益上让步，欧盟又不会轻易地降低它的标准。这当然是俄欧在免签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即便俄罗斯完全达到了欧盟的上述显性标准（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这都可以做得到），免签之事仍会是水中月镜中花。因为，欧盟还有一套俄罗斯无法达到的隐性标准。

四、欧盟的隐性标准

除了上述的显性标准之外，欧洲人还有一套隐性标准。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这套隐性标准，因为它涉及俄罗斯人是否被认为是欧洲人的问题。

签证作为一种主权象征，从符号学的角度，可以被看做是划清“本我”和“他者”的一道界限。^①“免签”这一能指，其所指为“可以自由出入欧洲的资格”。俄欧免签意味着欧盟对俄罗斯开放边界，作为“异质”的“他者”/俄罗斯因此获得了出入欧洲的资格。一旦欧盟在文化和理念上的同质性被破坏，从而产生认同危机，这势必会动摇欧盟的合法性根基^②。所以，无论是对于汲汲追求欧洲身份的俄罗斯而言，还是对于张起“文化和理念同质”大旗意图整合欧洲的欧盟而言，此处的免签/能指都利害非轻。以德国在免签问题上的立场为例：俄德一直交好，双边关系发展水平较高且比较稳

① 波兰前国防部长诺什指出，欧洲文明应该有一个界限，俄罗斯东正教与欧洲文明相距太远，俄罗斯文化是一种与西方文化对立的文化。这方面的代表言论可参见余南平主编：《欧盟一体化：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脚注①。

② 文化和理念上的欧洲认同，是欧盟赖以存在的根基。

定。甚至在 2003 年，俄罗斯和德国就签署了《俄罗斯政府和德国政府关于促进两国公民相互旅游的协议》^①。这一文件旨在促进青年交流、加强政府机构代表、商业人士及科学、文化、教育和体育人员之间的联系。但在签证问题上，德国却表现得甚为保守。德国人的态度是，无论双边关系如何亲近，德俄仍然是欧洲和非欧洲的关系。

对于欧盟中普遍存在的类似态度，俄罗斯人并非没有察觉。俄罗斯的一些外交人士在 2003 年就提醒，“切勿过高估计签署《接收遭遣返非法移民协议》的意义。决定免签一事成败的首要因素是俄欧双方的政治意愿。（俄罗斯）应该做好心理准备，以应付极端的情况。”^②这大概只说对了一半。确实，双方的政治意志是问题的关键，但更重要的还是欧盟的政治意愿。俄罗斯外交副部长弗拉基米尔·奇若夫的话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俄罗斯简直是希望明天就开始展开谈判，症结在于欧盟的政治意愿。”^③不过，欧盟的“政治意愿”受签署《接收遭遣返非法移民协议》这类事情的影响不大，而是由那套隐性标准决定的。

那么，这套隐性标准具体是什么呢？欧洲人似乎不曾说破。既然显性的标准并非决定性因素，而另一套具有最终判决意义的标准又隐而不显，也就难怪一些俄罗斯人会抱怨，“最糟糕的是，欧洲人其实并没有给出什么标准，这使我们根本没有明确的努力方向。”^④实际上，俄罗斯人不可能不清楚欧洲接纳俄罗斯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例如，2011 年 11 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来到德国，参加“北溪”管道的开通仪式。他会见了德国总统斯蒂安·武尔夫。在谈到签证问题时，武尔夫对此的回应是，奉劝不要期待在取消对俄签证问题上会很快取得进展。关于这一问题还有一些法律方面的事情有待解决。在新闻发布会上，武尔夫指出，在俄罗斯，集会和出版还没有充

① 俄文为“Соглашение межд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ФРГ об облегчении взаимных поездок граждан РФ и Германии”。

② Светлана Б., Ратиани Н. Ну пустите же вы Дуньку в Европу! Россия борется за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с Евросоюзом// Известия. 28 февраля 2003.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

分的自由，尚没有良好的投资环境。^①面对德方的诘难，梅德韦杰夫反驳道，“并非所有与欧盟免签的国家都敢夸口自己的民主状况和反腐败成绩”^②。

关于欧盟在免签问题上的立场，另一位政治人物带着一点埋怨情绪说道，“欧洲人固执地坚信，俄罗斯为国际犯罪团伙‘进攻欧洲’的桥头堡。出于对俄境内犯罪状况的恐惧，务必采取严格的入境限制。”^③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对俄国内确实存在的问题不以为然，而是认为欧盟或者是苛刻或者是头脑固执。由此可知，俄罗斯并非不知道欧洲人的隐性标准，而是不愿意面对，并且也无法达到这种标准。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因此，俄罗斯仅仅满足了欧盟提出的显性标准，而没有达到那套隐而不彰的标准，仍然不能算是欧洲的一份子，依旧无法获得那张自由出入的凭证。俄罗斯的明眼人或许也对这种情况有所感觉。欧盟的一名外交官在接受《新时代》周刊采访时说，俄罗斯的官员都明白，问题不可能很快获得解决。我询问俄罗斯联邦移民局的同行：“你们准备好明天就取消签证了吗？”他们大笑起来，回答我说：“当然了，没准备好。”^④

结 语

目前，莫斯科和布鲁塞尔在签证问题上已经就以下方面达成共识：扩大免签人员的范围，增加多次签证的发放数量，与此同时，简化再次申请签证的办理程序。阻碍俄欧双方达成免签协议的问题是：莫斯科坚持对公务护照持有者免签，而布鲁塞尔则以俄公务护照发放范围过宽为由表示反对。总体上，双方的对话陷入僵局。

个别欧洲国家已单独同俄罗斯签署了公务护照持有者免签的双边协议，包括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但俄罗斯需要的并不仅是免签的便利，更在意的是免签所代表的欧洲身份。因此，俄罗斯认为“同单个国家互免签

① Президент Германии отказал Медведеву в безвизовом режиме. 08.11.2011. www.lenta.ru/news/2011/11/08/visa/

② Президент Германии отказал Медведеву в безвизовом режиме.

③ Что мешает отмене виз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④ Хазов С. Везывозный нажим. С.15.

证”是不得已的方案,更愿意在整个欧盟层面和新条约框架下解决免签问题。

俄罗斯在该问题上态度积极。俄方认为,俄欧之间如果免签,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双方人员的交往,大量的俄罗斯游客会为欧盟带去不菲的收入,大大提高双边经贸水平,于欧盟有益。事实上,俄欧之间实行签证制度的确对欧盟有诸多不利,例如,繁琐的签证办理流程使俄罗斯和欧盟的高人、社会活动家、学者、大学生、中学生和游客,对那些需要签证的国家形成了非常负面的印象。俄欧之间实行签证制度后,向俄罗斯公民发放的过境签证预计将达到数十万张。每天须办理近 5,000 份签证。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相反,俄欧一旦免签,欧盟可从中获得更多旅游收入。根据俄罗斯驻欧盟及欧盟候选国领事机构提供的数据,这些国家前往俄罗斯的游客日益增加,其总数已超过前往这些国家的俄罗斯游客。即便在目前情况下,俄罗斯游客每年仍可为欧盟带来 180 亿欧元的旅游收入。^①

与俄罗斯相比,欧盟显得有些不温不火。欧盟有着自己的考虑:第一,假如欧盟对俄免签,会有大量的人员从俄涌入欧盟国家,根据欧盟推行申根签证的经验,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会对欧盟国家的安全带来消极影响;第二,欧盟一旦与俄罗斯免签,持有俄罗斯护照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居民,就可以先于格鲁吉亚人免签进入欧盟,这意味着欧盟在法理上承认了这两个地区的独立。

更关键的是,在欧盟的认知层面上也尚不具备对俄免签的条件。签证制度是对“本我”与“他者”的一种区别仪式,而“免签”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一种身份认同。欧盟各国免签是对欧洲“本我”的认同,在欧洲人的认知中,俄罗斯人从来都是“他者”,是一种异质。相近的文化之间更易互相影响,而相差较大的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则较小。^②俄罗斯和欧洲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却又相近,欧洲人担心俄罗斯会对欧洲本体造成冲击。“俄罗斯加入欧盟后,欧盟还会是欧盟吗?”就是这种担心的体现。这种担忧有其原因,目前

① «Конец света» в Брюсселе не прошел даром для саммита Россия-ЕС.21.12.2012. www.mk.ru/politics/article/2012/12/21/790931-konets-sveta-v-bryussele-ne-proshel-darom-dlya-sammita-rossiyaes.html

② 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远离欧盟的国家和地区却获得了免签资格,例如美国、中国台湾地区、委内瑞拉等。

的现实情况是，欧洲人仍没有做好从心理上接纳俄罗斯人的准备。^①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布鲁塞尔在签证问题上一拖再拖。

落实双方达成的协议和文件，在客观上需要一个过程，而且确实存在着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例如欧盟内部协调需时间，尤其是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后，欧盟诸国形成统一政策确非易事；一些欧洲国家将免签问题作为同俄罗斯讨价还价的砝码，在欧盟现阶段的决策机制下，这些国家的意见也的确可以影响解决问题的进程，等等。但这些都显然不是事情的根本所在。

纵观十年对话进程，假如说，事情伊始，俄罗斯由于心存幻想，对欧盟的标准亦步亦趋；那么，随着事态的发展，俄罗斯的态度则渐趋现实。“莫斯科方面非常气愤，因为他们相信，通往免签之路的重重障碍皆为有意的凭空虚造。……‘免签’不过是悬在毛驴眼前使其不断前行的胡萝卜^②，欧盟借此引诱俄罗斯按其意愿行事。”^③俄方态度的改变使其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一开始的顺从欧洲，变为讨价还价，又变为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逼迫欧洲。事情终于进入了死胡同。

拨开表象看本质，俄罗斯获取签证的过程，就是达到欧洲标准的过程。“免签的承诺”是欧盟悬在俄罗斯眼前的“胡萝卜”，利用俄罗斯对此的汲汲追求使其就范。但与其说是欧盟存心引诱，毋宁说是俄罗斯愿者上钩。

已经有一些俄罗斯人意识到，欧盟不会对俄罗斯免除签证。不过他们认为，欧盟这样做的唯一原因是，“‘免签’是欧盟在诸多问题上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的最后一着。”^④作为局外人来考察这一问题，我们或许能看得更明朗一些：俄罗斯无法达到欧洲的标准，也无法获得欧洲人的身份，欧盟也不会与其免签。俄罗斯人中的头脑清醒者大概早已对此有所洞察，只不过不愿面对。

① 诚然，欧盟已经与墨西哥、委内瑞拉、毛里求斯等其它“他者”实现了免签，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不可能对欧洲的“本我”认知和秩序造成消极影响，而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则让欧洲人心存虞虑。

② 这个胡萝卜就是欧盟抛出的“承诺”。

③ Хазов С. Везывозный нажим. С.15.

④ Там же.

【Abstract】 It has been 12 years since the visa-free entry, an important topic for Russia-Europe dialogue, was proposed. Currently, Russia and Europe are at a deadlock on this issue, which has become a major obstacle agains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What on earth does visa-free entry mean and what are the prospects? Based on the paradigm of semiotic, the “visa-free” issue is regarded as a signifier while the signified is “the qualification to enter Europe freely”.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can be found that during the dialogue on this issue, in fact, “moderator – applicant” relationship has been formed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 With “promises” as means, the EU enables Russia to move closer to its established standards. Because in addition to dominant standards, there also exist recessive ones, which Russia will never reach. As a result, Russia will not gain the visa-free entry to the EU in the end. After all, Russia cannot become Europeans in the mind of the EU.

【 Key Words 】 Russia-Europe Relations, Visa-free Entry, Identity, Immigration Issue

【Аннотация】 Вопрос безвизового режима — важная тема диалог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продолжающегося уже более 10 лет с 2002 г. и по сей день.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зашли в тупик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это стало основным препятствием на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Что же означает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для России и ЕС? Каков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этого вопроса? На основе парадигмы семио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как означающее, где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 «право на свободный въезд/выезд в/из Европы». С эт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ожно обнаружить, что в диалоге по данному вопросу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сь отношения «ЕС / рецензент — Россия / заявитель». ЕС использует «обещание» как меру действий, заставляя Россию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м стандартам. Однако вследствие того, что в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видимым стандартам, существует также набор скрытых критериев,

которых России никогда не достичь, Россия,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не достигнет безвизового режима с ЕС, Россия не станет настоящим европейцем в понимании ЕС.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опрос миграц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教育问题

试论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妇女教育改革*

朱川豫**

【内容提要】作为西方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推行的妇女教育改革开创了女性公共教育的先河。这一改革将培养西方化的妇女、以家庭教育来塑造文明的新一代臣民作为目标；通过将公共教育扩展到妇女群体，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结合本国的传统道德观灌输给贵族女性，不但开始了近代俄国妇女的文化启蒙，也加速了俄国贵族阶层的西方化和俄国的近代化进程。最终，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妇女教育改革提高了俄国妇女的家庭地位，推动了妇女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为十九世纪中期俄国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民主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叶卡捷琳娜二世 俄罗斯妇女教育 俄罗斯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D751.2; K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5-0150-(22)

十八世纪以前的俄国传统看法认为，女性是永远不会成熟的人，她们通常在家庭男性亲属的庇护下生活，结婚后则成为丈夫卑微的附属物。作为过去被忽视的人群，俄国妇女在十八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 1729-1796, 1762年即位)的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女皇为

* 本文系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高水平学术团队建设”(项目批准号:SKJ20100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章的问题与错误由作者负责。

** 朱川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专门史博士研究生。

满足西方化改革的需要，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有文化的俄国新女性和新臣民，以推动国家的西方化进程。因此，她在当政初期便发动了妇女教育改革，将公共教育扩展到妇女群体。改革不但塑造出了西方化的俄国贵族妇女阶层，使有文化的贵族女性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参与社会活动，也推动了整个俄国贵族阶层的西方化；同时，教育改革也开启了近代俄国妇女的文化启蒙，提升了妇女处理家庭事务的能力和妇女的家庭地位，推动了俄国家庭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关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教育改革问题的研究，国内的吴式颖^①、姜晓燕^②和王晓梅^③等学者在文著中均有论述，但对妇女教育改革问题的研究涉及尚浅，对改革的社会影响更少论及。由于“俄国贵族女子中学教育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贵族文化属性的表现之一，在十月革命时期则被认为是‘旧世界’文化的代表物”，^④因此相关研究在苏联和我国史学界长期被忽视。但事实上，女性教育并不仅仅是贵族文化的简单附属物。作为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要素，妇女教育还在俄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即以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妇女教育改革为研究对象，分析改革的具体思想和活动，讨论教育对近代俄国贵族妇女文化、生活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了解近代俄国贵族妇女文化、前妇女解放运动时期的女性生活状况和俄国早期家庭民主化的情况。

一、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前的俄国妇女教育状况

（一）十八世纪以前的妇女教育

① 吴式颖：《俄国教育史——从教育现代化视角所作的考察》，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② 姜晓燕：“试析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教育改革”，《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17）——外国教育政策与制度改革史研究》，2009年。

③ 王晓梅：“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宫廷文化教育”，《教育评论》，2011年第6期。

④ 参见 Белова А.В. История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 // Женское институт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Педагогика, 2002. №.9. С.77.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①，我们可以得知，女性教育在基辅罗斯时期就已存在。“罗斯受洗”后，基辅罗斯学习和吸收拜占庭先进文化，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大国。在学习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基辅罗斯统治者在贵族中推行教育，“在引进基督教后不久，弗拉基米尔^②就下令要对‘优秀人物’亦即本地贵族的子女进行‘文字教育’。”^③教育主要面向贵族和神职人员阶层，其中也包括妇女。

基辅罗斯时期的妇女教育通过两种途径进行，即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学校由王公贵族和教会创办，教授基督教教义、阅读、书写、算术等内容，如“11世纪末在基辅的一个女修道院曾设立了一所女学堂^④，教女孩们阅读、书写、唱歌和缝纫。13世纪在苏兹达尔也设立了一所女性学堂。”^⑤家境殷实的贵族女性除了学习基本的读、写知识外，还跟随家庭教师学习西方古典文学。她们中的一些人还达到了较高的文化程度，如切尔尼戈夫的公主叶夫罗西尼娅的传记就介绍说，她“‘未就学于雅典，然学得雅典人智慧’，说她掌握了‘哲学、修辞及全部文法’。”^⑥在基辅罗斯时期，“不仅在王公和扈从中间有有学识的人，而且在富裕的市民——商人、手工业者中间也有有学识的人”^⑦；而同时期的欧洲，在骑士中间很少有识字的人，神圣罗马帝国皇

① 关于女性教育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史书《往年纪事》，见王钺的《往年纪事译注》（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34-335页）：1086年“圣伊奥安担任都主教时，弗谢沃罗德奠定了圣安德烈教堂的基础，又在教堂附近建造修道院，他的女儿扬卡削发入院。扬卡召聚很多修道女，根据修道院的教规生活。”以后，经过学者研究和考证，这座女修道院就是一所女学堂。在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教育史》（李子卓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192页）中有相关记述：“在基辅，十一世纪末，在一个女僧院中曾设立了一所女学堂，约有300个女孩子在这里学习阅读、书写、唱歌和缝纫”。

② 弗拉基米尔（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约980-1015年在位）是基辅罗斯大公，988年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命令全体国民必须受洗。他在位期间，开创了基辅罗斯的黄金时代。

③ М.П. 泽齐娜，Л.В. 科什曼，В.С. 舒利金：《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苏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④ 这所女子学校与王钺的《往年纪事译注》和康斯坦丁诺夫的《教育史》中提到的修道院女子学校即为同一所学校。

⑤ 转引自吴式颖：《俄国教育史——从教育现代化视角所作的考察》，第55页。

⑥ М.П. 泽齐娜，Л.В. 科什曼，В.С. 舒利金：《俄罗斯文化史》，第24页。

⑦ 康斯坦丁诺夫主编：《教育史》，李子卓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193页。

帝康拉德二世（Konrad II，约 990-1039，1024 年即位）就是一个文盲。^①由此看来，在十到十三世纪，基辅罗斯的文化教育水平与西欧国家相比不仅并不落后，甚至更为先进。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教育主要面向社会上层，普及率不高，女子受教育比例低。

公元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鞑靼人的入侵中止了基辅罗斯的文明化进程。属通古斯语系的蒙古鞑靼人尚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与属印欧斯拉夫语系处于封建制社会阶段的罗斯人相比，文化明显落后。蒙古鞑靼人用粗鲁、残酷的方式征服了文化先进的基辅罗斯人，他们摧毁城镇，杀死或俘获罗斯居民，罗斯文明遭到毁灭性打击。曾作为推广识字教育、抄写和保存书籍的中心的修道院，在当时起了防御入侵的堡垒的作用，因而遭到了围攻、火焚和破坏，文化上有价值的东西都被破坏无余。^②基辅城在重创中几成废墟。

“这个城市曾经面积广阔，居民众多，然而现在一切都化为乌有：仅剩下 200 间房屋与苟活在最为残酷的奴隶制下的遗民。”^③

十五世纪末，当莫斯科公国摆脱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文化水平已大大落后于西欧各国，同时与西方接触的通道又被崛起的波兰和立陶宛阻断，失去了与西方直接接触、向西方学习的机会。十七世纪初，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俄国^④文化水平虽有所进步，但与西欧国家相比依然落后。此时的西欧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大运动的洗礼，启蒙运动在十七世纪初也开始兴起。在这一时期，西欧城市工商业发展迅速，世俗文化发展起来了。以初等教育为目标的城市学校和以高等教育为目标的大学，如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均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到十五世纪末全欧洲大学已增加到六十多所。”^⑤并且，世俗文化和科学成为大学里教授的科目，“大约到十四世纪，一般的大学都有文科、法学、医学和神学四个系。”^⑥

① 康斯坦丁诺夫主编：《教育史》，第 194 页。

② 同上，第 196 页。

③ 转引自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卿文辉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67 页。

④ 1547 年伊凡四世（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1530-1584 年，1533 年即位）成为第一位加冕成为沙皇的莫斯科大公，自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开始，莫斯科公国便被称为俄国了。

⑤ 王定华：《中外教育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年，第 302-303 页。

⑥ 同上，第 304 页。

十七世纪初的俄国没有西欧式大学，甚至连教授世俗文化知识的普通学校也没有。这一时期俄国的学校教育由教会控制，教授内容多以宗教神学知识为主。1687年建立的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是俄国第一所高等学校。虽然学院在课程设置中开设了外语、修辞、逻辑学和诗学等世俗学科，但神学知识在课程设置中占主要地位，“学院的宗旨是培养高级神职人员和国家公职人员”^①。十七世纪的家庭教育迫于经费问题并不普及，“富人家的女人和孩子们一般都是文盲，教师一般都是由教徒或政府委派的人来担任。”^② 妇女教育在这一时期处于被忽视的境地。

（二）彼得大帝时期的女性教育思想萌芽

彼得大帝（Пётр I Алексеевич，1672-1725，1682年即位）登基之初，俄国学校教育仍为教会所控制，主要教授宗教神学知识，教学内容脱离实际。这与彼得一世的改革要求相去甚远。彼得一世将教育简单地视为为国家服务的要素，但他所认为的国家服务并非简单的事业，而是需要达到很高的专业要求。^③彼得一世意识到，唯有世俗教育才能为国家改革培养急需的人才，因此非常重视教育改革。彼得大帝推行的教育改革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在国内培养人才，建立专业化的专门学校^④和以基础学习为主的算术学校^⑤；其二，国家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彼得一世提倡西方礼仪和风尚，他曾打算将教育改革扩展到女性群体以推进俄国的文明化进程。

十七世纪的俄国妇女被禁锢在家中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只有在去教堂或拜访女性亲友时才可以出门。外出时，她们着装严实，佩戴头巾和面纱以防被陌生男性看到面容。已婚妇女在家中绝对服从丈夫，如有过错，丈夫有

① T.C·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焦东建、董茉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25页。

② 同上，第124页。

③ Lindsey Hughes, *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99.

④ 专门学校是指政府开办的学习西方科技的专业技术学校，如数学与航海学校、矿业学校等。

⑤ 算术学校是政府开办的教授阅读、书写、计算等基础知识的学校。

权惩罚她们。^①彼得一世打破传统，“为了赋予宫廷以西方式风貌，他拆掉妇女闺房的‘墙围’，强迫她们脱离与世隔绝的状态，出席欧洲式舞会和参加公共社交活动。”^②他要求贵族的妻子和女儿们走出家的“牢笼”，学习西方礼仪并参与西方式的社交舞会。出席舞会时，贵族妇女被要求穿着西方服饰，并禁止佩戴面纱。

彼得一世利用一切可支配的资源来满足国家改革的需要，包括将家庭中母亲的职能加以利用以服务于改革。“他规定妇女最重要的责任是为人妻母，并赋予母亲责任新的含义。”^③新含义强调母亲在子女教育中的主动性，认为妇女是国家未来臣民的哺育者，应承担好教育孩子的责任。而这种主动性为以往的传统观念所忽视。由此一来，妇女受教育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了。

同时期的一些开明贵族同样意识到女性教育的重要性。曾任阿斯特拉罕总督的塔季谢夫（В.Н.Татищев，1686-1750）、贵族出身的造船师萨尔蒂科夫（Ф.С.Салтыков，?-1715）、国务和教会活动家普罗科波维奇（Ф.Прокопович，1681-1736）和彼得大帝本人，都提出过妇女教育提案。“1713年费多尔·萨尔蒂科夫提议建立女子学校，教授阅读、书写、法语、德语、针线活、舞蹈等科目，‘这样俄国女性就与欧洲女性’一样了。”^④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女性教育的提案。萨尔蒂科夫已经认识到，只有受过教育的女性才能为国家培养人才。但迫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提议没有能付诸实施。为了推行西欧生活方式，“彼得一世提议送贵族妇女去国外学习外语和社交礼仪”^⑤。但由于贵族妇女父母们的强烈反对，他只得放弃提议。鉴于女性教育提议多遭破产，彼得一世于1722年颁布法令：“文盲，尤其是无法写出姓名的贵族妇女，将不得结婚”^⑥，希望以此改善妇女识字状况。尽管女性教育改革在彼得大帝统治期间未能实现，但女性教育思想的萌芽已

① 参见 Barbara Alpern Engel,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6-7; 姚海：《俄罗斯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44页。

② Barbara Alpern Engel,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p.11.

③ Ibid, p.13.

④ 转引自 Barbara Alpern Engel,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p.13.

⑤ Ibid, p.11.

⑥ 转引自Рябова Н.Н. Эволюция жен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 XVIII-XIX веках. 25.03.2010. http://www.prosvetitelstvo.ru/docs/impiipd.php?ELEMENT_ID=954

经出现。

十八世纪上半期的妇女教育主要通过教会的女子神学校和贵族家庭教育来实现。神学校教授宗教教义等神学知识，脱离社会的实际需求；家庭教育教授世俗文化知识，但由于家庭教师水平的参差不齐，教学水平不高，教学目标也不明确。在家庭教育中，姑娘们的“大好时光全部用于学跳舞、行礼、请安和装腔作势方面；至于发展自己的智力和增长知识，她们根本用不着操心，”^①这种无目标的教育缺乏实用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使姑娘们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以至于俄国政府在1758年出台法令，规定“所有将担任家庭老师的人需通过彼得堡科学院和莫斯科大学的考查，以确定他们是否具有执教资格”^②，希望以此来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在十八世纪上半期，以上两种教育形式都无法达到彼得一世对妇女教育的期望目标。

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妇女教育状况

（一）“塑造新母亲”的教育思想

彼得一世去世后，俄国进入宫廷政变时期^③。尽管改革步伐放缓甚至停滞，但其所带来的变化却影响了俄国，反对妇女受教育的阻力减弱了，“一些开明的父母设法让女儿学习西方文化。那些接受了新观念的父母认为，社会文明需要妇女的参与，因此他们在家中雇佣外国女教师指导女儿学习。”^④十八世纪的俄国女学者达什科娃^⑤（Е.Р.Воронцова-Дашкова，1743-1810）公爵夫人就是通过家庭教育开始了启蒙学习。尽管受限于费用昂贵以及父母的开明程度，家庭教育依旧不普及，此外，如前文所述，教育水平依旧不高，但是贵族中对妇女教育的认可度增加了。

① 转引自 T.C·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第 202 页。

② 转引自 Isabel de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Catherine the Grea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90.

③ 宫廷政变时期指从 1725 年彼得一世去世到 1762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上台的 37 年时间。在这 37 年间，被认为充斥着宫廷阴谋，俄国皇位更替频繁，一共有六位君主登上皇位。

④ Barbara Alpern Engel,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p.15.

⑤ 达什科娃公爵夫人是 18 世纪中后期俄国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她被认为是欧洲第一位担任公职的女性，曾担任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并主持出版了六卷本的俄语词典。

叶卡捷琳娜二世上台后，恢复并推进了彼得一世的改革。同时，女皇强调西方思想对俄国改革的有益影响，使西欧启蒙思想大量传入俄国。十七世纪的英国教育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提倡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其作品在俄国得到重视。1760年，洛克的专著《教育思想》在俄国首次出版，1788年再次出版。在俄国上层精英和女皇的著作中，洛克的思想被广泛地引用。^①同时，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也在俄国大量流传。“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的著作在奥伦堡、喀山和西伯利亚贵族家中的藏书馆里都可以见到。”^②其中，卢梭强调道德教育。在西欧启蒙思想与俄国传统思想的融合下，女性教育改革思想发展成熟起来了。妇女教育改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期间成为现实。

叶卡捷琳娜二世被认为是彼得一世西方化改革的继承者。在妇女教育问题上，她继承并发展了彼得一世的妇女教育改革思想，并于上台之初就开始着手改革的相关事宜。1764年3月12日，经叶卡捷琳娜二世批准，由别茨科伊（И.И.Бецкой, 1704-1795）设计的《贵族青年与少女教育总纲要》颁布了。这个方案是俄国女性教育改革计划的基础，它“要求6—18岁的贵族女孩应该在专门的封闭学校接受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为‘塑造新母亲’，妇女教育改革于同年拉开序幕。”^③“塑造新母亲”的含义，是通过教育塑造有文化、有道德的新俄罗斯女性。作为未来的母亲，她们将培养文明的新一代国民以推动国家文明的进步。这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妇女教育改革的思想内涵，贯穿改革的始终。

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相信，可以通过教育创造出一个道德高尚、举止文明的民族。她希望以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从而推动国家改革。由于经费短缺，国家无法建立足够的公共学校，于是家庭教育被赋予了特殊职能。16世纪的《治家格言》认为：“家庭是一个组织，具有教化家庭成员和规范其行为的作用。家庭中妻子一面过着半隐匿的生活，一面处理家庭事

① Лабутина Т.Л. Екатерина II и жен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XVIII веке// Диалог со временем.2010. №.31. С.205.

② Там же. С.204-205.

③ 参见 Белова А.В. История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 С.78.

务。”^①教会的思想认为，妇女是家庭中的道德典范。“‘一个好女人’应该是谦逊而勤劳的，虔诚而贞洁的，全心全意地服务于她的家庭和孩子，顺从自己的丈夫。”^②传统观念对家庭作用的阐释和对妇女家庭角色的定位，是妇女教育改革思想的理论基础。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给立法委员会的指示中，“将父母的教育职责归结为自然法则，承认家庭教育占首要地位。她概述了一套教育方法，希冀用良好的榜样，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温和的品质等启蒙思想中的人文主义特性教育人。”^③女皇希望家庭教育可以分担国家西方化改革的任务。她试图将家庭置于国家等级制度之中，以家庭为小单位传播统一的思想，专制君主则被设想为整个国家的父母。在这个构想中，作为家庭道德典范的妇女是实现家庭社会职能的关键。女皇“将妇女道德水平的提升、社交常识和文化知识的增长，同她们的家庭联系在一起”^④。妇女的教育关系着家庭的文明，家庭的文明关系着社会的进步。如此一来，社会的进步同女性教育联系在了一起，受教育的妇女将承担哺育文明的新一代臣民的任务。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倡的妇女教育改革仅局限于社会中、上层女性，这在以后的改革活动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一些贵族和政府官员同样认为妇女教育具有塑造新国民、促进家庭和社会文明化的功能。潘宁(Н.И.Панин, 1718-1783)伯爵提到了女性在学校受教育的两个优势：一、对妇女们管理家庭经济状况和合理组织家务活动予以指导，将有益于家庭和社会；二、培养妇女良好的行为举止将有益于“改正严酷的旧习俗”。^⑤在西欧生活过多年的教育大臣别茨科伊，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倡导文明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俄国中、上层妇女。他认为，应“向父母灌输适宜的思想，再由他们将这些思想传递给子女，这种教育将创造个人的新秩序”^⑥。别茨科伊指出，忽视妇女教育将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因为母亲是

① Barbara Alpern Engel,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p.9.

② Ibid.

③ Carol S Nash, “Educating New Mothers: Women and Enlightenment in Russia”,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81, Vol.21, No.3, p.302.

④ Ibid, p.305.

⑤ 转引自 Carol S.Nash, “Educating New Mothers: Women and Enlightenment in Russia”, p.307.

⑥ Barbara Alpern Engel,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p.16.

孩子的道德教育者，她们的道德和修养决定着孩子们的未来，忽视女性教育将无益于年轻一代的成长。别茨科伊还提出了一个女性培养方案，以适应中、上阶层的价值观：“使女性变得温柔、勤劳和能干，她们将按照同样的方法养育自己的孩子，并以自己为例激励其他人。”^①他的部分设想在斯莫尔尼女子学院和儿童收养所以付诸实践。

在西方化改革带来的新思潮影响下，新的家庭观念在 18 世纪中后期形成。一些具有新思想的贵族否定了家庭中妇女应处于绝对从属地位的旧观念，他们反对无视爱情的旧式婚姻，提倡家庭生活需要温情和爱情，夫妻双方应互助互爱和承担对子女的教育责任。中等贵族博洛托夫(А.Т.Болотов, 1738-1833)就希望找到一个能与之“分享自己所有内心情感和生活中的一切快乐、交流自己的想法并得到安慰和建议的人”^②。由此看来，只有受过教育的女性才可能满足博洛托夫与之交流思想、共同教育子女的要求。在上层社会中，“未婚妻的教育水平被未来婆婆看作一个评判标准……在一些家庭中，妇女受教育水平这个因素受到未来丈夫及其亲戚的关注。”^③可见，妇女教育被认为是家庭新生活不可缺少的要素。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与出版家诺维科夫(И.И.Новиков, 1744-1818)认为，知识产生美德，这种美德有助于妇女对孩子的教育，也有助于夫妻之间有益的思想交流，从而将夫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④

(二) 妇女教育改革的实践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妇女教育改革活动，包括建立以斯莫尔尼女子学院为模式的贵族女子中学，在所建立的儿童收养所和国民学校中推行女孩教育，将私人寄宿制学校纳入国家管理体制中。

1764 年 5 月 5 日斯莫尔尼女子学院的开办，不仅标志着叶卡捷琳娜二

① 转引自 Carol S.Nash, “Educating New Mothers: Women and Enlightenment in Russia”, p.307.

②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60 页。

③ Белова А.В. История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С.82.

④ 参见 Carol S.Nash, “Educating New Mothers: Women and Enlightenment in Russia”, p.304.

世妇女教育改革的开始，而且还被认为是近代俄国贵族女子中学教育的开端。学院一开始只面向贵族阶层的女孩，一年后又开办了招收市民女孩的平民班。学院开办的第一年就有 200 名 6—18 岁的贵族女孩入学，开办期间人数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过 480 人。“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有 1,316 名贵族和市民阶层的女孩在斯莫尔尼女子学院学习过，有 850 人完成了学业：其中 440 人来自贵族阶层，410 人来自市民阶层。”^①

斯莫尔尼女子学院的目标是培养理智稳重、品行端正、行为得体、道德高尚、不矫揉做作、具有一切美德的女性。^②在学校，学生接受西方世俗文化和东正教伦理道德教育，学校希望以此改善那些粗俗的贵族家庭，培养贵族男子理想伴侣和贵族子弟细心、合格的母亲。作为未来的母亲，女子学院的毕业生们将教育国家的新一代服役阶层。^③叶卡捷琳娜二世向学院院长强调了毕业生对后代的教育职责，“院长必须时刻关注对贵族的保障，国家事务参与者的命运将取决她对良好秩序的关注”^④。

学院实行封闭寄宿制管理。为使女孩免受社会和家庭不良风气的影响，学生往往在很小的年龄就入学，并在封闭的环境中学习。学校规定父母不得在孩子受教育期间将她们带离学校，“亲属的探望只能在学校中进行，并且有严格的规定：会面过程中必须要有在学院任职的女士在场。”^⑤

学院还实行分班授课，课程设置上包含了西方与本国的文化知识。根据别茨科伊的建议，按照年龄将学生分成四个班级，设置不同的课程：“第一班（6—9 岁），学习两种外语、俄语、算术、图画、舞蹈、音乐和手工；第二班（9—12 岁），除了以上学科增设地理和历史课程；第三班（12—15 岁），开设语文、科学和建筑及徽纹学入门；第四班（16—18 岁），学生必须掌握相关法律的精确知识，良好教育、优良品行、社交和礼节的所有规则。”^⑥这种培养方法不同于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的贵族家庭教育。按年龄分班，循序渐

① Рябова Н.Н. Эволюция жен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 XVIII-XIX веках.

② 参见 Белова А.В. История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 С.80.

③ Barbara Alpern Engel,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p.16.

④ 转引自 Carol S.Nash, “Educating New Mothers: Women and Enlightenment in Russia”, p.307.

⑤ Белова А.В. История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 С.78.

⑥ 吴式颖：《俄国教育史——从教育现代化视角所作的考察》，第 178—179 页。

进地增加课程难度，充分考虑了孩子的接受能力，体现了学校培养方法的科学性。此外，针对女孩未来的教育者角色，学院也设置了相应的培养措施，“年龄最大的女孩们参与辅导第一班年幼女孩的学习，因为学院认为她们从这个实践中能够提前培养出以后作为母亲教育孩子的能力。这样，无论以后在后代教育中遇到什么问题，她们都能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法”^①。

除常规课程外，学院也重视道德教育：所有班级都设置宗教课程和道德课程，并且宗教课程在课程设置中居首要地位。尽管教会改革削弱了东正教会在教育领域的控制力，但教会中对女性“性情温顺”、“纯贞善良”、“品行端正”的提倡，仍为社会民众广为接受。女孩们在早晨上课前和晚上睡觉前都必须进行祈祷。“所有学生不分年龄都应在早晨同一时间起床，甚至早到早上六点。这么早就起床做祈祷，使女孩们从童年时起就习惯了始终不变的作息习惯，虔诚的宗教观念被灌输到她们心中。”^②而这明显是符合教会要求的“品行端正”。

学院还根据学生的天赋和能力将其分类，制定相应的方案加以培养。根据别茨科伊的建议，女子学院按照学生自身的天赋把学生分成三大类：“第一类：科研天赋和艺术天赋较为突出的学生；第二类：手工艺天赋比较明显的学生（这样的学生人数很多）；第三类：只能从事最简单工作的学生。”^③这样，根据学生素质制定相应的培养方案，发挥学生的特长，有助于将其培养成才，体现出学院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通过明确的培养目标、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科学的教学方法，斯莫尔尼女子学院在女性文化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毕业生们都掌握了阅读和翻译书籍的技能，掌握了教育下一代的本领，营造和培植园林的技术。她们还为农民做了许多好事，经常为他们治病，给他们的孩子们上课。”^④斯莫尔尼女子学院成为俄国女性公共教育的典范。“在斯莫尔尼女子学院建立后的一些年里，在俄国主要城镇按照这一模式开办了约 20 所女性公共学校。”^⑤

① Белова А.В. История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С.81-82.

② Там же.С.80.

③ Т.С·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第 242 页。

④ 同上。

⑤ 转引自 Barbara Alpern Engel,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p.17.

根据别茨科伊的建议，叶卡捷琳娜二世还在 1764 年建立了收养孤儿的莫斯科儿童收养所。别茨科伊希望这里的孤儿日后成为市民阶层的组成部分，因此收养所不仅照顾孤儿，还教育所有孤儿。“主要教儿童学习劳动技能（如教男孩子学习耕耘和园艺，教女孩子学习烹饪和制作面包，等等），并予以适当的文化教育，以使他们日后成为具有生存技能的自由民。”^① 女孩学习的技能多属家庭领域，符合女性的性别角色定位。对于孩子们的未来，别茨科伊也有所考虑，“这些孩子们都将在这里学到一两门技能，优秀的学生还将被送往莫斯科大学或美术研究院学习；女孩子结婚时候，可以得到 25 卢布的嫁妆；成年的孩子离开时将得到 1 卢布。”^② 当时还规定，凡与收容所的孩子结婚的农奴都可以获得自由。^③ 在实施农奴制的俄国，这个规定实属难得。其后在彼得堡和俄国其他城市也建立了类似莫斯科儿童收养所的机构，虽然由于经费不足、条件恶劣以及儿童死亡率居高不下等原因，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Павлович，1796-1855，1825 年即位）于 1828 年下令停办此类机构，但其存在期间至少为部分孤儿提供了谋生的门路。

1786 年，《国民学校教育章程》颁布，这是俄国首次对国民教育立法。根据该章程，叶卡捷琳娜二世确立了开办国民学校的计划：在省城建立学制为五年的国民中学，在县城和城镇开办学制为两年的初级国民学校，女童可以到国民学校就学，但只针对贵族、商人和城市平民子女，农奴子女被排除在外。“1786 年，国家在省城兴办了 26 所先进的中心学校，1788 年又开办了 14 所。政府还在中小城市兴办小学，1787 年就开办了 169 所，共有 11,000 多名学生，18 世纪末就增加到 315 所，共有两万多名学生。”^④ 然而，国民学校的女性入学比率并不乐观，因为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男女同校学习是很不体面的事。^⑤ 在这两万多名学生中，女生占不到十分之一^⑥。

《国民学校教育章程》涉及了与教育相关的机构。在章程颁布前后的一

① 吴式颖：《俄国教育史——从教育现代化视角所作的考察》，第 179 页。

② Isabel de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Catherine the Great*, p.492.

③ T.C·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第 241 页。

④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 270 页。

⑤ 吴式颖：《俄国教育史——从教育现代化视角所作的考察》，第 179 页。

⑥ 比例推算自“到 1800 年，学校数量已经增加到 315 所，教师 790 名，学生 19,915 名，其中男生 18,128 名、女生 1,787 名。”参见：T. C. 格奥尔吉耶娃，第 240 页。

段时期里，私立寄宿制学校被置于国民学校筹建委员会的统一管理之下。

“1784年，彼得堡已有私立寄宿学校22所，中学4所；莫斯科有私立寄宿学校10所。这两个城市的在校学生人数情况是这样的：彼得堡的在校学生总数为500人（其中100名女生），莫斯科的在校学生总数为370人（其中包括65名女生）。这些学校所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外语、神学、俄语、算术。”^①。但私立学校费用昂贵，且整体教师水平不高，在1784年国民学校筹建委员会发起的检查中，一些师资力量薄弱的私人寄宿学校被关闭，其他学校也被置于委员会的管理之下^②。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俄国的公共教育体系初步形成。与以往相比，贵族妇女的识字人数上升明显。“据当代学者米切尔·马雷塞（Michelle Marrese）估计：在18世纪中期只有少部分（26人中只有4人）外省贵族妇女能阅读和书写，四分之一世纪过后，这个比例接近到一半。此后，随着妇女识字率的明显提升，到19世纪初始，大约已有92%的外省贵族妇女识字。”^③与过去相比，妇女教育的覆盖面从社会上等阶层扩展到中等阶层，市民子女受教育的可能性增加了。但是，农奴子女仍然被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这种教育的倾向性直到农奴制改革后才有所改变。不过，妇女教育改革的影响在俄国教育史中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斯莫尔尼女子学院为代表的一批贵族女子中学的建立，改变了以往俄国缺乏女性中等教育学校的局面。斯莫尔尼女子学院教育目标明确、教学内容涵盖文化与实用知识且方法较以往更为科学，培养了文化与道德兼具的俄国新女性。此外，改革后的初、中等国民教育学校招收适龄的男、女童入校，政府为男、女童提供了相对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妇女公共教育，在开始俄国女性的文化启蒙、将妇女纳入国家的近代化改革进程、促进俄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① T.C·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第238页。

② Isabel de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Catherine the Great*, p.496.

③ 转引自 Barbara Alpern Engel,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p.32.

三、叶卡捷琳娜二世妇女教育改革的影响

（一）妇女教育改革的积极影响

妇女教育改革是俄国贵族女性文化启蒙的开端，也推动了俄国贵族的西方化。同时，教育使贵族妇女在管理家庭事务方面日趋合理，妇女的家庭地位得到提高。教育也激发了妇女在文学领域的探索兴趣，十八世纪晚期妇女文学作品首次得到出版。知识使女性走入社会公共领域，妇女的职业化成为可能。

首先，教育改革提升了妇女处理家庭事务的能力，并促进了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女子贵族中学培养出了具有虔诚宗教信仰和世俗文化知识的新女性。在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当人们谈到斯莫尔尼女子学院的毕业生时，经常提到的是她们固有的处事方式——这些女孩掌握了适应家庭事务需要的知识、学问和手工技术。^①受过教育的女性能够在家庭中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为妻子，与丈夫沟通和互相尊重；作为母亲，教育子女和组织好家庭生活。一般情况下，“贵族女孩主要由母亲抚养和教育，男孩在七岁以前同样由母亲抚养，以后将转由父亲教育他。”^②在近代俄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教育的积极作用表现了出来。“19世纪中叶，母亲的作用更加突出：她们鼓励女儿放弃仅限于家庭关系的传统妇女角色，提高女儿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兴趣，培养女儿的个性和独立性。母亲教育的成效在10-20年后显现出来：数十个特权等级女性参加了俄国革命运动。”^③

家庭事务还包括对家庭的经济收支或财产事务的处理。在处理这类事务时，女主人往往需要突破家庭界限与公共机构或是其他有产者打交道，而知识的增长提高了贵族妇女管理家族财产和处理经济事务的能力。1731年长子继承法被废除，妇女获得继承遗产（包括地产）的权利，并有权处理自己的财产。1753年，政府颁布法令赋予已婚妇女自主管理财产的权力，并可不经丈夫允许处理财产。法律赋予了妇女管理和处理家庭财产的权利。如果

① 转引自 Белова А.В. История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 С.81.

② Walter G Moss, *A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 To 1917*, London: Wimbledon Publish Company, 2002, p.307.

③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第262页。

缺少教育，那么妇女将没有能力妥善地管理财产。女贵族娜塔莉亚·格罗特（Н.Грот, 1828-1899）的母亲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家庭事务管理者，她总能帮助丈夫将家庭账目处理得井井有条^①。很明显，只有接受过一定的教育，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 19 世纪 20 年代末，理想的家庭生活被认为是构成外省贵族生活基础的要素。理想的家庭生活表现为，在夫妻间、父母与子女间建立平等的关系，家庭中妇女的地位得到提升。这种理想的家庭生活是以后俄国家庭民主化进程的起点。我们从一些妇女的书信中可以发现夫妻地位平等化的趋向。彼得一世时期的妇女在给丈夫的信中强调自己的从属地位，玛丽亚·基列耶夫斯卡娅（М.Киреевская, 1811-1859）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致我的老爷伊万·伊万诺维奇……愿我的主宰者伊万·伊万诺维奇健康永远，请您——我的主宰者写信告诉我您的健康情况。”^②到 19 世纪初，对丈夫充满爱意的称呼代替了敬畏的称呼。“一位妻子在 1812 年的家书中对丈夫的称谓是‘我亲爱的、珍贵的朋友’，她的自称则是‘你永远的朋友，阿努什卡’。还有其他一些妇女在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的书信中称自己的配偶为‘我最亲爱的珍宝’，‘我亲爱的朋友’，‘我快乐的伴侣’等。”^③尽管虐待妻子的现象在一些贵族家庭依然存在，不过，妇女已开始就不公正的待遇提出抗议。1828 年，库舍夫将军（Кушев, 生卒不详）被妻子控诉使用家庭暴力。对此，他认为打妻子是自己权力，没有人有权阻止他，库舍夫夫人则表示，她作为孩子母亲应有尊严，应在家中被合理对待。^④

其次，教育激发了妇女对知识的兴趣，她们开始尝试文创作学作品。在 18 世纪末，一些女性的作品还得以出版。谈到女性对知识的追求，就不能不提到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达什科娃公爵夫人。她在任职俄罗斯科学院院长时主持编撰了六卷本的辞典，对确定俄语的拼写规则和语法规则有积极作用。不过达什科娃公爵夫人的成功在当时实属特例，因为那时的社会风气并

① 参见 Barbara Alpern Engel,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p.36.

② Barbara Evans Clements, *A History of Russia: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81.

③ 转引自 Barbara Alpern Engel,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p.33.

④ *Ibid*, p.34.

不认可女性从事学术研究，更多妇女对知识的兴趣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从而颠覆了妇女没有能力通过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只能由男性作家来表达她们心声的旧观念^①。在她们尝试创作的初期，作品主题多与女性的道德教育角色有关。以后，她们开始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心声，回忆录是主要形式。安娜·拉布津娜（А.Лабзина，1758-1821）的个人回忆录，通过对往事的回忆，表达自己对周围人物和社会的看法。叶卡捷琳娜·乌鲁索娃（Е.Урусова，1747-1816 以后）通过作品表达女性在文化启蒙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她捍卫了‘女性追求文化的权利’，表达了“自己对俄国文化的爱”，同时也暗示了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②

随着受教育女性的增加，女性读者群体扩大了，部分知识女性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诗歌是主要的表现形式。在作家卡拉姆津（Н.М.Карамзин，1766-1826）和出版家诺维科夫的资助下，一些女作家的作品得以出版，如叶里扎维塔·赫拉斯科娃（Е.Хераскова，1737-1809 年）、叶卡捷琳娜·乌鲁索娃、叶卡捷琳娜·斯温因娜（Е.Свиньина，1778 或 1779-1841）和亚历山德拉·马格尼茨卡娅（А.Магнитская，1784-1846）的作品^③。不过，能出版作品的女性人数很少，她们的作品在出版物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也微乎其微，但与 18 世纪初没有女作家作品出版的空白局面相比，已然是很大的进步。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妇女写作多是为了兴趣而非谋生手段，职业女作家尚未出现。

女性关注和参与文学，促进了俄国文学语言和表达方式的感性化与文雅化，18 世纪晚期感伤主义文学风格的兴起就受此影响。“感伤主义文学推动了这样一个观念，即女性作为‘感情的抒发机器’和‘道德的模范’，成为促成文学语言女性化的因素。”^④除了当时作家的文辞语言和写作风格受此影响外，他们的创作主题也开始关注到女性，女性成了一些作品的主人公。在感伤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卡拉姆津的小说《可怜的丽莎》中，就以细腻的文笔

① 转引自 Wendy Rosslyn, *Making Their Way into Print: Poems by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Women*,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2000, Vol.78, No.3, p.408.

② 转引自 Barbara Alpern Engel,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p.20.

③ Wendy Rosslyn, “Making Their Way into Print: Poems by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Women”, p.413.

④ Barbara Alpern Engel,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p.19.

叙述了丽莎这个可怜姑娘不幸的爱情故事。

最后，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教育对女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妇女走上职业化道路的影响。19 世纪初叶，俄国贵族妇女进入公共社交场合，并积极融入社会公共事务中。她们崇尚西方贵族妇女的生活方式，穿着西式衣裙，按照西欧流行风尚打扮自己；她们在社交舞会上用法语交流，参与并主持文化沙龙，就文学等问题发表自己看法。自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中期，很多贵族妇女在首都和其他主要城市建立了文化沙龙。“在 18 世纪 90 年代，女贵族瓦尔瓦拉·尤什科娃（В.Юшкова，1768-1805）在图拉开办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沙龙。俄国最好的诗人们在那里公开自己的最新诗作。”^①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俄国的文化沙龙发展达到鼎盛。圣彼得堡的慈善家大公夫人叶莲娜（Великая Княжна Елена，1807-1873）每周四在自己的宫殿里举办文化沙龙，邀请俄国的文化精英和声名显赫的外国来访者参加聚会。^②此外，受西方文化和宗教思想影响，女性参与慈善活动成为 18 世纪晚期俄国的新现象。叶卡捷琳娜二世建立儿童收养所就属于慈善活动，后来玛丽亚皇太后（Мария Фёдоровна，1759-1828）接替了她所有的慈善事业。1812 年 11 月，‘妇女爱国协会’成为俄国最早建立的志愿者联合会之一。协会最初的成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贵族女性。协会的初始目的是帮助 1812 年卫国战争中的受害者。在拿破仑被俄国打败后，协会继续发挥着慈善救助作用。^③

19 世纪初，俄国女性职业化现象开始出现。女性的职业化最初主要是担任教师，“她们挣得自己的薪金；她们在斯莫尔尼女子学院任职，在贵族军官学校担任低年级教师。”^④虽然在 18 世纪晚期女性教师所占比重甚小，妇女也没有被认为是教师人才的主要来源，教育委员会甚至还曾限制和减少斯莫尔尼女子学院的女教师人数，但这毕竟是妇女走上职业道路的开始。到 19 世纪初玛丽亚皇太后开始推行女性教师培养计划时，“女性可作为教师”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被称为‘俄国自由主义之父’的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1777-1825，1801 年即位）时期的大臣斯佩兰斯基

① Barbara Evans Clements, *A History of Russia: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p.95.

② Ibid.

③ 参见 Barbara Alpern Engel,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p.43.

④ Carol S.Nash, “Educating New Mothers: Women and Enlightenment in Russia”, p.310.

(М.М.Сперанский, 1772-1839) 就曾鼓励自己的女儿从事教师职业。^①

(二) 关于妇女教育的非议

妇女教育改革推动了俄国的文明化进程，但改革触及了传统观念，新旧事物的碰撞无可避免地引发出质疑声。

首先，是传统思想和观念对女性教育改革的质疑。妇女教育的本意，是希望通过受教育女性在家庭中发挥母亲对子女的教导作用，来推动国家的西方化和文明化，但当妇女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成为职业女性时，却引起了守旧贵族、甚至是一些社会开明人士的质疑。质疑者认为，提倡妇女教育并非鼓励有知识的女性走上职业化、或学术研究的道路。如诺维科夫等人就认为，妇女受教育的目的仅仅是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和母亲。诺维科夫对“象牙塔”里的男女学者都进行了批评，对女学者批评得更为苛刻。他和公众一样对女学者持有敌意，^②然而女人做学问正是支持教育平等的标志之一。在那样的氛围下，即便像达什科娃公爵夫人那样杰出的女性，在被任命为俄罗斯科学院院长时，第一反应竟然是婉拒，她表示：“上帝他自己把我创造成一个女人，就打消了我支持女人工作的念头”^③。甚至到了 19 世纪 20 年代，十二月党人还认为妇女发挥作用的领域应局限在家庭中，尼基塔·穆拉维约夫(Н.М.Муравьев, 1796-1843)就表示，“妇女不仅不能成为政治权利的主体，甚至应被禁止参加立法机关的公共会议。”^④

其次，在妇女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少数妇女的“出格”行为成为一些开明人士批评妇女教育改革以及西方化改革的把柄。知识和文化的增长有助于塑造女性的个人意识。在舞会、音乐会和沙龙等社交活动中增长了见识的贵族妇女渴望爱情和婚姻的幸福，这种个人意识的觉醒也诱发了少数妇女出轨的可能。一些为数不多的、有伤风化的行为^⑤成了指责妇女教育改革的把柄，

① Carol S.Nash, “Educating New Mothers: Women and Enlightenment in Russia”, p.310.

② Ibid, p.304.

③ 转引自 Barbara Alpern Engel,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p.21.

④ 同上, p.24.

⑤ 这里指一些见异思迁的贵族女性在社交场合结识了一些异性，有些发展成了情人关系，并威胁到了婚姻。

并被一些“开明人士”加以利用以攻击西方化改革。我们可以将这些“开明人士”称为“早期的斯拉夫主义者”，他们不满西方化改革在给俄国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改变了贵族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对俄国传统文化受到的冲击和破坏深感忧虑。18世纪晚期，激进的启蒙思想家拉吉舍夫(А.Н.Радищев, 1749-1802)强烈谴责“那些一年、一月、一周，甚至是一天(这是上帝禁止的)一换爱人的贵族妇女。她们今天认识一个男子，在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后，明天就把他给忘了。”^① 贵族政论家谢尔巴托夫(М.М.Щербатов, 1733-1790)也指责一些贵族妇女对情感的过分追求破坏了公共道德和婚姻忠贞原则，甚至引发了俄国的离婚危机。^② 针对对婚姻道德的威胁，东正教会采取措施加强对婚姻的束缚以增加离婚的难度，希望以此来维护传统的家庭道德准则。

四、结语

叶卡捷琳娜二世教育改革是彼得一世教育改革的继续和完善。叶卡捷琳娜二世把公共教育推广到贵族妇女阶层，希望塑造有文化、有道德的新俄罗斯女性，并希望这些未来母亲以家庭教育的方式来助力国家的西方化改革。作为改革的重要成果，斯莫尔尼女子学院强调知识与道德学习并重，实施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力求培养文化和道德兼备的人才，并在学生培养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也因此成为俄国贵族女子中学教育的模本。学院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思想开明的上层贵族“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多尔戈鲁基(И.М.Долгорукий, 1740-1830)就很倾向与斯莫尔尼女子学院的毕业生结婚”^③。教育改革不但开启了近代俄国妇女的文化启蒙，还加速了俄国中、上阶层的西方化，即塑造了一个西方化的上层。西方式礼仪、舞会与文化沙龙、流利的法语和对西方思想文化著作的阅读，成为18世纪晚期形成的俄国上流社会文化的标志性特征。同时，教育提高了俄国妇女的识

① 参见 Barbara Alpern Engel,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pp.20-21.

② *Ibid*, p.20.

③ Carol S.Nash, “Educating New Mothers: Women and Enlightenment in Russia”, p.303.

字率^①，促进了近代俄国妇女文化基础的形成，使妇女得以加入到俄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教育改革的覆盖面主要涉及社会的中、上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因为属于不自由阶层，在 1861 年农奴制改革以前尚未被纳入国家公共教育体系之中。

作为西方化改革的一部分，妇女教育改革在国家的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俄国的近代民主化进程。文化知识和社会意识的增长使妇女走出家庭，参与到社会工作中去，她们开始成为俄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贵族家庭中，妇女地位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家庭中的宗法—专制色彩，促进了家庭的民主化进程。18 世纪 30 年代，“对传统家庭中居核心位置的宗法—专制制度的评判发展起来，这一批判潮流首先是在接受过教育、但在家庭中居于从属地位的已婚女性中间发展起来的”^②。当妇女的活动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领域，家庭中的民主化意识就逐渐演化为社会中的平等意识，这就为 19 世纪中期兴起的俄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到 19 世纪末，争取女性平等权的妇女组织形成了全国性的组织；1905 年还出现了有政治主张的妇女政治组织。^③研究叶卡捷琳娜二世妇女教育改革，将有助于了解近代俄国贵族妇女的文化状况、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之前的女性生活状况和近代俄国家庭和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westernizing reforms, the reform of women education pushed by Catherine the Great pioneered the public education of women. The reform aimed to cultivate westernized women, and endeavored to foster a new generation of civilized people by family education. In the reform, on the one hand, the public education was extended to the group of women, and on the other the western cultural values and Russian traditional morality were combined to instill into the noble women as well. This not only enlightened the

① 18 世纪末、1850 年和 1913 年，俄国妇女的识字率分别为 4%、10%和 26%。数据来自于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第 265 页。

② Barbara Evans Clements, *A History of Russia: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p.95

③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第 266 页。

cultural process of modern Russian women, but also sped up the westernization of Russian aristocracy and modernization of Russia. As a result, the reform of women education under Catherine the Great managed to elevate the status of Russian women in their families and promoted them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public affairs, and thus laid a foundation for Russian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the social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19th century.

【Key Words】 Catherine the Great, Russian Women Education, Russian Education Reform

【 Аннотация 】 Являясь важной составной частью реформы вестер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проводимая императрицей Екатериной II реформа в сфере жен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оложила начало женскому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у образованию. Эта реформа воспитывала женщин в Западной традиции, целью которой было,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семейном образовании,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новое поколение граждан; за счет расширения доступа женщин 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у образованию, женщинам-аристократкам прививались западные культурные ценности, объединённые с традиционными моральными ценностями России, что привело не только к культурному просвещению женщин арист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кругов, но и ускорило процесс вестер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истократии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реформы Екатерины II в сфере жен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овысили статус российских женщин в семье, поощряли участие женщин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а также заложили основу для женского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 середине девятнадцатого века и процесса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общест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Екатерина II, жен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реформ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责任编辑 黄翔)

社会转型背景下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发展的选择*

顾鸿飞**

【内容提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改革,是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复苏的深刻社会背景。1992年,联邦《教育法》首次提出并准确定义了“非国立教育”,明确了其法律地位。在该法的鼓励和扶持下,非国立高等教育开始了大规模扩张。1996年,联邦《教育法》修订版和联邦《高等及大学后职业教育法》相继颁布,继续鼓励发展非国立高等教育,促使非国立高等教育的规模进一步扩张。尽管国立和非国立高等教育并存、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但非国立高等教育从复苏之日起一直饱受社会习惯势力的质疑、排斥乃至否定,在实际办学过程中,教育政策不适、法律地位不能有效落实等问题,时刻阻碍着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发展。90年代末期,非国立高等教育规模无度扩张的负面效应显现,俄政府和学术界开始反思这一教育形式发展得是否合理,同时关注其发展状况和思考它的未来。2000年后,随着俄罗斯强国战略的实施,非国立高等教育作为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进入被国家规范管理的阶段,成为国家发展总规划以及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部分。

【关键词】俄罗斯高等教育 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 俄罗斯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D751.2; G5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5-0172-(27)

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二十余年,只

* 本文是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发展研究”(201022108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顾鸿飞,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是历史的一瞬间。但是对于俄罗斯乃至俄罗斯高等教育系统而言，这短短的二十几年却承载了巨大的意义——高等教育在社会转型期完成了从全面的国家垄断向市场机制的转轨，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消失了 70 余年的非国立高等教育复苏，并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

在历史上，非国立教育曾使用过“私人教育”、“社会教育”、“非政府教育”、“自由教育”等称谓。在 20 世纪最后十余年非国立教育刚刚复苏之际，不同话语权的人对这种教育形式的理解各不相同，因此也就产生了以下称谓：“私立教育”、“预算外教育”、“社会教育”、“自我财政教育”、“商业教育”、“非政府教育”、“付费教育”等。^①“非国立教育”的称谓首次正式出现在 1992 年 7 月版的联邦《教育法》中。至于为什么选择“非国立教育”而不是“私立教育”等其他称谓，时任教育部长第聂伯罗夫(Э. Д. Днепров)解释道：“我们避开使用‘私立学校’这个专门术语，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在社会意识能接受的范围内行事更好，还因为我们考虑到了社会意识对凡是‘私有制’事物都有一种特别的反应。‘非国立教育机构’所包含的意义更加广泛，它既包括了私立学校本身，也包括了由不同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其他举办者创办的教育机构”。^②

为了表述方便和便于读者理解，我国学者在研究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时，大多把“非国立高等教育”翻译成了“私立高等教育”。但这是不准确的。首先，俄语表达法“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中文译文是“非国立(非国家)高等教育”，与“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国立高等教育)相对应。更重要的是，在俄罗斯社会，“非国立”三个字蕴含着丰富的内容，直接影响到非国立高等学校的地位、权利、义务和责任等，远非“私立”两个字能够涵盖得了的。为了能更真实、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入地反映非国立高等教育发展的情况，本文采用“非国立高等教育”这一概念和称谓。

社会条件是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客观基础，社会转型是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发展的深刻社会背景。在社会转型期间，社会整体的各个基本构成要素

① Ильинский И.М.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вузы России: опыт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4. С.135.

② Днепров Э. Д. Школьная реформа между «вчера» и «завтра». Москва, 1996. С.181.

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引发了社会结构、国家制度、政治和经济制度、所有权制度、国民观念等全面性和根本性的改变。在过去的二百余年中,“俄罗斯经历了3次深刻的社会转型,它们分别是19世纪60年代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时期、1917年革命及其前后有关大事件时期和20世纪末期的社会转型。”^①“20世纪最后的十几年,是俄罗斯打破过去的经济体制和习惯生活方式的阶段”。^②发生在1991年12月的苏联解体导致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方式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高等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镜子。俄罗斯的民主改革和市场关系的建立,不可避免地触及到高等教育系统,导致高等教育原有的社会存在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高等教育不得不作出相应的反应,在很多方面都迥然不同于前苏联时期,其中最显著的现象就是高等教育体制被打破,中断了七十多年的非国立高等教育复苏了,结束了国立高等教育一枝独秀的历史。此次在民主化浪潮和向市场关系转化过程中复苏的非国立高等教育,由于社会转型的起始方式、转型路径与取向等与前两次截然不同,因而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发展特征。

一、非国立高等教育复苏的社会条件

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复苏“是俄罗斯古老的非国立教育传统的复苏”,^③但它的复苏绝不是偶然现象,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社会转型是“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在需要的时间、需要的地点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④影响非国立高等教育复苏的因素很多,从外在环境看,它是俄罗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发生质变的结果;从内部环境看,它是高等教育系统自身发展的要求和必然。

① В·科隆泰:“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0年第1期,第106页。

②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Ф: 2001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04-05-26.

③ Днепров Э. Д. Школьная реформа между «вчера» и «завтра». С.181.

④ Вениаминов В.Н. Качество в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вузе. СПб.: Изд-во Политехи, ун-та, 2005. С. 26.

1. 国家政治结构、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结果。

政治对教育的影响是绝对的，教育对政治也有着很强的依从性。在中央政府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政治体制下，“苏联国家权力是胜过学术权威和市场相互作用的最纯粹的例子”。^①这集中表现在禁止非公有制教育形式的存在，国立教育是国家唯一的教育形式，政府是教育的唯一投资者和办学者；国家权力渗入到整个教育系统，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对大学长时期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学校被极度政治化，被视为国家机关的附属部门，成为“国家所有、高度集中、计划控制和行政干预”的对象，^②相应地，学校内部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准确地复制了国家机关的官僚化模式，形成了科层制体系。长时期高度集中的管理，导致前苏联的大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期高度层级化，行政机构臃肿，办学体制僵硬，办学自主性丧失，学校运作低效。

1991 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开始社会转型。这次社会转型是国家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转变。1993 年 12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宪法》颁布。这部宪法与前苏联宪法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承认私有制事物和私人财产权合法化：“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权”（35.1）；“私人、国家、市政以及其他所有制形式在俄罗斯联邦得到同样的承认和保护”（8.2）；“每个公民都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智慧，从事营利性以及不受法律禁止的经济活动”（34.1）；“俄罗斯联邦制定国家教育标准，支持不同的教育和自我教育形式”（43.5）。显而易见，上述条款均表达了“从事私人活动不受任何限制”的国家意志。社会转型给俄罗斯带来了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开启了国家通向自由、民主和非政治化的大门，解放了国民的思想，激发了非国有力量投资办学的积极性。

2. 私有制合法化为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复苏奠定了经济基础。

经济是教育的基础，经济体制对教育起着制约作用。在公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占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政府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唯一

① [美]伯顿·克拉克著：《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60 页。

② 陈列：《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4 页。

所有者和配置者，社会力量没有权利、更没有资金投资教育。社会转型建立了经济市场化制度，实现了市场主体多元化，催生了私人资本。“市场经济的发育改变了教育的外部环境，使市场机制、市场价值等极大地影响了教育的发展”。^①经济所有制形式实现多元化，使得非国家经济成分获得了合法地位，让资源与财富从集中于政府一身变为分散在政府、社会以及个人手中。民间资金的崛起，客观上为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复苏积累了社会资源，奠定了非政府力量投资办学的经济基础。

3. 新兴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新型人才。

前苏联经济是按照斯大林确立的苏联工业化模式发展起来的。在以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下，军事工业和重工业高度发达，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明显落后。受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特点的影响，前苏联高等学校的学科结构形成了重理工、轻人文，基础理论研究实力雄厚的显著特点。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延续了前苏联“重理轻文”的人才培养模式，到90年代中期，人才结构的长期倾斜造成了毕业生结构性失业现象非常严重。数据显示，当时俄罗斯人文学科毕业生所占份额只有8%，仅是法国的1/10、美国的1/5，即使与前苏联高校毕业生人才结构最接近的德国相比，也仅是德国的1/7；相反，俄罗斯工程技术专业毕业生则是美国的4倍；农业经济毕业生是法国的15倍、美国的7.5倍，而此时社会对工程师的实际需求量只有高校实际培养人数的一半。^②随着俄罗斯步入市场发展的轨道，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快于其他产业，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迅速提高，基础设施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国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引起劳动力从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市场对人才类型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任务更多地遵循于市场驱动性，然而，大学行政管理的官僚机制以及高等教育的滞后性使得国立大学难以在短时间内调整专业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市场需

① 崔克亮：“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方向与路径”，《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月23日。

② Кроль В., Краснушкин Е., Назарова Т. Мировые системы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выпускников//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1996. № 2. С.136.

求为导向的非国立高等学校应运而生，发挥了“拾遗补缺”国立高等教育的职能。

4. 大学财政拨款制度发生变化。

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承担了高等教育的全部开支。但是叶利钦激进的“休克疗法”导致了国家经济衰退，政府财力匮乏，国家资源配置机制出现了缺陷，无力及时兑现为高等学校财政性拨款的法律承诺（不低于联邦财政年度预算的3%）。数据显示，1992~2002十年间，预算拨款一直不足3%，2000年仅为1.5%。^①显然，国家供给和高校需要之间出现了失衡，大学出现了财政危机。为寻找补充性资金来源以补偿联邦预算的减少和维持高等教育系统的正常运作，政府必须进行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改革，在“计划”之外寻找新的资源配置方式，非国立高等教育则是解决教育经费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5. 消费者市场的需要。

在政府集权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前苏联长期实行薪金及家庭收入平均政策。在实际生活中，消费模式也较为单一，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低层次的大众消费”。^②在高等教育系统，除国立高等教育之外，不存在其他可供教育需求者选择的教育形式，教育需求者只有通过竞争性的考试才能够接受免费高等教育。在转型过程中，经济垄断消除，社会财产重新分配，消费者不仅有了各种选择和消费的机会，而且居民收入的分化也促进了对高等教育的“差异需求”，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形式和结构走向多元化。

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本文只列举了影响力较大、较显著的影响因素。实际上，影响非国立高等教育复苏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复苏是帮助政府解决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和教育公平问题的需要。在前苏联，高等教育是国家的“短缺经济”，“在220万考生中，被录取者不超过

① Адриан Ж., Бентабет Э., Винокур А., Линей Т., Планас Ж., Прохоров Ж., Робен Д., Сигман К., Третьякова Р., Гохберг Л.М., Клячко Т.Л., Агранович М.Л.,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ая И.А., Капржак А.Г., Соболева Е.Н. Белая книг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Ч.1, II. М.: Изд-во МЭСИ, 2000.С.61.

② Кузьмин С.А. Социальные системы– Опыт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анализа.Москва,1996. С.50.

25%”。^①此外，前苏联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很不均衡，高等学校几乎都集中在工业基础设施完善、历史文化悠久、居民收入高的欧洲地区的大城市，而在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疆土辽阔的亚洲地区，高等教育资源却相对匮乏。在政府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复苏非国立高等教育显然是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一个不错选择。

二、非国立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

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从复苏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本文将其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1年底，为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复苏阶段；1991年底至1999年底，为非国立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阶段；2000年至今，为非国立高等教育的规范发展阶段。

1. 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复苏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1年底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不久便开启了“改革与新思维”的进程，他严厉批评了苏联的僵化和停滞，极力倡导再认识社会主义，喊出“除了改革别无出路”的口号。在戈氏领导下，苏共和苏联政府提出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在政治领域，拒绝按照行政命令使思想集中化，主张思想意识多元化和公开化，制定了社会人文化和民主化的方针。在经济领域，相继制订并出台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纲领和法令，积极推行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进程。国家的教育改革与社会生活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进程是同步的。1987年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会上所颁布的决议《苏联高等和中等专门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试图找到高等学校财政拨款的新渠道。1988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全苏国民教育工作者会议，会议重新解读了教育形式、教育目的，确立了教育改革的基本原则，强调了教育革新的开放性和教育任务的多样化。1990年10月18日，苏联政府颁布了《稳定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该方针明确“各种所有

^① Иваненко К.Б.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5. С. 84.

制形式一律平等”和国家将实施“非垄断化”、“非国有化”及“私有化”方针。尽管《稳定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直接作用的是国家的经济制度，但它为非国有制形式的教育机构找到了公开身份以及自由、合法活动的政策基础，极大地推动了教育服务市场萌芽的生长。1990年12月25日，时任前苏联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叶利钦签署了《企业和企业家活动法》（№445-1），允许社会力量开办学校。该法称，“为满足社会需要和为国民提供服务，允许各种法律组织形式的企业在所在地的地方人民代表委员会注册合营公司、股份公司、私营企业和开办学校”（第34条），《企业和企业家活动法》进一步解放了社会思想。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以57.4%得票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7月11日，他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教育改革的首个总统令——《发展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的首要措施》。该总统令首次提出了创建非国立学校和制定统一创办制度的问题，它要求支持非国立教育机构和建立教育发展基金会，为各种所有制的企业、组织、机构投资教育制订税收优惠政策。《发展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的首要措施》更直接地为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投资创办非国立教育机构提供了政策条件。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专营“影子经济”的非国家所有制的高考补习班已经遍布全俄各地。私有制合法性的确立，标志着它们获得了合法身份。此后，这些高考补习班开始公开办学，办学范围也扩大到职业技能培训。发展到90年代初期，它们以私人企业、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等组织形式，注册成为具有真正大学意义的非国立高等学校。到1991年初，全国正式注册的非国立高等学校为45所，1992年初达到了92所。^①此时，政府尚未把这类学校纳入到教育主管部门，对它们的管理缺位。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校，办学自由度非常大，学校管理较为混乱，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因此，学校倒闭屡见不鲜，而与此同时，新建的学校又层出不穷。

2. 非国立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阶段：1991年底至1999年底

“俄罗斯历史上的这些社会转型都浓缩了社会的变化，都是在刻意追求之下通过政治体制和（或者）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转型的初衷在于

① <http://stat.edu.ru/stat/vis.shtml>

克服社会经济的落后状态而建立一个先进的社会，而且事先预定要具有某些特色”。^①1992年6月，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全面启动了私有化进程。私有化运动的重大结果之一，就是从根本上瓦解了前苏联国家垄断的政治制度和集中的计划经济基础，完成了俄罗斯所有制形式的变革。

国家经济需要发展，高等教育同样需要发展。在社会转型初期，仅依赖政府力量已经无法解决高等教育领域的诸多问题，必须要从新的意识形态出发建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法律基础，实现教育多元化，开辟多渠道的资金来源。1992年7月10日，俄罗斯联邦《教育法》（№ 3266-1）颁布，这一年也因而被确立为俄罗斯非国立教育的纪元年。联邦《教育法》是社会转型期第一部联邦级教育法典，是俄罗斯教育非国家化进程中的里程碑，被视为“俄罗斯教育系统最进步的法令之一”。^②这是因为，它打破了旧的教育集权模式，废除了旧的教育政策，构建了新的、多样化的教育模式，开启了教育非中央化、非国家化和地方化的（2.5）的步伐。联邦《教育法》的民主精神充分体现在把“教育的自由和多样化”（2.5）定为国家教育政策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制定了创办教育机构主体的开放机制，首次明确了“非国立教育”以及它的法律地位，规定了非国立教育机构的举办者（11.1）、机构性质、地位（12.3）、管理（3.36）、经济（4.39）、受教育者的权利和社会保障（5.50）等。联邦《教育法》鼓励、扶持非国立教育，给予了在俄罗斯联邦登记注册的社会和宗教组织、机构、基金会和个人创办学校、从事教育活动的权利。

在联邦《教育法》的鼓励和扶持下，非国立高等教育开始了大规模扩张。90年代上半期，每年平均有50余所新建学校获得办学许可证。^③1996年1月，联邦《教育法》修改版颁布，最显著的变化是将1992年版第41.10条“国立和市立高等学校在按照与自然人以及非国有企业、机关、组织签订的

① В·科隆泰：“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0年第1期，第106页。

② Филиппов В.М.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для новой России//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2000. №. 1. С.6.

③ Клячко Т.Л., Мау В.А.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высшего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опрос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007. №.3.С.47.

合同有偿培养法律、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人才时，招生人数不得超过该专业招生总数的 50%”改为“招生人数不得超过该专业招生总数的 25%”。俄政府修改 41.10 条，原本希望通过减少国立大学的商业学额以遏制国立高等教育商业化步伐，但客观上却为非国立高等教育提供了生源。

1996 年 8 月，俄联邦《高等及大学后职业教育法》（№ 125-ФЗ）颁布。这是一部专门针对俄罗斯高等教育和大学后职业教育的国家级法律，是对联邦《教育法》的细化和补充，它的主要取向是“鼓励非国立高等学校创办和运营”（3.6）。在上述两部法律的直接作用下，非国立高等教育进入了新一轮的数量增长阶段。从复苏到 2000 年初，在不到十年间，非国立高等学校的数量增加了近 4 倍，占全国高校总数的 37%，而国立大学数量仅增长了 1.27 倍。1999/2000 学年，非国立高等学校毕业生数量比 1993/1994 增加了近 30 倍，而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仅增加了 16%。在非国立高等教育和国立大学有偿教育的共同努力下，在 1998/1999 学年，俄罗斯高等教育规模达到了历史最高值，标志着俄罗斯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①

非国立高等教育规模的大扩张，客观上要求财政投入的不断递增，否则，“在不降低质量的前提下满足学生数量增加的要求，确实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挑战”。^②但是“休克疗法”的失败以及 1998 年前后持续 2~3 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全面“休克”：经济大幅度衰退，货币严重贬值，国库亏空，多数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国家的经济状况让非国立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和资金紧缩的矛盾突显，而且规模无度扩张的负面效应也都暴露出来，比如，办学条件（教学用地、教师数量、教学设施、科研条件等）达不到国家最低标准，办学不遵循教育规律，专业设置高重复率等。一时间，社会各界纷纷指责非国立高等学校是低质量的发源地，是以谋取利润为目的、从事很多不良活动、制造大量影子地带的商业机构。^③比如，俄罗斯高等教育领军人物、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 В. А.（Садовничий В. А.）就

① Клячко Т.Л., Мау В.А.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высшего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47.

② 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0 页。

③ Филиппов В.М. Программа «Вести плюс» РТР. 2003.05.27.

坚持认为，“商业大学不是教育”，^①认为在短短几年内创建了如此之多的非国立高等学校是国家的错误。^②他把非国立高等学校颁发毕业文凭视为像毒品生意一样繁荣的文凭贸易，指出获得假文凭的人就像得了急性传染病，承受着无知的病痛，并将被假文凭毁掉一生。^③时任俄罗斯教育部长基涅列夫(В.Г.Кинелёв)在1996年教育部全体总结会议上对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作了如下的总结：“……尽管目前非国立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学校数量与国立大学不相上下，但就整体实力和所发挥的功能而言，国立高等教育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最强大、最坚实的核心，非国立高等教育则是包围它外面的那层薄薄的表层。不过，这个表层将逐渐增厚，非国立高等教育应根据自身的特点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④在指责、担忧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同时，俄政府和社会也开始反思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关注和思考着它的未来发展之路。

3. 非国立高等教育规范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俄罗斯在自由私有化运动的失败中跨入了21世纪。面对激进经济改革给国家带来的一片混乱，社会大众普遍开始对西方模式的自由经济以及西方价值观失望，对“俄罗斯是否可以完全学习西方”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于是，俄罗斯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2000年伊始，为实现俄罗斯回归国家秩序、重返世界强国舞台，普京政府制定了强国政策，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

俄罗斯国家政治方向的变化决定了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政策目标和政策内容的重新选择。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主管部门重新转向国家权力，依赖国家职能、利用国家机器控制非国立高等教育的无序扩张，整顿非国立高等教育系统的混乱状况。2000年上半年连续颁布了《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俄罗斯联邦教育民族学说》和《到2010年俄罗斯教育现代化构

① http://www.msu.ru/info/struct/rectintv.html?2004-06-25_18-26.f6b5732

② Садовничий В.А. Качествен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доступным. http://www.msu.ru/info/struct/rectintv.html?2007-06-18_15-08.5332bad

③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VII съезд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екторов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6-7 декабря 2002 г.

④ Ильинский И.М.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вузы России: опыт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4. С.104.

想》。这 3 部法律文件是俄政府“国家统一调控”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充分落实，是教育重新返回国家的标志性文件。它们强调，学校不分所有制形式，全部统一在国家教育系统，在国家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肩负着同样的教育使命，发挥着完全相同的作用。2003 年 9 月，俄联邦会议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生态委员会会议明确，“非国立教育是俄罗斯教育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2004 年，联邦《教育法》和联邦《高等及大学后职业教育法》删除了鼓励、扶持非国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全部条款。从此，非国立高等教育走上了与国立高等教育并存、共同发展、相互竞争的道路。

进入了国家行政权力视野的非国立高等教育结束了规模扩张，作为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了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任务的规范发展，和国立高等教育一道，肩负起普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的时代使命。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非国立高等教育在教育质量、结构调整和社会效益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前，俄罗斯高校共计 3500 所（包括分校），非国立高等学校（包括分校）占总数的 40%，有 1400 所，其中有 452 所实施高等学历教育。在这 452 所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非国立高等学校中，除了培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文凭专家以外，还有 50 余所被公认为能够提供优质教育，而且，其中的 10 余所不仅可以培养博士研究生，还完全有实力与优质国立大学竞争，科研成果转化率也很高，其收入成为除学费以外的学校办学经费的又一个主要来源。^②

三、非国立高等教育的作用

俄罗斯非国立高等教育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以租赁场地办学到开始拥有自己的教学用地、从无学历教育到学历教育、从职业

① Ильинский И.М.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вузы: кризис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пути его преодоления// Ректор. 2004. №.3. С.37.

② Экспресс-форум: закон о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и бюджетных мест . 2012-01-17. http://www.akvobr.ru/ekspres_forum_zakon_o_raspredelenii_budgetnyh_mest.html. 俄罗斯于 2003 年 9 月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后，与国际接轨，开始实行“学士+硕士”两级人才培养制度，但政府也允许医学、工程、师范类高校双轨制人才培养，即学士+硕士和传统的五年制文凭专家并行。

培训与再培训到学士教育再到博士培养、从单一的教育服务到能开展科学研究、从人才培养方向偏重人文社科类到增设自然学科的历程，如今已经成为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非国立高等教育对俄罗斯国家发展、社会稳定、高等教育社会化以及完善高等教育系统，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1. 完善高等教育系统。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起，俄罗斯学者高频率地用“变化”、“适应”和“脱节”等词语来探讨国立高等教育。^①这是因为，国立高等教育由于自身的惯性和特别的自信，不能够（或者没有）及时地对国家的发展动态作出反应，没有科学地分析教育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和根据新的教育环境制定发展战略，最终陷入了僵化的境地。具有自由意识形态的非国立高等教育则是教育领域的一个新事物，一种新现象。它的复苏彻底结束了由政府向所有公民提供高等教育的历史，将单一的高等教育系统多元化，同时为高等教育系统注入了新鲜血液。它终结了国立高等教育“养尊处优”、独享教育资源的历史，作为国立高等教育的竞争者，将其推到了办学的具体行动中。比如，推动国立大学在学校管理上适当借鉴企业管理模式，引进竞争机制，努力克服内部的垄断和自身的惰性，旨在增加办学活力和提高办学效率。

主观上，非国立高等学校为了生存和更好地发展，在办学过程中根据市场的驱动，及时调整专业设置；为稳定和（或者）扩大生源，能够摆脱传统教学大纲的束缚，制定多样化的教学大纲，采用新的教学理念、教学工艺和教学方法，以满足不同教育需求者的需要。比如，非国立高等学校改变国立高等学校传统的“以班级形式进行课堂讲授，学习者被动地接受信息”的教学模式和“学生学、教师教”的劳动分工模式，倡导“合作、承认和理解他人的观点、对话、共存、共同合作、尊重个体”的教育理念。^②非国立高等学校还积极借鉴国外高校和企业先进、有效的教育工艺以及管理经验，并创造性地加以改造。经过 20 多年的不懈努力，部分非国立高等学校，如前文

① Иваненко К.Б.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5. С.22.

② Розин В. Философ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редмет, концепция,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естник высшей школы.1991. №.1. С.50.

所述,发展成为了优质大学。与此同时,非国立高等教育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则在客观上促进了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等的革新以及高等教育结构、功能的转变。使得高等教育系统更具开放性、民主性和多样性,最终帮助俄罗斯高等教育系统走出了休克状态。因此,下文这些从非国立高等教育支持者口中发出的赞誉之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为过:“非国立教育的发展是当今俄罗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和独特的风向标,是教育民主化和教育非垄断化最显著的指标之一”^①;非国立高等学校“从诞生伊始就肩负着探索教育新模式的任务”^②;“始终是俄罗斯学校的推动者,是研究俄罗斯先进教育思想和教育工艺的实验室。”^③

2. 增加教育机会, 稳定社会秩序。

“在教育系统预算拨款显著下降的情况下,没有90年代从零开始的非国立高等教育,今天的成绩无法取得”。^④非国立高等教育帮助政府解决了教育经费问题是毋庸置疑的。它利用社会资金开设学校,增加了教育资源,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有数据显示,20年来,非国立高等教育帮助国家节约了100亿美元的办学经费。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非国立高等教育的贡献在于:第一,大学数量增加了,这意味着大学学额总量的增加,对教育需求者而言,则是教育机会的增多。非国立高等教育是实现俄罗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力量,推动了高等教育规模在1998/1999学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值。第二,非国立高等教育为教育需求者提供了就近入学的机会,比如,2002/2003学年在莫斯科市就读的外省学生数量就从90年代初期的75%下降到了25%。^⑤第三,任何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都不可能满足所有需求者的就业需求。非国立高等学校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带进教室,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矛盾,避

① Днепров Э. Д. Школьная реформа между «вчера» и «завтра». С.181.

② Березовский А.П., Борисов В.М.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2000. С.74.

③ Днепров Э. Д. Школьная реформа между «вчера» и «завтра». С.181.

④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остоя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оклад министр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М.Филиппова н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м совещании работников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осква, Кремль, 14 января 2000 года. <http://www.spbumag.nw.ru/2000/04/1.html>.

⑤ Балыхин Г. Изменится ли статус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Ректор. 2004. №3. С.5.

免了犯罪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面对这些事实，曾经攻击过非国立高等学校是“让年轻人不去扩充失业者队伍、不进入犯罪组织的就业安置处”^①的国立大学校长们，也开始承认“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复苏减轻了国家的预算负担，普及了高等教育，还让年轻人有地方可去。”^②

今天的非国立高等教育为教育需求者从被动选择教育资源转向根据自己所需、更为自由地选择提供了可能性。它正在稳定地发挥着自身的文化功能和更加广泛的社会作用，推动着社会的完善。但这里也有必要指出，尽管非国立高等教育与国立高等教育共同组成了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但是国立高等教育依然是俄国家高等教育的主导形式，非国立高等教育并没有走进高等教育系统的中心，它所发挥的所有功能都是对国立高等教育的“拾遗补缺”。

四、影响非国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几个因素

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显示，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复苏是时代的要求，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它的存在是有价值的，但发展却是一个被动选择的过程。在这样一个缺少主观能动性的发展过程中，客观上与主观上必然存在着一些制约非国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

1. “否定私有制”的思想意识阻碍非国立高等教育法律地位的落实。

生产资料国有制是列宁主义的具体落实。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指出，“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所准备起来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③生产资料国有制对百废待兴的苏维埃俄国在战后能够迅速、有效地集中资源和力量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抵抗国内外反动势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继生

① 2003年10月，莫斯科国立社会大学校长茹科夫（В.И.Жуков）接受俄罗斯《劳动报》记者采访。

② Ильинский И.М.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вузы России: опыт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4. С.71.

③ [俄]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 1902年1月-1902年8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3页。

产资料私有制被废除后，在教育领域，列宁于1918年2月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高等学校招生规则》的命令。该命令要求大学停止收取学费，指出国家财政预算将担负学校全部办学经费。然而，由于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政权不稳，经济百废待兴，政府无力向大学财政拨款，因此，非国立高等教育暂时得以保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掌握政权，展开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推行全面彻底的废除私有制政策后，非国立高等教育或被收归国有，或被关闭，最终，彻底消失在历史尘烟中，长达70余年。

“没有专制主义俄罗斯不能存在。俄罗斯的完整、坚韧和强大都建基于俄罗斯的专制主义。这就是俄罗斯的历史”。^①俄罗斯国家发展史显示，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并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尽管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社会转型带有极强烈的民主化改革性质，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也已经初步搭建起了民主政治的框架，但复杂、矛盾的自由民主改革实际上带有浓重的权威官僚的味道，它没有弱化政府高级阶层极端的思想倾向，也没有推动社会更清楚地理解所有制内涵的丰富性和消除人们对私有制事物的异样反应，依然有部分社会习惯势力完全否定私有经济的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虽然早在1992年7月联邦《教育法》就明确了非国立高等教育的法律地位，但是“法律的字面意义常常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②首先，教育主管部门在政策文本上经常回避使用“非国立（高等）教育”，而是用“国立大学以及其他组织形式的教育机构”来指称国立和非国立大学。其次，社会习惯势力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非国立”三个字上，因为这三个字代表了该类学校的所有制形式。在他们的认知中，这类学校就是任何一个有钱人、一个企业按照申请制度都可以随便创建的教育机构，它们是“不被国家认可的学校”、“不是我们的”，是“不可靠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反国家的”。这些人认为，只有贴有“国家”标签的国立教育才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能够给国民带来好处的”。这种认识致使非国立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在实际办学中得不到有效落实。比如，俄联邦《非商业

①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П.П.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М.: 2006. С.140.

② [俄]弗拉基米尔·普京：《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81-82页。

组织法》(2.2)规定,“教育是社会财富全部或者很大程度上的生产者,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属于非商业机构,因此,教育机构的注册应该按照非商业性机构进行”。联邦《教育法》和联邦《高等及大学后职业教育法》规定,非国立教育机构是非商业性机构,办学活动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得抽取办学活动所获得的利润,同时也没有纳税的义务,允许学校是财产的所有者,对非国立高等学校的土地使用、税收给予若干优惠或者视具体情况免除其土地税。但事实上,非国立大学依然被视为营利性企业,被征收营业税、土地税等。特别是当国立和非国立高等教育两者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政府作为国立大学的唯一举办者和投资人,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首先保护国立高等教育的利益:“国家给国有制大学制定了一些特殊的、甚至更加有利于其发展的政策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确实想保留自己强大的教育系统,我们不想放弃已经闻名世界250多年的国有高等教育”。^①

2. 俄罗斯人口减少,非国立高等教育生源供给压力增大。

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死亡率、特别是有劳动能力的男性公民的死亡率骤然上升,与此同时,出生率下降。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几乎发生在全国各个地区。2006年,普京在总统国情咨文中首次将俄罗斯的人口问题称为“最尖锐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委员会不久前公布的未来人口最乐观的预测结果显示,在未来25年里,俄人口将减少1,000~1,500万,到2050年,人口将从现在的1.43亿下降到1亿;悲观的预测结果是到2025年全国人口总量不超过1亿,到2050年只有0.75亿,2075年为0.5~0.55亿。^②人口危机已经威胁到俄罗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到国防建设。

教育规模受教育供给和教育需求两方面制约,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变动对教育需求和资源配置将产生直接影响。俄罗斯人口下降正在成为制约非国立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第一,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减少的压力增大。2006年,全俄中学毕业生总量为130万人,2009年大学的招生容量与基础学校毕业生的供给量已经基本持平,2012年下降到70万人,预测到2015年将维持在71.5万人左右,这意味着教育供给将大于教育需求。第二,与国立

① Андрей Р. Почему выбирают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вузы?//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http://www.examen.ru>

② Вузы: без трагедий и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й// Труд. 2009-08-05.

大学有偿教育的生源竞争将愈加激烈。联邦《教育法》第 41 条规定“国家每年给高等学校财政拨款不低于联邦年度预算的 3%”。但在俄社会转型初期,由于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政府无力全部承担起国立高等教育的财政经费,便卸载自身承担的责任,即允许国立高等教育市场化,以补充政府预算的不足。这样,国立大学开始在政府拨款之外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开办有偿教育。特别是 2004 年联邦《教育法》修改版删除了第 41 条第 10 款“国立和市立高校按照与自然人,以及非国有企业、机关、团体等签订的合同有偿培养法律、经济、工商管理、国家和市政管理专业人才时,招生人数不能超过该专业招生总数的 25%”,国立大学有偿教育的招生规模不再受限制。此后,其招生规模持续扩大。2009/2010 学年初,全俄大学自费生为 9.6 万人,超过学生总数的 2/3。其中,国立大学占总数的 63.1%。当前,国立大学自费生和免费生在数量上大体相当。^①国立大学有偿教育严重抢占了非国立高等学校的生源市场,因为对于教育消费者而言,附属于国立大学的有偿教育更有吸引力。最后,来自国立大学免费教育的压力增大。联邦《教育法》第 41 条和联邦《高等及大学后职业教育法》第 2 条第 3 款规定,“保证俄罗斯联邦每万人居民中至少有 170 名大学生免费接受高等教育”。近些年来,针对有偿规模的持续扩大,政府一再强调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不应以减少国家预算学额为代价。2010 年 1 月《关于修改联邦〈教育法〉第 41 条和联邦〈高等及大学后职业教育法〉第 2 条》法案正式实施,规定从 2011 年 9 月 1 日起,俄罗斯联邦每万人居民中至少有 200 名大学生享受国家预算学额,2013 年不少于 200 人;2016 年不少于 300 人;2020 年不少于 350 人。^②这意味着今后越来越多的考生有机会通过全国统一考试(ЕГЭ)接受国立大学免费教育。

这样,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将受到严重挤压。专家预测,受人口

① Подготовка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ях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 2009/10 учебном году. <http://nizhstat.gks.ru/>

② Пояснительная записка к проекту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ю 41 Зако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б образовании» и статью 2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высшем и послевузовском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м образовании». http://russian.su.ru/publ/novosti/zakonoproekty/zakonoproekt_ob_uvelichenii_chisla_bjuzdzhetykh_mest_v_yuzakh/8-1-0-26

减少影响，在不久的将来，全国将有 2/3 的高等学校濒临倒闭，35%的非国立高等学校从教育市场消失。非国立大学在校生数量也将大幅度减少，比如知名的莫斯科人文大学 2008 年在校生数量为 1 万人，预计到 2020 年，招生数量将减少 25%。^①这种状况“必然会影响地方经济建设以及很多目前还无法估计到的不良后果和潜在的危险”。^②

3. 单一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制约非国立高等教育发展。

在前苏联，政府是高等教育唯一的举办者，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教育评价标准强调教育活动必须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要求大学注重学术价值，注重基础知识和科学研究，办学必须以培养“精”、“专”人才为宗旨。这种知识本位价值观决定了前苏联的高等教育为精英教育，这种教育使前苏联进入了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之列。学术型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了一批批高素质、有知识、有科学研究能力的生力军，符合斯大林工业化经济模式所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特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延续了知识本位教育质量观，并将其实施于非国立高等教育领域。一方面，必须要承认，用知识本位教育质量观衡量非国立高等教育质量，体现了政府提倡的国立、非国立教育政策平等的价值取向。同一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确实催生了一批优质非国立大学。尽管数量不多，但对于提高非国立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树立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形象，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但从另一方面看，用该标准衡量所有的非国立高等学校，必然会有部分学校的教育质量不达标。比如，萨多夫尼奇B.A.认为，尽管一些非国立大学顶着“综合性大学”、“国际性大学”的光环，其实年轻人在那里并没有学到高深知识，只不过是坐了几年板凳而已。他强调大学的历史很重要，能称之为“大学”者，至少得有 100 年校龄。^③鉴于非国立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水平，他指责数量庞大的非国立高等学校正在使高等教育、学历和学术称号贬值，给国家教育和科

① Ильинский И.М. Повышение качеств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вузах: опыт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Электронный журнал «Знание. Понимание. Умение». 2008. №.11. <http://www.zpujournal.ru/e-zpu/2008/11/Ilinskiy>

② Рожаева Е. Какой вуз лучше: частный ил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2009-07-27.

③ Садовничий В.А. Качествен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доступным. http://www.msu.ru/info/struct/rectintv.html?2007-06-18_15-08.5332bad

学系统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导致人们不再重视教育质量。^①

现行国家教育质量评价标准是教育主管部门在传统质量观下制定的。该标准的实施，表面上为两种教育形式营造了公平竞争、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政策环境，事实上，这种评价标准并不客观、并不科学，非国立高等教育是在“一种‘非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寻找着自己的落脚点和目标定位的。”^②这是因为，第一，国立高等教育与非国立高等教育有着不同的产生和发展基础，前者历经了 250 余年的锤炼，沉淀了厚实的历史，享受政府预算拨款，生源质量高，一直处在卖方市场；后者刚满 20 年，基础差，底子薄，无政府预算拨款，自筹资金，主要依靠学生的交费，其他收入无或者不稳定，经费压力大，生源是前者的落榜生。第二，两者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前者作为教育形式的主导，肩负着国家高等教育的基础和主干，保护和发展高层次的基础知识，追求高深专门人才的培养，而后者复苏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发展沿着市场的轨道，为新兴的市场经济服务。第三，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当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变化，科技进步、市场经济发展、社会需求等不同于前一历史时期时，教育质量观必须要与时俱进，教育质量标准必须要符合时代的要求。今天，俄罗斯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和办学主体的多样性实现了学校形式、类型等的多样化，使得不同类型、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培养目标的高等学校得以并存。而且高等教育选择主体和学习需求也实现了多元化，即使是非国立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学校办学层次也存在着很大差别。因此，不同类型的学校、不同的办学层次、不同的办学定位、不同的办学条件决定了各类学校人才培养规格和人才培养模式应有所不同。

在现实的办学过程中，国家教育质量评价标准是所有非国立高等学校发展的风向标。为换取有限的教育资源，比如获得实施学历教育的权利以及获得和国立大学同等的国家优惠待遇，非国立高等学校作出的选择只能是违背

① Алферов Ф.И., Садовничий В.А.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оторое мы можем потерять//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для России XXI века. 2002. <http://www.mccme.ru/edu/index.php?ikey=msu-book>

② 郭大光：“21 世纪民办高等教育的使命”，《高等教育研究》，1999 年第 4 期，第 21 页。

自身发展逻辑，以牺牲办学自主权、个性化办学为代价，去迎合、依附于政府权力，全力以赴去追逐硬性的评价指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统一的教育质量评价标准驱使非国立高等教育沿着一条没有按照自身思维和逻辑、在实用主义原则下一定程度上舍弃自我、依附政府权力、非独立的道路发展。在这条道路上，非国立高等教育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的权利被剥夺，那些有一定特色办学能力的学校发展受阻。萨多夫尼奇B.A.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非国立高等教育质量绝对不符合前苏联时期的教育标准，呼吁在实行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今天，不应该禁止非国立高等学校，俄罗斯应该向世界学习，制定一套独立的质量评价标准。^①可见，用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衡量非国立高等教育质量，才能够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定位的学校的发展要求，才能够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

五、解决问题的对策

现阶段，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帮助俄罗斯走向民主的市民社会，走向市场经济，依靠创新帮助国家摆脱落后于世界经济的局面和发展成世界强国。非国立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是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它与市民社会相互依存，互为促进。市民社会是非国立高等教育未来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社会条件，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又可良性作用于市民社会的建设。“必须永远要承认，俄罗斯通向美好的未来，除了自由之路以外，没有更好的选择。人民生活涉及到政府的在逐年减少，非国立教育也将是这个过程的一个自然结果和必要条件，它的作用将不断增加”。^②可见，非国立高等教育未来有着继续存在与发展的客观基础和需求，而教育活动从被动选择转向主动发展，是实现非国立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这取决于政府对非国立高等教育态度的改变以及它自身的完善程度。

1. 正确理解所有制内涵的丰富性，客观认识非国立教育。

迄今为止，“忽视所有制内涵的丰富性”依然或多或少地藏匿于非国立

① Садовничий В. А.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вузы - это не есть образование. 2004-06-25. <http://www.msu.ru/info/struct/rectintv.html?pagen=18>

② <http://gfi.gov12.ru/president.htm>

高等教育各利益相关人的头脑，这种认识与态度给非国立高等学校的办学活动设置了重重障碍。态度决定行动，方法决定效果。改变非国立高等教育各利益相关人的观念，特别是政府的认识，是实现非国立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落实到行动上表现为优化非国立高等教育的政策环境和改变单一的教育质量观。

(1) 优化政策环境、切实落实法律地位。纵观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很多国家都为私立教育专门立法或者在教育法中有特殊的规定。当前，俄罗斯没有专门的非国立（高等）教育法，由于政策制定者缺少对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必要的理论思考，没有厘清非国立高等教育由于所有制形式和财政来源的不同，有着由自身属性所决定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因此说，现行的教育政策并不适合于非国立高等教育，也使得国立和非国立高等教育在相互的关系上始终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和谐。“今天的俄罗斯，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非国立大学都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中的很多困难是教育立法不完善导致的，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社会对涉及全体国民利益的教育问题的讨论还远远不够”。^①非国立高等教育实现持续发展，需要适宜的国家政策、完善的相关政策法规以及有可操作性的细则作保障。因此，优化政策环境、切实落实法律地位是当务之急。“非国立大学不是在等待政府行善，而是期待获得与国立大学竞争的平等条件。”^②“……非国立与国立高等教育不应该仅仅是法律上的平等，更重要的是切实落实法律权利，要让非国立高等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切实享受权利的平等和尊敬”。^③受此影响，近些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努力落实非国立高等教育的法律地位，主要表现在教育资源分配政策开始向优质非国立大学倾斜。比如，2007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布了《关于试点运行国家向实施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学生提供教育贷款支持》的决议

① Алайба Т.Е., Заборова Е.Н. Студенты об имидж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вузов//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4. №. 2. С.93-97.

② Девять "НО"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http://www.ed.gov.ru/files/materials/9862/%F1%2025-30%20%EC%E0%FF%202009.doc>.2009-05-22

③ Дружинин Е. Эпох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ади диплома» уходит в прошл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ерсоналом. 2000. №.5. С.14-20.

(№534)，^①决议从2008年2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在首批112所试点学校中，有5所是私立大学。^②2012年2月，联邦《重新分配教育服务市场草案》正式发生法律效力。该法律规定，每年不超过40所优质非国立大学的物理——数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教育、经济和管理等专业课的4,500名学生享受国家财政预算，这笔资金的来源是减少了办学不达标的国立大学的预算学额。^③

(2) 改变单一的教育质量观，实行多元化教育质量评估标准。质量是非国立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是教育需求者选择学校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提高教育质量是非国立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主旋律。那么，什么样的质量观和教育质量评估标准才适用于非国立高等教育呢？“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应包括高等教育的所有功能和活动：……应建立独立的国家机构和确定国际公认的可比较的质量标准。但对学校、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应予以应有的重视，以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④ 非国立高等教育和国立高等教育是社会的两种不同的分工，一起为国民提供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它们的发展历史、基础条件、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对两种教育形式的需求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无论是衡量国立高等教育质量和非国立高等教育质量，还是评估非国立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学校的教育质量，制定一个多样化的质量评估标准是必然的、客观的选择。在非国立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道路上，既要允许有能力的学校向优质国立大学看齐，也要允许学校根据自身的优势特色办学，为高等教育需求者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丰富的教育形式和内容，满足多方面的要求，而那些既不能够达到国家教育标准、也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的学校，在市场机制下必然会受到自然淘汰

①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23 августа 2007 г. №534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 п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я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кредитов студентам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высшего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меющ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аккредитацию». <http://vip-auto.info/dok2009/laws07/tex07710.htm>.

② 112 вузов россии подали заявки для участия в эксперименте по господдержке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кредитов. <http://www.faito.ru/archnews/1206938290,1215280115/>

③ Мария Агранович. Можно ли учиться бесплатно в платном вуз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Неделя. 2011-12-29.

④ 赵中建：《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90年代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22页。

法则的惩罚，最终退出教育市场。

2. 完善非国立高等教育系统。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事物的本质。在未来，教育政策只是非国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外在条件，它需要通过非国立高等教育系统的主观努力才能发挥作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非国立高等教育必须完善管理制度，实现科学的自我管理。

(1) 树立科学的办学理念，走多样化、特色发展的道路。非国立高等学校办学的主要特点是自筹经费、自负盈亏，学费是最主要的办学资金来源。近些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国内经济发展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非国立高等学校的学费收入严重缩水。比如，最近一、两年来，俄罗斯新大学提出延缓交学费或者按月交纳的学生数量增加了 2 倍。不过由于该校是优质大学，科研成果转让、社会服务等收入完全可以弥补学费的不足，能够保障学校的运作。但是其他 97% 办学经费要依靠学费的学校，受到学生支付能力下降的影响，遭到的打击实在不小。^①在这种情况下，商业行为不可抗拒地成了学校日常的基本行为，甚至发展成为办学目标。一些学校在筹措教育经费的幌子下，在办学过程中，放弃了教育的公益性，追逐利益最大化；随意降低招生门槛，不加论证地增设“投资少、见效快”专业。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市场机制带来的“如果不使其他人境况变坏就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的状态”正在侵蚀着非国立高等教育系统。^②因此，非国立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必须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遵循教育规律，协调好规模、质量、结构、效益间的关系。俄罗斯国土、人均耕地面积和自然资源总量居世界首位，资源分布的区域性特征明显。地域间自然条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显著差异，对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规格、数量、质量等都提出了不同的需求，这为非国立高等学校走服务于地方的特色化办学之路提供了现实可行的条件。此外，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客观条件决定了在未来选择发展道路时不能够

① Зернов В.А.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вузов придётся не сладко//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2009-02-13.

② [葡]佩德罗·泰克希拉、[荷]本·琼布罗德，[美]大卫·笛尔，[葡]阿尔伯特·亚玛瑞尔主编：《理想还是现实——高等教育中的市场》，胡咏梅、高玲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完全拷贝国立高等教育系统，它应以学校间的差异为根本，明确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确定所在地区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培养规格，选择适合的教学工艺，建立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评估体系，走有质量保障的多规格人才培养道路。

(2) 扩大生源范围，应对人口缩减。人口严重缩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它对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将产生不小的影响更是无法回避。针对人口缩减，俄政府在几年前就已经为国立大学制定了一系列规避风险的措施，如高校合并、取缔办学不合格院校等。非国立高等教育则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找应对风险或者降低风险的措施。其中，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改变生源结构，扩大生源范围——将招生范围扩大到中学生以外，即面向成年人。当前，全俄大约有 2/3 的成年人尚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高等教育，包括退休人员、退役和部分现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以及与所学专业不对口的工作人员等。这些群体因为需要提高劳动技能，因而将成为非国立高等学校未来的潜在生源。非国立高等学校也应根据教育需求者的要求调整课程设置，发展成既可提供教育服务、又可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提高职业技能的场所。

六、结束语

今天的俄罗斯在普京政府的领导下继续追逐着“强国之梦”。为重返世界强国之列，普京强调国家的发展要依靠国家调节的作用，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但“反对在俄罗斯恢复任何形式的国家的、官方的意识形态”。^①他指出，政治民主和经济现代化是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私有制经济将继续发挥它的补充作用，但在通向民主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有政府的强力介入，民主是“可控制的民主”。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在可预见的未来，国立高等教育和非国立高等教育将长期共存。其中，国立高等教育占主体地位，非国立高等教育发挥补充作用，它们各施所能、各尽其职。非国立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将由从前的被动选择转向主动选择。为得到国家和社会

^① Путин В.В.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999-12-30.

的认可，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它必然要积极地提供符合国家现代化建设要求和社会、个人要求的教育质量。

【Abstract】 The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marketization reforms since the middle 1980s are profound social background for the revival of Russian Non-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1992, the “non-national education” was first proposed and precisely defined in the federal law on education. Just with this law, Russian non-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egan to expand widely. In 1996, the federal amended law on education and Federal Law on Higher Postgraduat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ere promulgated, continuing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non-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which promoted its further expansion accordingly. Although the national and non-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exist,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still non-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questioned, excluded or even denied since its revival. In practice, the improper education policies and in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its legal status always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non-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late 1990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xcessive expansion of non-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was manifested, which enabled the Russian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to reflect on the validity of this form of education, and to become concerned about its development and future. Since 2000,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ssian strategy to strengthen the country, non-state higher education, as part of Russian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became manag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part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Russian Higher Education, Russian Non-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Russian Social Transi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Начавшиеся в 80-е гг. 20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 и рыночные реформы стали основным фоном развития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 1992 г. был издан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образовании», в котором было впервые дано точное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был утверждён его чёткий

правовой статус, заручившись поддержкой в рамках данного Закона,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начало своё крупномасштаб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В 1996 г. вышли пересмотренны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образовании» и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ысшем и послевузовском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м образовании», которые продолжили поощрять развитие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что содействовало дальнейшему расширению масштабов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и конкуренцию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и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высшим 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общая ситуац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 была сформирована, однако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 момента своего появления сталкивалось с проблемой сомнения, избегания и даже отрицан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общества, в фактическом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м процессе та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как не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правовой статус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т.д.,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ли эффектив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конце 1990-х гг. негатив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чрезмерного расширения сферы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заставили росси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и научные круги задуматься о разум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и этой форм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тали уделять данному вопросу больше внимания и рассуждать о будущем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осле 2000 г. вслед за воплощением стратегии мощной державы,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ектор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тал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тал подчинятьс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нормам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стал частью общего планирова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责任编辑 黄翔)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4年第5期

(总第189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 公开发行 ·

定价：24.00元